

戦争が遺したものの——鶴見俊輔に戦後世代が聞く



阅读日本
书系

战争留下了什么

——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日〕鹤见俊辅 上野千鹤子 小熊英二/著

邱静/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是两位知名学者对日本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亲身经历的访谈，记载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与对日本政治的透彻反思，在日本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鹤见俊辅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过战争、反思过战争，是日本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到底有多少是模糊的？那些在西方和中国都有的概念，在日本又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本书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语境引人深思。



“北大出版社社科图书”
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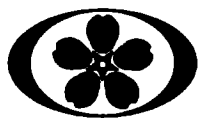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ISBN 978-7-301-25862-0



9 787301 258620 >

定价：45.00元



阅读日本
书系

战争留下了什么

——战后代后的鹤见俊辅访谈

〔日〕鹤见俊辅 上野千鹤子 小熊英二/著

邱静/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3-91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日)鹤见俊辅，(日)上野千鹤子，(日)小熊英二著；邱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

(阅读日本书系)

ISBN 978-7-301-25862-0

I. ①战… II. ①鹤… ②上… ③小… ④邱…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D09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5089号

SENSO GA NOKOSHITA MONO by Shunsuke Tsurumi, Chizuko Ueno, Eiji Oguma

Copyright © Shunsuke Tsurumi, Chizuko Ueno, Eiji Oguma,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Yo-Sha.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Yo-Sha,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Han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Beijing

书 名 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著作责任者 (日)鹤见俊辅 上野千鹤子 小熊英二 著 邱静 译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862-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7.75印张 247千字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前 言

本书是关于鹤见俊辅先生战中战后经历的访谈。

众所周知，鹤见先生不仅是把实用主义介绍到日本的哲学学者，也是杂志《思想的科学》和“变节”共同研究的核心成员。他与九山真男、竹内好、吉本隆明等著名知识分子相交颇深，也参加过“60年安保”斗争和“越平联”。在战争期间，他作为海军文职参与过军队慰安所的设置，而在20世纪90年代，他参加了为向“随军慰安妇”进行赔偿的“为女性设立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以下简称“国民基金”）的活动。

可以说，鹤见先生的诸般经历本身就是从战中到战后的一部历史。笔者与鹤见先生此前虽不相识，但在完成研究战后思想的拙作《“民主”与“爱国”》（新曜社）之后，就很想去听一听鹤见先生的经历。

笔者首先联络了上野千鹤子女士，问她能否与我一道对鹤见先生进行访谈。上野女士不仅与鹤见先生相识，也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民基金和慰安妇问题发表过很多看法。而且，上野女士是“全共斗的一代”，在代际上处于鹤见先生与笔者之间，对“战后”有自己独到的关注点。出于这样的考虑，相较于独自进行访问，我感到与上野女士共同访问鹤见先生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得到上野女士的欣然应允之后，笔者致信鹤见先生，并在京都会面商讨了策划实施事宜。笔者负责协调我们三人的日程安排

并进行联络,鹤见先生承担了座谈会场(京大会馆)的准备工作。于是,从2003年4月11日到13日,我们对鹤见先生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谈。其成果由新曜社结集出版,是为本书。



鹤见俊辅

我们的访谈比预想的还要成功。鹤见先生从一开始就极其坦率地向我们讲述了包括悲惨的战争体验在内的亲身经历。本书中记载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证言和秘闻轶事,都是在鹤见先生迄今为止的著作或访谈中所未曾披露过的。

另外,上野女士的加入也使访谈增色不少。正如我所预想的那样,不论是慰安妇问题还是国民基金问题,由于有上野女士的加入,讨论都能够毫无妥协地进行。而且,对于鹤见先生深刻的战争体验和战后体验,只靠笔者来理解把握恐怕也是困难的。上野女士与我属于两代人,所关心的问题也不相同,把我们两人的问题加在一起进行访谈,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在那三天之中,访谈除了从早到晚在京大会馆进行之外,在去别处吃午餐、晚餐时也在继续,访谈录音总计近三十个小时。录音的整理工作由堪称笔者知己的三位本科生和研究生(松井隆志、贵

户理惠、小山田守忠)以很低的报酬“打工”完成。此外,关于“越平联”的记述,我们请曾任“越平联”事务局长的吉川勇一先生就事实关系进行了确认。在此我们要向以上各位表示感谢。

有过整理采访或访谈经验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访谈记录无法原样照搬就成为文章。为使由磁带记录下来的访谈内容通顺易读,笔者在2003年夏天进行了整理和重新编辑的工作。虽然也担心笔者的整理编辑是否会有损于鹤见先生和上野女士旷达的发言,但我还是努力使访谈现场的气氛能尽量重现于纸面。

本书把对文献出处、时事问题等的注释降到了最低限度,因为我们不希望打断读者品味访谈时的思路。关于鹤见先生的著作,以及笔者发言中所提及的文献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拙作《“民主”与“爱国”》(尤其是第16章)。

书名《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是根据上野女士的提议而定的。起初,笔者对于“战后一代的”这样的提法感到有些别扭。与符合字面意思“生于战后(战败后不久)”的上野女士不同,笔者是在日本战败近二十年后出生的。如果对9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说“你们是战后的一代啊”,可能他们也只会显出困惑讶异的神情。笔者虽然也被包括在“战后一代”之中,但心中却无法涌出这种真实感。

但是,作为指向现代的词语,“战后”仍然在被使用着。这恐怕并不只是因为除此之外就没有合适的词语可以表达现代。可能也是因为,包括对美国的关系、对亚洲国家的关系在内的国际秩序,以及日本诸般的国内秩序,都仍然处在战争余波中“战后”所建立起来的框架范畴内吧。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仍在被“战争留下的东西”所束缚着。正因为如此,可以说,现代仍然是“战后”,不管当事人对此多么没有真实感,现代出生的人们也仍然只是“战后一代”。

“战后”已持续了将近60年,想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但为了把“战后”相对化,就只有去面对“战争留下的东西”、为理解“战

后”而努力。仍然只能是“战后一代”的我们，在仍然只能属于“战后”的时代生活，就必须做出这样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听取鹤见先生的战争体验和战后体验是有意义的，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这个书名也是恰切的。

我们有幸能将此次策划付诸实践。如果本书的读者能够由此了解鹤见俊辅这样一位知识分子的足迹，由此思考战争与战后的历史，并由此分享到访谈现场的理性高扬，我们将感到十分荣幸。

2004年1月

小熊英二

目 录

第一日

作为原点的家庭出身 / 3

近代日本的“第一病” / 3

严母之侧 / 9

父亲与鹤见家的人们 / 13

爪哇岛的残杀俘虏事件 / 19

美国归来 / 19

在海军武官府 / 25

残杀俘虏事件 / 30

与“随军慰安妇”的关涉 / 32

慰安所运营 / 32

与女性的关系 / 37

慰安所里有“爱”吗 / 41

对“国民基金”的评价 / 45

爪哇生还 / 49

杂谈 1 第一日夜 / 55

上野与鹤见的初次见面 / 55

掌握日语 / 58

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 61

第二日

八月十五日的经历 / 69

“那不是敌机” / 69

在战败一方死去的决心 / 74

对特攻队的感情 / 78

沉默的八月十五日 / 82

占领改革与宪法 / 90

拒绝协助占领军 / 90

宪法前言与象征天皇制 / 93

关于宪法第九条 / 97

知识分子的责任 / 101

《思想的科学》创刊 / 105

源自战争体验的多元主义 / 105

“异类交流”的同人们 / 108

刊名的由来 / 111

丸山真男与竹内好 / 116

与丸山真男的交流 / 116

彼此的影响 / 119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 / 123

国家(state)vs 性(sex) / 125

与竹内好的交往 / 132

五十年代的纠结 / 137

《思想的科学》五十年 / 137

大众路线与发掘作者 / 140

朝鲜战争与美国 / 146

桑原武夫与抑郁症的经历 / 151

人的轮廓与性 / 153

战争责任与“变节”研究 / 159

追放解除与“变节”研究 / 159

战争责任问题 / 162

跟父亲的和解 / 165

杂谈 2 第二日夜 / 169

所谓“全历史”(total history) / 169

八卦聚集地 / 173

历史的文风 / 176

作为“纪念文集”的诗集 / 180

第三日**“60 年安保” / 187**

出乎意料的高涨 / 187

“无声之声”与电视的功效 / 189

桦美智子死去的日子 / 192

失败是下一次的准备 / 195

对藤田省三的讯问与对女性史的评价 / 198

对藤田省三的讯问 / 198

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与女性史 / 201

谷川雁与“活动小组村”的女性们 / 204

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评价 / 206

吉本隆明其人 / 210

少年士兵一代的思想家 / 210


全共斗与吉本 / 213

诚实的人 / 217

对“一根筋”的评价 / 220

亚洲问题与鹤见良行 / 224

战后思想的空白 / 224

4  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与韩国的关系以及金芝河 / 229

鹤见良行其人 / 232

全共斗·三岛由纪夫·联合赤军 / 234

全共斗时代 / 234

三岛由纪夫与对死者的评价 / 238

联合赤军与“警探小子民主主义” / 241

越平联与逃兵援助 / 246

遇到小田实 / 246

“进击”心情下的逃兵援助 / 249

逃兵进澡堂 / 252

越平联的组织运营 / 256

疲惫与道义 / 259

杂谈 3 第三日傍晚 / 266

在这儿“散伙饭” / 266

超越个人的 / 269

后 记 / 271

我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译后记) / 275

第一日

1

— — — — —

作为原点的家庭出身

近代日本的“第一病”

小熊 这一次我们是想请鹤见先生谈谈自己的经历。先生青年时代留学美国的经历在《期待与回想》(晶文社)等著作中已多有谈及,所以这次我们想以先生的战争体验和战后体验作为重点。其中会包括许许多多的话题,从“随军慰安妇”问题到战争责任问题,从与战后各位知识分子的交往到“60年安保”斗争、反越战运动,这本身就能成为一部宝贵的战后史。

鹤见 这次空出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我也已经八十岁了,所以三天对于我的余生而言可是很长时间了(笑)。你们问什么我都会回答的。

上野 您这样讲、这样信任我们,我们非常高兴。

鹤见 不过在谈到战争体验之前,还是想说说我的家庭出身。这是与我的思想和行动“方法以前的方法”相关的,说它是原点也好、是制约也好。即使是谈战争、战后,要说明我为什么会在某一时刻选择了某种方法,就要先讲讲这些。我想对此有所自觉会比较好。

尤其是今天二位来访问我,你们的年纪都跟我相差很多,各自的时代体验也不相同,所以呢,像我的行为方式是有这些不同的价值前提的、我是不能不变成这样的,感觉一开头讲讲

这些会比较好。

小熊 那不然就由我先为读者介绍一下先生已经公开的经历吧？这样就免得劳烦先生一一重述了。

鹤见 请吧(笑)。

小熊 鹤见先生 1922 年生于东京。家庭成员精英众多,姐姐鹤见和子是有名的社会学者,堂弟鹤见良行也以亚洲研究而著称。

鹤见先生的外祖父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后藤新平,历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满铁总裁、东京市长等。作为他的女儿,鹤见先生的母亲对自己的长子俊辅非常严格。鹤见先生则对母亲很叛逆,从小就是个不良少年。

鹤见先生的父亲鹤见祐辅从战前的第一高级中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系,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在战前是知名度很高的畅销书作家,还当过众议院议员,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和亲美派,但战时转而支持战争,担任了大政翼赞会的总务。战后他被占领军执行公职追放^①,但在追放解除后又进入了鸠山一郎(同为被解除追放者)内阁,出任厚生大臣。父亲这种反复变节的经历成了鹤见先生战后“变节”研究的原点。

以上这些差不多就是迄今为止公开的内容了。

鹤见 基本上都很对。只有一处不相符。我父亲并不是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京帝大毕业的。他在一高的时候是第一名,但东大毕业时并没有拿到“银怀表”(当时首席优等毕业生会被授予银怀表)。他“高文”考试(高等文官考试)是第二名。儿子查了当时的官报,那上面登了。

上野 那时还是会在官报上登出“高文”考试名次的。

小熊 因为当时这些名次决定了一个人能够升至何种位置,要是在政府官厅的话就是“高文”考试成绩或在东京帝大的名次,要是在陆海军的话就是陆军大学或海军大学的毕业排名。现在的政府官厅之类也还是这样,可以说是没什么变化。

^① 1946 年盟军在日本公布“公职追放令”,禁止战犯等相关人员出任公职。——译者

鹤见 是的。要是东京帝大第一名毕业，基本上就能当上次官或者大臣。不过我父亲这个人气量小，他会讲自己是一高第一名毕业的，但“高文”是第二名他就不说。

我父亲原本是就凭着学习上去的。他家境贫寒，拼命学习，一直拿到了一高的第一名。后来就跟后藤新平的女儿结了婚。因为是这样靠学习去拿第一的人，所以除了当第一之外就没有其它的追求了。就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政治家、官僚，运作着日本。

如果说明治时期是日本近代的开始，所谓知识分子就是在那以后得到了特权地位。在我看来，同一时期在英国、美国、俄国、德国等都没有像近代日本那样的知识分子特权地位。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是能够掌控权力的人，而是像契诃夫的《樱桃园》里写的永不毕业的大学生一样的存在。

但在明治以后的日本，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习得欧美知识体系的人们，他们要担任指导者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们都毕业于一高和东京帝大，这就是当时形成的模式。基于这种认同而着意大量培养人才，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构：通过考试进入那些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把欧美知识讲得头头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权力。

这样一来，大家都想着去当个知识分子吧、考试的时候写上标准答案吧。所以在自由主义流行的时候就写上自由主义的标准答案、军国主义流行的时候就写上军国主义的标准答案，都是这样的人们成了领导者。我从战争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知识分子有多么的卑劣。

我觉得这种结构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大约1905年左右形成的。就感觉人都变了。在那以前，明治最初的知识分子们不是这样的人。比如像若槻礼次郎等等。若槻原来是个弃儿。我战败初期在《思想的科学》采访过他，他既不傲慢也不虚荣，很平静地说着“我是个弃儿”“战争期间不能喝酒真是难受”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还有跟我父亲完全不一样的人，真是

谢天谢地。

上野 鹤见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指学校里的精英吗？

鹤见 是的。因为这些人正是学校制度本身造就的。跟小学一年级学生相比，二年级学生就更高级，跟二年级比三年级就更高级，老师是最高级别，知道正确答案，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假如有比我更牛的不良少年，一年级的老师说“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同学请举手”，他可能就会问“老师，这个问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笑）然后还要问“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吗”之类的。不过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还没这么干过。

小熊 这样啊。

鹤见 如果有人这么问，几乎没有老师能够回答吧。我想只会打这个学生或者给他零分。能在这种制度下得一百分的，就只能是那些按老师所想的意思去揣摩答案、“我知道我知道”地举手回答的家伙。这种优秀生将来成了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一直在对不同的老师举着手，不管老师是自由主义的也好、是军国主义的也好，都是一样。这种肉体习惯就是在学校里养成的。

上野 我在东京大学教书，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学生。

鹤见 这种人聚集的地方之一就是东大新人会。新人会在大正民主时代是为了支持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而成立的。但后来一流行马克思主义，他们就认为民本主义不够彻底、从此要马克思主义了，于是就转到共产主义那边去了。但是，这些人在30年代遭到镇压变节，就又开始讲什么社会主义过时了、以后就是高度国防国家，早早地又转向另一边去了。

学者们也是一样。把欧洲或美国当模本，左顾右盼没有自己的判断，学起来倒是快得很。有着这种肉体习惯的人都有“第一病”。也有少数人例外，身为第一却没有“第一病”，但这样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不管是学界还是评论界，都只是要争做时下潮流的第一名，为此尽是做些琐碎的工作。

一旦形成这种“第一病”的学校制度,出现知识分子的集体“变节”现象也就是当然的事了。因为都是意识不到自己变节的变节,就只是总想要当第一而已。

上野 是。

鹤见 这对于后面要讲到的看待历史的方式而言也是很重要的。有“第一病”的人在评价历史时也总是有明确的标准——历史在进步呀、社会主义比民本主义了不起呀之类的,基于这种标准去说“某某点是该人物的局限性”,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用现下的立场来评价。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带有日期的判断”是很重要的。明治五年就是明治五年,凭自己独立的思考,那时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要这样去看。而不是以某种进步的标准去衡量,说什么现在看来这是当时的局限。不是二年级学生就比一年级学生棒这样的出发点,而是要去看各个时段分别是如何思考的。

这里的悖论是:这种“带有日期的判断”反而能够通向未来。并不是去评断“这是当时的局限”,而是要去思考:当时就只能这样想这样做吗?这样一来就有了与其后的发展不同的可能性或方向了吧。就会知道其后变为现实的某一条路未必就是“进步”,也还有其它的可能性。不这样做的话就谈不上思想史了。我很佩服丸山真男,就是因为他是懂得这一点的。

我认为日本有很多学术领域,历史学也好其它也好,都不明白这一点,都是抱着时间推移就伴随着进步这样的前提。

小熊 最近也有些学者在说“进步史观已经过时了,批判进步史观是新观点”,但您所说的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进步主义批判”吧。

鹤见 这种渐次“毕业”再转向其它的做法还是“第一病”。就是认为之前时代的做法过时了、没用了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想,读历史的时候要把进步和倒退放在一起去思考。不是用现代的标准去判断某个特定时代的思想,而是要退

回到当时的情境、还原到那里去思考。这样做才能够看到可能性。

比如说,在日俄战争之前出现了许多反战论。有像内村鑑三那样的基督教的观点,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观点。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但后来东大新人会拿1904年的反战论跟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反战运动进行比较,毫不怀疑地认为自己一方是进步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要说我从战争体验中得到的,其中之一就是这种思考方式。大学毕业的人轻易地变节,没什么学历的人却有独立的思考。像渡边清、加太浩二他们都只上过小学,却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

这种思考方式也是从跟我父亲长期相处的经验中得来的(笑)。他就是1905年以后的那种人,从小学起就一直是第一名,在一高英法系也是第一名,都是以成绩取人,所以都是二高不如一高、京大不如东大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人是“被造出来的人”,他自己并不是“创造的人”。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讲到了“被造出的自然”与“创造的自然”的区别,跟这是一样的。从明治维新到1904年,有一批人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了明治国家。但后来在明治国家的既成体制之下就尽是些被造出来的人们。

被造出来的人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却很擅长学习。要进行近代化,培养这样的人曾经是必要的。但是只擅长学习就有潜在的危险,要是遇上没教过的事情、没考过的东西,就茫然不知所措了。

小熊 我研究战后思想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之前所有的制度都不行了的时候——哪怕只是暂时性的——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们就出现了。

鹤见 我也这么期待过。但我感觉,战败是产生了一些裂缝,但麦克阿瑟的对日占领和日本的战后重建又把裂缝给补起来了。

麦克阿瑟自己也是个学校里的秀才。从上军校时起就一直拿高分,是那种母亲陪着参加毕业典礼的人。军校的毕业典礼由母亲陪着挺煞风景的吧,我想日本也没有这样的(笑)。麦克阿瑟很聪明,把天皇、文部省、东大这明治国家的三大根基原样保留下来,没有改变培养领导者的方法。这在统治和经济方面是非常有效的。

小熊 我在《“民主”与“爱国”》的绪论里引用了小田实先生说的一个情况,就是日本刚刚战败的时候,东大毕业生没什么人气。那时候政府机关和大企业也没人气,人们甚至说,与其东大毕业后进大公司,还不如早点退学去当黑市商人。但是到了60年代,之前那个时代就被认为不过是过去的一时混乱而已。黑市商人吃香的时代是不是幸福不知道,不过制度是安定下来了。

鹤见 就是这么回事。

小熊 所以要请鹤见先生谈谈从战争到战后的故事,好作为独立思考的精神食粮啊(笑)。

鹤见 好(笑)。

严母之侧

小熊 您跟父亲的关系影响了您看待事物的方式。关于跟母亲的关系,您在《我的母亲》等文章中也提到过,说她是一位非常严格、不允许撒谎的母亲。

鹤见 我妈妈在我15岁去美国留学以前总是体罚我。从我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对于小孩子来讲是极其痛苦难当的。

等我稍大一些了,她也不给我零用钱。小学的时候也是,如果放学路上稍微磨蹭了一会儿,就会受到体罚。在我三岁左右的时候,有一种叫做“华夫饼”的点心,就是两片大大的薄煎饼夹奶油那种,我从自家的柜子里偷出来吃,结果她狠狠体罚了我,还说“生了你这种坏孩子是我的错,我们两个一块拿刀死了吧”。每天每天都在不断地说“你是一个坏孩子”。

小熊 您出于反抗,就不想回家,经常做坏事,您在书里也写到了。
鹤见 是。开始是偷书。因为不给零用钱,所以就把偷来的书卖掉换零用钱。然后就又会被体罚。已经成了恶性循环了。

不过,可能是一种动物式的直觉吧,我知道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当中,她唯独很爱我。所以她才那么狠地打我、捆我。这样一来,我对妈妈就恨不起来。所以尽管她那样体罚我,我从来没有对她动过手。总而言之,就是成了自我惩罚。



父亲家的亲戚(1927年,伯父广田理太郎的庆祝宴会,
父亲祐辅前为俊辅,理太郎夫妇前为姐姐和子)

小熊 鹤见先生“我是个坏人”的基本认识就这么形成了吧。
鹤见 因为每天都被灌输着“你是个坏孩子”了。所以,我的“我是个坏人”可不是从亲鸾或者谁那里学来的(笑),而是由我妈妈给我灌输的。

对孩子而言,母亲是心里的原住民,也是压迫者,可能比斯大林还要厉害(笑)。母亲对孩子的压迫到了什么程度,世间的母亲都是不知道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对此不了解是一个问题啊。

上野 不过最近的女性主义已经开始对女性的加害性有所自觉了。
鹤见 这样呢,我妈妈教会了我两件事。它们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的心

里。其中之一就是“被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上野 啊……(笑)

鹤见 我不想被爱。因为很恐怖。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却唯独我被爱着,被打啊、被捆啊。

小熊 您写过,因为想逃离这样的母亲,就出入酒吧咖啡厅,跟女人发生关系,还多次自杀未遂。

鹤见 是。等到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些酒吧街。到现在还能回忆起去涩谷的情形。而且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在那里喝下足以致命的安眠药,扑通一下倒下死了,把尸体亮在我妈妈面前。这到十四岁为止都是我的理想。自杀未遂大概有5次左右吧。

十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这种状态了,就把我送到美国去留学。去了美国以后,就算喝了安眠药扑通一下倒下了也没意义了吧(笑)。

上野 就是自我惩罚吧。对外的攻击性转向了自我惩罚。

鹤见 因为没法对妈妈动手。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年轻人在进步。不是有人用金属球棒杀死妈妈吗。当然杀人是不对的,但变得能够反抗母亲了,算是一种进步吧(笑)。

上野 不会这么做而转向自我伤害的人现在也有不少。做母亲的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只会想“我这么爱你,你却……”

鹤见 比如说,我妈妈到最后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上小学的时候成绩那么差。母亲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控制着孩子。所以就算晚上睡觉了,妈妈睡在别的屋里,还是会觉得妈妈在听我睡觉时的声息,苦恼得没办法,有一次还抱着被子跑到地下室,在锅炉房旁边铺上被子,才终于安下心来睡着了。这已经是神经症了。这种状态的话,去上学也不可能学得下去吧(笑)。再加上从小学起就偷东西啦、跟女人发生关系啦。

小熊 但另一方面,先生从小就特别能读书,上小学的时候就读了无政府主义的书,读过的书都有一万册了。

鹤见 我知道“无政府主义”这个词是因为小学五年级时读了野村芳

兵卫的文章。也确实读过克鲁泡特金什么的,不过其它很多都是“讲谈本”那些绝不能让我妈妈看到的黄书。但自己就会挺骄傲地觉得“我在读书”,觉得周围的同学都不如我,到了考试就交白卷(笑)。我到现在都很看不上卖弄学问的人,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也成不了最后一名。还是比那稍微靠前一些。丢人啊。

上野 哈哈(笑)。

鹤见 到六年级快小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考试成绩是倒数第六名。但我妈妈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成绩会如此之差。当时的精神病学认为小孩子是不会得抑郁症的,但我明明就是抑郁症。

上野 抑郁症是因为无法达到自己过高的理想或期望而起的,是自我惩罚的症状。会去责怪自己。

鹤见 后来虽然小学毕业了,但在七年制高中的初一年级就被开除了,参加插班入学考试进了当时的府立第五中学,但也是两个学期就被开除了。总是不上学、跟女人发生关系、自杀未遂,所以还进过精神病院。但我妈妈也跟着到了医院,要跟妈妈住在一起,治不好的呀(笑)。

上野 有人说对孩子而言家庭就是强制收容所(笑)。

鹤见 我对妈妈的孝行就只有一件事,就是没有自杀成功。安眠药倒是吞了120粒,但倒在酒吧街上,被巡警给架起来带到派出所,让我把药都给吐出来了。这样就活了下来。

上野 鹤见先生没有自杀成功确实是对父母的孝行。

鹤见 确实如此。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妈妈会垮掉的。但我妈妈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那样做。

上野 您刚才说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两件事,一件是被爱很辛苦,那另一件呢?

鹤见 另一件就是:“我是个坏人。但就想保持干坏事的自由”。

上野 啊?(笑)

鹤见 “坏事”的内容在变。两岁的时候被体罚是因为吃华夫饼,感

觉就像做了十恶不赦的事。

上野 然后就被体罚。

鹤见 我妈妈发现我偷吃了华夫饼,就抓住我打我,说“你是个坏孩子,真是对不起先人。我把你杀掉自己也死了算了”(笑)。

我从这儿学到的是,“正义”是一种惹人厌的东西。要是有人从头到脚都很“正义”,会很令旁人困扰的。我在战后没有加入日本共产党,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因为我是坏人,所以不想到“正义”那一边去。像斯大林那样的人就是同时掌握着“权力”和“正义”的状态。

小熊 这跟您刚才讲到的不要只从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出发去进行判断也是有联系的吧。

鹤见 是这样。只有某种绝对的正义标准可真让人受不了。

小熊 不过另一方面,您在《我的母亲》中写过,母亲是一个绝对不容许撒谎的人,而且,“如果很真诚,她最终又什么都可以原谅,这可能并不能算是完善的思想,但对我来说却是精神的故乡”。您在“变节”研究等著作中,也严肃地批评了那些撒谎变节的人们。

鹤见 也确实是这样。反正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虽说是过分了,但不管怎么说是有以一以贯之的原则的。不过,被她期待着要有原则的我活得真的很痛苦(笑)。从一生下来就是如此了。

父亲与鹤见家的人们

小熊 您母亲对您的期待过高,那您父亲对您的期待也很高吗?

鹤见 是的。连我的名字俊辅也是日本第一位总理大臣的名字。

小熊 就是由伊藤博文在改名“博文”之前的名字“伊藤俊辅”而来的吗?

鹤见 因为我父亲是“第一病”,是想当总理大臣的。

小熊 您说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不会将名称与实体混为一谈的“彻底的唯名论”。在1962年的《幻术的世界》中,您写道:“名称是社

会所赋予的。但是,它只是权宜之物。必须始终由尚未被赋予名称的状态开始,自己去进行新的思考。”这虽然也是受到您在美国所学的实用主义和语言学认识论的影响,但也是从被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的您自己的立场而来的吧。

鹤见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基本上在日本有一种很强的倾向,认为名称本身就等于实体。战争期间我给某个小学打电话,对方却说“没有这么一个学校”,让我反复纠正了好多次,说“这里是某某国民学校”(笑)。就是觉得只要把牌子一换,实体也就变了。

小熊 就像现在的省厅改革一样啊。好像把省厅的名称改了就算是改革了。

鹤见 战后的改革也是如此,把招牌换成了民主主义,就觉得内容也已经改变了。就连日本共产党也是,一给人贴上“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样的标签,就有很多人觉得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或组织真的存在。

小熊 思想始于家庭啊(笑)。被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是什么感觉呢?

鹤见 我很小的时候,到两岁左右吧,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其实是大约两年前我姐姐和子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是跟我家发生的事情有关的。

我5岁左右的时候,家里突然从一直住着的房子搬到了荞麦面店旁边,只有两间很小的屋子。不过因为我是小孩子,只有两间屋子的家也觉得很大,而且附近还有拉洋画的。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看到了加太浩二做的《黄金骷髅侠》洋画(笑)。后来过了几年,我们家又搬回了原来的地方。那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和子告诉我,那是因为家里起了纠纷。外祖父后藤新平娶了一个年轻的妾回来,然后就跟自己的继承人吵了起来,结果儿子把父亲推倒在地。后藤新平就非常生气,说要把他的继承人身份废掉。

小熊 就是要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吗？

鹤见 是的。但当时我妈妈对外祖父非常生气，就像对我生气一样。我妈妈不管怎么说是个很直来直去的人。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不能动手，但据说是非常愤怒地对他讲过“不能这样！”结果后藤新平后来就作罢了，没有废掉儿子的继承人身份。

但经过这样的事以后，这个儿子就没法在后藤家里呆下去了，就临时搬到那边的小房子里去躲了一阵。等后藤新平的怒气平息、他们一家搬回新平的宅子的时候，就把那个房子和我们家在新平宅子里的房子换了。结果我们家就搬到荞麦面店隔壁去了。

因为这样，后藤的继承人一家很感谢我妈妈和我们一家。我跟和子从小时候起，去了后藤家不知为什么总是会受到优待。但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认为都是理所应当的，就总是大模大样的。所以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不过，等我稍大一些以后就觉得奇怪了。后藤新平是伯爵，他家是贵族，我家是平民。但去了这位伯爵家我却能大模大样的。大概两年前跟和子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小熊 比伯爵家还要了不起的孩子啊？……

鹤见 是这样的吧。所以我很早就有了罪的意识。从小就因为外祖父的关系被高看、受优待，觉得好像是凭自己的力量而如此的。但反过来又会觉得非常抱歉，这种感觉一直都挥之不去。

上野 这跟您母亲给您的“你是个坏人”的意识有关联吧？

鹤见 是的。

上野 这种罪人的意识，还有“正义”与“权力”集于一身的状态也不只见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也是同样的。

鹤见 我妈妈后来成了基督教徒。因为我这个不良少年放荡无行，她苦恼得不得了，最后就带着我到教会去，自己受了信礼。但我没有信基督教。我父亲、妹妹、弟弟都是基督教徒，但我没有人。因为我是坏人嘛。

上野 也没有佛教这条路可以走？

鹤见 现有的宗教都没有人。“马克思主义”在我来看也是一种宗教，所以我也没有加入日共。

但马克思本人很伟大，而且考虑问题十分细致周到。像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有一个注释，说使用价值是很重要的问题，但这里提到的价值仅指交换价值。我觉得这很了不起。因为使用价值对不同的人而言是不同的，他尊重这一点，不去对此进行一般性的讨论。这个注释就证明了他是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不过我觉得，虽然马克思是这样，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

小熊 但您一直很关注宗教的事情吧。您在战败初期写过毕达哥拉斯，六十年代关注过新宗教，七十年代前后还谈到过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受教于墨西哥巫师的记录。

鹤见 说起来，过去我家住的地方现在是伊斯兰教会(笑)。我家住的是过去后藤家在别处的一所房子。而后藤家的所在地 20 世纪 30 年代成了“满洲国”大使馆，战后做过黎巴嫩大使馆、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然后成了伊斯兰教会。有意思啊。

上野 刚才问您佛教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对佛教很入迷。而我其实是在基督教徒的家庭中长大的。

鹤见 真的嘛？我很惊讶啊。

上野 是。我的父母都是日本基督教会的教徒(笑)。我没有成为基督教徒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小孩子就想要跟父母对着干，可他们并不是个人，而是负有教义的。所以就一心想着那只能去找别的教义，就投奔佛教了。

佛教有超越是非善恶的思想。原始佛教、镰仓佛教也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觉得您往那个方向走也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禅”也是说要身心合一，谈不上是信仰。

鹤见 我对宗教问题是很关注的，但一读书就发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对我的问题已经给出答案了。帕拉塞尔苏斯(Aureolus Para-

celsus)(中世纪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医学家、神学家)认为,有彻底的基督教信仰的人是无法行善的。因为信仰者知道什么是善行,就会期待行善必将在天国得到回报。这样的话,就成了为了回报而行善,就不再是真正的善行了。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中是有这种矛盾的。

所以这样一来,要说善行,就只能是不信神的人不经意地做了的好事。与彻底的基督徒的行为相比,无神论者不经意的行为才更接近善行。



母亲家的亲戚(1925年。在后藤新平家。最右边是
母亲爱子,新平抱着的是俊辅)

小熊 就是说,抱着“我是正义的一方”的想法去行善是不行的,只能是怀着“我是个坏人”的想法不期而遇。

鹤见 是的。有教义呀、进步呀,并不表示这就是必然。这也是跟我看待历史的方式相关的。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存在于明确无疑的教义里,而是暧昧的、混沌的存在。是有这样的看法的吧。这对我而言,就是“方法以前的方法”。

小熊 所以您才会很喜欢狸猫是吧?

鹤见 我信仰狸猫(笑)。因为战争期间看了宝塚的音乐剧电影《狸

御殿》。不管战争的惨痛多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还是在很欢乐地演着。而且非常有趣。

小熊 您是说，想用狸猫来对抗基督啊马克思啊的教条。

鹤见 要是狐狸骗人呢就会骗成功，是这种感觉吧？但要是狸猫到最后就会露馅啦（笑）。这才有意思呢。

上野 您也说自己是狸猫吧（笑）。

鹤见 我跟街坊会到京都附近的信乐去旅行的时候，就买了一只“信乐烧”的狸猫回来，放在自家的大门口了。狸猫是我的神（笑）。

小熊 是“纯粹率真”的守护神吗（笑）？

鹤见 是啊。所以说，如果要问我妈妈给了我什么，就是给了我这种生活方式的种子（笑）。对我来说哲学的原型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关系，我跟我父亲、我妈妈的关系。这已经是我的思想的根了。所以就想说一说这些。

小熊 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听您讲战时的经历了。

爪哇岛的残杀俘虏事件

美国归来

小熊 然后 1938 年您就去美国留学了,每天背 50 个英语单词,刻苦学习考进了哈佛大学。一起留学的您姐姐和子女士说,到俊辅的宿舍去一看,自我鞭策的话写在纸上贴了一墙,她很吃惊,觉得“墙上贴的戒律可能是把妈妈的教训内化了”。

鹤见 嗯——反正好好学习了是真的(笑)。因为只有小学毕业却一下子要上大学嘛。

小熊 后来在哈佛学的是语言学和哲学。除了和子女士,一起留学的还有都留重人先生等等。

鹤见 都留先生是我今生唯一的老师。他真的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的东西。毕竟我 15 岁的时候,都留先生已经 26 岁了,而且是个特别优秀的人。

小熊 后来您因为用功过度积劳成疾,开始出现肺结核的症状。再后来日美开战了,还被联邦警察逮捕送进了拘留所,说是因为您平时读无政府主义的书,但当时正是美国西海岸开始把日裔送进收容所的时期。再后来您就乘“战时交换船”^①回日本了。

关于美国留学时代的经历,您在《期待与回想》等书中已经

^① 二战时运送滞在交战国的外交人员、留学生等回国的船只。——译者

讲了不少,所以我们想从您在战争开始以后的经历问起。首先想请问您的是,为什么您明知道日本会战败,还是要选择回去呢?

按您之前书里的说法,您父亲本来是个自由主义者,此时却转而支持战争,您对此是很反感的,而且您也不相信日本所宣称的战争目的。但您又觉得“得知败北时想在日本人中间”。可是您还说过,因为读了无政府主义的书,没有与日本国家一体的感觉。那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鹤见 并没有明确的理由。是模模糊糊的。促使人行动的并不是明确的东西,而是模模糊糊的信念。是模模糊糊的,但也是实实在在的。

小熊 虽说如此,能不能请您再讲得具体一点?

鹤见 我被送进拘留所的时候,姐姐和子特地来看我。当时她说她不要回日本。和子在美国学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涉入颇深,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支持日本的战争。而且留学之后就明白,日本是没法战胜美国的。

但她最后还是坐上了交换船,动机只不过是因为“父亲很可怜”。如果自己就这么不回日本了,父亲就可能会被当作“非国民”的亲属而受到迫害。她的出发点就只是这样。她跟我不一样,是爸爸的女儿。

上野 那是和子女士让俊辅先生考虑起这种可能性来了?

鹤见 我并没有想过父亲会受到迫害的事。

上野 如果您不回国的话,对您父亲会有致命的影响吧?

鹤见 可能相当严重。因为我父亲是议员,而且是大政翼赞会的总务。但他已经是大人了,也有一定的地位,我是觉得他必须自己去做个了断。但和子不一样,她是那种会高兴地想着“要是爸爸能当总理大臣……啊那样的话是可以当的”、感到很欢喜的人。

小熊 但要是这样的话,您为什么回国呢?

鹤见 我也不太清楚。但有人问我,要发交换船、你要不要坐的时候,

我就回答说。日本已经快要战败了。那在战败的时候,我要呆在战败的一方那里,就是这种模模糊糊的想法。或者说,不想呆在战胜的一方那里。关于这场战争,不管有多么觉得美国这方是对的,一想到自己跟着胜利者美国、说着英语回到日本的样子就觉得无法忍受。



小熊 也就是说不想呆在“正义的一方”?

鹤见 是很混乱的啊(笑)。并不是理性判断的。

不良少年(1937年5月,东京)

小熊 您没对在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感到生气?

鹤见 对美国这个国家当然是有反感的。不过在美国坐牢的经历倒是很有趣。也有个很个人的原因,就是进了拘留所就不用学习了。

小熊 啊?

鹤见 我只是小学毕业就进了哈佛大学。打那以后就很高兴自己因为学习好而受到表扬。要是在日本的话,我就只会被看做后藤新平的外孙、鹤见祐辅的儿子不是吗。但在美国就不会这样。

所以我就拼命学习,得到了优秀奖。但因为必须要竭尽全力,每天就觉得痛苦啊痛苦啊,痛苦难当啊。跟这相比,进了监狱就不用学习了,不是很好嘛(笑)。

上野 相当严重的优等生病啊(笑)。

鹤见 远离大学生活,天天都是星期天。而且,跟当时日本吃的东西相比,美国拘留所的饭也很好吃,过得很愉快啊。

上野 哈哈(笑)。

鹤见 而且关在拘留所里的人都很有趣。有些人是因为杀人还是什么被关进来的,跟他们一聊,简直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

屋手记》一样。说是杀人犯,人却是意外的好。有个杀了人的拳击手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说着“我全盛的时候想跟世界拳王施梅林打一场的”(笑)。跟这样的人接触的经验都是从拘留所得来的。

但另一方面也会觉得不安,觉得是不是这辈子也就这么完了啊。结果后来哈佛大学教授会投票让我毕业了。他们接受了我在拘留所的马桶上写的毕业论文。

坐上交换船的时候,都留重人是直接从外边社会上过来的。他对我说,“不要紧,今早的《纽约时报》上登出来了,你毕业了”。我这才想,啊这样啊。因为一直都觉得“不会吧”。在监牢里我也没有受过拷问,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民主主义的。

小熊 您写过,日本的大学大概就不会这样对待一个作为政治犯被抓起来的人。

鹤见 然后我们就坐着交换船,取道大西洋,在非洲的莫桑比克换乘了日本的船。然后日本的军人也上了船,讲战时的经历体会。从那以后气氛一下子就变了。

小熊 您在文章里说过,归国子女们变成了“战时的日本人”,这种变化很令人震惊。

鹤见 回到日本以后,发现日本社会也全变了,战前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都转而写些支持战争的东西。而且,要是有批判战争的言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什么人告发。连在自己家里都不能放心。吉田茂就是被住在自家帮忙的学生告密,让宪兵队给抓起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里才是敌国,美国不是敌人”。然后回来的第五天就是征兵检查了。

小熊 从征兵检查合格到被实际派遣之前这段时间,您是什么心情?

鹤见 害怕。原来决定从美国回日本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被征兵。

而且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我结核病加重,经常咯血。骨结核也肿起来了,非常疼。但要是去住院可能就不让我再去学校了,那样的话留学的努力就要被打断了,就是因为担心这个才没有去医院。

所以,我没想到这种状态回日本征兵检查还能合格。虽说对日本输掉战争、自己被炸弹炸死这样的事情是有心理准备的。本来也并没想到日本会在这场战争中胶着下去。

我之前对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也有误判。实际上,支持国粹主义、排斥欧美文化,都是出于对享受着西洋文化的城市里的有钱人的反感。因此对那些非公费留学、靠家里出钱到敌国去的家伙,就得通过再教育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所以我会回国后马上就受到征兵检查,管你什么病啊什么的就都合格了。这下我就觉得,“完蛋了”。

上野 跟预想的不一样了。

鹤见 要是留在美国,就不用让战争脏了手。虽说是被逮捕了,但本来就是抓错了的,我想就算是战时也会被释放的。而且美国监狱也比战时日本吃得好,就算不放出来也比在日本强(笑)。

但我回来了,征兵检查也合格了。于是每天吃完饭就练习长跑,从自家跑到附近的车站去。我想这样就会咯血,可能就不用去部队了吧。但却没有咯血,也不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后来是被派去南方以后,结核菌在体内到处转移,病情恶化了。我没办法,想着海军比陆军多少还文明一点吧,就报名去当海军的文职。

小熊 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一等是军人,二等是军马,三等是军鸽,四等是文职”。文职在军队里是被看做最下一等的。

鹤见 很久之后,我在爪哇病情加重住进了海军医院,上等水兵级别的人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些自愿报名当上等水兵的人非常相信战争,说是没有给长官敬礼啦什么的,抬手就打人。打得自己手疼了,就让人们互相打。

每当这种时候,这些上等水兵之类的人还要自己先训示一番。先说些敕语啊什么的里面的话,什么“诚惶诚恐”之类的,然后才开始打。闻此所想,我在战后结合符号论的内容写成了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1946年《思想的科学》创刊号上的《关于语言的护身符式用法》。

小熊 战时的“皇国”“大东亚”也好，战败后的“占领军”“民主主义”也好，都是被当成附有权威的“护身符语言”而使用的，这篇论文对此进行了批评。也可以说是一篇以战争体验将在美国学到的语言学理论具体化了的文章。

鹤见 是的。

小熊 您报名做海军文职，也是想逃避征兵的，但还真通过了啊。

鹤见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报名文职能通过，是因为海军需要翻译。收集情报、跟德国联络都需要翻译。

当时日本想要从德国引进军事技术，但主航道的制海权被盟军控制着，日德之间几乎无法取得联系。强行突破封锁的方法，一是靠潜水艇（基地设在爪哇），二是靠“封锁突破船”（blockade runner），就是以机关枪武装起来的快速货船，我就被派到了这样的船上。

小熊 这可是相当危险的任务吧。日德之间的潜水艇有好多都被击沉了。

鹤见 执行这类任务的文职人员死的也很多。比如中井英夫的哥哥。中井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是朋友，他哥哥以前是三菱商社的职员，后来被征做文职，被派去执行乘潜水艇运送德国飞机设计图之类的任务。但那艘潜水艇在印度洋被盟军击沉了。后来中井设法找三菱商社看到了相关资料，想以哥哥的故事为主线写一部小说。但这个心愿还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

小熊 您是乘封锁突破船去了爪哇吧。

鹤见 是的。1943年2月，我乘封锁突破船被派往爪哇的潜水艇基地。从那里再经印度洋到德国就只能乘潜水艇了。我被命令在那里下船，进了巴达维亚（1942年日军占领时期改称“雅加达”）的海军武官府。那艘船不久以后就在南方海域沉没了。

那时我20岁。突破船上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日本人，但会德语的只有我一人，所以就好像是他们的命运都交在我的手上了。

小熊 原来只知道您的英语很棒，德语您也行啊？

鹤见 在美国的大学里必须要修一门英语以外的外语吧。我就学了德语。但实际就只有在乘那艘船的时候，还有在爪哇潜水艇基地跟德国的潜水艇队员、军官接触的时候用过。

交谈过的德国人当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位突破船上的厨师。他说“这种战争真是无聊”。他一家人从前在莱比锡还是哪里开着一家餐馆，后来被征兵来的。他说他真的很不情愿。

在海军武官府

小熊 然后您就在爪哇雅加达的海军武官府工作了吧。那里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吗？

鹤见 雅加达海军武官府的武官是一个叫前田精的大佐，他后来升了少将。怎么说呢，他是个很复杂的人，在战争期间也一直在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接触，好像还见过后来当了共产国际委员的陈马六甲（Tan Malaka）。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他马上向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们开放了自己官邸的地下室。但他自己并没有出面。是很有分寸的。

说起来，他是个即使日本战败也相信大东亚解放理念的人。我并不相信日本所宣称的战争目的，直到现在也不认为日本政府认真考虑过这个事情，但也有极少数人是真心相信的。

小熊 虽然很难给他定位，但鹤见先生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吧。

鹤见 这位武官交给我的任务是“给我跟敌人读到的新闻一样的新闻”。因为如果相信大本营发布的消息就没法打仗。经常是大本营海军部说是已经“击沉”的船现在正进攻过来。所以他就要我监听敌方通讯，把他们的战果、伤亡、补给、伙食、士气等情况整理出来，做成日语的跟敌人一样的新闻。

于是我就呆在分配给我的宿舍里，夜里收听敌方的短波广播。每天的功课就是夜里记下笔记，稍微睡一会就去上班，编写当天的“新闻”。我写字很难看，不过有两位女打字员会用日

文给打出来。

小熊 在爪哇还有其它从事这种工作的机构吗？

鹤见 爪哇的日本陆军自己还有更大的情报机关。陆海军的关系很差，就算是同样的事也是由不同的组织来做的。

但陆军这边没有懂外语的人，是让俘虏来收听广播的。所以英文资料收集了很多，却没人能解读。所以从效果上看，我每天五六页纸打出来的新闻可能比爪哇陆军的情报还要充实。

小熊 您听的是哪里的广播呢？

鹤见 路透社、合众社(UP)，然后还有印度新德里的BBC广播。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其在远东的根据地，所以有英方的广播局。但这个印度广播的内容是出类拔萃的好。不管是时事分析还是其它方面都显示出很高的素养。当时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印度的广播节目是由乔治·奥威尔制作的。

小熊 鹤见先生的外祖父后藤新平也是这样吧，被派到殖民地、占领地的都是本土的非主流人士，所以时不时的就有一些很有能力的奇才。

上野 在这些地方发挥了才能也很难办啊(笑)。

鹤见 于是我就夜里监听广播，上午编写新闻，到午饭前工作就做完了。但熬夜很疲劳，而且我是有反战思想的嘛，要是被周围的人发觉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当时要是在日本国内，只要稍微流露出厌战情绪就会有人向宪兵告密。所以我一直是紧绷着的状态，多余的话一个字都不讲。

因为恐惧，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一个人关在屋里。读读宗教的书、听听印度的广播多少心里会安慰一些，就一直下去彻夜工作。都已经成了恶性循环了。从来都没有那样去工作过。干完活去吃午饭的时候，因为疲劳和紧张，拿筷子的手就哆哆嗦嗦地抖。最后结核病加重，就被送回国去了。

上野 恐惧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啊？其他人都不懂英语，所以如果想要消极怠工也是可以的吧。

鹤见 我从15岁到19岁都在美国，觉得日本肯定会战败，也并不是

正义的一方。但周围的人们都在说着“干掉鬼畜美英”、认为日本会打赢。独自一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就感觉极为恐怖。日本人才是可怕的。

所以,跟长官说话的时候,我就要拼命掩饰自己的内心,以至于都会有面部抽搐那样的表现,手也控制不住地在裤子上蹭来蹭去,白色的衣服都脏成黑的了。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小熊 在日本兵当中就没有几个能让人感到安慰的伙伴吗?好像在您的书里写过,虽然经常挨那些年轻的、认真地相信战争目的的水兵们的打,但稍微年长一点、留着胡子的士兵们并不是这样。

鹤见 是啊。留着胡子的士兵们大抵都是厌战的。这个啊,说是一种暗号也好,是传递着某种信息的。

上野 胡子是不服从的标志。

鹤见 是的。那些心里觉得“这种战争真是无聊啊”的人们都留胡子。他们都是些三十来岁的老兵,不得志的“万年一等兵”那样的,一辈子升不上去。

这些人里有个很牛的人物。他以前去过中国战线,因为中队长讨厌他,就命令他到前线去侦查。像这种危险的任务都是让上司讨厌的人去干的。但他最后总算活着回来了。然后中队长就嘀咕说必须向上级报告此事,他就说了句“那我去报告吧”,就被中队长暴打了一顿。

小熊 搞不好会被枪毙的……

鹤见 最后是被关“严重禁闭”^①了。那以后就升不了职了,万年一等兵。

小熊 对这样的士兵,因为部队里出了事上司也得负责,所以在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有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鹤见 能“无赖”至此是很强悍的。他们这些人都留着胡子。不过我没有他们这样的胆量,因为也才刚 20 岁。所以就只是一味

① 日本军队的禁闭处罚分“禁闭”和“严重禁闭”两种,后者食住薪饷处罚更重。——译者

干活。

小熊 有能力干活,却没能做出任何反战的努力,您后来曾经写过这种悔恨的感觉。

鹤见 嗯。我不相信日本政府宣称的战争目的,虽然也有在美国受教育的原因,但在爪哇看到身边的事,也就明白日本人心里“东亚解放”的实情了。

比如,有的士兵把砍杀俘虏试刀当成值得夸耀的事。后面还要说到,实际上我身边就有残杀俘虏的事,也有慰安所问题。而且日本军队显然还在做毒品交易。

日军在中国战场买卖鸦片的事已经有人研究、广为人知了,但爪哇武官府其实也到处充斥着鸦片。武官府的军官士兵都把香烟混着鸦片来抽。我每天要编新闻,但其他人每天没有事情做,就抽鸦片啊、出去玩啊。

上野 很颓废啊。

鹤见 爪哇虽说是前线,还是有可能这样腐化度日,但我因为收听敌方的广播,就知道战线正在日益逼近。日本军队在阿图岛、塔拉瓦岛“玉碎”,幸存者寥寥无几,会听到这样的情报。

于是我就做了个“玉碎计算”的笔记。就是像预言一样的,计算如果敌人到了爪哇大概能有多少人活下来,还有到那时自己会置身何处,就考虑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写了《敌人的国家》《深渊临近》等较长的东西,就是后来修改发表的文章《战争给的字典》的草稿。《敌人的国家》是讲,身处应是“敌国”的美国时战争爆发了,但回到日本后却发现,其实对自己而言日本才是“敌人的国家”。而《深渊临近》是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很快就要打败,所有人都得死,在这种好似被瀑布冲向深渊的情境中,自己将会怎么样呢?

上野 关于自己您是怎么想的呢?

鹤见 在这种情境下,就想着自己要做的最后决断。要是敌人终于来了,我被发到了一枝枪,该怎么办呢?因为不相信日本的战争目的,我不想跟敌人战斗、不想去杀人。所以剩下的选择就只

有：要么拿枪指着长官抗命，要么把枪对准自己自杀。但最终我选择的是后者。连用枪对着长官的气力都没有。

上野 自杀的话，是用枪吗？

鹤见 文职人员平时是不带枪的，枪支由部队管理，也不是随意使用的。等士兵们出去玩都不在的时候，我就一点一点地偷来些鸦片，装在小瓶子里。想着到了那一天，就在杀人之前把它吞了自杀。

武官府是殖民地时期荷兰造的西式楼房，后来被日军接收的。我就想，要是战斗开始了，就到厕所里把门锁上，在那把鸦片吞了。就是不知道要吞多少鸦片才能死，不过反正就打算这么做了。

后来，因为分配给我的都不是直接杀人的工作，所以就埋头于工作了。虽然由于劳累过度生了病，但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了。战时的我没有想要活下来。也不想杀人。就只是这样。

小熊 后来您参加“越平联”^①活动的时候，在1966年的演讲中说，“‘不去杀人’是我反战的根本原则”。

鹤见 是的。但这个问题战后也一直在困扰着我。我会想，那当时如果对我下达了“杀敌”的命令，我会怎么做呢？虽然是想要拒绝服从命令决心自杀，但在战争中每天都在恐惧度日，说不定会屈服于这种恐怖、听从命令呢。

上野 您是会有这种担忧的啊。

鹤见 所以战后我想的是，要做一个能一口气地说“我杀过人。杀人是坏事的”这样的人。这是对我而言最高的理想，这以上的理想自己不会去追求，也不会去要求他人做到。

用和歌来比方的话，如果和歌写得不好、上句与下句意思连不上就被称为“腰折”，而所谓“一口气地说”就是不“腰折”。不论有什么样的恐怖、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被迷惑，能一口气地、一下子地去说“我杀过人。杀人是坏事的”。能想到这一步，我

^① 日本市民为反对越南战争而结成的反战运动团体（1965—1974），全称为“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译者

战后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越平联”的时候都还没有完全的自信。它在我自己心里哲学上的解决是在大约十年之前。

残杀俘虏事件

小熊 但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残杀俘虏的事件是吧。

鹤见 是的。“第二十水雷战队”的舰队司令部到了雅加达,我编写的新闻也要送到那儿去。但这支部队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澳大利亚的货船,说船上的人们看见了自己的舰队、知道了军事秘密,所以不能让他们活着。

于是他们就把我们住地的马棚改造了一下,把这些抓来的乘客关押在里面。乘客中有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性,她并不认为他们会被杀掉。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杀死被俘的平民是犯罪行为。但日本军队对此是无知的。

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人后来怎么样了。我所知道的是杀害印度的果阿黑人的事件。果阿当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日本史上说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①就葬在那里。葡萄牙是中立国,所以葡领果阿的人跟战争毫无关系。他就是偶然被日本的水雷战队抓到了。

小熊 这个印度人被杀害了。

鹤见 对。这个黑人在被关押的时候生病了。情况报告给军医,他们却说,日本军人的药还不够呢,哪有药给这种家伙。然后就说要杀掉他,给发了毒药。这个命令是由住在我隔壁宿舍的文职人员受领的。

后来我听这个文职人员讲了杀人的情形。他们让他带着毒药和手枪,把这个黑人带到指定地点去。在那有海军士兵在挖坑等着埋尸体。这个黑人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杀,还以为是带他去医院,很感谢地跟着去了。

^① 1506—1552。西班牙人。1540年作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前往印度、日本等地传教。——译者

然后给他吃了毒药,但他没有死。于是就把人活着扔到坑里填上土,他还是没有死,呜呜地呻吟着,说是后来就用手枪乱打,直到土里的呻吟声停止了才回去。

小熊 这在战后应该成为战犯审判的对象吧。

鹤见 因为杀害的是与战争无关的中立国平民,在国际法上绝对是犯罪行为。战后对乙级、丙级战犯进行了战争审判,水雷战队的司令长官被处以绞刑。但是,这个命令只是碰巧没有下达给我而已呀。接受这个命令的文职人员就住在我的隔壁。命运会怎样是不知道的。

小熊 有个事情我想确认一下。您在1956年的论文《战争责任的问题》中写过,读到被判处死刑的乙级、丙级战犯的遗稿集《世纪遗书》,有个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因为我的证言被处以死刑,松了一口气”。您在战犯审判的时候作证了吗?

鹤见 我没有给战争审判作任何证言。因为我觉得战争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是不适当的。水雷战队的司令官被处刑,他的遗稿辑在了《世纪遗书》里,但我并没有作证。当然我也没有去告发我的那个文职同事,他也没有受到刑罚。

小熊 还有在您1956年的回忆文章《战争给的字典》中写着,爪哇的杀害俘虏事件是以您监听的敌方通讯情报为依据去追查间谍,杀害了无辜的平民。

鹤见 很抱歉,这个部分是我虚构的。《战争给的字典》是以刚才提到的战时笔记为蓝本,战后修改了很多次写成的,发表前这里加入了虚构的成分。《战争责任的问题》和《战争给的字典》是在乙级、丙级战犯的审判到1955年告一段落之后发表的,但那也还是内容有可能会给人惹来麻烦的时期。

小熊 是这样啊?那拙作《“民主”与“爱国”》中基于《战争给的字典》所写的内容必须做些订正了(2003年9月再版时做了订正)。

鹤见 但需要订正的仅此而已。因为大部分都是事实。

小熊 那《战争给的字典》里关于慰安所的记述呢?

鹤见 那些是事实。

小熊 那么就请您讲讲这些情况吧。

与“随军慰安妇”的关涉

慰安所运营

上野 关于慰安所的事情,我们提些深入的问题也没关系吗?

鹤见 嗯,请问吧。今天我会有问必答的。

上野 您在《战争给的字典》中写了为开设慰安所做准备工作的事,那些女性都是来自哪些国家的?

鹤见 作为日本军队的设施,慰安所是按照军阶分成不同等次的。有士兵去的慰安所、下士去的慰安所、士官去的慰安所,然后还有更高级别的将官去的慰安所。我参与过的是为新加坡等地的海军将校来爪哇而开设的士官俱乐部。除此之外,德国的潜水艇舰队基地不是也设在爪哇么,还有以这些德国将校为对象的慰安所。

我参与的事情首先是决定这个士官俱乐部的选址。有个爪哇数一数二的中国女富豪有很大一片地。我就去接收土地了。

然后将官级别的人到爪哇住在官方宿舍时,还得去找女人服侍他们。我就上街去找能满足要求的女性。

小熊 但您本来的工作不是翻译和通讯监听吗?

鹤见 本来的任务是这些,但因为我是在涉外课,所以那些事也会找到我头上。听敌方的短波广播啦、接收慰安所要用的土地啦、

给远道而来的将官带女人啦,全都属于“涉外”。

小熊 接收土地的名目说是“士官俱乐部”,那您知道是要当慰安所吗?

鹤见 知道。

小熊 接收土地、征募女性的时候,都是用军票^①来支付的吗?

鹤见 我涉及的情况用的是当时爪哇流通的军票盾。

小熊 那这些费用从哪出呢?

鹤见 全都是“机密费”。我也做过会计所以知道,机密费就是把保险柜打开,只记上从机密费里拿了多少出来就行了,不用记是拿去做什么用的。然后议会审议预算的时候也都会通过“机密费”。

上野 跟现在一样啊。被人知道就不好办了的花销啊,接待费啊什么的全都是“机密费”。

鹤见 要是普通的开支,比如买文具什么的,都必须记上钱的用途。但机密费是随便花。

小熊 您在《战争给的字典》里写道,在当地征募了几百名“特务人员”,但通过面试的几乎都是女性,而且几乎都被送进了慰安所,成了给高级将校慰安的“别邸特别人员”。

鹤见 那也是花机密费干的。我看过出纳所以知道。

小熊 那还有先前提过的购买毒品也是……

鹤见 机密费。简直是无法无天。特别是到了“十五年战争”时期^②,根本不知道这些钱都用来做什么了。

上野 那被带到慰安所的女性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鹤见 日本军人喜欢白人女性。爪哇以前是荷兰的殖民地,不过荷兰人都被关进了收容所。但街上还有被叫做“half caste”的人,就是白人和当地人生的混血儿,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应召那种服务

① 战时日本在战地、占领地大量发行“军用手票”作为货币流通,是支配经济和掠夺财富的手段。——译者

② 日本有将1931—1945年期间发动的对外战争总称为“十五年战争”的说法。——译者

的组织。

上野 《战争给的字典》里写，您当时有一个很会办事的同僚去“调集”慰安所的女人，这其实就是您本人？

鹤见 不是，我对当地的情况没有那么熟悉。像刚才说的，我主要的任务是编写新闻。去哪儿能找到那种女人，都是有那方面消息网的同僚告诉我的。

上野 这些女性原来是在当地妓院的吗？还是像战后日本的“伴伴女郎”^①一样，是战争中生活困苦良家女性？

鹤见 主要是当地的良家女性。但那些混血儿里也有平时就做这一行的。

上野 “慰安妇”的状况各个地方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那您接触到的混血儿她们就是在日本占领下自己选择这条路来谋生的吗？

鹤见 我想是这样。跟那些开始是被日军强奸的菲律宾“慰安妇”有点不一样。在田里干活被抓来什么的，我的周围还没有。

上野 这也是各个地域、各种场合情况不尽相同的，所以鹤见先生遇到的也不能被认为是一般情况。印度尼西亚也有荷兰女性在收容所里被强迫卖淫，是可以要求赔偿的受害者。

这个问题也是“荷兰人”的界线要怎么画的问题。在有很多混血儿的地方就有大片的“灰色地带”。一般说来，荷兰人会被作为日本敌国的国民送进收容所，而混血女性不同，不是被收押的对象。她们一方面被白人瞧不起，另一方面又遭到本地人的猜忌，所以既是孤立的被歧视者，又是能脱离当地规范的自由人，是这样吧？

鹤见 可以这么说吧。可能正是因为被白人瞧不起才被容许自由吧。

上野 读《战争给的字典》就感觉，鹤见先生看待这些女性的目光真是冰冷啊。“她们站在将校军官的立场，把按照军官的命令准备酒食的我们看作跟原住民的男仆一样”，您的文章里这样写着。

^① 「バンパン」(音“pan pan”)。这里指二战后主要以美军为对象的街头卖淫女。——译者

鹤见 不知该如何是好啊。这些女性对我们这样的下级人员态度很傲慢。等把她们带来,让她们住在被用作慰安所的一部分机关宿舍里,就会吩咐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半夜把人叫过来说“拿套子来”、早晨按铃说“去准备早饭”什么的。这种体验对我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怎么说呢,就会觉得自己成了以前从未有过的身份啊。不管怎么说,想着“总比杀人强”,就去做了。

上野 白皮肤的混血女性对日本人抱有轻蔑感,又不能对军官们表现出来,就把敌意投向了地位低下的日本人吧?

鹤见 是这样的。我记忆中是被以如此感觉来对待的。我在爪哇呆了不到两年,就我自己所见的情况,这些混血儿想要趁着统治者易人的机会,把之前从纯种白人那里受到的歧视都补偿回来。方式就是在日本的高级军官占有自己的时候利用那一点“优待”吧。

上野 日本军官要找白人女性,这其实也是种族主义吧。

鹤见 是的。基本上,日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也是被颠倒过来的白人崇拜。在爪哇也有好多为日本人比当地人肤色白这种愚蠢的事而感到自豪的家伙。

上野 去慰安所的士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鹤见 是从佐官到将官级别的。这种高级军官都安排在机关宿舍里住。要是尉官就到别的公营俱乐部去。

上野 那里都是什么样的女性呢?

鹤见 专门面向士官的俱乐部找的还是混血儿。荷兰人混血儿相当多。

上野 有日本“慰安妇”吗?

鹤见 士官俱乐部的是混血儿,日本“慰安妇”在别的地方,是在面向士兵的慰安所,还有就是料理店的艺伎。做艺伎的人会弹弹三味线^①什么的,但也跟士官睡觉。好像有从大阪的叫什么“红

① 日本的一种弦乐器,有三根琴弦,用拨子弹奏。——译者

玉”之类的组织来的人。料理店只有士官可以去，下士和士兵另外有别的慰安所。不是把台湾、朝鲜的女性强行拉去当“慰安妇”么？

小熊 还宣称要构筑推翻白人统治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日军造出的这种女性等级完全就是对此的背叛。

鹤见 在爪哇也并不全是像我直接接触到的混血儿那样的情况。军队自己就另外设有都是朝鲜、台湾“慰安妇”的场所。不过这种慰安所在爪哇哪里、如何分布，我并不清楚。

上野 德国军官的慰安所是什么样的女性呢？

鹤见 那里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恐怕也是混血儿吧。因为她们多少懂一点荷兰语。讲荷兰语在德国人那里是可以通的。

上野 她们平时说什么语呢？

鹤见 说马来语。

上野 日本军官说马来语吗？

鹤见 军官不说，在慰安所也不需要说话吧。

上野 您接触过朝鲜“慰安妇”吗？

鹤见 在爪哇基本上没有。后来我的结核病严重起来，生了骨疽，被从爪哇送到新加坡，然后换乘去日本的货船时遇见了一起坐船的朝鲜“慰安妇”。当时不断有运输船被美国潜水艇击沉，所以在等待护卫船来组队集合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船舱底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要是我能随意跟她们讲话，我很想问问，你们从哪里来的呀、为什么要来这里呀。呆在货船舱底的时候我们都有了些近乎友好的关系，但我不能问。

小熊 建立了友情吗？

鹤见 相互之间是友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彼此都有那种动物式的直觉能感到是这样的。我对她们没有轻蔑的态度，她们也不会去告发有反战思想的我。而且一起呆在舱底的人们，一旦挨了鱼雷就会死在一起吧，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自然地有了亲近感。当然了解是有限的，但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关系了。

上野 她们都起了日本名字吗？穿的是和服吗？

鹤见 是被起了日本名字的。但穿的是西式的衣服。料理店的日本艺伎是穿和服的。

后来我被送到别的船上回到了日本，也不知道她们后来怎么样了啊。恐怕在当时的状况下，船被鱼雷击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与女性的关系

上野 您刚才说的跟朝鲜女性的相通感觉，跟您之前所说的对混血女性的感觉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在读您的《战争给的字典》时，感觉其中所写的女性都是没有面孔的，或者说是没有被当作个人来写。

鹤见 那是因为没有性方面的关系啊。我是个不良少年，很早就开始有了男女关系。后来到美国留学以后，抑郁症是治好了，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战争期间，都完全没有跟女性发生过关系。是自己要装成这样的。

上野 您说装成这样？

鹤见 就是说自己要刻意装成在肉体上对女人什么反应都没有。所以都留先生因为只见过在美国时候的我，还对我说“你呀，不要光是学习，也得要稍微调剂一下的”，说“我能一口气说出大联盟里打击率^①排名前十的球手哟”。他不知道我以前曾经是个不良少年。战争期间我的同僚们也都不知道。

小熊 您写过，您也从来没去过慰安所，每天晚上就在宿舍里读宗教的书，克制自己。

鹤见 在爪哇做文职的时候每月会发避孕套，所以一般人都会去的。不过我因为少年时期净干那些事了，就觉得现在要去拿国家发的这些跟女人发生关系，就好像伤害了不良少年的骄傲似的。

^① 棒球安打数对全部击球数的比率，是评量打击手成绩的重要指标。——译者

小熊 但在军队里如果你不去慰安所的话,就会被看成是“奇怪的家伙”吧。

鹤见 是的。会说你“不合群”。后来有一天,他们聚在宿舍里一边窃笑一边弄着什么东西。机关宿舍里有差不多 100 来人,原来他们是在做个什么“童男排名表”,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相当于相扑手排名表里“横纲”的位置。

上野 这是军队里一种侮辱性的排名吧。

鹤见 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他们会觉得,童男的话,大概是没胆子去嫖吧。

上野 对这种侮辱,您没做任何辩解?

鹤见 就说我有结核,不去慰安所是因为对健康不好。

上野 我觉得,您看待女性的目光很冰冷,好像并不只是因为您没有跟女性发生性关系。

在您的《战争给的字典》里,只有一位当地的女性是有面孔的。您说梦见在后面追着这个女孩子,从军队逃走了。她跟您可能没有发生过性的关系,但却是有面孔的。

鹤见 是说罗奥姆吧。她是个在机关宿舍打杂的女孩。

上野 为什么只有她……?

鹤见 不知道……反正是有从那种恐怖的状况里逃出去的想法。想和上野君说的那位有面孔的女性一起生活,也有这样的想法。日本人那么可怕,就觉得就跟当地的女性一起生活,不回日本了也好。

上野 但怎么没有行动?

鹤见 一个原因是害怕当逃兵被宪兵抓住关严重禁闭。要是在爪哇逃走就会被陆军宪兵抓起来。而且按照日本的军法,发现逃兵是可以当场击毙的。

上野 这种恐惧是主要理由吗?

鹤见 但也并不仅仅是如此。在我心里,对女性有一种禁欲主义式的安排,没法下定决心跟女性一起生活。也是因为有这样因素,就没法温暖地描写女性。

有个叫做黑田三郎的人,就以非常温暖的笔触写过在当地一起生活的爪哇妻子的故事。当时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如果我做着军队文职的工作,再跟某个女人一起生活,罗奥姆也好别的人也好,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当文职领到的薪饷足够娶个当地人做妻子了,但我把其中的三分之二都寄回家了。

小熊 但您家是名门望族,没有必要给家里寄钱吧。

鹤见 经济上是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让妈妈放心。

我在日本读到中学就被开除了,所以尽管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了业,战争期间在日本也是被当作小学毕业的文职人员来对待的。所以工资没有那么多高。这个我妈妈也知道。从里边拿出这么些钱来寄给家里,妈妈就可以相信我没有像不良少年时代那样放荡度日。是作为这种证明来寄的。

上野 跟您母亲的关系这么重要啊?

鹤见 我妈妈把这些钱全都存起来了。战后都还给了我。战争结束后我没有再要父亲的钱,就靠写东西生活。多亏有这些钱啊。

小熊 您写过,您对父亲的变节持批判态度,不想在经济上依靠家里。

鹤见 是的。那笔钱到战败时有五千多日元。要是在战前的话能造一所房子了。虽然战后通货膨胀了,但也是笔挺大的数目。

小熊 薪饷的三分之二都寄回家,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做什么用了?

鹤见 文职是给提供三餐、住宿的。所以剩下的钱就用来买书了。雅加达从荷兰殖民地时期起就是城市,所以有欧洲的书籍。德语的康德全集啊,叔本华全集啊,都是那时买来看的。

上野 回到刚才的话题,您对那位做勤杂工的女孩有这样的梦并不难理解,但我还是想问,为什么只有这个女孩是例外,而对其他女性的描写都是没有面孔的?为什么您对女性的目光如此冰冷呢?

鹤见 不,还会想要跟女性一起逃走,那就不是只有冰冷了。

上野 那在您回忆那些跟高级军官来往的女性时,是让人感觉不到面孔或个性的,这是为什么呢?

鹤见 不是啊,上野君,就算你追问这些理论的、像戴着面具一样的问题……(笑)

上野 这不是理论而是感觉啊(笑)。

小熊 我想是身处在那种极端的环境当中,要逐一去分辨每个人的面孔和个性的话,神经承受不了吧……

上野 可能下边要说的稍微有点离题,不过我在想,战败初期的日本也有那些跟占领军士兵来往的女人。您对她们也是同样的看法吗?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引用过这样一个插曲:跟占领军士兵在一起的日本女人,对穿得破破烂烂复员回来的笔者抛下一句“残兵败将”,当时这位复员的士兵真是怒火中烧……

小熊 是鹤见先生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里引用了猪狩正男的文章。

上野 也就是说,攀附在占领者身边的女性,在爪哇就是那些混血儿们,她们一方面也是占领和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却同时又对地位更低的男性显出傲慢的姿态。是不是可以说,您对这些女性的反感就表现为对女性描写方式的冰冷了?

鹤见 当时确实感到了那些混血女性的傲慢,不过我并没有想着自己也要变成海军少将级别、跟那些姑娘一起睡觉之类的。什么要在军队机关里再往上升一升、不受那些混血女人的侮辱等等,也完全没有想过。

倒是我的同僚们看我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我懂英语,所以要是去那些有混血儿的酒吧的话,就会比较受欢迎、能过得很愉快吧。但我不想用英语。听短波广播那是命令,没有办法。但我不想愉快地操着英语在混血儿当中度日。像刚才说的,她们既受当地人歧视,也受荷兰人歧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某种自由。

小熊 您说过,您决定从美国回日本的时候,尽管知道日本会战败,但是觉得忍受不了跟着胜利的美军、说着英语、若无其事地回到日本的自己。不愿意操着英语愉快度日,也是这样一种感情吗?

鹤见 是这样的。

上野 这些受到双重歧视而孤立的混血女性,为了生存去投靠新的权势者、出卖自己的肉体,您不会对她们抱有同情吗?还是想追问这一点。

鹤见 对她们这样的人我是尽量不想去接触。不想被引诱。

上野 不想被引诱是说?

鹤见 那时是我 13 年之久没有男女关系的时期。从去美国到 1951 年,完全没有跟女性发生关系。

这个禁欲啊,是要让自己对女性的态度很冷。禁欲是让人变得冷酷。会不正常地神经过敏、接触恐惧症。要是跟女性有关系,自己的秩序就会崩塌,是抱着这样一种警戒心的。在那 13 年中,我想我是个非常冷酷的人。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刚才上野君说的冰冷是从这里来的吧。被追问至此已是无路可逃。

慰安所里有“爱”吗

小熊 我想稍微转移一下话题,您对女性的看法是这样的,那对去慰安所的日本男性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高级军官另当别论,对年青士兵是同情的。海军 18 岁就可以报名。志愿来的这些青年很多都是很老实的,之前在日本也不曾像我那样放荡度日。他们来到战场,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回日本了,又第一次领到了些钱,就会去找女人的吧。

要说怎么看待这些青年,我也没资格说“因为年轻所以更真心地去做吧”之类的话。因为我生来就是个不良少年。但在他们看来,会觉得我也一把年纪了,却是个童男。不过我想这种误会还是不去澄清的好。

小熊 就是说,对那些还没有过什么却可能就要死去的年轻人去夸耀自己的经验是残酷的?

鹤见 嗯,是这样。而且,这些再也回不了日本的青年去慰安所,可以

得到慰安所的女性的爱。很明白。作为女性这边来讲,虽然是有各种各样的“客人”,但十八九岁的青年来了,还是会带着温情,好好对待他们的。

上野 这些女性是哪里人呢?

鹤见 日本人。有艺伎的料理店是士官以上级别才能去的,但士兵去的慰安所有的也有日本女性。

上野 她们跟台湾、朝鲜的女性在同一个地方吗?

鹤见 我想因为她们之间会有歧视,所以都是分开的。但士兵去的慰安所里的日本女性大都是上了点年纪的。她们恐怕是当了很长时间的应召女,然后才来爪哇的。

小熊 您在《期待与回想》的末尾提到了这些青年士兵和女性:“18岁左右、认真不已的青年来到战场,知道自己没法再回到日本了,就在那里抱着四十来岁的慰安妇,寻求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好的慰藉,对此深怀感激。这样的事情是实际存在的。”“我觉得那是爱。”

这些说法在当时还受到了批判吧。您这种看法到现在也没有变化吗?

鹤见 就像在那本书里写过的那样,慰安所是日本这个国家凌辱女性的场所,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我觉得,爱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去纯粹培养出来的。在任何情况、以任何方式,爱都会发生。

所以即使对象是慰安所的女性,爱也是可能的。假如我不曾有过放荡少年的经历,而是直接报名参加了战,在看到当地的情景幻想破灭、开始真正地厌恶战争的时候,要是去了慰安所,有个人关心我、给我安慰,我想就有可能爱上她的。

上野 把那些青年所怀有的感情看做是“爱”,考虑到战争的极端状况,可能还可以接受。但从那些女性的角度看又是如何呢?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来很多“客人”,虽说会对那些青年们更好是有可能的,但把这叫做女性的“爱”合适吗?

鹤见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有过各种放荡的经历。在那些花柳巷中,我觉得她们是很接纳我的。但自从去了美国以后,我就觉得那都

是因为我家很有钱,不过是因为这个阶级的背景我才受欢迎的,就全都理解为是一种屈辱。就是在自己的心里把受女性欢迎有交情这样的经验切断了。从那以后就像刚才说的,开始跟女性隔绝了13年。

但这种理解是理智上的,不是感性的。如果抛开这种切断的理解方式去想想看,我觉得她们其实直觉上都知道,我虽然家庭优裕,但也是个不幸的人。一个14岁的孩子这么放荡,怎么会是个幸福的人呢。她们对这种不幸抱有直觉或者说同情,就会想为我做点什么对我好。我想这也是爱的一种。

所以就算是在慰安所那种状况之下,我想这也是有可能的。18岁志愿参战、怀着没法再回到日本的绝望心情的士兵,去找某个固定的女性,让她对自己好,这应该是会有的吧。虽说没有严密、实证地听取过对方的意见也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上野 我也并不怀疑就算在这样的地方“爱”也是可能的。实际上,“慰安妇”的女性当中也有人跟日本的下级士兵恋爱。还有人在战争濒临绝境时跟日本士兵一起殉情。在没什么选择的情况下,要是有个纯真的青年士兵来找自己,对她们来说也是很欢喜的事吧。

但是这也是在权力关系下发生的。无论如何也没法说这是她们自己选择的。她们说自己是受害者也是有理由的。

鹤见 是这样的,这确实是如此。

上野 您承认这一点啊。

鹤见 这当然是承认的。不过呢,人的感情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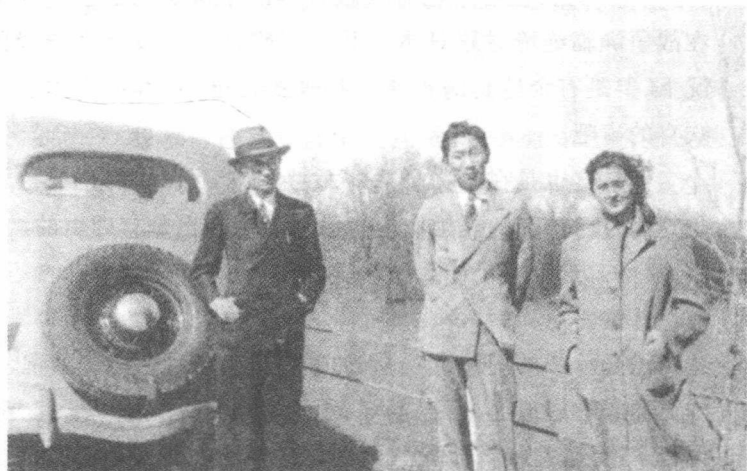
比如坪内逍遥,就是娶了妓女做妻子,过了一辈子。我觉得很了不起。还有马场恒吾,也是这样的。我想他们夫妇之间是有爱的。这样的爱是可能的。

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在不良少年时代交往的那些女性都很接纳被学校开除了的我,我很感谢她们。虽说也会有因为有钱才被接纳的屈辱感,但直到现在都还有感谢的心情。如果没

有爱,是不会留有感谢之情的。



上:美国留学时代(1939年,剑桥藤代博士邸。后排高个子的是东乡文彦,前排左一是鹤见,他旁边是都留重人)



上、下:美国留学时代(1940年,波基普西(Poughkeepsie),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附近。右起:罗斯玛丽、东乡文彦、鹤见、东乡的汽车)

小熊 听您这么说就觉得,您那句引起争议的“我觉得那是爱”,体现的是您对那些“青年”的爱。

鹤见 是,这是真的吧。

再来讲个小插曲吧。东中野有个咖啡厅,我在不良少年时代跟那儿的女招待有了关系。然后为了证明我真的是认真考虑过很多,就让姐姐当使者去传话。和子就真的去找那个女孩了。我很感谢她。

上野 您相当信任您姐姐啊。

鹤见 现在想想很不像话啊。然后姐姐就替被学校开除的我到离东中野城区很远的咖啡厅去跟她传话。有这样的关系,我想对方完全没有爱、只是为了钱是无法想象的。

小熊 您虽说跟女性断绝了往来,却比别人更加倍地信赖女性不是吗?

鹤见 信赖也是有的,戒心也是有的。因为从小时候起就对妈妈有戒心了。

但是,我喜欢女性。所以,“女人这玩意”这样的话,不管怎么下决心也好,我都是没法说出口的。刚才说我对女性很冰冷,也许是吧,但这里并没有对女性的轻蔑。

上野 刚才您所讲的都包含着真情实感,我们能体会得到。不过,您说到坪内逍遥他们,我还是会想,“在男性看来可能是真爱传奇,但女性的一方是什么感受,不问问她本人就无从知晓”。在女性这边看来,爱可能是有的,但权力关系也是有的,是二者兼具的。

鹤见 不,我不觉得那是“是 A 还是 B”那样的。爱与受害二者都是成立的。但同时那里是有爱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能让步。

对“国民基金”的评价

小熊 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话题,请您谈谈“为女性设立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以下简称“国民基金”)。

1991年,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女士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1993年,日本政府承认日本军队参与了慰安所设置。



1995年,战后五十周年的国会决议发表。在此期间,以对“慰安妇”进行“日本国民的赔偿”的名义,在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了“国民基金”。

参加该基金的有国际法学者大沼保昭、俄国史学者和田春树、朝鲜史学者高崎宗司等,他们都曾长期支持日朝日韩友好和民主运动,并致力于在日外国人权利等问题。但与此同时,“国民基金”在日本国内也受到了批评,说它是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正式赔偿和道歉而设置的,很多过去曾是“慰安妇”的女性也拒绝领取赔偿金。这之后,该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三木睦子女士退出,像和田先生那样致力于日韩友好的人士也遭到了批评。

鹤见先生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该基金会的发起,刚才说“觉得那是爱”的说法招致了批评,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那这个问题您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

鹤见 从我个人感情的角度讲,我觉得日本应该以国家的名义明确承认曾强征慰安妇,并进行赔偿。所以在这样的国家赔偿实现之前,设立这种基金会都应该要慎重吧。

上野 在这个场合,应当赔偿跟有没有爱是没关系的吧。

鹤见 没关系。因为在各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说在菲律宾完全就是强奸女性,把她们驱赶到慰安所。

上野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要是您在爪哇接触过的那些混血女性说“我受到占领者的蹂躏”、要求赔偿的话,您认为她们有这个资格吗?

鹤见 从个人感情出发的话,我认为从朝鲜、台湾被抓去的女性应该优先赔偿。但我并不认为对她们就应该锱铢必较地拒绝赔偿。

基本上从“大东亚战争”开始,当权者一方做的都是非常轻率无谋的事。所以,我想就算是一不小心赔偿多了,不也很好嘛。

但“国民基金”的情况是,虽然募集到了钱,发放时却被拒绝接受。发放难是和田、大沼和我都没有料到的。这是判断失

误了。

上野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判断失误”。

鹤见 有受害的女性说,如果不是日本的国家赔偿就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原来觉得,一方面尊重这样的立场,一方面给其他人发放基金的赔偿,不是也可以嘛。但没有想到拒绝接受的人如此之多,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

上野 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会不会是跟您不太了解日韩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运动情况有关?这些运动预想到了受害者是不会接受那样的赔偿的。在“国民基金”的构想出现之前,我们曾经私下讨论过不要政府插手干涉,自己筹款成立真正的民间基金。但考虑了种种情况之后,觉得会遇到太多的困难,就中途放弃了。

鹤见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萨哈林的问题进展得太顺利了。日本战败后,战前日本领有萨哈林时迁去的朝鲜人滞留在那里,他们回国的事情随着冷战的终结成为可能。那时在大沼保昭和原文兵卫的活动下,日本政府与韩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得以顺利进行。“国民基金”成立的时候就是和田跟大沼叫我参加的,我以为会跟萨哈林的事一样可行的。

上野 我现在很关心“国民基金”的历史评价问题。“国民基金”是带有期限的运动,结束之际应当来做个自我评价。在参加运动的人们看来,它已经近乎于一场脚踏圣像式的信仰考验^①了。所以要评价它本身就是一种火中取栗的行为,但是,正是出于对和田先生和鹤见先生的敬意才更要做。

那我想请问您的是,您刚才说是“判断失误”,那发现政治行为出现判断失误的时候,光从感情上讲“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诚意是有的”是不行的,而是要就结果追究责任的。发现判断失误之后,为什么没能进行政治上的修补或者纠正呢?

鹤见 有判断失误的事情,我之前也都公开讲过。我想国民基金内部也有其他人中途发觉是判断失误了。

^① 江户时代禁教,为证明不是基督教徒,会让人用脚踏刻有圣母、耶稣像的木板或铜板。——译者

上野 发现判断失误的话,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个人承担责任,辞去召集人的职务。三木睦子女士就辞职了。另一个选择是在发现判断失误之后,努力在政治上改变“国民基金”的方针。但是基金的各位并没有这样做,相反还去批评受害者的混乱和运动的分裂,而这本来是由各位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

鹤见 不,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做”。最好的方法是将接力棒交给有更好的赔偿方法的人们,跟他们合流。我想和田春树的想法比较接近于此。他在国民基金遇到批评和抵制时说过,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好的。

上野 这还是感情上的东西。因为判断失误导致了运动的混乱和分裂,造成了二次伤害,对此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您觉得“国民基金”留下的是什么呢?

鹤见 我觉得至少是公开了此前日本政府并未正式承认的慰安所的存在,留下了记录,播下火种让事情开始广为人知了。我想“国民基金”最起码是做到了这一点。

上野 但最初播下火种的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站出来揭露实情的女性们。日本政府是被点火的对象。

鹤见 虽然是如此,但“国民基金”也起到了这种效果吧。

上野 您刚才所说的“在播下火种的意义上,有国民基金比没有要好”,是说对谁好呢?我听起来像是对日本好、对日本人好的样子。如果只是“对日本人好”,那换句话说就是“自我满足”了。那是否对受害者好,要由谁来判断、根据什么判断呢?

鹤见 可能是“对日本人好”吧。表明有那样的事实,把握战争这个东西,对所有亚洲人来讲都是必要的不是吗。对各位受害者而言,也有了一个机会留下访谈、记录等等。

当然,因为这些记录工作等等的积压,引起了对我参与之事的批评,对此我甘愿接受。

上野 鹤见先生您曾经表达过“我成了被不断击打的沙包”的感悟。这作为您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站在那些必须要去不断击打这个沙包的人们的立场上看,又如何呢?

比如以韩国的前“慰安妇”女性们为主,人们每周三都会在日本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这个活动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这十年里,她们都老了,也有人去世了。她们也希望日本政府能正式进行道歉和赔偿,也希望能就这样放下了。从她们的角度看,就算鹤见先生说“我成了沙包”,也……

鹤见 是啊,是这样。

小熊 上野女士,那这些就先……

爪哇生还

小熊 我想请问鹤见先生,“国民基金”成立的时候,关于各位受害者希望得到何种形式的赔偿,在基金内部有过讨论吗?当时虽然已经有了针对日本政府的赔偿诉讼,但应该也会有人觉得能得到其它形式的“补偿”也可以——这种判断我想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最初有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讨论呢?

鹤见 实际上我一次会议也没参加过。大沼跟和田让我加入,我就捐了一些钱。但他们内部有什么样的讨论我并不很清楚。不过我想他们没有预料到会有那么多困难。

上野 困难估计会很多,日本也有社会活动家预料到了。根本不能算是意料之外。会使受害者和运动分裂也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批评。说是意料之外,是因为听不到这些批评吧?

小熊 “国民基金”成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是日本政府惯用的手段”。从我研究过的历史来看,明治以来的日本政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不体面的事情、麻烦的事情交给外围组织或民间团体来做。要是成功了就是政府的功劳,要是失败了就像蜥蜴一样把尾巴一断,责任和批评都推到外围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头上。慰安所的营设也是这样,实际上都是军队在运营征召,却说“那是委托民间业者去干的”,就用这样的说辞来逃避。

所以国民基金“也还是个被当作外围组织的存在吧”——

虽然这么说对不起参加“国民基金”并付出努力的各位,但我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在这方面,参加“国民基金”的各位是怎么看的呢?

上野 那是和田先生和大沼他们对待日本保守政治现实的“现实主义”。他们觉得,政府正式赔偿没有希望,那么就算是当外围组织干不体面的事,也是保守政权之下能有的最大限度的成果了吧。那在1995年的时候,名义上还是社会党村山富市任首相的,等自民党再上了台就连这也做不成了,是这样的一种预期。

我想和田先生他们是持有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不得不说他们对政治状况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其后很快就又回到了保守联合政权,一直持续到现在。

小熊 这作为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主义可以理解。但这个问题是跟韩国等国际政治的问题相关的。在韩国,这个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国民基金”不仅受到各位受害者的批评,还被指责说是燃起了韩国的民族主义之火,政治现实主义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吧。

上野 成立“国民基金”时是根据国内政治的现实主义来判断情况的,国际政治没被纳入考虑范围吧。

小熊 我想各位受害者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担心自己年老后的生活、希望给家人留下点钱,这样的想法也是有的。本来从日本战败到朝鲜战争再到后来,她们都是历尽艰辛,在经济上也吃了很多苦头,有人希望得到补偿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上野 是的,是这么回事。

小熊 恐怕和田先生他们是抱着多少给这些受害者一些补偿金的想法设立“国民基金”的。可能在受害者中间也有人觉得国民基金不也不错么。但是,随着韩国国内政治状况的发展,就不再是凭单个受害者的判断来看待问题的氛围了吧。

当然,如果日本政府进行正式赔偿,本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我并不是要批评韩国政治的变化,而是想说,这样的情况在成立国民基金的时候可能是预料不到的吧。

上野 关于这些变化,要是连在日韩交流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和田先生都判断失误,到底谁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呢?就连和田先生恐怕也对韩国女性运动的现场情况没有什么了解吧。

小熊 冷战终结以后,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太过急剧了,我觉得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本来在1988年韩国民主化之前,要求日本进行战后赔偿的运动跟民主化运动一样,是受到韩国政府镇压的。对于前“慰安妇”的女性们关注程度也并不高,苦于生计的人们也很多。

但在88年民主化、91年苏联解体的背景下,91年就有了金学顺女士的诉讼。其后数年中,韩国国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韩国政府也开始对受害者进行生活保障援助。和田先生虽然长时间致力于日韩关系,但到了90年代,这些从前意想不到的变化接连出现,可能也无法都很好地预测吧。不过这些还是得问过和田先生他们才能知道。

鹤见 现在看来,韩国也好,菲律宾也好,要是能分别根据各地的情况去判断和推进就好了。韩国的话,难得有和田从70年代起就致力于金大中的人权问题,并长期为日韩交流而努力,就算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也应该能有其它办法的。

上野 是啊。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去进行判断。我看到和田先生就觉得很可怜,那样长年来致力于日韩交流的人,却在日本和韩国都受到批评。是出于对和田先生的尊敬和同情才会去涉及与“国民基金”相关的事情的。

鹤见 暖,说实话,我没有退出“国民基金”的理由也就只是这个。中间已经发现是判断失误了,要是像三木睦子女士那样退出了,也就不会有问题了。可是,我跟和田、大沼在“越平联”、战争审判批判时就打交道,日韩问题也一直都是一起参加的,要是自己就这样撤退了,是违反我的“黑社会道义”的。

上野 让这样一位战后日本堪称一流的知识分子、良知所在不得不遭受如此批判之苦,这样的运动到底是怎样的呢?这样的想法总是挥之不去。

小熊 “国民基金”陷于停顿、批判指向了和田先生他们，这样的事态日本政府是没有预料到的。直接负责的官员们可能也有认真的人，但作为组织，被认为是依照那种逻辑行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鹤见 我从前是不良少年，比和田、大沼他们还稍微多点鬼主意。虽然他们可能觉得村山政权期间是个实现国民基金计划的机会，但政治的门外汉想利用这样的机会，结果捉鬼被鬼捉，反倒是自己被利用了啊。

上野 您是说和田先生和大沼他们是政治的门外汉吗？

鹤见 那他们不像我一样是政治家家庭的第四代嘛（笑）。

上野 啊（笑）。

小熊 这么说就没办法了（笑）。

鹤见 从我母亲这边的家系来说，我就是政治家的第四代啊。所以我特别讨厌政治家。他们都是些不管做什么都要先从解读内幕开始的家伙。

上野 不过您以前都没有讲过参加“国民基金”时您自己是如何考虑的呢。川本隆史批评您的时候您也没有写过反驳的文章。后来藤田省三先生写的“我坚决支持鹤见”的文章您读过了吗？

鹤见 啊，真是乱来啊，藤田。因为他也是个黑社会嘛（笑）。

上野 但鹤见先生自己却保持沉默。

鹤见 ……坏人要写文章为自己辩护，是很难的啊。

上野 “很难”是一回事，那有想辩解一下的想法吗？

鹤见 这种笔仗造出了新文体，还成了导火线引出一大堆事情来，意义何在呢。没有这样的想法。

上野 结果没有这样。

鹤见 确实存在预料不到的不周之处，我是承认有错误的。但我觉得就算我这么讲了，事情也不会就此转折有所进展，所以还是保持沉默吧。出于黑社会的道义，不能丢下和田春树不管。从“越平联”开始，这三十八年我们都是一起的。所以就一起代人受过吧。如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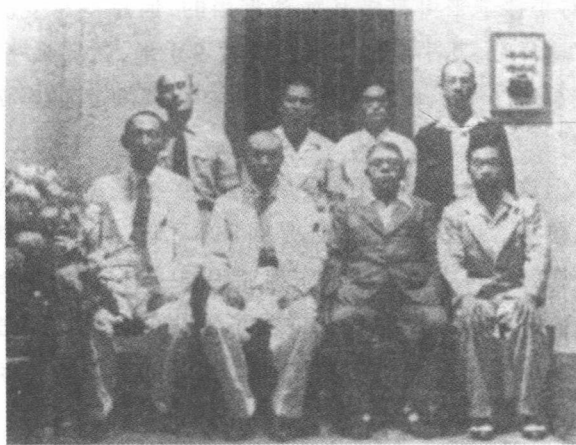
上野 明白了。

小熊 趁这个机会也想问问您，刚才您讲了参与过设置慰安所和寻找女性的事情，这些经历您没跟和田先生、大沼先生他们讲过吗？

鹤见 没有。像刚才说的，跟和田、大沼从“越平联”到日韩问题，认识的时间非常久了。所以这些事情不会一一去讲的。

小熊 还想问您的是，当时您去做这些跟慰安所相关的工作时，觉得有罪恶感吗？

鹤见 嗯，是“总比杀人强吧”这样的感觉。



海军任职时代(1942年2月,在爪哇岛雅加达海军武官府工作。后排右二为鹤见)

小熊 这样啊？

鹤见 但是呢……是啊，直到现在还有这么深的印象，也确实是相当强烈的体验啊。

我还记得，夜里上街寻找女性的路上，在爪哇的田里看到萤火虫在飞。给我带路的当地人说“萤火虫，萤火虫”。他知道萤火虫用日语怎么说。在战争里，我在这样的地方做着这样的事情，而漂亮的萤火虫在那里飞着……那种微妙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

小熊 嗯……

鹤见 那时候，自己心里闪出的念头是“我绝不要跟日本女人结婚”。

想逃离这样的状况,跑到田对面的什么地方躲起来,跟爪哇女人一起生活,不回日本就这么过一辈子吧。对女性怀有的罪恶感、对日本人的恐怖和侮蔑感,都交杂在一起了。

上野 是在当时的日本军队里那么孤立吗?

小熊 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病情恶化被送回去了。

鹤见 本来骨疽是压痛那种软骨异常的症状,但后来都蚀出了空洞。于是就被转到西基尼(Cikini)的海军医院,做了两次手术。

那时候,被我妈妈打的经历就起作用啦。从两岁起就受体罚,对小孩子来讲是极其痛苦难当的,但总得忍受。可能是习惯了这样吧,几乎没怎么麻醉就做了手术,就那么一直忍耐着,还被军医夸奖了。那时我就想,“啊,被妈妈打的经历现在起作用啦”。

但这样也没有治好,最后在1944年底就被列入送返内地的名单了。就这样,到底还是回日本了。

小熊 后来您就没再去过爪哇或东南亚吗?

鹤见 没再去过。因为那对我来说是不愉快的经历。不过我喜欢印度尼西亚人。

上野 是有意要避开的吧。

鹤见 是的。

小熊 然后呢,还有个其实不想去问您的问题。您受邀担任“国民基金”的召集人,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有加害者的责任吗?

鹤见 是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接受这种代人受过的工作了。不过当然也有对和田和大沼的道义在。

小熊 啊,这真是个其实不想去问的问题呀。

上野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

杂谈 1 第一日夜

上野与鹤见的初次见面

上野 肥鹅肝盖饭是把肥鹅肝煎了然后加酱油的。这也是日本的发明吧。

鹤见 我想要“老式炸土豆饼”。

上野 借此机会,请让我讲个往事吧。我 18 岁的时候去找过鹤见先生的。当然您是不知道的吧。

鹤见 嗯,不知道。

上野 1967 年我进了京都大学来到京都,在五月长假结束的时候,去了鹤见先生当时工作的同志社大学的研究室。

鹤见 哦?

上野 我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思想的科学》,知道鹤见先生在同志社。但 18 岁的时候也不懂要怎么样,就只知道反正先去研究室找找。然后就去了同志社大学,看哪一间研究室门上写着“鹤见俊辅”。找到了站在门口,心像打鼓一样怦怦直跳。

鹤见 哈哈(笑)。

上野 然后下定决心敲了敲门。当当当。但静悄悄的没有回答。您不在屋里。之前已经紧张得不行了,这一来就一下子觉得没力气了(笑)。从那以后我有十年都没见过鹤见先生。

鹤见 是嘛?真正的初次见面好像是在我和多田道太郎一起办的现

代风俗研究会吧。我还记得你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我是京大社会学的过剩博士(over doctor)”。你是《女性学年报》的中坚力量吧。

上野 对。您还记得啊?

鹤见 是啊。研究女性学的人还不多,所以很有共鸣的。

上野 嗯。所以打从67年我自作主张去找您未果,这是十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京都的时候还与您有过接触,但到了东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这次就觉得好像是可以再次跟您相遇的感觉,非常开心。

小熊 我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就只是远远地看见过鹤见先生,策划这次座谈的时候才真正算是初次见面。鹤见先生您好像18岁的时候去拜访过柳宗悦是吧?

鹤见 是啊。那是1940年吧,我从美国回国一段时间。他拿当时非常美味的点心来招待我。他是个美食家啊。

上野 这样的事您记得真清楚(笑)。

小熊 那是因为那时是战争期间,吃不到点心嘛。

鹤见 是啊。我最初读柳先生的书是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我读的都是他关于宗教的著作,其它像民艺等等都不知道。他开始是研究布莱克(William Blake)^①的,书里引用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内容。

但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对我的问题都是用佛教经典的内容来回答的。这并不是说他就由基督教转向了佛教,神秘主义作为一种难以言说的体验,是可以转移到跟教义完全不同的事物中去的。

小熊 柳先生也是从基督教开始的,但因为想反抗当时西洋文化一边倒的风气,就去从朝鲜、日本的艺术品当中寻求神秘的东西。

上野 鹤见先生是出于对宗教的关心去读的柳先生的书吗?

鹤见 我一直很关心宗教。因为自己是个坏人、罪人嘛。所以读了非

^① 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常多跟宗教有关的书。后来去了哈佛,看到那里的附属美术馆有间屋子写着柳宗悦的名字,我就问管理员柳先生在这里吗,他说是的。柳先生就做过这么一次海外讲学,那一年他都在那里。我就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缘分,于是放暑假回日本的时候就去拜访柳先生了。

小熊 您小学毕业之前已经读了一万册书,那您喜欢白桦派吗?

鹤见 他们的书还读得挺多的。但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在战时摇旗呐喊,真是令人极其失望。我回国以后读报确认了一下,白桦派当中没有去写战争万岁的只有柳先生和里见弴了。所以对他们两人特别有好感。

小熊 您对吉野作造的评价也很高,当时读他了吗?

鹤见 吉野作造是不同时代的人,是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嘛。但他的民本主义很有意思。他认为,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南方的岛屿,也可能会有属于那片土地的民主主义,会有在当地的传统之下对民众的尊重。我觉得这是很出色的见解。那反过来也是在讲,在日本政治中也可以有民本主义,是要去建立起阵地来吧。他对“满洲事变”^①也是反对的,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像东大新人会那样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日本视为“落后阶段”,这样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小熊 我以前就从没接受过发展阶段论,所以反而会觉得,阶段论有那么占支配地位吗。

上野 在小熊君的年代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从天上落到地面,有了知识的自我形成了。但在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是好是坏,要进行对抗式的自我形成,马克思主义是最需要去突破的。

鹤见 丸山真男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写法持反对态度。他到了晚年不是写过山崎闇斋学派的论文嘛。我觉得写得很棒。

小熊 再读丸山先生的文章,就觉得真是又简明浅显、又充实深刻啊。

上野 再读就觉得丸山先生的日语特别好。这次也再集中读了鹤见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先生以前写的作品,就又感觉您写的是这样简明浅显的日语啊。

掌握日语

鹤见 我以前日语的文章写得很不好。在日本只念了小学,15岁就到了国外,后来一直是用英语学习的。战争期间写的《哲学的反省》什么的,都是很差的文章。

小熊 是鹤见先生1946年出版的处女作。因为成了归国子女,儿时就使用的日常用语倒还好,要用日语写文章就得重新学起。

鹤见 1949年,我在桑原武夫先生的引荐下当了京都大学的副教授,但那之后日语就成问题了。

但桑原先生人非常好。他看到我的情况,就去找志贺直哉商量,说自己那有个很早就学了英语、日语恢复不过来的人。然后志贺直哉就说,“那他别拿日语名家的文章当范文学”。当时要说名家的文章,那就是志贺直哉的文章了。好像还说,“他掉到英语跟日语之间的沟里,是会挣扎的。挣扎来挣扎去,就能形成自己的文体了”。我觉得说得很棒。

上野 不是说“去读我的文章”啊(笑)。

鹤见 桑原先生就讲给我听。于是这就成了我的目标。不管怎么说,我在日本初进大学工作,能有桑原先生做上司,实在是受益匪浅。

小熊 然后在英语跟日语之间斗争了多少年,才觉得“这样就差不多能写了”?

鹤见 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不是说英语变差了多少日语就能变好多少的(笑)。

上野 读您的文章,觉得您的文体从很早以前起就很一致,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就在想,您是从早期开始就在有意识地写这种简明浅显的日语吗?刚才听您说,这种文体好像也是努力形成的。

鹤见 前些日子收到唐纳德·基恩(Donald Lawrence Keene)寄来的明

信片。一看呢,日语是日语,可就是一点也没看懂。等到那天该睡觉的时候忽然恍然大悟,啊,原来是把主语和宾语给省略啦。把主语和宾语一加上就看懂了,就成了像《源氏物语》一样的文章(笑)。

上野 基恩先生写的文章比日本人写的还像日语(笑)。

鹤见 我很吃惊。嗯,这样的名作我是写不出来的(笑)。要是以此为目标,就成不了现在的文体了吧。

上野 战后的文学作家里,有没有让您觉得有共鸣的人呢?

鹤见 对《近代文学》的人们就有共鸣。但彼此并没有打过交道。当然也有别的作品、作家我觉得很好的。

小熊 《近代文学》的人们比鹤见先生年长,是在战前参加左翼运动感到幻灭的一代。鹤见先生在年龄上跟吉本隆明、三岛由纪夫等相仿,属于“战中派”,但却并不像他们那种一门心思的皇国青年一样,在日本投降时感到是被出卖了。那对您的同龄人有感到共鸣的吗?

鹤见 非要说的话,就是中井英夫。他和永井道雄、嶋中鹏二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我的同学,不过我跟他的政治立场特别有共鸣。

小熊 中井先生的立场是什么样的呢?

鹤见 他战争期间是在三宅坂的参谋本部,是被征召入伍做密码工作的。他当时写的日记后来出版了,叫做《从那里来》(潮出版社),完全是一部憎恶战争的日记,太了不起了。连我都还有顾虑,没有那样去写。那样的反战思想,他就一直在三宅坂参谋本部的密码兵营房里写日记,那是把命都豁出去了呀。

我觉得,那是他对他父亲的厌恶。他父亲是东大教授,是把林奈(Linné)的植物分类学原著从欧洲带回日本的人,但在战争期间做了陆军司政长官到爪哇去了。于是中井英夫就觉得,那家伙吊着军刀真是混蛋,这种厌恶感跟对战争的憎恶连在了一起。他因为不愿意从父亲那里拿钱,就从东大退学了。

这种感情有跟我很相近的地方。我在战后见到他的时候虽然跟他说“你父亲不像你说的那么坏呀”,但我讲这种话是完

全没有说服力的(笑)。不过中井在日本战败后一度加入了共产党,这跟我不一样。从他的思想经历看,他加入共产党并没有必然性,是对战争的憎恶促使他这样做的吧。

小熊 顺便问一下,鹤见先生总是说“黑社会道义”,这说法是从哪来的呀?您当不良少年的时候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的吧。

鹤见 是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

小熊 那所谓“黑社会道义”到底是从哪学来的?

鹤见 因为上小学的时候就逃学去看黑社会电影什么的。“阪妻”(阪东妻三郎)啊,市川右太卫门啊,岚宽寿郎啊。对我来说那就是人生理想。

上野 小熊君,鹤见先生说的“黑社会道义”是种比喻的说法,可不是说的日本的集团伦理啊。

鹤见 从小学起就没有过现实中黑社会的老大跟小弟的关系。不过确实是一个人以那种黑社会的心态生活的。

为什么我会形成这种黑社会的意识,那是因为我妈妈不给我钱啊。零花钱是一点都没有。说是“必需的东西去记账买”(笑)。这非常贵族气,但对小孩子来讲就太残酷了。因为买了什么父母全都知道。

小熊 所谓货币经济是匿名的世界呀。

鹤见 所以我就到书店去偷书,然后转卖出去换钱。我自己都在想,我这么笨手笨脚的,干这事倒真能行啊。然后换了钱,五日元十日元的,就自己在门柱旁边挖个坑埋起来,弄了个自己的个人银行。想想看,这是非常无政府主义的,是蒲鲁东说的人民银行啊(笑)。

然后要是哪天不想去学校了,就从那儿挖出五日元十日元来,等着电影院十点钟开门。之后就呆在电影院里不走了,同样的电影看上差不多三遍,直到天黑。三部连放的电影看三遍,就是九个多小时了。盒饭也在那里吃。然后虽然不想回家,也还是要回去。回去以后就会挨打。我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从小学三年级以后一直是这样的。

上野 孤独的孩子啊。

鹤见 是啊。所以后来就学会了“黑社会道义”什么的。是从黑社会电影和“讲谈本”里来的。不过没有什么老大啊小弟啊,完全是一个人的。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所以缺课的日子多极了。成绩嘛,总是倒数的。不过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倒数第一。在这一点上我很尊敬久野收君。我认识的知识分子里就他当过倒数第一。

上野 是吗(笑)?

鹤见 他进了熊本的第五高中,当时是按成绩排座位的。他一看自己后边还坐着一位,就问他:“你是怎么回事?”结果人家回答说:“我是补缺进来的”。所以久野收是倒数第一(笑)。久野收胸中是有倒数第一的器量的。那些有“第一病”的家伙总是不断地迎合潮流、见风使舵,在任何地方都是第一。但久野收不一样,他是那种就算自己所在的一方打败了,也一定会孤身奋战到底的人。从战前的“泷川事件”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

小熊 鹤见先生“一定要呆在战败一方”的坚持,跟这有关联吗?

鹤见 有关联吧。因为我是很尊敬久野君的嘛。我虽然很接近倒数第一,但没当过倒数第一啊(笑)。

久野君对我特别好。他知道很多从大正时期开始就有的传闻轶事,都是那种只有倒数第一才会知道的东西。相比之下,我父亲跟我讲的都是什么他的上一级的英法系的主席是阿部次郎呀,尽是这样的事(笑)。倒数第一讲的传闻轶事可不是这样的。就因为是这样,才会有那么多人合起来为翼赞议会摇旗呐喊啊。

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上野 说到翼赞体制,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攻击的时候,包括民主党的支持者在内,美国有超过七成的国民都支持布什。

鹤见 跟日本的翼赞议会是一样的。我父亲不是在昭和 17 年的翼赞选举中当选为翼赞会总务了么。以“肃军演说”而闻名的斋藤隆夫,当时不是靠翼赞而是靠选举当选的,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还在议会里。但他那篇被称为“肃军演说”的讲话被从议事记录里抹去了,结果是篇什么样的演说也无从知晓了。



在料理店“樱田”门口

上野 苏联解体后的后冷战时代是美国单极体系,这您预想到了吗?

鹤见 也不能说是全然不知。但我没想到美国会变成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现在很明显就是极权主义。

上野 就是啊。我跟美国的朋友说,将近八成的国民都支持当权者的国家就是法西斯主义,结果把他惹火了。

小熊 我是没想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还要强化军事力量,在全世界搞军事介入。

上野 是啊。“后冷战时代正应当裁军”的机会一度是有的。但产业、政界、军事一体的体制已然形成,无法止步,是这样一种构造吧。

小熊 但总是搞什么打伊拉克这样的事,国家会破产的。

上野 会吗？从全世界募集战争经费就可以了。而且战争也是最大的经济刺激因素。破坏完了再重建，这不就是“scrap and build”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吗？

小熊 这种情况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成立吧。除美国以外的其它地方都遭受战祸，才形成了美国产品垄断市场的局面。

鹤见 布什是个富家公子哥儿。听他说的英语就知道了（笑）。但他虽然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在 900 名毕业生里也就是排第 700 名左右。

小熊 您组织“越平联”的时候，是很强烈地意识到那是“美国的战争”吗？

鹤见 从结果上讲是那样的吧。不过也期待在美国也会有反战的舆论，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是“与美国的战争”。最终美国国内的观点成了一半对一半，越南战争结束了。但看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情况，当时的教训并没有长期固定下来。

小熊 但可以说是保持了三十年。跟越南战争之前相比，美国的行为还是慎重了许多。在反越战运动的影响下，美国的国家暴行被阻止了二三十年，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很伟大。日本的战败深刻地影响到了日本的存在方式，虽然可能还到不了日本这样的程度，但越战的失败也是影响到了美国的存在方式的。

鹤见 嗯，是这样。我虽然觉得战后日本跟战前相比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但最近要是发生了什么事，电视上就老演高级官僚低头谢罪的场面，这在战前是无法想象的事，这可以算是变化吧（笑）。

失败了，被谴责了，接受它，承担它，重新站起来，这样的力量是很重要的。美国几乎没有怎么失败过，这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上野 日本在泡沫经济的时候，也出现了“Japan as No. 1”的说法，跟那时相比，您更喜欢现在日本这种“失败”的气氛吗？

鹤见 是啊。这样比较好。从这里会产生什么吧。

上野 您怎么看美国打伊拉克的事？

鹤见 布什这种行为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影响美国自身的历史，如果处理不好，从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看，还有可能将整个人类都卷进去。当然这不是说萨达姆好，但我想对布什说：“You can fool some of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你可以暂时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林肯）。即便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总有一天是会瞒不下去的。到那时要如何去处理美国的历史呢？

但鉴于美国目前的极权主义状况，我也并不抱马上就能彻底改变的希望。我不像乔姆斯基那么乐观。

小熊 我看纪录片《乔姆斯基》，他强调在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清洗”之后，60 年代前半期的美国社会有多么残酷。人们渐渐在反越战的共同主张下集合起来是从 6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在那以前，即使是举行反战游行也召集不起多少人，还会被扔臭鸡蛋，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他始终觉得“总比那时候强”。

鹤见 我 1942 年以后就再没有回过美国，乔姆斯基说的或许是对的。不过，为什么乔姆斯基能一直显出那么开朗的表情，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问过道格拉斯·拉米斯（Charles Douglas Lummis），他说“因为乔姆斯基没有服过兵役”（笑）。拉米斯自己是当过海军的。我之前见过一位美国的女教授，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哭了。这样的美国人也是有的。如果我是她，也会感到深受打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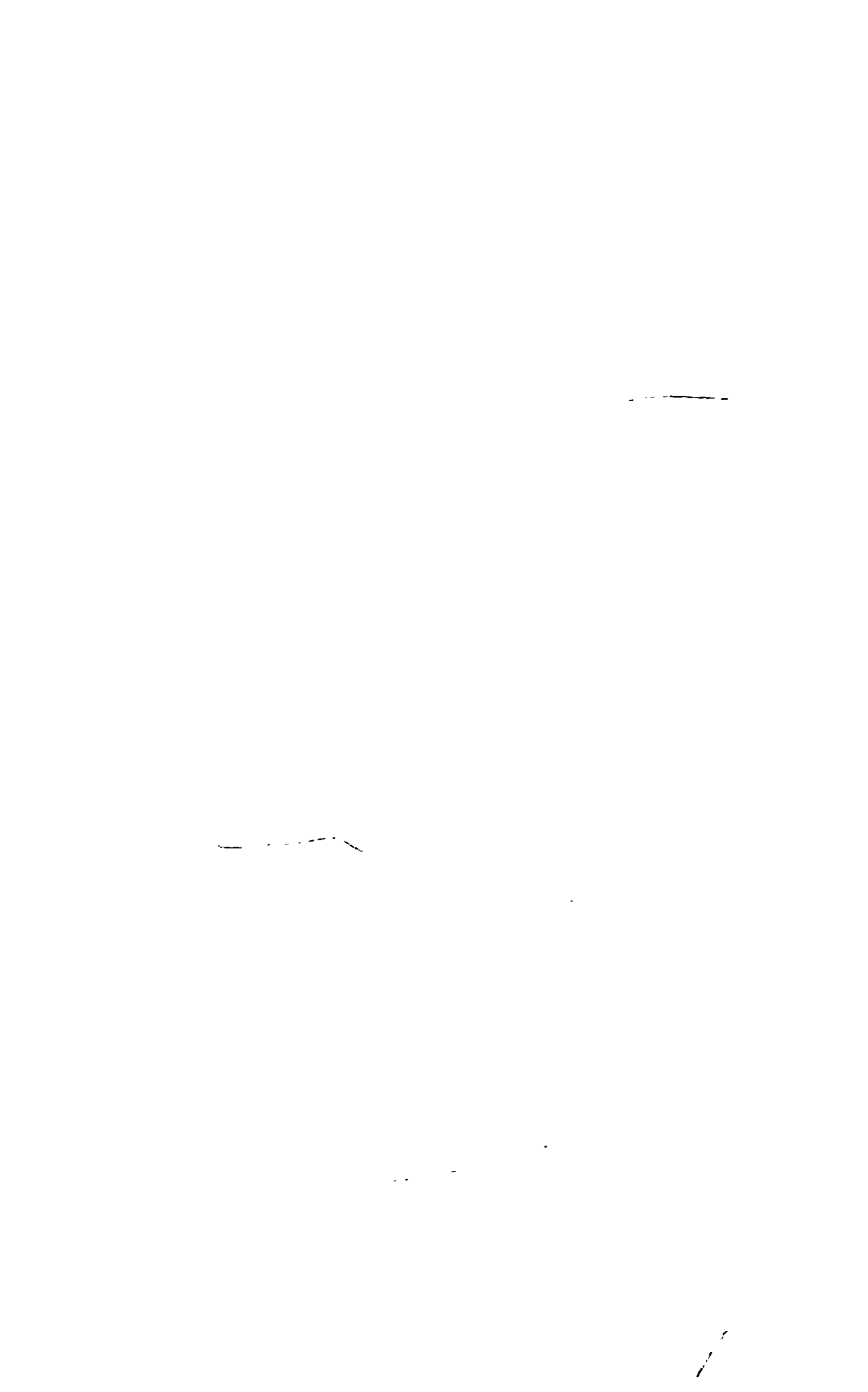
小熊 不过呢，如果善意地去理解，“即使绝望也于事无补所以要给人希望”，也有类似这样的因素吧。“越平联”邀请美国的反战运动家拉尔夫·费泽斯顿（Ralph Featherstone）他们来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在争取公民权运动的时代都曾多次出生入死，但见到本人都是那么阳光，很令人惊讶。

鹤见 可能是吧。小田实他们也是，都不是以悲剧情绪去演讲的。

小熊 这种乐天的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的优点,可能那是个就算悲情演绎也不会有人欣赏的社会吧。

上野 因为是犬儒主义(cynicism)成不了气候的国家啊。

小熊 嗯,光明地向前,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出过去吧。释迦牟尼也说过“戒弛以行”的(笑)。



第二日



八月十五日的经历

“那不是敌机”

小熊 那么我们第二天的访谈就从日本战败前后的事情开始吧。您因为骨疽恶化被从爪哇送到了新加坡,然后又回到了日本,那应该是在1944年12月吧,从那以后到日本战败这段时间您是怎么过的呢?

鹤见 在自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初步好转了,但战况已经恶化,回爪哇归队的船什么的都没有了。然后就有命令让我去军令部帮忙做翻译。1945年4月,我就到日吉的军令部——现在的庆应大学那里——去上班了。

小熊 完全是战争末期了。

鹤见 我在新加坡遇到空袭,以为就要死了,在运输船上也遇到了空袭。然后1945年4月横滨空袭的时候我也在日吉。

新加坡空袭的时候,我还在司令部听短波电台呢。别人都逃走了,我因为进了收听室逃不了。炸弹呢是这样的,如果听见嗖嗖的声音,就是落在远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的就是落在近处的,很恐怖。虽说都准备了自杀用的毒药,想着死就死吧,但真的很恐怖。

小熊 死的心理准备还是跟死的恐怖两回事啊……

鹤见 也有这样的因素,不过也是因为我不相信日本是正义的。想想

可能会在这种战争中被杀死,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小熊 那后来回到日本,在军令部工作是什么情形呢?

鹤见 会点英语的人都被作为文职召集起来了。神田不是有家卖外文书的叫北泽书店么,那里的店主当时就跟我在同一间屋里上班,就在我跟前。那时大家已经大致明白了日本跟美国的战况,所以都抱着厌战的情绪。

小熊 当时丸山真男先生在广岛的陆军船舶司令部,做的是从新闻和通讯情报中整理国际形势的工作。丸山先生当时的笔记后来翻印出版了,就是《丸山真男战时备忘录》(日本图书中心),这本书里面信息相当多,还对战后做了预测。您当时有没有对战后的设想或预测呢?

鹤见 我做的是很个人的东西,在爪哇的时候做了昨天说的“玉碎计算”。到军令部上班以后就在想美军会不会登陆日本本土呢,到了那个时候在战乱中要如何逃跑呢这样的。所以都不是像丸山那样综合的预测。

不过,我5月10日偶然去见过都留重人先生。那天我从军令部得到了外出许可——海军用语叫“半舷上陆”。然后还发给我两个很大的饭团子。我坐在户山原那儿吃,附近就是外务省的分室,我就去找在那里上班的都留重人先生了。他就说:“已经达成妥协了。联军会保留天皇制。以后要怎么办就是活下来的人们的责任了。”所以我就想,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那天我在户山原吃了另一个饭团子,就开始写战败后发表的《哲学的反省》了。

小熊 是鹤见先生的第一本书吧。

鹤见 是的。不过里面的文章都写得不好。

小熊 但都留先生关于战败的预测是在五月,在当时的日本算是很早的吧,而且是很理解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的。

上野 都留先生是从哪得来的情报呢?

鹤见 他在外务省上班。说起来,当时就连在外务省里,会英语的人也实在是不少。更早以前日俄战争的时候,外务省会英语的人

还更多一些。但在那之后,外语好的人在外务省里就升不上去了,会受到国粹派的排挤。连大使级别的人也几乎都不会英语。

上野 真是可怕的事。

鹤见 就连我也是,英语倒是会,但翻译很不擅长。我15岁之前是用日语学日语,之后是用英语学英语,所以把英语翻译成日语非常不顺手。虽然是用英语学了哲学,但日语到15岁以后就没再学了,脑子里没有“绝对矛盾的自我统一”之类的词。所以翻译也很头疼。

小熊 军令部让您做的是什工作呢?

鹤见 基本还是在爪哇时做过的那些。监听美国的通讯,翻译没收来的资料,调查对方的伤亡情况什么的。后来是翻译从欧洲转来的资料什么的。

小熊 1945年4月,正是冲绳战大量进行“特攻”的时期吧。

鹤见 是的。所以知道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果。

小熊 直到8月15日您都在军令部吗?

鹤见 没有,7月我病情恶化休假了。那时住在日吉租的房子里,但这次结核菌在体内到处活动,生了腹膜炎。突然就上不了楼梯了。

借这个机会,我就向军令部递了辞职报告。在爪哇的时候还能听听新德里的广播,但在军令部就光是翻译没收资料什么的。尽是些杀伐战术的文件不是么。我不想做这种工作。但直到8月15日,那份辞职报告都在上司手里,7月的就当休假处理了。

小熊 没让辞职啊?

鹤见 但这有个好处,就是8月15日以后海军来通知,给了正式的退职金。我虽然是以学生身份从美国回来的,但这些钱加上从爪哇寄给我妈妈的钱,以当时的物价能维持好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了。所以就可以在经济上自立不依靠父母了。这对我来说真是轻松了。那以后也有了稿约,1949年就到京大就职了。

小熊 原来如此。回到刚才的话题,您7月向军令部提出了辞职报告,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鹤见 后来就住热海去了。本来我家是在东京的,昨天说过,祖父想废掉继承人的时候,我家在中国大使馆后面,是我妈妈从她父亲那儿得到的房子,但当时腾出来给别人住了。后来我妈妈被疏散到热海,我父亲跟和子就从热海的家往返东京上班。父亲是去他的太平洋协会事务所,和子在太平洋协会的美国分室工作。

期间妈妈又被疏散到了轻井泽。父亲的弟弟们的家也都住在那里,所以是三家人挤在一起。堂弟鹤见良行是父亲最小的弟弟家的长子,所以他也在。

于是父亲、和子跟我就留在热海的家里。但从热海到东京乘汽车要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因为腹膜炎不能动,白天他们去东京的事务所什么的,我就自己做饭、睡觉。

小熊 我想插个问题,之前您从爪哇回来的时候,您父母亲是怎么迎接您的呢?

鹤见 我得了骨疽被送回来的时候,父亲自己不会开车,就给后藤的继承人打电话,让他开着车,一起到品川车站去接我了。不过,我父亲知道我在美国因为无政府主义进了监狱,但都不跟外人讲的。

上野 不管怎么说是活着回来了,他们应该很高兴吧。

鹤见 父亲和妈妈一直是爱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两个人爱的方式却都很让人困扰(笑)。妈妈就是从小时候起一直体罚我,父亲就是给予特别关照,不管是留学还是别的,什么都要给你创造很好的条件,所以很困扰。

上野 那回来的时候您母亲呢?

鹤见 确实是看我活着回来了很高兴。但妈妈中风了身体不好,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她就不怎么抱怨我了。只说好好吃饭什么的。

说起来,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妈妈就用我用过的那张桌子了。那上边挂着我在哈佛大学得到的优秀奖状。我入学的时候

候不是优等生,也没得过奖学金,所以就只有这张奖状。

小熊 您父亲当了议员,据说在议会发表过支持战争的言论,那您母亲对战争是什么态度呢?

鹤见 我去了南方,但听说在战况恶化以后,我的同学要上战场的时候,我妈妈说“请活着回来啊”。

小熊 当时讲这样的话可得有心理准备吧?要是被告密的话可能会招来宪兵的吧。

鹤见 那样的感觉,我妈妈也是有的啊。不过我妈妈对日本也有着朴素的喜欢。我的外祖父后藤新平原本是从被当作叛军打败的藩提拔起来的。靠着领取的一点钱去上学,只读过须贺川的洋学校。我还记得有人说,他让女儿站在面前,唱“愉快,愉快,明治之世”之类的歌。我想我妈妈很质朴地继承了这种感情。

小熊 当时空袭越来越厉害了。您说在战争中觉得日本是敌国,那美军飞机来自家上空轰炸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呢?

鹤见 我家所在的麻布十番毁于空袭,当时我看到了头顶上的 B29。那时我就想:“啊,在那种地方孤独地飞,驾驶员真可怜啊。”

小熊 一边受空袭,一边想的是这样的事?

鹤见 是。所以同情的是对方(笑)。我是很顽固的啊。和子到屋顶上来,说“敌机来了”,我回答说“那不是敌机”(笑)。

小熊 但是,也不是觉得美军是朋友吧?

鹤见 没觉得是朋友,但也不觉得是敌机。日军才是敌人(笑)。

小熊 日军是一回事,那日本的士兵呢?

鹤见 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就快要战败了,却在被杀死。

小熊 原来如此。那就是说,不管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士兵们是可怜的。

鹤见 是的。在地上被杀死的,孤独地在天上飞的,都很可怜。

小熊 这种感觉跟后来的越平联也是相通的吧。反对美国轰炸越南,但被派到越南去的美国兵也是受害者。

鹤见 是这样的。

小熊 丸山真男先生写过,在空袭的时候,炸弹是不会避开反战者而

落下的,所有的人都是命运共同体。

鹤见 我明白这种感觉的。所有人的家都着火了,没人能独自轻松。但这跟把美国兵看成敌人去恨是不一样的。

小熊 这虽然微妙,却可能是重要的不同吧。

鹤见 我想是的。

在战败一方死去的决心

小熊 后来您的家人都疏散到轻井泽,热海就剩您一个人了。在那种状态下,到战败之前您都想了些什么呢?

鹤见 因为美军可能会登陆作战,就在想到时候自己要如何。虽然有腹膜炎,但动还是能动的。

当时是说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本土,日本全国都要迎战,要妇女和老人都去练习竹枪。我因为是海军文职,可以不加入这种国民军,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辞职报告没有被受理,以为自己也会被命令拿着竹枪辗转各地的。就在想到那时候要怎么办。

上野 怎么投降之类的?

鹤见 不,没那么简单……我不想在别人之前投降。

上野 那是怎么回事?

鹤见 那是种微妙的心理,不是有逻辑的,完全是凭着伦理感情的原则而动的。大家一边徒劳地作战,一边逃往内地纵深。就觉得我应该在那里那样的。不过打仗杀人这样的事,会想着要用生病之类的理由想办法躲过去。

小熊 但是,觉得不能抛下国民军里的其他人独自投降。

鹤见 是的。这是在美国说要乘交换船回日本的时候立下的原则。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因为要接受战败的惩罚。但对日本人完全不能信任。这场战争会打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但是,这样的话是绝对不想说的。那我死了也就死了,但也不想去杀美国人。对自己的日

本上司说声“是吗”、把他杀死,我也生不出这样的气力。很混乱,但就是这样一种心情。

小熊 教育学者宗像诚也先生在《我的教育宣言》(岩波书店)里写过,他的学生接到动员,很多都去了军需工厂,所以他就尽量到可能会遭空袭的工厂去徘徊,等待一起死去的机会。后来到了日本战败前夕,他就搬到预计美军将要登陆的九十九里滨去住,想着跟学生一块死吧……

鹤见 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吧。

小熊 但宗像先生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持批判战争的观点,却同时对所谓“日本人”和学生有非常强烈的一体感。特别是他对战时改变立场要学生为战争出力有罪恶感,因为想要承担责任,就觉得只有一起死去。后来他在战后就非常支持日教组的“不要再次把学生送上战场”的口号。

像宗像先生这样的人想跟学生们一起死去,我可以理解。但您在“日本人”中间是那么孤立,又为什么会……?

鹤见 那就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觉。就是在美国的收容所里决定要坐交换船的时候,想着战争结束的时候我要在战败的一方,就只是这样的。就像在爪哇的时候想的那样,想着到了最后就在杀敌之前自杀。

上野 既不能去投降,也不能去作战,就只有死?

鹤见 是的。因为我会英语,早早投降美军当个翻译好像也不错,但这种事我完全没有想过。

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父亲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他是觉得美国人来了以后他就能当总理大臣了。

小熊 是吗? 鹤见祐辅先生在战前是作为亲美自由派而闻名的,但在战时是支持战争的吧。他在战争末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鹤见 应该是觉得反正会打败的。但去了议会就说必将完胜什么的。

小熊 然后因为美国也知道自己是亲美派,就觉得美军来了以后自己能当总理大臣?

鹤见 是啊。那种人最拿他没办法了。这种优等生的愚蠢,是战争体

验让我看到的。他是那种以第一名的身份从一高英法系毕业、觉得要是不能上东京帝大就不是正经人的想法。然后自由主义流行就是自由主义、军国主义流行就是军国主义,总是要抢到前面当第一。

基本上当第一的人都是因为想当第一才成了第一。我的小学同学永井道雄非常优秀,但只是第二名。因为他不会为了想当第一而用功嘛(笑)。很简单的事。当了第一的家伙都是想当第一的人。

小熊 是这样的人吗(笑)?

鹤见 不过我小时候也很单纯地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但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前后就开始有点不对劲了。

很久之后,父亲因为脑中风病倒,我去看保险箱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他写的东西。读了以后发现,父亲作为自由主义者,在二·二六事件之前还有努力的意愿,但在那以后就放弃了。然后到我去美国以后,就有了决定性的改变。

但美国方面对父亲的变节是很清楚的。好像是《时代》吧,登过《日本自由主义已死》(Japan's Dead Easy Liberals)的新闻,说日本的自由主义者丧失了与军国主义斗争的力量,举出的代表人物就有父亲,还登了他的照片。因为父亲曾到美国各地游说,所以是相当知名的。我在美国读到了这篇文章,觉得的确是这样。

鉴于美国方面对他是这种评价,就算美军来了也是当不上总理大臣的。但父亲不明白,后来受到了公职追放处理,他很吃惊。

上野 没想到会这样,就觉得吃惊吧。

鹤见 然后父亲就非常失望。后来还为了解除追放花了不少钱。就觉得自己会英语,所以是能当总理大臣的啊。第一的家伙很多都是这么天真的。坏人是当不了第一的啊(笑)。

小熊 清水几太郎先生回忆说,战时曾被邀请到鹤见祐辅先生家吃饭,和子女士为了不让英语变差,在自己家里也说英语。这是

真的吗？

鹤见 某种意义上，父亲是谦虚的。我跟和子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自己的英语发音不好，让我们帮他纠正，就每天晚上轮流读英语书。读英语是要纠正他的发音。清水几太郎说的可能是这个吧。

反正父亲觉得不学英语是不行的。那就是已经知道要打败了嘛。是考虑到战后的事情才这样做的吧。但去了议会说的就是完全相反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小熊 但当时是战争期间，英语是敌国语言吧。要是被告密的话会被抓起来的不是吗？

鹤见 当时就是会让人觉得“在自己家里都会被告密”的气氛。像昨天说的，吉田茂就是被家里寄住的学生告密抓起来的。

除了我跟和子，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是皇国万岁的，所以这种轮流读书的活动都是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等战争末期我从爪哇回来以后才开始的。虽说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弟弟妹妹会去告密，但他们在家的时候心里就不怎么踏实。

小熊 和子女士也是因为觉得战争会打败，所以就一起学英语吗？

鹤见 和子嘛，是那种会根据情况发挥演技的人哟（笑）。当然也觉得是会打败的，但在外面就不这么讲。

和子工作的太平洋协会美国分室有清水几太郎、细入藤太郎、都留重人、福田恒存、坂西志保五个人。在他们中间，和子是可以说战争会打败的吧。他们当中没人认为会打胜的。

小熊 但您父亲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觉得会打败，在家轮流读英语，在议会就为战争鼓呼，如果说这是天真的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不是很明白。

鹤见 这个啊，我也不明白（笑）。你不明白是因为你没有“第一病”。反正就只是在想学了英语就能当总理大臣。

上野 如果善意地去理解，能不能说您父亲对战后处理怀有一种使命感呢？

鹤见 不是这样的。就只不过是当第一、想当总理大臣（笑）。觉得

自己一直是第一,所以有这种资格。在内心深处就跟小孩子一样天真啊(笑)。

小熊 您的不想独自一人投奔胜利者,也是对这样一位父亲的反抗吗?

鹤见 可以这么说吧。要是我不愿意死的话,就不从美国回来了。之前说过,在美国监狱里比在日本吃的好。然后等美国战胜了,当个翻译跟美军一块回日本也是可以的。

这种想法很合理,在某种意义上也合乎道德。这样呆在美国的话,自己的手就不会沾上鲜血,就能在思想层面始终坚守反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吧。但我不喜欢这样。我不想在战胜的一方迎接日本的战败。这既不是合理的判断,也不是道德的命题。是有那种超出了伦理思想的伦理那样的,这也是黑社会道义(笑)。

上野 还是黑社会道义啊(笑)?

鹤见 所以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些以道德命题之类为借口的大学教授很无聊,怎么就那么毫无矛盾头头是道呢。我是黑社会,不要那样的东西。所以要不是和田春树那样的大学教授,我是感觉不到黑社会情谊的(笑)。

对特攻队的感情

小熊 您要反抗您父亲所代表的那种态度,不想轻易地投降,而是要死在战败的一方。那我想请问您,对特攻队您是怎么看的呢?对您这一代人来讲,他们是明知会失败却选择死亡的人的象征吧。

鹤见 ……对特攻队,小田实有很独特的看法。

小熊 是说小田先生在1965年发表的《死难的思想》吧。关于特攻队的电影或小说都只是写到出击场面的悲壮为止,不会去写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在撞上敌舰之前就被击落、死得毫无意义。就是说,他们不是像落花一样“牺牲”了,而是像炮灰一样“死难”

了,这一点并没有被正视。

鹤见 那样的看法很残酷,我这一代日本人是做不到的。

小熊 您在当时对小田先生《死难的思想》的评论里也是这么写的。

鹤见 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有那种“要呆在战败一方”的感情,这样去看那些出击的人们……

小熊 做不到是吗?

鹤见 特攻几乎是没有什么战果的,我在军令部翻译美国的文件所以知道。但知道是知道,对那样的看法还是无法有同感。

小熊 还有一点,特攻虽说原则上出于自愿,但实际上是没法说“不愿去”的。飞行员的人选也是,上级将校跟资格老的飞行员负责选人,都是让连正规训练也没受过的预备士官或见习生这样的青年驾着旧飞机或教练机去特攻。这种军队组织的丑恶,虽然大家不怎么公开去讲,但读当时的回忆录之类就能读到一些片断的吐露。

鹤见 这些事情,我因为在军队待过也都知道。依自己的意愿讲出“不愿去”需要极大的勇气,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等于是被绑去的。虽说有特攻都是出于自愿的说法,但策划特攻的人是清楚这种状况才如此提议的。但这样的事情,就算知道……

小熊 就算知道,对这样死去的少年士兵,无论如何都抱有同情,或者说觉得过意不去吗?

鹤见 战争过了很久以后,我的同学藤川正夫的姐姐给我送来了他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日记。他在参加特攻死去之前把日记寄给了姐姐,姐姐把它出版了。那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我是不能发疯的吧。是不能慢慢地慢慢地向天上升起升起升起,消失掉的吧。”

这是学生在战争中的绝唱。知道这场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但也不能独自逃掉。所以他在航空部队,就希望能一直向上飞去,就这么消失掉。

小熊 这种心境跟鹤见先生“只有去死”的感情是重合的吧。

鹤见 是的。

小熊 与此相关的,您还写过有个叫一宫三郎的同学,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在大学生暂缓征兵的时候就说要报名参加海军。您虽然有反战思想,但没有勇气明确表示,只对他说“别那么着急比较好啊”。后来他报了名,在南洋死去了。您写过,对于这样真心真意死去的青年,始终都抱有一种歉疚。

鹤见 ……一宫三郎的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永井道雄邀我们去他家,一宫在回家的路上说要去报名参加海军。那天有永井和我,还有后来当了中央公论社社长的嶋中鹏二。从小学起我们就是朋友了。

还有永井道雄的哥哥也在。他哥哥当了海军少佐,在军令部工作,后来战死了。他因为在海军中枢机关,是知道日本会败给美国的。嶋中也是父亲有反战思想。所以我们几个是多少有些共同的想法的,只有一宫并不知道这些。后来大家聊完天,回家的时候就我跟一宫两个人,一宫就说“要报名参加海军”。我说“别那么着急比较好”,他就问“为什么呢”。但我又没法明确回答。他完全不了解状况。怎么说才好呢,是很困扰的,但仅以此为理由是不能解脱的。

小熊 您有这样的记忆,但您1968年在“海之神会”演讲时对战歿学生兵进行了批判。《听吧 海神的声音》中收录了战歿学生的手记,您说他们没有逃跑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种精神上的卑怯”。这样的说法,要是跟您刚才说的这番话联系起来一想,就觉得“您真说得出口啊”。

鹤见 那是因为68年才会那样说的。不是说因为战争过去一段时间了,而是68年当时的情况使然。那时我是在越平联声援从越南战场逃走的美军士兵的。

上野 有时代背景的因素。

小熊 但另一方面,跟那些没有逃走而死去的人们也是有共鸣的吧。

鹤见 嗯——战后我跟乙骨淑子熟了起来。她父亲跟我一起在军令部工作过,是无线电通讯员。他有一次在大房间里大声说:“不

管怎么样,没办法不觉得这场战争要打败,鹤见君你觉得呢?”(笑)他已经是老资格了,说这种话也不会被打的。我当然认为是会打败的,但没法这么回答他。

但他女儿乙骨淑子等父亲回到家就说“爸爸是非国民”,把他批判了一通。战败那天她跑到宫城去,跪着向天皇谢罪,说是我们努力不够。后来她说伤病军人没有人管,去了他们那里做义工洗绷带。但后来她又说不能原谅那些如此对待军人们的政治家,某个时期突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当时她父亲说:“现在你用父母的钱上学,在学校期间不要加入共产党了。”但她不听,还批评她父亲说:“爸爸说这种话没有正义感。”

后来她看到50年代日本共产党的内部纷争,觉得实在反感,就退党了。那以后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了抗议松川事件冤狱的运动。再后来她开始写文章,加入了一个叫做《回声》的同人杂志。在那个时期我跟她有过的接触。但在她那里,战争期间的“爸爸是非国民”和加入共产党时的“爸爸缺乏正义感”是连续的。

小熊 很明白。这样的人好像不少吧。

鹤见 后来她得癌症死了,去参加葬礼的时候真是难过啊。她的父亲还健在,问候了一下。他活了差不多101岁。乙骨淑子的丈夫也很好,不过她父亲为人真是器量很大。那是个就在军令部的屋子里头大声说“我觉得会打败”的人。然后在葬礼上,说起女儿是这样的人,真是服了啊,这些事……

说起葬礼,在加太浩二的葬礼上,有位女士跟我讲了他在战争期间的事。这位女士的丈夫战时是大政翼赞会的职员,是管理洋画剧演员的。说是加太跟这位职员在战时灯火管制的情况下特别入迷地打麻将。也不管遇上空袭可能就没命了,玩麻将玩得热火朝天。我听了很感动。听到空袭警报来了也不跑,就埋头打麻将。这就是黑社会啊(笑)。

小熊 我觉得这里是鹤见先生思想的根本所在,所以想问问您:对乙

骨女士的这种认真和加太先生的这种不认真,您都是肯定的,这种矛盾(ambivalent)的态度就是您的特点吧。

比如您对渡边清评价很高,他从前是少年水兵,后来写了《战舰武藏的末日》、《被打碎的神》(朝日选书)等等。他是自己报名加入海军的,在战争期间非常认真地恪尽职守。他写道,在战时十七八岁的他看来,那些三十来岁的老兵很不认真,真是没有办法。他就想,为什么大人们是这样的不认真呢。

后来战败以后,渡边清怀着这种认真的态度转向了对天皇的批判。他认为,天皇和民众都忘记了那些在与美国的战争中竭尽了全力战死的人们,把美国占领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这种不认真的态度是不能原谅的。

但从鹤见先生的战争体验来看,会去殴打像您这样内心抱有反战思想、态度不明不白的文职的,恰恰是这样的认真的少年水兵。而三十来岁的老兵们是以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接受您的。

这样的话,您会站在哪一边呢?战时和战后都很认真的少年少女们,还有战时和战后都不认真的大人们,您会跟谁有共鸣呢?

鹤见 这个啊,嗯,要说共鸣的话……嗯,是哪一边都理解啊……

上野 在这一点上鹤见先生是矛盾的态度吧。要是能跟其中的一方完全统一,就没理由会出于自责而抑郁了吧。

鹤见 嗯。

小熊 啊,这个问题是因为觉得先生大概没法回答,所以才问的。

上野 不怀好意的问题啊。

沉默的八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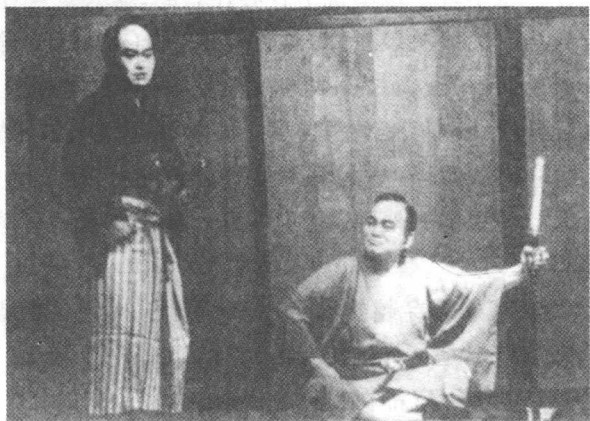
小熊 那您八月十五日那天是怎么过的呢?

鹤见 八月十五日那天,我一个人在热海的家里。收音机坏掉了,但因为说是白天会有重要广播,所以就拿去修理,弄得差不多能

听了,就拿着回家,一个人听了终战诏书。

小熊 您写过当时的印象,说天皇只是说自己国家受害了,却不提让其它国家的人们受害的事,觉得很不对劲。

鹤见 觉得非常反感。都觉得天皇是个讨厌的家伙了。不是他自己长期以来在做着残酷的事情吗?



与加太浩二(右)(1964年12月,在《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忘年会”上演出“相马的金先生”。上野本牧亭)

小熊 是因为有在南方的经历才会这样想的吗?

鹤见 是的。而且我五岁的时候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从那以后起就对日本会如何变化抱有不信任感,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在美国,是从那边的立场去认识的。

不过后来我对原子弹爆炸的看法改变了。终战诏书里强调了“新型炸弹的残酷性”,当时我只觉得“说这干什么呀”,觉得他光强调受害。那时对原子弹的残酷性还没有充分的估计。

小熊 《讲下去的战后史》(思想的科学社)收录了丸山真男先生跟鹤见先生的对谈,丸山先生也讲到,战后初期没能把原子弹爆炸的问题思想化是自己的错误。丸山先生8月6日在广岛,目睹了大量人员的死伤,但他回忆,当初投下原子弹的时候,他只觉得战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鹤见 是的。这一点在战后十年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本来

占领军是不允许公开原子弹爆炸的惨状的。占领结束以后，1952年《朝日画报》刊出了特集，这才开始被广为人知了。

小熊 您对周围收听战败广播的人们是怎么看的？

鹤见 我是自己听的广播，然后就很好奇周围的人们是怎么对待战败的。我就一个人踱到热海车站去。到候车室来的人都不说话。谁都什么也不说。也不说不甘心什么的，就只是坐着。

我当时的印象跟写《日本人与战争》（朝日新闻社）的罗伯特·吉兰（Robert Guillain）很像。他是一位法国记者，当时被软禁在轻井泽。他很感兴趣当地人会怎么迎接战败，结果一看之下，聚集在一起听广播的日本人又陆陆续续地走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他说那时他想起了能剧^①。我想就是这种感觉。

上野 能剧吗？

鹤见 就是大家都好像穿越轮回了。梦幻能剧的世界就是跟死者的对话吧。情况是一样的。

小熊 就是说您觉得大家都在跟战死者对话吗？

鹤见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上野 身在这样的人们中间，您有什么感觉呢？

鹤见 感觉完全是游离的。我先是觉得，自己的命保住了，放心了。然后就想，这是托天皇的福。

上野 您讨厌天皇，还这么想？

鹤见 是。托天皇和铃木贯太郎首相的福（笑）。

小熊 原来如此。

上野 就是说，既不是解放感、也不是安心感，两者都不是吗？

鹤见 我因为道德的理想是很高的，这样而得救了会有种耻辱的感觉。而且我父亲就想着借此机会争取当总理大臣吧，他是那种天真轻率的人。

小熊 顺便说一下，我的父亲1944年末被征兵，8月15日那天是在满洲他所在的部队里迎来战败的。他并不是什么刚健的士兵，也

^① 日本的一种舞台艺术，以佩戴面具演出的古典歌舞剧为主，表现超现实世界。——译者

没有实战经验,就是个没上过大学、也不知道什么反战思想的二十岁的士兵。后来我问他“那时候是什么印象”,他说听到战败的时候非常难过、悔恨。

鹤见 哦。

小熊 但是这样的感觉就三十分钟左右……

鹤见 哈哈,这很不错(笑)。

小熊 那以后,“等一下,那就是说我可以回日本了吧”的解放感就油然而生。不过后来他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实际回国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我对那种微妙的感觉非常感兴趣。战败了很悔恨是真的,但战争结束了很高兴也是真的。

鹤见 原来如此。

小熊 也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割裂开来的吧。我并不怀疑是有人会到宫城去向天皇谢罪的,但这些人三天以后、或者三年以后还会是同样的心情吗,可能并不一定。

上野 这种微妙的感觉,是没法说得很清楚的。

小熊 说起来,您在1953年的座谈会上(《知识分子的场合》,《芽》1953年8月号)讲过,您在战争期间曾经有这样的预测:如果空袭加剧、粮食不足,邻里居民就会起来造反,会发生革命的。

鹤见 那是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这么想过。就想我家是有钱人,大概会被抢的吧。

上野 是这种想法啊(笑)。

鹤见 是啊(笑)。有钱人的儿子,有结核也好什么也好还是通过了征兵检查,就是这样的世道吧。所以就想,一旦粮食变得越来越少,就会那样吧。

小熊 “战争转化为革命”啊。嗯,不过清泽渊、近卫文麿等人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担心。

鹤见 要是粮食不足,邻里组的人们就会一起做饭,我家这样的就会被抢,就变成共产主义革命了吧。但是这种预测落空了。不管空袭多么残酷、粮食多么短缺,日本人就是没有一起做饭啊。

每个人都是自己去农村找门路，千方百计采买吃的。

上野 结果是止步于家庭自我中心主义。

小熊 家庭自我中心主义让“总力战”体制和革命都无法实现。关于这一点，丸山真男先生在《日本的国家主义》（『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等论文中写到过。

鹤见 那都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了。不如说是连家庭都在解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连亲戚之间、亲兄弟之间都在争抢粮食。感觉什么共同性啊根本都没有。

上野 但您觉得在轰炸过后的焦土上，人们还有力气群起举事吗？

鹤见 我以为会发生像富山的米骚动那样的民众暴动。

小熊 刚才说到1953年的座谈会，您当时说，就觉得先是一起做饭等等，然后邻里组或者翼赞团体里的前社会主义者可能就会加以指导的吧。

鹤见 是的。然后当然也知道有些社会主义者被关进了监狱。

比如我当时很欣赏羽仁五郎。1942年我回日本以后，从前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们都改变了立场，对战争大加称赞。最突出的就是我的父亲。我对此非常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次我偶然看见家里放着一本河合荣治郎编的《学生与历史》，里面有羽仁先生写的文章。

在文章里，羽仁先生对学生读者们这样写道：各位因为是学生，所以可以暂缓征兵。那么，该怎样去报答在中国战线上战斗的同龄人们呢？你们应当写出卓越的历史学著作来，就像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基督教史和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耶稣传研究史那样。

我看了觉得很惊讶。要在日本写相当于西洋的基督教研究史的东西，就意味着让人去思考天皇制。当然这在当时是不能直接写出来的，可是我就想，这里还有没有变节的人啊，真的很震动。

后来，因为我妹妹在女子学习院，我就通过她把羽仁五郎的书一本本借来读，发现他基本上一直都是同样的主张。我就

觉得,如果去请教羽仁先生,可能他可以告诉我在当时的状况下如何才能解脱自己。于是我就托人去打听羽仁先生的情况。结果传回的消息是羽仁先生已经被捕了。

小熊 那是在 1945 年吧。

鹤见 是的。是我从爪哇回来以后了。我想“这下完了啊”。当局终于注意到羽仁先生了。

小熊 后来从 1968 年起在《思想的科学》上连载的系列对谈《讲下去的战后史》中也有您跟羽仁先生的对谈。

鹤见 是的。羽仁先生那次的题目是“八月十五日你在做什么”。羽仁先生说,八月十五日那天,他本以为朋友们会来解放自己出狱,就一直等着。可是谁也没有来。

然后他对跟他谈话的我说,要是读了他的书那么感动,为什么没有跑来打开监狱的大门呢,你八月十五日那天在做什么啊。羽仁先生认为,共产党也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当时没有站出来行动的日本国民是没有资格把责任都推到共产党身上的。

但在我而言,八月十五日已经没有力气去解救羽仁先生了。生病加上营养不良,人已经是摇摇晃晃的了。虽然知道谁在狱中,也想过他们要是被解放了会发生点什么,但没有想过自己去解放他们。

小熊 战败大约二十年之后,日本共产党战后的革命路线基本以失败告终,就有意见认为,以日共党员为首的政治犯不应该接受占领军的解放,而是应该等待日本社会提出“释放他们”的要求。因为没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民主在日本无法扎根,自下而上革命的氛围也无法形成。您觉得这种方式有可能吗?

鹤见 从伦理上讲,这样做是有决定意义的。对此有清晰论述的是武谷三男。

武谷在战前坐过牢,后来出狱了,但布施杜生的妻子以帮忙的名义寄住在他们家。布施在京都被捕,后来死在监狱里。他妻子听到战败的消息非常高兴,写了布告呼吁大家去解放狱

中的人们,想到新桥附近去张贴。因为自己的丈夫死在狱中,所以她觉得必须要尽早去解救他们。

但武谷阻止了她。他说,就算你不去也会有人去的吧,要是你说的话,他们看你是女性会侵犯你的。

但是,二十来年之后,武谷说,那是目光短浅的看法。虽然想着总有谁会去做,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去做。所以自己是把那仅有的可能性都阻止了。这是自己的责任。武谷在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记忆的。

上野 有这样的女性,历史应该记住。

鹤见 后来有个共产党员叫野山广。他写过,战败时他被关在多摩的府中监狱,德田球一也在那里坐牢,曾经找他商量过事情。1945年9月三木清死在狱中,以此为契机,美国占领军命令日本政府释放政治犯。德田找他商量的就是是否应该接受占领军的解放的问题。

但野山在文章里说,当时他身体已经不行了,根本没法思考,所以什么都没法回答德田。结果,十月四日,他们通过占领军命令的形式被解放出来,美军就被定为解放军了。

野山写道,现在想来,应该这样回答德田:应该等到日本人站出来解放我们的时候,不让美军来解放会比较好。确实,他说的对。这样的话,战后日本共产党的立场会好得多吧。但这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

上野 我有个很单纯的问题。美军侵入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的时候,民众去占领哄抢首都政府机构,推倒萨达姆的铜像。也发生了很多针对美国占领军的恐怖事件。而日本在战败后的占领时期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这是为什么呢?您在战争期间也觉得应该会发生这样的事吧。

鹤见 体力问题是一个因素吧。大家都营养不良,没有力气这样做。像德田球一从战前的劳工运动时起就以武斗派而著称,他体力很好,堪称特殊体质,所以在狱中18年都还有思考的能力。野山广就没有这样的体力。

小熊 还有一点,伊拉克的情况是美军很快就来了,但日本有所不同,从投降占领军进驻是隔了一段时间的。在此期间,虽说是投降了,但特高警察和宪兵队都还在活动。实际上,内务大臣公开发表的方针是要逐步处罚政治犯,没有打算释放。鉴于这种情况,占领军介入了,这才在十月释放了共产党员,所以也难怪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在观望吧。

鹤见 虽说如此,但我们自己还是应该有些行动的。当羽仁先生问我“你在做什么啊”的时候,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啊。

小熊 日本共产党的干部十月被释放的时候,您想过要去欢迎他们吗?据说荒正人他们那时去欢迎了,但说去的大部分都是朝鲜人。

鹤见 对他们被释放本身觉得很好,不过我从15岁起就更喜欢克鲁泡特金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时候也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被抓起来了,并不是支持共产党。

但羽仁五郎不是共产党,是无党派,而他又是我支持的人。所以按道理讲,我应该到羽仁先生被关的地方去解放他。这种内疚感,我一直都有。

占领改革与宪法

拒绝协助占领军

上野 您写过,在战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您会因为战争期间自己没有像样地去抵抗而感到内疚,以致都没办法抬起头来走路。战败并不一定是被看作解放的。

鹤见 不是那样的。就是会想,为什么在战争中没有大声抗议被抓进监狱呢,觉得非常难受。所以会说英语也成了讨厌的事。从战时起,连在路上走都会觉得厌恶。是抑郁症的状态了。

上野 然后也不想去协助占领军。

鹤见 是的。不想。开始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在战时的日本,我的内心就是“鬼畜美英”。但从战争结束时起就不再是那样了。我在战争期间写日记,里面写过这样的话:“从现在起我跟美国的战争开始了。”战时是跟日本的战争,但战后跟美国的战争就开始了。

上野 这是怎样一种情况?

鹤见 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现在想来,那是自己对自己的预言。不跟占领军合作,后来还参加反越战运动,战后是把美国转变为对方了。

小熊 但在您周围也有很多人战败之后就态度大变吧。

鹤见 是的。有的人战败以后在路上遇见,就得意地说:“怎么样,我

说的没错吧。”说是预见到了日本会败给美国。但他在战时是说“日本会胜利”的(笑)。

有很多人好像都不记得自己过去的言行了。我父亲也在想着自己能当总理大臣。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跟占领军合作。

上野 您对占领改革是怎么看的呢? 占领军在初期推行了理想主义的改革,解散财阀、农地改革、颁布新宪法等等。

鹤见 初期的占领改革比我设想的要好得多。是很激进的。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施行占领改革的人们很多都是在罗斯福新政时代大学毕业、拿了博士的。后来办《思想的科学》的时候,有个叫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人帮我们订美国的书,他在占领军中是伍长待遇,可他也是在写关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论文时应征入伍的。

还有个我在哈佛的同学利伯曼(L. Eric Liberman)给我送来了毕业名册。他来日本是军医,但他以前在哈佛是全年级名列前茅的。他来找我,让我给他讲讲法西斯主义是怎么产生的。我自己因为有战时的体验,在战争期间就想过“变节”研究的计划,所以私下里跟他聊了不少。

利伯曼是这样说的:美国今后会变成法西斯国家,所以他很想知道日本发生了什么。他是犹太人,所以可能对此有危机意识,但这是很棒的预言。看看伊拉克战争时的美国就觉得,他的预言现在实现了。

小熊 当时那个时代,谁要是说在占领军那儿有门路,大家都会羡慕得不得了吧。即便如此——不,可能是正因为如此吧——您还是觉得没法跟占领军合作吗?

鹤见 没想着要去合作。不过因为知道占领军中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满怀理想而来,私下里会和他们谈话。日本会说英语的人很少,所以他们会来找我。

我跟占领军中负责教育的人们接触过多次,他们是制定语

言相关政策的。当时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吗,像引入拉丁字母什么的。开始是一个叫豪尔(Robert King Hall)的人跟我联系,后来是一个叫哈尔本(Abraham Meyer Halpern)的人,但对于合作的要求我都拒绝了。

小熊 语言政策,是因为您在美国学的是语言学吗?

鹤见 是的。我在哈佛学的是语言,后来还跟和子一起,在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后出任驻日大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索绪尔的学生)等学者的手下参与了美国编写初级日语教科书的项目。叶理绥的日语非常好,还经常读日本语言学者的研究著作。有一次他还拿来了时枝诚记在京城大学纪要上写的文章,时枝当时是京城大学的助教授,是批评索绪尔的。我在战败后不久写过关于语言的论文,可能那边收集到了这些情报吧。

上野 但不跟占领军合作的话,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鹤见 是可以拒绝的。不像日军那样,如果不跟他合作就会遭到报复。

小熊 但是,当时在日本,跟占领军有关系是非常高级的,很多人都觉得可以从中获利,不过您是不会这么想的吧。

鹤见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反而更让我下定决心了。而且,从战争开始以后我就以会说英语为耻。虽说现在想来多少有点病态吧。反正就是不想做占领军的工作。

小熊 因为您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觉得“无法忍受自己跟着美军、说着英语、若无其事地回来”,就决定了。

鹤见 是的。不管怎么说,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是觉得走路都抬不起头来。为什么自己有明确的判断,却没有站出来抗议战争呢?战争期间也没有被逮捕。我为此感到羞耻。

小熊 和子女士在关于《思想的科学》初创时期的回忆文章(《“战后”中的“思想的科学”》,《思想的科学会报》复印版第一卷)中提到,在把美国的社会科学介绍到日本的时候,占领军给提供了他们带来的书,有这样的事吗?

鹤见 占领军作为一个组织并没有特别给我们提供什么。不过我们在美国被没收的书啊笔记啊什么的给还回来了。和子和我也就是通过个人关系去向占领军中的美国年轻学者借些书,像刚才说到的塞尔兹尼克他们。后来我们就到日比谷的占领军图书馆去查资料,那里是完全对外开放的。

上野 虽说如此,您英语这么好又有人脉,完全不合作的话没有什么损失吗?

鹤见 我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但会被别人看作是奇怪的家伙吧。后来也有好多次,有人问我要不要来美国,但我到现在一次也没有去。虽说有好多人是想去得不得了啊(笑)。然后我还为了反越战去美国大使馆门前静坐。赖肖尔在自传里把我写得像个令人头疼的家伙,不过我能理解他这么说的心情。

小熊 祐辅先生在占领军来访的时候作何反应呢?

鹤见 塞尔兹尼克来我家吃饭的时候,他说着英语很高兴的样子。但塞尔兹尼克要回去的时候我送他出门,他就告诉我:“您父亲那么精神,但他近期就要受到追放处理了。”

宪法前言与象征天皇制

上野 您写过,因为有在美国坐牢的经历,所以内心对美国的民主主义有基本的信任。那您对占领改革的积极看法也与此相关吗?

鹤见 有这个因素。所以当利伯曼把他的预言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很吃惊,没法认同。但到了今天看到伊拉克战争的事态,觉得他的预言应验了啊。其实从越南战争的时候起就对美国感到相当失望。

上野 那么伟大的民主主义被占领军作为当权者强加过来,您怎么看呢?

鹤见 这确实不是理想的方式。

上野 我想请问您一下有关宪法的事,1946年3月新闻公布新宪法草案的时候,您是觉得它比预想的要好吗?

鹤见 我喜欢宪法的前言。坦率地讲,我感觉那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望着烧成一片荒野的东京或是大阪,是没有那种心境写出这样的宪法的。

这时候,美国人来了,他们健康活泼,吸取了罗斯福时代好的因素,看着烧过的废墟,起草了宪法。在他们当中,还有像起草了男女平等条款的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这样的人,她当时比我还小一岁,是位刚满22岁的女士。她是在日本长大的,对日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宪法前言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们讨论起草出来的吧。

上野 您最初读到的宪法前言是日语还是英语?

鹤见 日语。

上野 您觉得是好文章吗?

鹤见 当时我日语还没那么好呢。比较难的日语就不行。

上野 哦(笑)。那内容呢?

鹤见 我觉得这篇前言是很不错的。

上野 您说宪法的内容很好,也喜欢宪法的前言。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那是支配者强加的宪法。跟您也颇有交情的批评家加藤典洋,说它是战后日本出发点上的“扭曲”、“污点”,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小熊 上野女士很执着于这个问题啊。

鹤见 这个啊,从我成长的环境来说,我对日本的国民、领导者、知识分子的评价都是非常低的。我父亲是以一高第一名的身份毕业的,既是知识分子也是政治家,我就会觉得,也不过就是这样的人而已。

所以,我看到宪法草案的时候就觉得,“就算是强加来的,这不是很好的宪法吗”。还会想,“是有了这样的宪法,可日本人能遵守吗”。这是我真实的感觉。

上野 就是说,这是靠日本人自己的力量没法制订出来的宪法?

鹤见 是的。而且,只不过是恰好没有什么势力有力量反对它而已。

上野 那就是欢迎这部宪法了?

鹤见 我觉得它是很好的。不过我后来得知,西洛塔他们本来是想走得更远的。当初他们写的并不是“国民”的平等,而是所有人(All Natural Persons)的平等,是将外国人也包括在内的平等,是日本政府在翻译等过程中给变了的。所以它也不是完全的理想形态吧。

上野 加藤典洋等人认为,不管内容怎么样,强加的就是强加的,应当重新加以选择。

鹤见 从政治上的理由出发,我认为现在的宪法还是应该捍卫的。但如果不是从政治的角度,而是完全从道理上讲,通过投票重新选择的说法是对的。但这只是从道理上讲。

从目前来看,进行重新选择,将趋势导向捍卫宪法的方向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改宪的意见应该还不占舆论的绝对多数。但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知道会怎样了。

上野 我想再请问一下有关具体条文的问题,如果前言是很好的,那第一条象征天皇制的条款您是怎么看的呢?因为占领军的既定路线是保留天皇以便对占领提供支持,您会觉得怎么到现在还推翻不了吗?

鹤见 我当时的感觉是,天皇以那样的方式被战争如此利用,负起责任来退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像木户幸一那样在天皇侧近的人们也是这样想的。如果当时天皇完全自发地提出退位而又有人支持的话,是可以就此退位的。

但占领军认为天皇退位会使统治日本变得困难,是相当不愿如此的。但是,如果天皇无论如何都坚持退位的话,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说,在同占领军的关系当中,天皇变得卑躬屈膝了。对美国的恩惠是太过在意了。

小熊 在当时的国际情势下,如果不是仰赖美国的话,天皇被追诉战争责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吧。

鹤见 如果澳大利亚和中国参与对日占领,就会很明确地倾向天皇退位吧。

小熊 恐怕天皇一旦退位,就会产生间接的连锁效应,其他政治家或

者当地权势者就有可能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引火烧身。天皇都退位了你也应该负起责任这样的。

鹤见 这也是有可能的吧。

上野 就算昭和天皇退位了,有宪法第一条在的话,天皇制这种制度也保留下来了。

鹤见 天皇制虽然保留了,但昭和天皇通过退位负起了战争责任。我觉得,当时这是可以做到的吧。如果昭和天皇承担了责任,皇太子和太子妃就可以在明确天皇有战争责任的基础上继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就会相当不同了吧。

上野 那么护宪天皇制就实现了。或者叫做主权在民的天皇制。如果是这样您会支持吗?

鹤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的皇后所做的很多事情就能从更开放的立场上得到理解吧。

上野 那么,您是说不打倒天皇制也没关系吗?

鹤见 要是你这么问的话,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会有点勉强的,就像相扑手已经把对手逼到场边,却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先踏出界外了,或者相反,被对手拉向对面然后又猛然放手,就整个人向后倒下去了,会是这样的吧。以我的政治感觉来看是这样的。

小熊 您当时是觉得推翻天皇制比较好吗?还是觉得保留象征天皇制也不错呢?

上野 嗯,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小熊 丸山真男先生在战败后的几年中并没有正面批判象征天皇制。如果改革过于激进,就会形成左右两派极端对立的形态,可能会导致相当混乱的局面。他似乎是有这样的判断。后来冷战激化,占领政策向反共的方向摇摆,进入了所谓的“逆流”时代,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反抗,他开始明确提出了废除天皇制的主张。不过在战后初期他是这样判断的。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从根本上讲,我认为推翻天皇制会比较好。因为,虽然宪法第一条规定了天皇的地位基于全体国民的意志,但我认为,在此处加上国民投票的条款,明确主张可以据此决定天皇退位或废

止天皇制会比较好。但是,我想要废止天皇制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小熊 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明确主张废除天皇制的是日本共产党。您没想过要支持日共的主张吗?

鹤见 关于日本共产党,我觉得只有不支持日本的战争这一点,是从大正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对这一点,我到什么时候都是支持的。但是,在其它方面我并不支持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我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小熊 刚才提到的少年水兵渡边清,他正是因为战时对天皇的敬爱非常强烈,战后才会对天皇有强烈的反感,在宪法草案公布时,他对规定天皇是象征的第一条是强烈反对的。您没有这样的想法吧?

鹤见 没有。我虽然认为昭和天皇退位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天皇家族并没有强烈的反感。对现在的天皇也是如此。因为并不反感,也就不想亲近。觉得亲近了就被利用是很讨厌的。

关于宪法第九条

上野 接下来想请问您关于宪法第九条的问题。

小熊君的《“民主”与“爱国”》指出,如果回到当时的背景来看,宪法第九条并不是理想主义或是其它的什么。美国当时是想解除日本的武装,靠国际联盟也就是联合国来进行共同管理。而在日本方面看来,接受非武装化就可以使天皇免于追诉,也可以避免共产革命、维持保守政权。而且,反正现实就是已经战败了、解除军备在所难免,赶紧改变态度说这是理想才是上策吧。

因为占领方面解除武装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现实,把非武装称为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粉饰处理吧。那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看待占领者强加的非武装化的呢?

小熊 我并没有去写“粉饰处理”这样的话。从刚才起,听到上野女士

那么执着于战后宪法的“扭曲”、“和平与民主的欺瞒”这样的话题,我有点吃惊。您还真的是江藤淳的“粉丝”、“全共斗”^①的一代吗(笑)?

上野 就别说我的事了(笑)。鹤见先生您怎么看呢?

鹤见 我觉得当时保守政治家跟日本政府方面确实是上野君所说的粉饰处理,他们也没法让人信任。我是在政治家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比较清楚政治家是怎样行事的。值得信任的人基本上没有。

但是,保守政权粉饰处理、欢迎宪法的时期很快就随着美国方针的逆转而终结了。其后,吉田茂试图反过来利用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抵抗美军的再军备压力。他以“有宪法在,国内的反对也很强烈,再军备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为由与美国交涉,想要把再军备控制在最低限度。

上野 是。这些在小熊君的书里也有详细描写。

鹤见 从当时起,我就很理解吉田茂的这种意图。我跟左派的不同之一就是对他的评价。共产党批评吉田政权是追随美国的卖国政权,但我就没法这么想。

我对吉田从战时起就有一种信任。战争期间从热海乘汽车路过大磯的时候,看到吉田用绷带包着化脓的脸,也不带随从,就站在那里。当时他刚从拘留所放出来。看到他的样子,就觉得真是有了不起的人啊。所以这样一个人战后反过来用宪法来对抗美国,我是很理解的。

小熊 鹤见先生在1955年的《纸牌的故事》里写过,“和平宪法的谎言”虽然是美国强制的“千真万确的谎言”,但是,“从这样的谎言中发掘真诚的运动,我们是支持的”。

上野 那是后话了。1946年宪法第九条制订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呢。

鹤见 跟对宪法整体的感觉是一样的。首先是觉得非常好,接着就会

^① 1968—1969年,日本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结成“全学共斗会议”,学生运动蔓延全国。——译者

对日本人能否遵守抱有强烈的疑问。但我觉得作为理想是特别好的。

上野 那这个特别好的理想是作为支配者的占领军强加的,对这一点您怎么看呢?而且还是以占领军继续驻留日本为前提的。

鹤见 理论上是矛盾的。对于战争审判,我从当时起就有这种矛盾的感觉,觉得无法认同。但对于宪法,当时并没有这种矛盾的感觉。

上野 您觉得让美军撤走、真正实现“非武装中立”是可行的选择吗?

小熊 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这跟能否预测到美苏对立是相关的吧。美国方面制订宪法前文和第九条时,冷战还没有公开化,世界各国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国际协调,是有这样的前提的。

上野 不,在这种国际关系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之外……

鹤见 我当时对美国 and 苏联都有相当乐观的看法。我跟苏联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对其负面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不过也并不要跟日本共产党保持一致。

说起来,当时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前卫》批评了我。战败后,1946年左右,共产党员作家高仓辉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加入共产党。但我不是从15岁左右就喜欢读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嘛。克鲁泡特金是多么不爱马克思,在自传里都写着呢(笑)。

日共方面的评价说,鹤见和子还好,她弟弟俊辅是个冥顽不化的“极端分子”。这种说法好像是昭和三、四年时的语言,就是那种不管怎么跟他讲道理都不明白、根本无法沟通的冥顽固陋的人吧。

小熊 和子女士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吧。

鹤见 是的。是在她去美国以后。所以在美国的时候,我周围的鹤见和子、都留重人、南博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我是克鲁泡特金(笑)。

小熊 原来如此。那回到宪法的话题,当时日本共产党是反对新宪法的,因为它既保留了天皇制,又肯定了资本主义,还要放弃武

装。共产党认为应当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为无产阶级而战，而不是去非武装中立。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对资本主义进行变革，谈非武装、和平主义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意见您怎么看？

鹤见 我觉得并不是深思熟虑的说法。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这部宪法就是小说，罗曼蒂克。没有扬弃资本主义的科学方针，和平主义就不过是浪漫想象。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那是罗曼蒂克的。但是，那什么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全都以科学社会主义和苏维埃俄国来决定的话，也是不合适、不够好的吧。

基本上我是怀疑主义的，所以不相信科学上绝对正确的东西。所以也没有走向马克思主义。

小熊 您不会去纠缠于道德上的“扭曲”、“欺骗”之类的问题，也是出于在政治家的家庭中形成的现实主义，以及对“绝对正确的纯洁”抱有警惕的怀疑主义吗？

鹤见 也可以这样说吧。

小熊 和子女士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那她当时对宪法有什么看法呢？

鹤见 当时她认为必须进行更加苏联式的变革，必须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权利。

小熊 嗯，当时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也是这样的意见。那您父亲鹤见祐辅先生对宪法是什么态度呢？

鹤见 宪法草案公布的时候，他很受打击。不久以后，我在父亲的事务所听到的说法是：“这虽然是很好的宪法，但在日本能行得通吗？”

上野 这似乎跟您的意见是一致的。

鹤见 但出发点是有些不一样的。我父亲是“第一病”，所以这会儿教养就跑出来了，说是“连康德都没读过能懂和平主义吗”（笑）。他觉得要接受宪法就必须得去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这跟我是不一样的。

上野 啊哈哈（笑）。

鹤见 我听了真是无话可说。我父亲就觉得,必须要让像他那样一高东大毕业、有教养的人来当领导者。但在我看来,没读过康德的普通大众的意见才是更重要的。

上野 但您二位都认为宪法虽好,水准却是跟日本人不相称地高。

鹤见 这里我们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我是对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评价很低,尤其是什么一高、东京帝大第一名毕业的人(笑)。对我而言,这种认识是战争期间的遗产之一。我觉得这帮人是懂这部宪法的。

上野 宪法草案公布的时候您也是这么想的吧。

鹤见 是的。就觉得那帮人(知识分子)能支撑起这部宪法吗。

知识分子的责任

上野 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些问题想请教您。日本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写过支持战争的文章,比如您说到白桦派里没去支持战争的只有里见弴和柳宗悦。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从高中时起就一直喜欢小林秀雄的书,是非常不幸的女子(笑)。小林也写过支持战争的文章,但在战后初期《近代文学》杂志的座谈会上,他说了那句有名的“我是无知者所以不会去反省什么的。让那些聪明的家伙们去好好反省反省看不是很好吗”。

他在战争期间写道,即便是一种暴行,但在国家处于困难状况时,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是当然的选择,这是庶民的感觉,或者说是生活者的感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可能会用理念呀思想呀去进行批评和判断,但生活者并不去这样做,是自己决定的。您对持这种意见的人们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我不能原谅说这种话的知识分子。

上野 但是像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认为自己也只不过是生活者的。

鹤见 这种借口是说不通的,我是尽量不去跟这种人交往的。

上野 是说这种借口本身很卑劣吗?

鹤见 是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特权才能有知识的。

上野 但从这些人内心的想法来看,也有人认为对国民的非常状态做出知识分子式的判断是卑劣的。就像住在自己家附近的熊先生八先生被卷入了战争,自己也是作为生活者,跟国家共命运的。

鹤见 这种想法是有的吧。这样的想法我也有。所以就想着要呆在战败的一边回日本了。要是只想着不弄脏手的话,在美国的牢房里老实呆着就可以了。

但是,知识分子并不只是生活者。他们是一路沿着特权的道路走上来的。这一点是不能不考虑的。就连我也不是只靠自己的力量到现在的位置的。

上野 您是说知识分子不能放弃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假装自己只是生活者?

鹤见 是的。就拿小林秀雄来讲,他是东京工业大学教授的儿子,又是东大法文系毕业的,也应该多少想想自己是得到了特权啊。

而且,他是把阿尔图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介绍到日本的人。兰波过的就是不同的生活。就算是质疑理性、厌恶装作知识分子去进行特权的判断,无论如何都不想如此,那也可以往别的方向上去啊。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有“帝王与我何干”的说法吗。政治也好,国家也好,“听说太阁大人也死啦”^①,可以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啊。

小熊 我想请问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随着时局而摇摆的不光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吧。您对这种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是强烈批评的,但对于随着时局摇摆的庶民却没有批评。这是为什么呢?

鹤见 这个问题很尖锐。我自己是享受了各种特权的。所以对那些跟我一样享受着特权的人们,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多负起点责任来,但对于没有特权的人们我就不会去说同样的话。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所以会有人对我抱有“不知为什么很不喜欢的夹竹桃”之感也

^① “太阁”是对摄政或太政大臣的敬称。也特指丰臣秀吉。——译者

是当然的。

上野 哈哈(笑)。

小熊 我以前就在想,这一点是丸山真男先生跟鹤见先生的不同之处。丸山先生对庶民也是有伦理要求的。

鹤见 丸山也是这么批评我的(笑)。他说,“鹤见君,你赞扬大众,但这是因为你家庭优越是知识分子的缘故”。

小熊 这是在《讲下去的战后史》的对谈里说的吧。丸山先生说,大家觉得他是有特权的知识分子、而鹤见先生是站在大众一边的,但实际上正相反——鹤见先生是浮于世间之上的知识分子,而他自己的家庭出身并不优越。

鹤见 他认为自己是庶民(笑)。丸山出于对我的“反感”经常这样说:“那是因为你是贵族所以才会这么想。像是跟附近贫民区的人们一起听落语^①的”。

上野 我明白他想表达的心情(笑)。

鹤见 我并不这么想。因为我是个与生俱来的不良少年。

小熊 丸山先生是不是庶民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把批评的对象放在何种位置上。

对于那些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战后又转而赞美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丸山先生也感到非常愤怒。但他认为,要说起来,建筑工头、工厂业主这些村镇的权势声望阶层——放在现在就是会去支持自民党的人们——才是造就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阶层,他称这些人为“社会里的下士官”,对他们是有这样的批评的。

鹤见 是的。丸山把这些人叫做“亚知识层”(亜インテリ)。这是我跟丸山不一致的地方。

1947年丸山在东大的演讲中区分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本来のインテリゲンチヤ)与“亚知识层”。“亚知识层”就是工头等等,是法西斯主义的主体。然后他对听众说,“大家是东

① “落语”是日本的一种曲艺表演,类似单口相声。——译者

大毕业的,所以并不是亚知识层”。

这种看法跟我不同。吉本隆明就是造船工匠的工头家庭出身,他指责丸山只不过是具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的争论,我是支持吉本的。

小熊 那篇演讲叫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运动》,我读了原文,意思跟您讲的有些不一样。丸山先生说的是:学生也跟社会上的普通人一样,有“亚知识层”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来听这种演讲的“大家都属于后者吧”。他并没有说“东大毕业的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鹤见 是吗?那我是出于自己的偏见曲解了丸山的思想了。

小熊 不管怎么说,是只将知识分子或政治家当作批判对象,还是也将庶民包括在内,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就有怎么看待那些认为自己是庶民、全然没有负起责任的意思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小林秀雄更典型的例子是清水几太郎。清水出身于本所^①的贫民区,是从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完全凭读书出来的。他将自己定位在庶民一方,认为自己是靠知识挣钱、迎合时局写稿谋生的“卖文商”。于是战前就写马克思主义,战时就支持新体制,战后是和平运动的旗手,70年代则成了支持改宪和核武装的右派。这样的人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呢,还是庶民呢?

上野 很有意思的问题。

鹤见 他也是“第一病”。学习非常好,各个时期流行的主题都能消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卖文。而且他还煽动读者去投身运动吧。这样的话,是有作为诱导者的责任的。

小熊 原来如此。那是超出了“知识分子还是庶民”这个框架之外的了。

鹤见 这是踩踏者和被踩踏者那样的关系。是有着诱导者的责任的。所以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是应该与庶民区别问责的。

^① 东京都的一个地名,商工业区。——译者

《思想的科学》创刊

源自战争体验的多元主义

小熊 然后在 1946 年 5 月,《思想的科学》创刊了。您能讲讲创刊的经过吗?

鹤见 现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教授们可能会以为,《思想的科学》创刊时七人有四人都在美国留过学,所以是个要引进美国思想的群体。但并不是这样的。

创刊时的成员中,我、和子、都留重人、武田清子是美国回来的。渡边慧是留学法国的。没留过学的有丸山真男和武谷三男。后来成为《思想的科学》方针的“多元主义”是武谷三男提出来的。

小熊 怎么说?

鹤见 是根据武谷在编辑会议上的提议定为规则的。我们是七位编辑同人筹划约稿、审读来稿。杂志最开始只有 32 页,所以因为版面有限而退稿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我们有个内部规定:即使是一度决定要退回的稿件,只要有一个人重读后觉得“这还不错”,就一定不会退稿。

这已然是对多元主义或者说多元共存的信任了吧。不去统一规定杂志的色彩。武谷看到了联合国的情况,反其道而行之,想出了这样的原则。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其实和子原来有不同的想法。当时是在东大川岛武宜的房间里开的编辑会。因为是烧成一片废墟的时代,所以会有这样的事。

当时和子觉得,已经有了以共产党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民科)。她说不愿意办成个像要来唱反调的杂志。

上野 和子女士那时是会这样说的。

鹤见 然后武谷三男就说,“有一本独立于共产党的杂志不也不错吗”。然后就通过了。

小熊 武谷先生从战前起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能说这样的话真是了不起。

鹤见 他是没有被日本共产党牵着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是党员。这个多元主义的原则,要是追溯起来的话,是他战前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杂志《世界文化》时的经验。

1935年《世界文化》在京都创刊的时候,日共的主要干部都在狱中,党组织已经破坏了。所以这个杂志不是只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是由很多不同的人合在一起办的。

后来苏联方面得知日共组织破坏后有一群人在办《世界文化》杂志。当时苏共正要实行人民阵线战术,就想对这个组织进行指导,派来了一位叫做小林辉之助的密使。但小林到了京都以后被捕了。为他做辩护人的就是在“泷川事件”中被京大开除的泷川幸辰,不过小林最后还是死在狱中了。所以《世界文化》跟苏联的指令或者人民阵线战术完全没有关系,是独立结成的具有多元性的组织。

《世界文化》在1937年因为同人全部被捕而废刊。但在仅有的两年半时间里就刊发了很多重要的论文,比如中井正一的《委员会的逻辑》等,都是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涉及到的。武谷、新村猛、和田洋一、久野收等人在战后都与《思想的

科学》有关联。也就是说,这些在战争期间的日本培育出的思想跟《思想的科学》连在一起了。

上野
鹤见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源流吧。这通过武谷对《思想的科学》的提议体现出来了。但大学里的思想史学者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因为杂志同人中七人有四人都是留学美国的,就认为大概是受到美国思想的影响才成为多元主义的。



肩扛行李去伊东调查(1951年)

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是在武谷三男本人的强烈主张下,才有了《思想的科学》的多元性。那些学者也不看看是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讲了该讲的话,这种思想史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呢?

我在那以前并没想到武谷会说这样的话。《思想的科学》是仰赖武谷才能这样的。

小熊

是以好的方式继承了战时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啊。日共没有变节的干部们在30年代初就都被捕入狱了,没有战争期间的经验,所以并不倾向于人民阵线式的合作,战后实行的还是以前对社会民主主义以打击为主的论调(打击社会民主主义、以共产党为基础组织劳动者)。有不少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鹤见

所以说《思想的科学》不是从《思想的科学》开始的。

民科创立时的成员中,武谷三男、渡边慧、宫城音弥他们三人后来到了《思想的科学》这边,作为个人不再出席民科的会议了。当时民科就在同一座楼的楼下,但他们都上到7楼来开《思想的科学》的会。为《思想的科学》防卫日共的就是他们三个(笑)。

在当时的同人中,宫城战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学生中间也属于最左翼的,但他后来得到资助去法国留学,体会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就开始对日本共产党持批评态度了。所以他战后就不支持日共的路线了。武谷也是这样,他们都把自己的经验汇集到《思想的科学》来了。

小熊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像越平联也不是从越平联开始的,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小组运动,还有吉川勇一先生在日共内部纷争时期的经验,也是有很多源流的。

鹤见 跟地理不是一样的嘛,正是因为有若干源流,才汇成江河的。

“异类交流”的同人们

小熊 您在《期待与回想》里说,当时《思想的科学》的同人是和子女士召集的吧。

鹤见 是的。和子从小时候起就觉得我很弱,很疼爱我,一直都很帮我。我被妈妈打了啊、跟女人的关系复杂起来了啊,每当这样的時候都是她来帮我。后来我得了结核,去了南方,总算是活着回来了。但战后我很消沉,她就请求我父亲说,“让俊辅去出杂志吧”。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正好父亲从战时起就在太平洋协会工作,那里有个出版部,依托海军出版书籍。日本战败后海军没有了,我父亲也受到追放处理,就不能再出版以前那样的书了。但出版社的机构还在。《思想的科学》当初就是借着这个机构创刊的。

但我15岁就去了美国,后来又去了南方,在日本几乎不认识什么人。召集同人的时候全是和子去讲的。最初的七人当中,我以前认识的就只有从15岁起就打交道的都留重人。

小熊 但和子女士当时也还很年轻吧。跟在美国留过学的几位是认识的,那跟其他各位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鹤见 她因为是女性,战时乘交换船回国也没有被召入伍。所以她从

1942年8月起就一直在东京。后来我父亲成立了太平洋协会美国分室,出版了几本研究敌国美国的书,和子就在那里工作了。清水几太郎和福田恒存他们也在那里工作,和子就一边上班,一边去拜访学者或者听课什么的。所以战争期间她就拜访过武谷和丸山。

小熊 就是说和子女士从战争期间当编辑时起就建立了人脉。

鹤见 她还从丸山那里拿了《国家学会杂志》给我看,上面登着丸山1941年写的论文《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那是我从爪哇回来以后,1945年的事情。

小熊 丸山先生事实上的成名作。您在战争期间就读了吗?

鹤见 是的。那篇论文讲的是以获生徂徕为代表的江户时代的儒学。丸山认为,政治秩序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依人的主体行为而产生的被制造之物,是一种“虚构”(フィクション),这种思想在西方近代思想中是有的,但在江户儒学中也已经产生了。这与战时的皇国思想,什么日本的自然之中埋藏着以天皇为中心的道德、这是国民的规范之类是完全不同的。

我读了这篇文章后非常吃惊。这正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创造的自然”和“被造出的自然”的问题。也是1905年之前“创造的知识分子”和“被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区分的问题。

小熊 我想能正确理解丸山先生这种意图的读者在当时不一定很多。

鹤见 可能是。但和子也是理解了丸山的意图才拿给我看的。

然后她还给我看武谷写的关于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论文。这篇论文登在文理大学纪要上,是他最早的一篇提倡三阶段论的论文。我也觉得非常好。

小熊 这也是战时的积累成就了《思想的科学》吧。和子女士作为编辑,建立各种人脉、读各种论文,都是与战后相联的。

鹤见 是的。是跟战争期间的关联。还有渡边慧也是在战争期间翻译了居里夫人写的《皮埃尔·居里传》,也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他也是非常讨厌战争的国际主义者。

小熊 战争期间您就读到了他们的作品,但见面是在战败以后了吧?

鹤见 和子见过他们,但我是在战后才见到他们的。像刚才说的,以前就认识的只有都留重人。另外武田清子也不算是初次见面,我们是一起坐交换船回来的。

小熊 初次见到丸山先生和武谷先生是什么印象?

鹤见 后来丸山跟我说:“鹤见君,你从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是端着不自然的。”可我完全没想要这样。基本上从战时起,我跟日本人说话的时候就始终是端着的。因为一直都在想着会不会被说是“非国民”、会不会被打死啊什么的(笑)。

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在战时那种情况下写出那样的论文的人,这种信赖感从一开始就很强烈。我们几位同人彼此都是这样想的吧。

小熊 但是,跟丸山先生和武谷先生不一样,您是没有发表过论文的吧。

鹤见 所以啊,我也在想,像他们这样的人还真的找我来做采编工作啊。当时大家都还没什么名气,但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是有成果的。所以我是有点惊讶的。但是没有人对我表示过不满。

上野 还是因为信任和子女士的关系吗?

鹤见 是的。大家都不了解我的情况,所以最开始就是这样的。

上野 战争期间东京帝大是没有女生的。青春妙龄的和子女士就那么旧帝大的研究室出来进去的吗?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行为吧。

鹤见 在这个意义上她是非常大胆的。去丸山的研究室,还给我看丸山的论文。

上野 是因为她自己关注这些呢,还是因为关心弟弟呢?

鹤见 开始跟我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听说有个叫丸山的人没有追随法西斯主义吧。武谷也是这样,得知有一个人在以如此的方式坚守马克思主义,就去拜访他了。

上野 是吗?

鹤见 但武谷是一个不寄身于日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和子的洞察力还不够。所以在川岛的研究室听到武谷的提议时,

她大吃一惊。

对她来讲,也没想过因为日共旗下成立了“民科”、办《思想的科学》就有某种积极的意义什么的吧。就是想为了病弱的弟弟帮忙办《思想的科学》(笑)。我想开始就是这样的吧。

小熊 但还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缘分啊。如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确定人选的话,武谷先生不用说,邀请丸山先生也是错的吧。

鹤见 要是仔细读他的论文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人们都传说丸山是个“KP”(共产党员)。我的堂弟鹤见良行当时是东大法学部的学生,他也说传说丸山是KP。他当时还没有慎重去读文章字里行间的的能力,所以就会这么认为的吧。

但现在想来,和子这样的人能去邀请丸山、武谷,而且他们二话不说就同意让我担任采编工作,还真是令人惊讶啊。历史并不是只有必然的呀,也是有偶然的。

刊名的由来

鹤见 在第一次编辑会上见过面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杂志刊名的事情。但进行得并不顺利。

基本上大家的专业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到一起。后来听丸山的学生桥川文三说,丸山在第一次编辑会上见到我的时候,觉得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小熊 因为您在美国学的是符号论、语言哲学、实用主义什么的,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基本教养是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思想,对美国哲学完全不熟悉。可能就像您不明白“绝对矛盾的自我统一”一样,丸山先生也不明白您说的东西。

鹤见 是的。但丸山听不明白我说什么,后来就到东大图书馆去找书,下了很大的功夫,找来了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写的美国思想史来看,要试着去理解我所讲的东西的背景。这也是听桥川说的。丸山对实用主义是抱有亲近感的。

小熊 但我觉得丸山先生的思想跟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完全不一致。

鹤见 虽然如此,但丸山是从福泽谕吉那里类推出来的。就是对政治、行为要根据结果去评价,而不能只考虑其意图。这跟实用主义是有相通之处的。

所以丸山关于福泽谕吉的一系列作品是看到了福泽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因素,正如他在获生徂徠那里看到了关于“虚构”的思想一样。所以虽说丸山是去学了实用主义,但他并没有对从美国传入的思想进行教科书式、优等生式的理解。

上野 杂志刊名定不下来是怎么回事呢?

鹤见 大家提了很多种方案。武谷三男说叫《科学评论》吧。

现在再来看武谷一直以来的工作,就很能理解他起这个名字的意图了。他在去世之前出版的《危险的科学技术》里写道,科学的前沿性作用就像在山里种树一样。在人迹罕至的山里种树,一见之下好像是种孤高的行为,但其结果是保持了水土,对人们的生活也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科学家的工作会影响到普通人。就像原子弹爆炸就会有很多普通人被杀死。所以,普通人也有对科学的方向发表看法的资格。但日本没有在这种意义上进行评论的刊物。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只有学者们的学会杂志。

理解了这种意图,就明白他为什么要提议叫《科学评论》了。但在1946年第一次编辑会议的时候还不明白。所以武谷的这个提案就只得了一票。然后丸山提议说叫《思想史杂志》吧。

上野 哇——

鹤见 丸山的想法是这样的。比如卢梭所说的“自然人”,这样的说法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要去进行实证的探究。要认真考察观念的要素是从哪里产生的。就像后来加藤周一研究翻译语一样。是要通过这样的工作去建立日本的思想基础。但这个提案也只得了一票(笑)。

上野 那您自己提了什么方案呢?

鹤见 我提议叫《符号论杂志》。我在《思想的科学》写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语言的护身符式用法》就是用了符号论的理论。

小熊 您昨天也讲到过,战时的“皇国日本”也好,战后的“民主主义”也好,都只是口号轮番登场,被“护身符式”地使用着,您的论文用符号论批评了这种状况。

鹤见 是的。考虑到这些,我就提议叫《符号论杂志》。但包括丸山在内,大家都不懂符号论。虽然我做了说明,但就像刚才说的,大家的反应是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提案也是一票(笑)。

小熊 那和子女士提了什么名字呢?

鹤见 和子什么也没提。因为对她来说,“民科”是正统,这个杂志是为了弟弟办的。

那次编辑会渡边慧没有来,因为什么我记不清了。都留重人在经济科学局,工作非常忙,也没有来。我记得武田清子也没来。所以就四个人开会,意见还都不一样。

上野 那是怎么把意见统一起来的呢?

鹤见 然后就完全陷入停滞了。我们开会是在日比谷市政会馆的六楼,碰巧上田辰之助也经常去那里。他在战争期间是靠边站的,但他英语非常好。博士论文写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经济思想,对中世纪经济也有关注,他自己也是公谊会教徒。

然后上田就很偶然地到了我们那儿,提了一个方案。从天主教神学当中诞生了某种科学思想的胚胎,可能他就是从这里想出了“思想的科学”这个名字。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有‘art of thinking’这样的说法,把它稍微改一下,可以考虑‘science of thinking’。这个说的不就是你们想要办的杂志吗?”这个名字很有人气,大家就把它定为刊名了。

上野 我听了觉得很惊讶。我本来还以为,因为是战败初期,人们对“科学的”这样的说法评价很高,或者是像恩格斯的“从空想到科学”那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了“科学”这个词的。

鹤见 所以说啊,后来的思想史学者们也有人这样推测,但这个名字

并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来的,是从中世纪神学那里来的。

小熊 我感觉是不是这样的:战争期间彼此抱有某种信赖感的人们循着对方的气息聚在了一起,每个人的专业领域各不相同,但有一种方式是彼此共通的,说是“art of thinking”也好,是一种要自己去进行根本性的思考的方式。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鸣的。

鹤见 战争期间这种“嗅觉”会变得非常发达。那是一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谁告密的时代吧,所以大家不是去看表面上的专业啊、党派啊,这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那家伙是不是符号论这种层次上的东西,而是会通过一个人讲话做事的方式去感受他是不是可以信赖。就是那种“对路”的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在战争期间和战败初期能跟不属于同一派的人、其它派别的人合流、接触。战后反而不再是这样了。

小熊 战败初期,中野重治能跟柳田国男对谈,津田左右吉能和羽仁五郎一起参加“和平问题谈话会”,鹤见先生能去采访若槻礼次郎,是这样一个时代啊。

鹤见 武谷三男在开始办《思想的科学》的时候,也会说“跟林达夫约稿吧”。我说“林达夫,我不熟啊”,他就说,“你去了会觉得投脾气。他是个特别洋派的人”。后来我就去了林达夫家,他给我们写了稿。就是这种发达的嗅觉找到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地分散在各处的人们。

小熊 这样的交流已经渐渐消失了吗?

鹤见 日本的学术,要拿“总店一分店”的关系来比喻,就像是外国的分店。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分店”。分店因为做不到追本溯源全面思考,就彼此争斗、势不两立。结果没有“天皇”就统合不到一起。这种荒唐的状态从签订和平条约以来就开始了。

坦率地讲,日本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进行根本性的思考,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就只会熟读上边给发的教科书。

上野 好尖锐的批评(笑)。

小熊 但武谷先生、丸山先生和您都接受了上田先生的提案,就像是

丸山先生所说的“竹刷型文化”^①的具体表现吧。在起点、根基上是彼此相通的。

鹤见 是的。根基就是由“在战争期间是如何度过的”而生的信赖关系。

^① 丸山在《日本的思想》中对文化类型有“竹刷型”和“章鱼罐子型”的比喻。前者是从同一根干上伸出各种分枝，后者是各个领域孤立存在、互不相通。——译者

丸山真男与竹内好

与丸山真男的交流

小熊 当时您跟丸山先生他们都有私交吗？

鹤见 也会到他们家里去拜访什么的。那时大家都很闲。没什么报刊媒体，也就不会被截稿日期追。我们就互相去串门，呆很长时间，也没人来找。

上野 羡慕。

鹤见 有一次我到丸山家去，桥川文三也在。丸山就说：“这位是桥川君，评论家。”他绝对不说“是我的学生”什么的。

在丸山家见到桥川的时候，桥川的状态非常不好。丸山学派里真正发愁生计的只有桥川一个人吧。他因为结核病，家散掉了。他自己也有结核，弟弟患结核去世，妹妹因为结核住院，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长大的。他在战时曾是日本浪漫派的保田与重郎的崇拜者，但战后从丸山那里借来卡尔·施密特的书读，就开始思考日本浪漫派与施密特的关系。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构思发表在同人杂志上的《日本浪漫派笔记》。

那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丸山给我介绍了高畠通敏，说：“鹤见君，这是位秀才，可不要毁他啊。”但结果高畠还是给卷进“变节”共同研究和“无声之声会”的活动里来了（笑）。

小熊 说桥川文三是“评论家”、高畠通敏是“秀才”啊？真是微妙的

说法呀。桥川在战时是个皇国青年,是出于对日本浪漫派的爱与恨写下《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的思想史学者,但有人说丸山先生对他的工作评价并不高。

鹤见 表面上看,丸山是肯定近代的冷静的学究,桥川是批判近代的浪漫主义者,所以人们往往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一样,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丸山是个内心有狂逸之气的人。他的家族里有这种气质的人也很多。所以在他的学生当中,像高畠那样的秀才他就能放心接触,但对会引发自己狂逸之气的桥川文三啊、藤田省三啊,他就会有意保持距离。

小熊 我读了丸山先生的遗稿集《自己之内的对话》(美铃书房),他说自己讨厌希特勒所喜欢的瓦格纳的音乐,但是,“我知道,我在瓦格纳那里厌恶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东西。或者说,也许是对我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瓦格纳式的东西的恐惧在潜意识中起了作用,才让我深信自己是讨厌瓦格纳的。”

鹤见 是的。实际上他就是这样的人。

战败后不久,我到他家去拜访。他从书房找出两篇自己在战争期间写的论文来,说“读读这个”。

一篇是叫做《读麻生义辉〈近世日本哲学史〉》的书评,里面引用了大西祝的话。明治前期兴起的西洋启蒙思想只是被当作时髦之物,流行过后人们就都转向了别处,大西对此进行了批判。丸山借此暗暗批判了现实:被输入到日本的德国唯心论与源自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也是作为流行思潮而兴盛一时、被当作深远玄妙的思想对待,导致了“科学精神的稀薄化”。“遵循历史脉络”的思考方式,拿丸山的论文《“自然”与“制作”》来讲就属于“自然”,战争期间也有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的哲学”吧。丸山在战争期间写了这篇书评,就是要批评那样一种动向。

另一篇叫做《神皇正统记中的政治观》。这也是他的得意

之作,是讨论南北朝时期^①北畠亲房《神皇正统记》的历史观的。北畠认为,不能给民众以和平的政权必然要衰亡,即使历代天皇也概莫能外。丸山在战争期间这么写,意图是很明显的了。

上野 战时写这样的论文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吧。

鹤见 这两篇论文,丸山拿给我我就坐在他家里读了。当时确实是很闲啊。读了以后就知道,这两篇是他的得意之作。丸山是想让我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工作,所以才拿给我看的。这两篇论文在70年代被收进了《战中与战后之间》(美铃书房)的单行本,不过当时他是拿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给我看的。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

小熊 那是1946年的事吧?

鹤见 是的。这在我跟丸山的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是粮食困难时期,是丸山也说过“复员回来的时候,家里拿出的银舍利真香”^②的时代。然后1947年我感到很有共鸣的是丸山的《陆羯南——人与思想》这篇评论。

小熊 战前在镇压下屈服转而支持战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了战后没怎么经过反省就再度复出得势。在这样的风潮下,丸山先生在这篇评论中写道:“就抽象的理论而言,跟当时的民权派相比,羯南的思想是绝不激进甚至相对保守的。但必须要注意的是,一个人是进步还是反动,并不是根据他嘴上如何说来判定的,他在实践中多大程度上贯彻了自己的主张才是更重要的。口头上喊得比羯南更雄壮的民权论者有很多,但这些人后来却若无其事地跟曾被自己骂为仇敌的藩阀政治家握手言欢。与此相比,羯南在抽象理论上所显示出来的进步性都在他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中体现出来了。”

鹤见 对对。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也觉得很有共鸣。读了这三篇论

^① 日本的南北朝时期是1336—1392年。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北朝),后醍醐天皇迁居吉野(南朝)。1392年两朝合并。——译者

^② “银舍利”指白米饭,是20世纪40年代日本粮食困难时期的用语。——译者

文,就能够了解从战中到战后丸山是如何对待日本的“同时代”的。也就是说,他批判的是战时的超国家主义,或是战后对“民主主义”的轻易赞美,但他的立足点是大西祝、《神皇正统记》和陆羯南。他并没有去勉强套用从欧洲或美国来的“干净”理论、借其权威去批判日本的现状。并不是去说“这是他们的局限性”,而是看到当时的时代的可能性,进行“带有日期的判断”。

这在战败初期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立场。他想让我了解他的想法。所以,就像他读米德的书、学习实用主义,努力想知道我说的东西有什么样的背景一样,他也希望我能了解他的想法,就给我读了他的论文。

上野 也正是因为您能读出这些,才构成了交流。

彼此的影响

鹤见 丸山的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我在1950年写了讲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这本书并没有止于对皮尔斯、詹姆斯等人的介绍,而是把石桥湛山、柳田国男,还有福泽谕吉和佐佐木邦都作为“日本的实用主义”列举出来。我不想只去说“在美国是如此这般”。这就是受了丸山的影响。

上野 所谓“土著的思想”,印象中总觉得是鹤见先生提出来的,而您觉得这是丸山先生的影响啊?

鹤见 也不能说全部都是,但丸山的影响是深入我心的。

小熊 不过呢,您从《思想的科学》初创时起,就跟良行先生一起去听取睡在地下通道的人们的“哲学”。因为觉得跟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们相比,这样的人才有真正的“哲学”。我觉得丸山先生是不太有这种“土著”的志趣的。

鹤见 可能是吧。

小熊 而且,福泽谕吉、石桥湛山就不说了,但佐佐木邦是位大众作家,丸山先生不怎么会去研究这样的人吧。

鹤见 是吧。说起来,也有反过来让丸山吃惊的事。1946年12月号的《思想的科学》以合评的形式做了罗素《西方哲学史》的书评。就是叫武谷三男、林达夫、丸山真男、松本正夫来开了个合评会,再让他们以此为基础各自写文章。但丸山来开会的时候吃了一惊。

让他吃惊的是,罗素虽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他的《西方哲学史》却引用了《大英百科全书》。丸山从战前起就受教于东大,所以有一种固有的观念,觉得正经的学术著作是不会去引用百科全书的。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就写着引自《大英百科全书》什么的。丸山就很吃惊,说“英国人会干这种事吗”。

这一来丸山就学到了,英国美国是有从这种杂书里“啪”地引个材料出来的做法的。战前的帝国大学作为学术依据的法国德国可能就不会这样吧。他就知道了,是有所谓“杂书派”这种做法的。

小熊 要说“杂书派”,丸山先生1946年写《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时,引用过夏目漱石的小说《其后》。当时的思想史学究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丸山先生是有意识地这样做了。

这种做法是从与《思想的科学》的交流中来的吗?说起来,《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比《思想的科学》的罗素合评要早一些,那是丸山先生想要确认自己内心认同的“杂书派”做法吗?不过当时整体上都有自由的气氛和交流,所以讨论哪个在先也没什么意义吧。

鹤见 是这样的吧。嗯,不过丸山后来也没怎么采用“杂书派”的做法,或者说他对此是自我克制的。倒是我入了“杂书派”。但丸山好像也接受有这么一种做法,丸山学派的人也是受到了影响的。

比如60年代前期出版的《日本的一百年》丛书,我也是编者之一。当时就跟丸山的学生桥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神岛二郎、今井清一他们,把什么明治时代点心店的日记之类的杂书堆得老高,一起来读。要描摹出时代的气氛,只读知识分子或

政治家的思想是办不到的。我把他们卷进杂书的漩涡里去了。松本三之介说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读这种杂书。

上野 现在我读学生的论文,引的全是杂书(笑)。

小熊 吉见俊哉等人说,日本文化研究的起源之一是《思想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研究。那丸山先生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和心理》也可以算是这个起源的一部分吧。但丸山先生自己渐渐跟这种做法拉开了距离。他在1967年的《讲下去的战后史》中与您对谈时,对《思想的科学》也讲了批评的话。

鹤见 是的。丸山那时倾向于认为应该有规范的学术训练。

小熊 丸山先生是公认的“反主流”:战败初期连杂书也引,到了60年代媒体膨胀的大众社会,他又强调学术训练了。

鹤见 不过他对《日本的一百年》评价很高,说“里面有历史”。他对岩波新书《昭和史》是非常反感的。

小熊 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远山茂树先生、今井清一先生、还有最近刚刚去世的藤原彰先生合著,1955年出版的那本吧。

鹤见 是的。他说“那里没有历史”。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讲这是对的”这样的思路。

小熊 关于《昭和史》有一场著名的“昭和史论争”。龟井胜一郎批评它是“‘国民’缺席的历史”,竹山道雄则出版了《昭和精神史》与之对抗。有人把这场论争简单地看作是保守派与进步派的论争,不过丸山先生对《昭和史》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我觉得,丸山先生虽然常被称作是进步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看到了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变节支持战争,对他们持批判态度的。像林健太郎、竹山道雄是战时批判军国主义体制、战后成了保守论者,丸山先生不如说在性质上是跟那边更接近的。

鹤见 竹山道雄是自由主义思想这一派的。但他写的《昭和精神史》是要论证自由主义思想的谱系中也有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脉络的吧。丸山对竹山是理解的。

林健太郎呢,在战败初期甚至比丸山还左的。他在《世界》

上写文章,批评大塚久雄的近代评价。

丸山的立场是很独特的。他在战败初期马克思主义兴盛的时代对福泽谕吉有很高的评价,是会被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是反动的吧。所以他也受到了日本共产党的批评。

小熊 但他没有成为保守派,也还是有反主流的因素,他是反抗从50年代前后开始的逆流的,对战前体制的复活抱有强烈的警惕。后来就对自己内心所具有的“瓦格纳式的东西”啊、浪漫主义啊就有意地保持距离吧?

鹤见 我想有很多原因。不管怎么说,他在战败初期确实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立场出现的。但结果没想到引起热潮、广受好评,然后成了学界的主流,很有讽刺意味的。

后来在60年代,丸山受到了吉本隆明的攻击。但吉本所要批判的那种立场,丸山在战时显然是没有的,在战败初期也是一样。不光是丸山,其他学者的作品吉本也都没怎么读过。所以他不明白丸山在战争期间有什么样的出发点。他的那些攻击都已经是一种肉体反应了,不管怎么样先噼里啪啦打上一顿。

上野 那丸山先生不是肉体派。

鹤见 丸山呢,不是有肉体式勇气的人。

小熊 说是他当二等兵的时候被人拿军靴^①打。

鹤见 丸山因为这些受了很大的刺激。我知道一个小插曲。在竹内好的葬礼上,增田涉在我前面读悼词,但他年事已高,读着读着同一句话念了两遍。我正觉得奇怪,他心肌梗塞发作,一下子倒下去了。当时丸山僵住了,动也不能动(笑)。

上野 呆住了?

鹤见 当时埴谷雄高很麻利地跑上来,给增田服了硝酸甘油。然后马上把他送到庆应医院,但几天后他还是去世了。可是丸山就那么站着,喃喃自语。

^① 旧日军的军用皮靴(“编上靴”)鞋底钉满铁钉,后跟嵌有铁掌。——译者

小熊 说什么？

鹤见 我以为他在说什么，在说“武田（泰淳）叫走了竹内，竹内叫走了增田”什么的。就连这种时候说的话都是思想史的（笑）。

上野 哈哈（笑）。

鹤见 相比之下，埴谷就像个橄榄球运动员。他从二十岁起就参加左翼运动，是活在把生死都置之度外的世界，还在监狱里待了很久。所以啊，千军万马雄赳赳的。

上野 您当时怎么样了？

鹤见 我虽然想着应该上前去，但觉得自己这么笨肯定不行，还是有自知之明算了吧（笑）。然后埴谷就很麻利地跑过来了。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①

小熊 您说读了丸山先生的陆羯南论觉得很了不起。但那是一种对民族主义的重新肯定吧。您写过，您从战争期间起就在“所谓的日本人”当中感到非常孤立，所谓国家基本上就把它等同于相扑。那我就想请问您，为什么会在战败初期对丸山先生那篇重新肯定民族主义的论文感到共鸣呢？

鹤见 首先是有之前说到过的1905年的分界线。虽然是到了很久以后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的，但从战争期间就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了。就觉得我父亲人格形成的时代跟之前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然后读了丸山的陆羯南论就觉得，原来如此啊。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是“日本主义”就全盘否定。他的论文是想说，明治初期“日本主义”当中也有开明的东西。这也是有历史感的“带有日期的判断”。我对这种思考方式是有共鸣的。

小熊 原来如此。“日俄战争之前的明治日本是不同的”，在这一点

① “ナショナリズム”(nationalism)在日文中可对应“民族主義”“国家主義”“国民主義”“国粹主義”“愛国心”“国家意識”等；“パトリオティズム”(patriotism)则可译为“愛国心”。这些日文汉字词汇又都可能与中文对应概念含义有所区别。此处为简明起见译作“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译者

上,丸山先生跟司马辽太郎是有共通之处的吧。

鹤见 这是丸山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是跟“创造的自然”与“被造出的自然”的对比相关的。所谓民主,“占领军来了就民主了,来搭上这部车吧”的思考方式跟自己去建成民主的思考方式有本质的不同。

金芝河在诗里写到过“悄悄写下的民主主义”,当日本人觉得民主主义已经是老掉牙的思想、小学一年级的思想的时候,金芝河正悄悄地在监狱的墙上写下“民主主义”的字样。这跟日本自民党的“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吧。同样地,陆羯南的“日本主义”跟东条英机的“日本主义”也不一样。丸山也是想说,1945年以后“搭车”民主主义的人很多,但跟这种民主主义相比,自己更尊重的是陆羯南所体现的民主主义。我觉得这很棒。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然后“民族主义”的涵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对于被罗致到“国家”这一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整体都是非常厌恶的。在战争期间就感到幻灭了。因为从儿时起就喜欢的武者小路实笃啊仓田百三啊都转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令人无法忍受。这样一来,就非常厌恶那些被国家网罗、马上就跟国策同声同气的所谓知识分子。所以也就讨厌所谓的国家了。

小熊 也就是说在“讨厌国家”之前,是先“讨厌趋附国策的知识分子”的?

鹤见 也有这个因素,不过我本来从不良少年时期就一直喜欢克鲁泡特金,所以讨厌国家。因此之前对主张国家联合从而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喜欢,觉得这种国际主义不就是国家代表的会谈吗。

但在印度听了德里的广播、在战后十年左右读了奥威尔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奥威尔在一篇叫做《关于民族主义的笔记》的书评里区分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概念化的、很大的范畴,总是会破坏许多其它系统的工作。但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所住的村庄、对邻人、对山河的热爱。

小熊君在《“民主”与“爱国”》里写到上野君的“没有领土的民族主义”的说法,这种思考方式当然也属于爱国主义。就像在日朝鲜人这样没有领土的人们的民族意识,就是“没有领土的民族主义”。

上野 我用这个说法是受了新川明的影响。

鹤见 反对冲绳复归的那一位?

上野 嗯。1981年新川他们编辑的杂志《新冲绳文学》制订了一部《冲绳共和社会宪法》。不是《冲绳共和国宪法》。

鹤见 冲绳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展开的,猪饲野^①的民族主义也是“没有领土的民族主义”。按照奥威尔的区分就是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不是有没有领土的问题,而是珍视与邻人之间的联系,并对国家的民族主义提出了彻底的质疑。

没有必要去拘泥于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的名称本身,不过更接近奥威尔的爱国主义的是过去的“国”的概念。站在比壑山顶极目远眺,一望之下但见大好河山。是“乡关何处”的“国”。这并不是“领土在哪里”“不是有国境吗”这样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爱国”,我是理解的。

小熊 丸山先生的“国民主义”也是这样的“国”?

鹤见 是的。丸山在悼念竹内好的文章《跟好君的交往》中说,所谓人类就是隔壁的熊先生、八先生。从这种“隔壁的熊先生”就是人类的视点来看,内部是“日本”、外部是“世界”这样的说法是虚假的。丸山是在读内村鑑三的时候想到这一点的,我也很赞同。本来没有这种区分,却由国境之类的界线划分成了国家啊。

国家 (state) vs 性 (sex)

小熊 我记得您在回忆爪哇时代的《战争给的字典》里说过,“国家 vs

^① 大阪市的一个地名,在日朝鲜人聚居地。——译者

性”的对立对当时的自己而言是最根本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鹤见 反正我对所谓的国家是非常讨厌的。从小我就绕着派出所走。因为老觉得会被抓起来(笑)。妈妈说我是坏人,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是坏人,从小就一直有一种恐惧感,觉得要是被人发现我是个坏人就会被抓起来了。所以对于国家的手下,什么巡警啊军人啊,全都想躲。在海军的时候一个人呆着,就有了“国家 vs. 性”的公式了。所谓“国家 vs. 性”,并不只是说忍着不去慰安所这样的。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自己身体里的性所指向的欲望与国家无关,或者不如说是跟国家对立的东西。我要用自己性的欲望跟国家给准备的慰安所对立。所以就有了“国家 vs. 性”的公式。唯有在这里才能容下自己对国家的反叛。

上野 我想请问一下,要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把民族主义解释为爱国主义并给予肯定评价,那就跟小熊君在《“民主”与“爱国”》中所写的很相近吧: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与公共性相关联的思想,应当被更广泛地理解,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小熊 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我只是说,“民族主义”有太多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所以在用“国家”“民族”等概念去表达某种含义的时候,就只能一概都说成是“民族主义”。上野女士对“公=国家”这一模式的早期铭记(imprinting)是不是有点太强了?

上野 “国家 vs. 性”的模式是把“性”作为“公共之物”的对立面的思考方式吧。

小熊 “国家”(state)指的是统治机构,并不一定跟“公共”(public)是一样的,我想这是政治学的通行认识……

上野 不管怎么说,鹤见先生想出了“国家 vs. 性”的公式,觉得在慰安所释放自己的性欲就等于加入了国家的制度,因此要拒绝,对此我很理解。我想请问的是,后来在鹤见先生众多的作品当中,“国家 vs. 性”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作为主题出现呢?

鹤见 没有吗(笑)?

上野 在您的著作里好像想不出来有。

鹤见 在某个时期之前,是因为想法还不成熟写不了。但91年出版的《天钿女命传》^①就直接写到了这个问题。

上野 啊,原来如此。

鹤见 能把它写出来是需要时间的。这个问题是内在于我的生活方式之中的。比如,在爪哇的时候不光是绝对不去慰安所,如果想要找个当地的女孩来同居,钱也是有的,但我也不会那么做。我不想做一个由国家驱动的人。所以至少要清楚地觉察到自己性的欲望,转向别处。

比如在爪哇有很好的图书馆,但日本人基本不去。我到巴达维亚图书馆一看,有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全六卷。我就把它从头到尾全部读完了。日本人里把这书借出来全部读完的,我想除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了。

上野 确实,您写的东西有时会提到霭理士。

鹤见 我是在要上封锁突破船之前偶然在神户的街上买了一本他的《新精神》,就在船上读了这本薄薄的书。后来在爪哇就读了《性心理学》。

霭理士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他把自由与性联系在一起,他的人生观是“dance of life”——人生之舞。他根本不会跳舞,却有把人生看作舞蹈的想法,那么爪哇的嘎麦兰(gamelan)乐舞也应该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种。“国家 vs. 性”的想法跟拼命读霭理士也是有关联的。

这些我想了很久,能想清楚写成一本书,是直到《天钿女命传》才实现的。那本书实际上是以我的方式写成的脱衣舞演员

① “アメノウズメ”是日本神话中出现的女神,《古事记》记作“天宇受卖命”,《日本书纪》记作“天钿女命”。传说天照大神因为素盞鸣尊胡作非为,发怒躲进天岩户,世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众神想尽办法,并令天钿女命手持竹叶,站在倒放的桶子上跳舞。因为跳得太卖力,衣服松开半裸着身体,引得众神哄堂大笑。天照大神好奇地推开岩户窥看,立在一旁的天手力雄神一把将她拉了出来,大地才重现光明。——译者

一条百合的传记。

上野 哦——？

鹤见 她是跟权力战斗而死的。我没有见过一条百合，是偶然从她的律师小野诚之那里听说了有关她的事，就是生平经历什么的。据说她的经历有很多是编造的，但听小野讲，她母亲杀死了她父亲，母亲被判处死刑，她就进了福利院，在福利院长大以后进了剧团，被剧团的男人们轮奸，后来就当了脱衣舞演员。所以我的主题是“*How could she live otherwise?*”（她还可以怎么生活？）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我想写出这一点。然后我探寻整理自己的记忆，引用了《古事记》，用擦印画混杂的手法写了传记。我觉得虽然那是日本文化，但却是我非常喜欢的精髓。我也满怀期待地读了马尔库塞关于性与社会的著作，但我所期待的内容他并没有写到，我觉得日本文化中的情欲问题跟英美的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用擦印画的手法，用描绘死去的一条百合的肖像的方式来写写看。这种写法不是我的独创，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就用过。

上野 默顿吗？很意外啊。

鹤见 默顿有一本书叫 *On the Shoulders of a Giant*（《站在巨人的肩上》）。这话是因为牛顿在著作的序言里写过，并不是自己独创了力学体系，而是矮人站在巨人的肩上就能望得更远，所以才出名的。但这句话本身也是口口相传的谚语，并不是牛顿所创。为了探寻这句话到底是从何而来，默顿就从古典文献当中去找出处，用擦印画的手法把这些写出来，就是 *On the Shoulders of a Giant*。我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写写看。

上野 我被题目给蒙住了，还以为《天竺女命传》讲的是《古事记》的事，所以没有读。一定得读一读。

鹤见 然后呢，还有柳田国男的影响。他认为，对于欧洲社会而言，民俗学提供了研究基督教舶来前的民间文化的线索。圣诞节也

好圣诞老人也好,都是基督教传入之前的民俗习惯被改变了形式保留下来的吧。所以柳田就去做民俗习惯的研究。

我在70年代去墨西哥写的《瓜达卢佩的圣母》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这本书思考的问题是:基督教之前的宗教在基督教强行进入以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呢?《天钿女命传》也是一样,是在想着,在被关进“近代”里面之前,应该有一种方式能表达日本的传统和我所思考的东西的吧?

小熊 原来如此。是这样联系起来的。

鹤见 《天钿女命传》不是历史书。是我长久以来自我养成、灵魂彷徨的故事。在年过六十之后写了出来,我很高兴。

上野 说起借古典文献使用擦印画手法,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论》也是这样吧。他在里面提出的“对幻想”的概念给了我很大的冲击。那本书也是用擦印画的手法,从《古事记》写到岛尾敏雄,在这些主题中回响着吉本自身体验的男女关系。那种“对幻想”的冲击是什么呢?我后来想,不是作为无言的身体而存在“性”,而是与“公”对峙的“性”值得表达,是这样被思想化、主题化的东西的冲击。

鹤见 关于性的想法,对我来说是思想的重要支柱。

上野 我想请问您,这个支柱在您的思想中有没有成为主题呢?性存在着跟把性思想化是有距离的吧。

鹤见 好难的说法啊。比方说我在军队的时候,下流的谈话成了一种娱乐,基本上都是在侮辱女性。不参加这种谈话就成了上榜“童男排名表”的理由。但是,与此不同的讲话方式到底有没有呢,我想有还是有的,不过非常困难。人们称之为哲学的讲话方式也是很难的吧。

我是很偶然的,性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个都被学校开除了。

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我父亲是讲谈社文化的畅销书作家,所以会带回来很多《讲谈俱乐部》之类的读物。我饥不择食地读完这些以后还不满足,但又不想回家,就在旧书店街上一

直逛,找出很多梅原北明等人的“禁书”之类,就读这些。濑户内晴美也读过差不多的书吧。然后我小学毕业后不是进了七年制连读的府立高中嘛,这种高中里全都是小学时成绩数一数二的人,但他们的性意识实际上都没有成熟(笑)。我见此情形就想干点什么,就在储物柜里堆了很多从旧书店收集来的“那种”书,借给大家传看,不收钱。后来被发现了就全被没收了。我也只好退学了。

上野 这就是退学的理由吗?

鹤见 是啊。所以对我来说性的问题是生死攸关的啊(笑)。但像上野君说的把性思想化,我并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自己在生活的事变成主题。但《天钿女命传》是能写的。

小熊 那我想听听您为什么喜欢漫画《警探小子》。我觉得您在《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中形容漫画主人公“警探小子”的话很有意思。说他是成绩很坏的不良少年,就对钱和性感兴趣。但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个少年警官。

鹤见 哈哈(笑)。

小熊 而且您说,这就像当时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的自画像。《警探小子》是70年代连载的漫画,在鹤见先生看来,“警探小子是个非常肥胖营养过剩的小学生,他关心的就是钱和性。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小学生当中唯一的少年警官,出于对自己的主脑——钱和性的关心,就到处去监视同年龄的其他孩子。警探小子非常不负责任,而且厚颜无耻,有点像是现在的日本向东南亚国家贪得无厌地进行经济推销的样子的真实写照”。

像这样,您一边说这是非常丑陋的日本自画像,一边又说喜欢《警探小子》,70年代时还说适合日本的是“警探小子民主主义”。我很想问一下对这些您是怎么想的。

鹤见 从昭和17年到昭和20年,日本没有漫画,是漫画欠缺的文化。所以我就想,出现《警探小子》的时代跟没有漫画的那四年相比不是很好嘛。因为那是日本的自画像。如果是在昭和前十年出现了《警探小子》,那就是绝好的日本国民自画像。

小熊 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好啊？但“警探小子民主主义”就不只是在说言论自由了吧。警探小子满心私欲，就是一种“国家啥的与我无关”的态度。可您说这是战后日本的一种成就，这是怎么个关系呢？

鹤见 《警探小子》的作者山上龙彦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最初的作品是《去旅行！平林》，可以算是环保漫画的开山之作。接下来他画了《光风》，讲日本再度进入了法西斯主义时代，是非常硬派的社会题材漫画。后来刚想着好久没看到他的作品了啊，他就画了搞笑漫画《喜剧新思想体系》，然后就画了《警探小子》。那以后他就不画漫画了，现在在写小说。是个有趣的人啊。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很想知道他精神世界的变化。

小熊 不管对山上龙彦的评价如何，70年代鹤见先生对警探小子这种只关心钱和性、私欲一大堆的日本人形象有很高评价，这跟以前的您相比有些出入吧。1959年您跟久野收先生、藤田省三先生一起出席“战后日本的思想”座谈会时，批判了沉没在国家给予的私欲当中的“欲望自然主义”。可警探小子简直就是会嬉皮笑脸地出入国家给准备的慰安所的人们的写照啊。

鹤见 我觉得把这种姿态给反映出来是很棒的。除了只关心钱和性，少年警官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要是在昭和17年去画嬉皮笑脸地到慰安所去的少年士兵，那可就不得了了。我是觉得那个时代应该有“警探小子”。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昭和19年曾被强制做工的耕治人写过，他被人告密说那家伙有点奇怪，就被警察抓进了拘留所。然后他疥癣发作，痛苦难当。他说警官拿了很多猥亵照片什么的，以看那些东西为乐。

上野 都是没收来的吧（笑）。

鹤见 所以简直就跟少年警官“警探小子”一样啊。警官就是这样的家伙。各种取乐，完了就把照片扔进垃圾箱，耕治人在拘留所里被命做杂役，在垃圾箱里发现了那些猥亵照片。耕治人很有意思的啊，他就把这些照片给了来给他送换洗衣服的像圣女一

样的妻子。就算是交流了。这正是白桦派的一种文艺复兴啊。

小熊 唔——您说这是白桦派的啊(笑)?

鹤见 是在白桦派的影响下出现的人。确实,他们跟像武者小路实笃那样出身于官家富裕家庭、主张人道主义、最后却为战争摇旗呐喊的人是不一样的。但要我说,那才是白桦派。

所以回到“警探小子”的话题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继小布什之后,小泉首相也跟进,要是在他身后画个戴警察帽的“警探小子”跟了上来的漫画,我觉得很不错啊。

上野 然后他关心钱和性,就去抢劫强奸什么的。

鹤见 啊,“警探小子”没有那么强了(笑)。我觉得作为反战宣传画还是很有力的。

与竹内好的交往

小熊 我想换个话题,回到战败后,请您讲讲跟竹内好先生的交往。听说最开始是您读了竹内先生的论文之后给他写信,这样开始交往起来的。

鹤见 是的。1948年《综合文化》杂志登了竹内的《指导者意识》。我读了以后大为叹服。这本杂志发行量并不太大,我买杂志的那家书店就只有5本,但我还是回去把剩下4本都买了来,分发给朋友们去看了。是给了和子、武田清子、市井三郎,还有鹤见良行。

我不怎么写“追星”的信,但那次因为觉得太佩服了,就给竹内写了信。然后竹内非常高兴,我们就开始了交往。他是那种会为崇拜者来信而感动不已的人。出人意料的低级趣味(笑)。

第二年,竹内在国土社出版的《知性》上写了题为《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的论文。这本杂志的发行量也不大,而且很快就办不下去了。竹内写文章的杂志都很快就办不下去了(笑)。这篇读过以后也觉得实在是佩服,就又把书

店里仅有的5本都买下来分发去了(笑)。所以我是给竹内添了好多崇拜者的。

小熊 《中国人的抗战意识与日本人的道德意识》是由日本军部制造鸦片卖到中国的事情讲起,提出了日本对亚洲的加害责任的问题。您对这篇文章感到叹服,是跟它与您在爪哇的体验相重合有关吗?

鹤见 是的。我感到,在当时来讲,这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大东亚战争”的问题。

而《指导者意识》这篇论文,是去重新探问了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所谓“指导者意识”的。这两篇文章都与我从战争体验中得来的问题意识有共鸣。

后来竹内写了以《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为代表的一系列论文,以鲁迅作为线索,对比了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他认为,与只顾培养学校秀才的日本近代化相比,中国是有不同的方式的。这也是把我模糊触及的问题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了。所以竹内对我来说是个令人惊讶的人物。

小熊 那您跟竹内先生是怎么见的面呢?

鹤见 我给他写信说想见面,他就寄来明信片说“来银座的正宗大楼吧”。然后我去了一看,武田泰淳他们好多人坐的满满的,都在喝“正宗”酒(笑)。我因为不喝酒,就先介绍了一下。说起来,战败初期就是像这样的,是会跟各式各样的群体都有接触的时代。

小熊 经历了战争,能够超越小圈子的界限辨认出可以信赖的人,是这种直觉很发达的时代吧?那我想请问您,您跟竹内先生还有丸山先生谈过彼此的战争体验吗?

鹤见 没有。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就跟小熊君你的父亲不会特意去跟你讲战争体验是一样的(笑)。就是有某种能彼此传达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像19世纪所认为的那样要有明确的信息应答,也有面对面时能朦朦胧胧地传达的东西。

小熊 就是直觉对方是个能够信赖的人,没有必要再说得更多了。

鹤见 是的。

小熊 竹内先生 1977 年去世之后，您写了他的传记《竹内好》。但您没怎么写到竹内先生被征召入伍送到中国的经历。您一直说战争体验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没有写呢？

鹤见 嗯，那是篇失败的作品（笑）。竹内对我来说真的是既有深交又很尊敬的人，没办法下笔自如。

对我来说，都留重人是唯一的老师，而竹内是非常意气相投的人。“60 年安保”斗争的时候，我一听说竹内为抗议岸信介而辞去了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就马上也向自己所在的东京工业大学递了辞呈。我是个很单纯的人啊（笑）。

上野 是感同身受吧。所以就没法大胆地下笔。

鹤见 因为跟上野君不一样（笑）。

上野 什么呀。我都被人叫做小心的上野，是个神经纤细的人（笑）。

鹤见 不过，竹内在 12 月 8 日日美开战时所写的宣言，以及他被征召入伍送到中国后看到鲁迅墓被毁的情景，在《竹内好》里面都写到了。在 12 月 8 日的宣言中，竹内是对日本朝着大东亚解放的方向前进抱有一线希望的。但在看到鲁迅墓被毁的时候，他意识到，在日本否定自我之前，要去进行解放亚洲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向着跟欧美妥协、跟天皇制和解的方向发展。

小熊 就是这样啊。

鹤见 反正我一直在读竹内写的东西，从不会感到他有违我的信任。

他关于八月十五日的《屈辱的事件》我也非常有共鸣。战败的时候，竹内是身在中国战线的士兵，那天他的中队长读《军人敕谕》时跟平常有点不一样，强调了“我国威之不振，汝辈当与朕共其忧”的部分。竹内说觉得这触及了“明治的精神”。

《军人敕谕》比《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颁布得都早，是在明治天皇还很年轻、还不知道今后日本将会如何的时期颁布的，所以写着在日本情势危急时你们要贡献力量。当时天皇的地位还没有完全巩固，还没有宣称什么“万世一系”耀武

扬威,还是从今往后要来建立国家、但也许并不顺利的时期。

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也都还是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到了日俄战争打胜以后,就都变成了跟权威站在一起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竹内不是靠借自外国的权威理论去讲的,而是通过重读被反复宣读默诵的《军人敕谕》而揭示的,这是这篇论文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小熊 觉得跟丸山先生的《陆羯南》很像。

鹤见 是的。

上野 这样的讨论,跟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只隔着一层窗户纸吧。您是怎么看待竹内先生的国民文学论的呢?

鹤见 这非常难讲。我没有参加岩波的“和平问题谈话会”,不过大概是在1954年吧,他们说让我跟竹内一起讨论一下,来做报告,题目是《论国民文化》。但我不喜欢“国民”之类的说法,不想用这个词。

小熊 当时主张知识分子否定自己的特权、跟民众融为一体,形成“国民文化”“国民文学”,共产党周边人士尤其主张这样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请您来讲没有什么不对的。

鹤见 虽说如此,还是觉得不喜欢啊。所以在做报告的时候,我一上来就说“我不喜欢国民这个说法”。

然后我主要讲的是“总店”跟“分店”的关系。日本大部分的文化不过是把外国的学术啊文艺啊当作总店、然后借助其权威开了分店而已。分店之间说不到一起去,就总是打得不可开交。如果能停止这样的做法,所谓的国民文化也就会出现了吧。这个报告也收进了我的文集,虽然经竹内的同意署了我的名字,但内容是跟竹内讨论过的。

小熊 总之您或竹内先生所说的“国民文化”应该是否定权威主义的。所以即使是“国民文化”也会是反天皇制的。

鹤见 是的。不过“国民”这个说法实在是……竹内提出的问题引发了1951年前后的“国民文学论争”,那时平野谦他们也说“就没有其它更好的说法了吗”。

小熊 但在竹内先生那里,正是因为“国民文学”这个概念曾经在战争中受到了污染,才应该像对待《军人敕谕》一样去努力重读,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吧。

鹤见 这样说来,竹内给《思想的科学》投过有关国民文学的稿子,叫《吉川英治论》。他说“写了这个给登了吧。”

小熊 吉川英治正是战争期间“国民文学”的代表人物。战后被新日本文学会定为战犯作家。

鹤见 但竹内的《吉川英治论》说,不是吉川搭上了法西斯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吉川的思想。

确实,吉川的《宫本武藏》写出的是一个不会去阿谀奉承权威的独立的人物形象。那是个凭自己的本事把权威所在的道场牌匾打翻在地的人吧,并不是集团的法西斯主义的人物形象。有点像佐藤忠男啊。孤独的黑社会(笑)。所以才会受欢迎的。吉川自己也是个像挥舞木刀一样去写文章的人。

竹内认为,这样的文学是国民文化。但是它被法西斯主义利用了。看了这样的视角就觉得,啊,原来如此。

小熊 但大家都能够很好地理解竹内先生的这种想法吗?一说起竹内好,就觉得是跟战前的大亚细亚主义者、国粹主义者有关的吧,很多人留下的是这样简单化的印象。

鹤见 嗯,未必都能够很好地理解吧。竹内是一个距离法西斯主义很远的人。他的“国”也是刚才所说的爱国主义的“国”。

五十年代的纠结

《思想的科学》五十年

小熊 回到刚才的话题,1946年《思想的科学》出刊,当初的反响相当好吧。

鹤见 是。我写了战争期间构思的《论语言的护身符式用法》,和子也写了批评实用主义的文章,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想写。

昨天也说到过,我去采访若槻礼次郎也是在这个时候。是作为系列访谈“我的哲学”中的一篇,除了若槻先生以外还访了很多知名人士。这本来是为了让《思想的科学》能卖出去而策划的,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我在若槻先生那里感到了人的伟大。那正是日俄战争以前的明治知识分子,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

他是个弃儿,只上过小学。小学毕业后就当了校长。学校放了学他就到河里去抓鱼什么的,周围的人就说,“这么优秀,送他到东京去吧”,给他出了钱。然后他就靠在图书馆自修进了大学,当了首相。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完全不摆架子,也不虚荣。因为是夏天,差不多光着身子就出来了,很平静地说着“我没见过自己的双亲”什么的。我就觉得,原来还有跟我之前所知道的日本知识分子、政治家完全不一样的日本人啊。采访结束以后,他

对我说，“谈话整理什么的全都拜托你了”。

小熊 《思想的科学》创刊号的时候，大家都去书店送书了吗？《近代文学》当时是平野谦先生、埴谷雄高先生他们用登山包背着去各家书店送，很有名的一个小插曲。

鹤见 是的。抱着书各处走走。



《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远足（1955春，去箱根水渠。

右起：市井三郎、鹤见良行、夫人、鹤见俊辅。摄影：川濑光男）

小熊 那武谷先生和丸山先生也抱着各处走去了？

鹤见 没有没有，还不像《近代文学》他们那样（笑）。不过我是去了。

小熊 战败初期，大家对新鲜的言论如饥似渴，新创刊的杂志都卖得很好。

鹤见 《思想的科学》创刊号出了一万本，全都卖光了。但后来发行量就逐渐下降了，再次超过一万本是在十五年之后，1961年出天皇制特集的时候。那一期的发行量达到了一万七千本。这个数字在《思想的科学》五十年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那一次，当时负责杂志发行的中央公论社因为嶋中事件（1961年2月中央公论社社长嶋中鹏二的住所遭到右翼袭击，理由是在《中央公论》上刊登的小说《风流梦谭》对天皇不敬）

变得很谨慎,天皇制特集的原稿都已经齐了,却跟我们说不能出。编辑部就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我说“出成油印版不是很好吗”,但都留重人先生在《朝日新闻》的论坛时评中提出了批评,说不要向压制言论的行为妥协。

于是我们就以《思想的科学》的名义成立了新公司来出版。本来我们自己也筹集了资金,但劲草书房的社长井村寿二还另外以个人的名义(不是社产)借了我们100万日元。我们这边就约定由十个人一起来借这笔钱,大家都盖了名章。借给我们钱的人估计没想着钱还能要回来吧,但天皇制特集出刊后很畅销,还剩了不少钱,结果两年内就把100万日元都还清了。这全都是都留重人先生的功劳。

那是发行量的最盛期。后来是加太浩二和上野博正给我们注入了资金,一直持续了五十年。我也出了一半左右,但在同时负担“越平联”和《思想的科学》的时候就很难。

上野 上野博正先生的大力协助连我都知道。

鹤见 加太浩二直到最后都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协助创办了《赤旗》周日版。那为什么给《思想的科学》而不是《赤旗》投钱呢,是因为他在那边只是个小卒。他到日共总部去讲教育政策方面的意见,那里的干部就只说“嗯是啊加太先生”之类的话。但加太到《思想的科学》来,比如说跟森毅开座谈会,森会很认真地回应他。这种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加太就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了数目惊人的钱,给我们出版《思想的科学》。

我呢是认可共产党的存在的。但日本共产党也是“东大毕业生了不起”的那种心态。我想对现在的日本共产党说,不要去斥责那些没有按预想的方式去关心政治的庶民,仅此而已。不管怎么说,托加太和上野博正的福,《思想的科学》一直持续到了96年停刊的时候。

小熊 关于停刊的经过您在《期待与回想》里面讲到过。

大众路线与发掘作者

小熊 初期的《思想的科学》介绍美国哲学等等,走的是启蒙的路线,但到了五十年代,就改为在各地组织读书会,从读书会上征集稿件、寻找作者。

鹤见 发行量下降的时候,大概是1950年左右吧。那时我已经去京大工作了,从东京坐夜行列车到京大去上班。然后有一天夜里火车经过热海的时候,我想起热海有岩波书店的别墅,那天丸山真男正住在那儿。我就想,“啊,在这下车的话丸山在啊”,就下了车去找他了。

然后我就跟丸山谈,他就说,“多建些支部,从每个支部里寻找作者,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么干的杂志当时是一家都没有。

丸山他是会说一些跟他平时做的事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话的。说要让《思想的科学》设立支部的,最开始可是丸山哟。

上野 这个提议跟丸山先生后来的学术训练路线相当不一样吧。

小熊 英国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被称为“看不见的大学”,您写过,丸山先生可能是参考了它的组织方式。

鹤见 是的,我觉得也有这个因素。但那时丸山已经在支持伊豆的人民大学和战败后建成的劳动者学校等等,所以也并不是完全模仿英国的。后来《思想的科学》就从大阪开始建起了支部,再扩展到全国各地。

上野 丸山先生的建议可能是有影响,但您原本不是也有从地方开始建立支部的想法吗?不是培养高学历的精英,而是育成民间的知性,没有这种启蒙的意图吗?

鹤见 我没有啊。我就是想着去卖杂志,完全是销售上的考虑。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我从京大到了东工大当副教授,还担任着文化广播的评论员,所以还颇有一些收入,但大学发的工资全都拿来填补杂志的赤字了。

我又不愿意从父亲那儿要钱。1954年《每日周刊》攻击《思想的科学》，说我拿编辑费中饱私囊，每月侵吞10万日元，还让女办事员当小妾开酒吧。真是受刺激，但也反倒来了精神有了干劲。所以就拼命努力卖杂志。

上野 这样啊？但说只不过是销售考虑是您谦虚吧？我觉得您是少有的启蒙家，实际在民间培养了很多知性的风气。您说这都不是有意为之的吗？

鹤见 我并不是丸山那个意义上的启蒙家。如果说启蒙意味着居高临下的教导，那我不是这样的。不过，对于出乎我们的意料、“啪”地唤起了觉醒这样的效果我是认可的。

上野 原来如此，不刻意追求的效果（笑）。

鹤见 如果是突然发生的，启蒙也是非常好的不是嘛（笑）。比如说，我在《电影评论》上批评了一部叫做《振袖狂女》的电影。这篇文章被新潟21岁的电焊工人佐藤忠男读到了，他受到启发，就给《思想的科学》投了稿。这篇稿子我一字未删、一字未加，原样照登出来了。这就是他作为电影评论家的第一部作品。这是非常愉快的事，但这是不经意突然发生的。不是想着“来启蒙吧”去做的。

小熊 “启蒙”这个词是“enlightenment”，也就是“点燃火种”的意思，所以本意就是这样的吧。

上野 由少数精锐同人创办的《思想的科学》是怎么开始接受一般来稿的呢？

鹤见 这本来不是我的主意，是大野力。他以前是日本共产党群馬县的地区委员，被日共除名以后就加入了《思想的科学》。然后他有几个朋友也想加入，但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得到两名同人的推荐才能加入。他就说，把这条取消，让谁都可以加入吧。于是也就开始接受同人以外的来稿了。

结果就有很多人加入进来了。不过当时负责实务工作的市井三郎大受打击。因为附近的同人都跑来了，剥夺了市井的学习时间。他是阪大理学部学化学出身的，对哲学是外行，所

以就非常用功地自学哲学史。刚才提到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翻译的，是个非常刻苦学习的人。然后他正打算学符号逻辑学，就有好多人涌进来跟他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困扰极了。于是他就给我寄了张明信片，强烈表达了停止大众化路线的意见。

上野 那就是杂志内部也有路线对立呀。

鹤见 虽然如此，最后还是朝着大众化的方向走了。不这样杂志也卖不出去(笑)。

上野 那您站在哪一边呢？

鹤见 已经开始大众化了，那就做下去，我的倾向是这样。最初的七位同人是丸山真男、都留重人、渡边慧、武谷三男、武田清子，还有和子跟我，这是水准很高的同人群体了。

上野 那真是少数精锐。

鹤见 但这样是办不下去的。不过，除了大众化之外也还是有选择的。最初的同人们大部分都会英语，所以洛克菲勒财团要给我们资助。

上野 是申请的吗？不申请的话是不会给钱的吧？

鹤见 是对方说要给的。

上野 哎——？

鹤见 人们还是觉得我们就是那样一个群体吧。但1950年前后，这个资助的问题在总会上有了意见分歧。当时，井上清、奈良本辰也、林屋辰三郎等共产党系的历史学者参加了会议，他们主张“不要接受美帝国主义的资助”。

小熊 当时民主化改造倒退，朝鲜战争开始，是共产党跟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时期。

鹤见 意见分歧的结果，决定不接受资助，我们就给拒掉了。这样一来就必须要靠杂志的销量，大众化路线也就是必然结果了。丸山说要建立支部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

小熊 那时候丸山先生已经在参与“和平问题谈话会”关于全面讲和问题的讨论，几乎不怎么来《思想的科学》了吧。

鹤见 是的。所以我半夜在热海下火车，到岩波书店的别墅去找他商量。

上野 也就是说，最初的同人构成有所变化，共产党系的人们也加入了。那大众化路线这种开展运动的方式是共产党相关人士引入的吗？

鹤见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吧。当然像刚才大野力的提议也都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是接受共产党组织的指导那样的。

上野 是吗？我总是觉得大众化是基于您的思想有意为之的。

鹤见 历史并不是必然的，有很多偶然因素啊（笑）。

但对于“跟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的主张，我并没有反对。就想通过大众化不是可以开创其它的路嘛。实际上，结果佐藤忠男、上坂冬子这样的作者就不经意地突然出现了。

上坂冬子是在丰田公司大纷争的时候开始写作的。当时，工会的干部跟公司妥协了。上坂是公司的办事员，她以讽刺的目光看待此事，在日记里写了她的第一篇作品《职场群像》，在《思想的科学》上发表了。

当时丰田工会的干部很愤怒，还给我写来了抗议信，但我把信扣下了，没有告诉上坂。《职场群像》是没有希望升职的高中毕业女办事员的坦诚记录。她的笔名也是我和多田道太郎各自给想了姓和名取出来的。

上野 我本来以为，您发掘跟学校精英不同的“庶民的知性”，这一态



在东京工大的研究室
(1955年3月。摄影：川濑光男)

度是源自您的战争体验,并与《思想的科学》的大众化路线相联的。

鹤见 结果上是有关联的。的确,我从战争体验中得来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没有什么界线,上没上过大学并不是问题,是这样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所以我会去支持没有学历但能写东西的人。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但是,这跟《思想的科学》的大众化路线就只有结果上的关联而已。

上野 在《思想的科学》,您作为编辑发挥了超群的作用吧。发掘民间的知性啊,把业余作者的原稿不加改动地刊登出来啊。

鹤见 不改动。不经意突然出现的嘛(笑)。

上野 提供这样一个场所本身就已经是一大作了。这并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吧。

虽然这么说可能会讨人嫌,但我还是要说,《思想的科学》作为“另一所学校”所起的作用,以及鹤见先生作为编辑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知性不在这里是培养不出来的吧。

鹤见 要是这样的话就好。

上野 哎?好像没怎么被嫌啊?

鹤见 假如不介意“学校”这个说法的话(笑)。

小熊 我还想问问跟大众化路线有关的事,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日本共产党中途被非法化,就很重视向各种活动小组的渗透了吧。鹤见和子女士也兼任了山村工作队的工作、到农村去开展调查记录活动,和石母田正等人一起参加了在劳动者小组编辑文集的工作。《思想的科学》也刊登了在活动小组写的东西。这些都是受到了共产党同人们的影响吗?

鹤见 与其说是“共产党的影响”,不如说是他们个人的影响。当时的风气也是这样吧。来劝我加入共产党的就只有战败初期的高仓辉,后来他们就不来找我了,可能是放弃了吧(笑)。

不过,我是认同共产党的存在的,也有许多关系很好的共产党员朋友。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做“变节”共同研究的时候,虽

然对战前共产党员的变节行为有很强烈的批判,但很多共产党员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像河合悦三等等。

共产党经济学者川崎已三郎也经常到我这儿来玩。一次偶然的机,他说“从大众小说考察一下民众的心理如何”,这启发了我,于是我就开始在《思想的科学》等等写大众小说分析,源头就是从川崎已三郎这里来的。但他并没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把当时党的方针强加给我、把我引向大众路线什么的(笑)。

要说让人为难的,就是《思想的科学》里既有日共党员,也有被日共除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间时常会有斗争。这很让人为难。

小熊 顺便想请问您,您没有想过要像和子女士那样参加劳动者小组的活动吗?

鹤见 我没有像和子那样一起去写文章,但也参加了很多小组的活动。当时《思想的科学》有很多读者小组,其中也有些很有意思的人。

比如社会学者见田宗介,我们是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在小组活动上认识的。他是1937年出生的,当时应该还是东大的学生。我见到他的时候说:“我以前见过你的照片。”他就说:“是吗?”我说的照片,是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上了新闻,说他是卖出了很多《赤旗》报的优秀的小学生(笑)。

小熊 见田先生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吧?

鹤见 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甘粕石介的儿子。新闻上说他是“也很懂资本论的小学生”(笑)。

他到初中都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觉得只有这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但上了高中以后就有了疑问。再后来他接触到了城户浩太郎等人组织的团体,虽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但开始走向不太一样的方向了。可他在之前交往的人们中间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就来参加《思想的科学》搞的战后史研究会、“乌托邦之会”了。

他虽然碰巧是东大毕业的高学历,却是个很有意思的秀才。尽管碰巧是那边来的,但《思想的科学》因为他而有了一些新气象。

小熊 见田先生所做的关于流行歌曲的研究,还有后来在他的《气流的鸣声》(筑摩书房)中体现出来的对宗教和响板音乐的关注,原来都是在鹤见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的科学》那里有原型的。我也是最近查了才明白的。

鹤见 流行歌曲研究这些,见田在学术上笃学明辨,是会作为学术成果留存下去的。

上野 人生咨询研究也是如此吧。见田先生的研究会成为经典流传的。

小熊 在见田先生的影响下,还出现了吉见俊哉那样的文化研究。

上野 见田先生当时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您就不辞劳苦地参加各个小组的活动,跟这些年轻人、普通人去交往,这是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

鹤见 很累的。一年到头就是整天整天地跑。那时候有体力啊。但是很累的(笑)。

朝鲜战争与美国

上野 顺便问一下,您对朝鲜战争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当时还没形成清晰的想法。对朝鲜是有同情的,但对美国的信赖感也还不像后来越战时那么弱。而且也并不像日本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学生们那样强烈地认为朝鲜和中国是正确的。

小熊 好像您在某个场合说过,您那一代人跟比您年轻的那一代人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十几二十来岁的人们会有“自己要被征兵了”的危机感,反应非常强烈。

鹤见 这倒是。1950年我28岁,已经不觉得自己会像以前一样被征兵了。会不会被征兵对人们如何看待战争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小熊 我看大江健三郎先生、佐藤忠男先生他们都写过，自己该不会要被征兵送到朝鲜去了吧，这种恐惧感非常强烈。这跟反越战运动时学生们的反应完全不同。参加反越战运动的学生们都不会觉得自己要被征兵送到越南去吧。

上野 这确实是。紧迫感不一样。

鹤见 那时我在京大。当时学生和年轻的助教们都在强烈反对朝鲜战争，很多人都去支持共产党的反战运动。

多田道太郎当时是助教，有一次跟他在京都的街上走，走到乌丸的十字路口时，他说“在这会爆发巷战”（笑）。当时日本共产党是采取武装斗争路线的吧，他也是支持的。我说“这种罗曼蒂克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不过当时在京大的学生里，连看似中立的人都是支持这个方向的。

上野 多田先生是这么有血气的人啊？

鹤见 我是属于克制派。多田道太郎在大东亚战争的时候当了学生兵，受到了很残酷的对待。此外，当时京大医学部的学生们正在做一个关于原子弹爆炸的展览。

小熊 是1951年展示了丸木位里·俊子夫妇的“原爆之图”的原爆展吧。当时正好赶上昭和天皇来巡幸，还发生了学生们递交公开质问状的事件。《“民主”与“爱国”》引用了这封公开质问状，里面的内容——比如希望让天皇来看原爆展、问他有没有拒绝再军备的意志等等，都是对其后的时代来说简直有点难以想象的，就直接把质问抛向了天皇。

鹤见 那是篇好文章。是中冈哲郎写的，礼数周到，是篇好文章。

但跟后来全共斗运动时相比，当时对学生运动的处分是很严厉的。写公开质问状的学生们会受到无限期停学处分，做原爆展也有违占领军的意向。学生当中甚至传说他们会被送到当时在美国统治下的冲绳去。他们是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的啊。在这一点上跟全共斗、越平联时代的中坚分子是不一样的。

说起来，当时策划那次原爆展的学生们半个多世纪以后开

了一次同学会。他们对参加者进行了访谈,据那时的核心人物河合一良说,当时京大的学生部长是理解的,是抱着一种学生们做得对的态度,想着尽量不要有人受到处分的。原爆展的话还行,但涉及天皇就肯定要处分了。不过在那个时代,学生跟教授还是会彼此呼应的。

上野 战败时您在日记里写“从现在起跟美国的战争开始了”,那在您心目中,原爆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

鹤见 我到广岛去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就像刚才说的,我思考关于原爆的问题也是相当迟的。我想的东西相对有限,一旦加入某个运动就不会轻易离开,但对自己能做到的和做不到的是有判断的。原爆是我很难去讲的主题。

上野 是吗?

鹤见 不过我很早就参与反对原子弹氢弹的运动了,还因此而幸免于难了呢。因为神户的美国领事馆看到我参加那些运动,就拒绝给我签证。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要我去做副教授,结果因此而未能成行。后来五十年代都留重人先生去了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期间遭到传讯,受到了很过分的批判。我因为被美国领事馆拒签,就逃过了一劫。

美国对我来说是沉重的土地,跟爪哇一样,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此后还有美国的大学想聘请我,我也都全部拒绝。

上野 您为都留先生辩护的文章《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写得非常好,饱含着关切和爱。

鹤见 看到报上的事件报道时,我白了一些头发。日本的报纸对都留先生受传讯作证持批判的论调,我想这样一来都留先生不就完了吗。

上野 一夜白头,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啊。

鹤见 都留先生大概也没有想到美国会变成那样的极权主义国家。但都留先生是我唯一的老师,所以我当然要写那篇文章。

小熊 您刚才说到“从现在起跟美国的战争开始了”,那在都留先生的事件和反越战运动的时候,您想起这句话了吗?

鹤见 没有,那句话是在那很久以后,差不多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翻看战争期间的日记,才发现自己在战败时写了这样的话。我自己也很意外。觉得是对自己的预言啊。在战败之前,我自己就是“鬼畜美英”,所以并没有批判美国,但战败就像是舞台转到了另一边,就想着这一回是我跟美国的战争开始了吧。作为结果,不跟占领军合作、不去美国等等,都是这种想法的延伸。

小熊 但有别于作为国家的美国,您对单个的美国人和美国的市民社会是心怀感激的吧。您写过,参加反越战运动也是出于对能够容许自己从哈佛毕业的美国市民社会所怀有的恩义之情。

鹤见 对单个的美国人当然是有这种感情的。像我在留学时住过的美国家庭就对我非常好。他们的家族很古老,房子却不大,他们就把他家大儿子的床给我空出来,让儿子睡在客厅沙发上。我很感谢他们。

小熊 所以美军的飞机来空袭的时候都不认为那是敌机。

鹤见 是啊。那跟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啊。

他家的大儿子后来在越战时期当了外交官,来过我家。他问我“现在你在做什么呢”,我说“在援助逃兵”。他是美国政府的外交官,虽然冲我瞪大了眼睛,却没有去告密。然后他说,他正在努力想促成美中建交,正在写一本关于美中关系的大书。我就说,“那跟中国建了交你就能当大使了吧”。他回答,“从对现在的美国评价这么低的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话也是高兴不起来的”(笑)。

这是他跟我之间最后的谈话。他后来从日本处长当到远东事务局长、美国驻泰国大使,但后来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的家庭在我看来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对象。

上野 顺便问一下,朝鲜战争时的首相是吉田茂吧。您对他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我从战争期间起就对吉田茂是正面评价。他是个坚持自己气节不改的人。所以我觉得吉田在对美交涉上做得不错。就连在参加游行喊口号的时候,要是“反对单独媾和!”之类的我就

会跟着喊,但要是“打倒吉田茂!”我就不喊了。那环顾政界还有像吉田茂那样能干的人吗?我表示怀疑。

小熊 您对吉田茂评价很高啊。

鹤见 吉田在大学里一直成绩很差,但他有政策方面的智慧。他在外务省就只当到驻英国大使,后面就完全升不上去了。之前也说过,吉田当时被人告密说是亲英美派,被宪兵抓起来了。我战争期间在大磯车站看见他,也觉得“啊,了不起的人啊”。

小熊 那对于这位吉田茂所进行的再军备,您是怎么看的?

鹤见 对手是美国,他是做了相当程度的抵抗了的。在当时的领导层里,我感觉他比其他那些家伙要可靠得多。

我在想,当时不是有“混蛋解散”的事嘛。吉田冲议员骂“混蛋”,结果引起事端,国会解散。从这里就能看出,吉田对国会议员全是轻蔑的态度,觉得这帮家伙们,都是形势一变就马上随风倒。这种傲慢,老实说我是喜欢的。

小熊 那对于跟这位吉田对抗的“和平问题谈话会”等等,您怎么看呢?

鹤见 那里聚集的都是像丸山、羽仁先生他们那样可堪信赖的知识分子。我是赞成和平问题谈话会提出的全面讲和论的。我只是未受邀请才没有参加。

小熊 也就是说,您赞成全面讲和与非武装中立,但支持吉田茂。

鹤见 是啊。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不是嘛,我觉得他们还不如吉田茂可靠。都是些一受引诱就会叛变的家伙。

小熊 唔——您是这样判断的……

鹤见 不过不会去公开这样讲,这点政治判断是有的(笑)。

小熊 但是,除吉田以外的保守政党的人们值得信任吗?要说他们是做得更过分啊。

鹤见 这倒是。但我不怎么相信日本的所谓进步势力。因为没想到他们在战争期间是那么的堪。所以就算现在出了什么事我也不会感到惊讶。那些从小学开始就当第一的家伙们是靠不住的。

桑原武夫与抑郁症的经历

小熊 后来您 1948 年 11 月受聘于京都大学,翌年 4 月起任京都大学副教授。听说这跟您英语好有很大的关系。

鹤见 那是托桑原武夫先生的福。桑原先生家的二层住的是土居光知,我给他送过《思想的科学》创刊号。然后据说桑原先生很看好,就想要叫我来京大。

但好像当时的京大校长说我还太年轻,所以不好办。那时我才 26 岁嘛。不过桑原先生没有放弃,京大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的三名代表来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就叫我来当翻译。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讲英语。即使能读会写,听力也不行。会话或翻译基本上都做不来。那时被邀请参会的赖肖尔带了一位文部省推荐给他的翻译,但这个人英语不行,赖肖尔就很着急。他在我留学美国的时候关照过我,知道我会英语,就走到我面前说:“你也给我当翻译吧。”我就回答说,那样的话文部省的翻译太没面子了,所以不行。赖肖尔就生气了,后来就一言不发(笑)。

校长见此情景,就跟桑原武夫说可以聘我当副教授。嗯,是托桑原先生的执着和政治能力的福,我才能受聘的。

上野 执着取胜啊(笑)。

鹤见 是啊。赖肖尔也是个相当厉害的人。他后来当了驻日大使,越战期间我所在的同志社大学邀请他来开研讨会。赖肖尔从大使馆带了个翻译。但其实他的日语很流利,翻译的日语却是远远不行(笑)。不过当时在同志社的学生面前我没有这么说。我就说:“诸位,你们知道赖肖尔先生为什么要用翻译吗?那是因为要做出拥护越战的回答需要时间考虑。其实他在美国是我的日语老师来着。”(笑)这样的事我是不会在同志社的学生面前去拆穿的,赖肖尔对我是有这种信任的(笑)。

但从赖肖尔的立场来看,他生我的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 1942 年在美国看了我被捕时的收押文件,在 FBI 做了有利于我的证言,所以他是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后来在加拿大开 E. H. 诺曼(Egerton Herbert Norman)的会议的时候,赖肖尔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美国都行。但我一次都没有去。和子就没那么固执,就去了。而我竟然还去美国大使馆门前搞反越战静坐被驱逐了(笑)。赖肖尔当然要生气了——“这混小子,你留学的时候我那么关照你”(笑)。

上野 您这么到了京大工作以后,就开始跟桑原先生打交道了吧。

鹤见 桑原先生大概也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家伙吧。当时我正苦于神经官能症的折磨,胸闷心悸、疲乏不安什么的。桑原先生请我吃各式各样的京都料理,而我完全无动于衷,就吧唧吧唧地吃,让他很是吃惊(笑)。那时我在心理上还受制于自己生在家境、门第都不错的家庭这件事,习惯了吃什么都不会去说“这个很好吃”的。

小熊 您在著作集里自己写的年谱上说,后来 1951 年 5 月您得了抑郁症,休养了一年左右。

鹤见 到了京大一看,我是京大校园里最年轻的副教授。我来的时候不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想着这下难办了,被大家另眼看待也是当然的,就一直很克制自己。这样过了两年左右就开始幻听,觉得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嘲笑我,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了了。

上野 那您怎么办呢?

鹤见 桑原先生是我的上司,多亏了他。我拿着辞职信去找他,他把信给留下了,说“你是生病了。别讲这事,继续领工资,休养休养吧”。

小熊 很宽容的上司啊。

鹤见 绝对的啊,这不是一般的教授会说的话啊(笑)。

那时我觉得如果还在父亲那住的话自己就废了,已经彻底从家里搬出去了。因为我的父母很有钱,所以从桑原先生的角度看,他满可以认为让我辞职也不会造成生活困难。但他很理解我的情况,绝对不跟我说“从你父亲那里要钱不就行了”之类

的话。因为他觉得那是我困扰的原因。所以他就说，“你还领京大的工资，不来学校也可以”（笑）。

小熊 那正是您父亲的公职追放处分被解除的时候吧。然后您就写了批判解除追放的《追放解除的心理》等等。

上野 那您疗养好了吗？

鹤见 根本没好（笑）。结果我进了精神病院。当时就想着该不会是精神分裂症吧，自己非常的害怕。因为症状是很相似的。也没有时间观念了。就这么坐着坐着，怎么什么时候就太阳落山天黑了，然后怎么就又升起来了，就成了这样。然后就住院，到1952年1月左右终于出院了，回到在京都借住的房子，忽然终于又能写很长很长的论文了。然后就很高兴。

人的轮廓与性

上野 鹤见先生，是有什么事情引发了抑郁症的吧？

鹤见 有。

上野 是什么事情呢？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您讲一讲。

鹤见 嗯，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从小跟妈妈的关系啊，很简单（笑）。但既然是这一次的访问，我就说说吧。反正不说也是不行的。

上野 好。

鹤见 我在15岁之前都是很放荡的，但那之后在美国、在军队都没有过男女关系。反正就是自我刷新了。决不结婚。不去想女人的事。就这么安排自己。是能做到的哟。有女性来的时候就眼睛不动。

上野 这个您昨天也说到，真的能这样吗？

鹤见 能。控制着眼球就能。这种状态持续了十三年，这么一来，身体完全按此形成了条件反射。已经变成个不正常的人了。

上野 所以在爪哇也完全对女性没兴趣吗？

鹤见 是的。但在编辑出版《思想的科学》的时候呢，跟女性的接触就增多了。那有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十七岁左右的女孩，她在很

多方面都非常能干,是个很优秀的人。《思想的科学》之前她是在太平洋协会的出版部工作的,她姐姐也在那儿工作,她们俩都过来了,不过都只是小办事员。

然后这个小办事员就好像是在我的灵魂深处这么……嗯,就好像扎了一颗钉子一样。我就责备自己,想一定不要去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就是作茧自缚。

上野 然后您就破了十三年来的戒跟这个女孩发生了关系,却不跟人家说结婚吗?对五十年代的日本女性来说,就算有了关系,也是很难主动向您要求结婚的吧。她等着您来跟她说,可是您却保持沉默。

鹤见 不,跟她并没有肉体关系。我也没有提出要结婚。当时我身体已经没有反应了。就装作毫无兴趣的样子。所以也没有去接近她。是这样引发了抑郁的。

上野 然后就责备自己,抑郁……

鹤见 就是呢,说是要断绝对女性的想法,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事啊。

上野 是。

鹤见 不过我这样安排自己的时候也正好赶上战争……

上野 是。

鹤见 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人。但是,自己还依然作为人而若无其事地活着,这是不好的。是有这样的罪恶感的。这就是原因了。

上野 自责啊。抑郁的原因大都是这样的。

鹤见 就想京大副教授就是这副样子,完全觉得厌烦了。但桑原先生很理性地制止了我。

上野 嗯。

鹤见 他说,“要是辞职的话,你现在又没法写稿,生活就成问题了”。还说,本来跟家里的关系成了这样,也是没法回家去的。所以就别离开学校了,就拿京大的工资不是很好吗。

上野 真是了不起的上司。

鹤见 别人似乎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很尊敬桑原先生。但如果那时我的上司不是桑原先生,我可能二十九岁就自杀死了。

上野 嗯。

鹤见 结果,在非常糟糕的状态下,她结了婚,后来被杀死了。登着她被杀的消息的报纸,我买回来了,但是没有看。那是在昭和31年,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篇报道放在某个箱子里,但没有看过。不愿意去看。真的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就想着,要是跟我在一起,就不会被杀死了吧。

上野 嗯。

鹤见 为什么后来不管多苦我都要继续办《思想的科学》,在她被杀之后,为了她曾经工作过的这本杂志,不管怎么干都可以,是有这样的动力在的。

上野 这些事,您今天是第一次讲吧?

鹤见 没有被记下来过。听我讲过的人都替我保密了,很谢谢他们。我有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像桑原武夫、永井道雄,他们都是能保守秘密的人。桑原先生是很喜欢八卦的,可是对当事人来讲很要命的东西都不会传到别人那儿去,因为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八卦就都集中到桑原先生那儿去了。桑原先生的伟大之处都在这里。

要说办杂志的理由就只是为了她么,也并不只是这样,后来加太浩二、上野博正他们也来支持我们了。

上野 那个……刨根问底的真是非常抱歉……

鹤见 不,没关系的。到我这个年纪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哈哈(笑)。

上野 从《思想的科学》的支部开始,您在五十年代参加过很多的小组活动。在男女之间的交往还没那么自由的时代,当时的活动小组也是为数不多的男女交往的场所吧。

鹤见 是的。

上野 在这种场合下,大明星鹤见先生一来,我想也会有女性主动接近您的吧。

鹤见 我已经又回到那种对此事不感兴趣的姿态了。

上野 就算您是这样的,也会有人愿意的吧。

鹤见 这种时候小林登美君帮了我很多的忙。她就很巧妙地给我挡过去了(笑)。

上野 那后来就再没有这样的抑郁症了吧?

鹤见 那么,想知道另一次抑郁症的原因吗?

上野 嗯。

鹤见 我在战后有两次因为抑郁症封闭了一年左右的经历。第一次就是刚才说的1951年。第二次是在1960年安保运动过了以后。说起第二次抑郁症的起因,我在安保运动期间就到处去参加抗议活动,差不多就像住到国会旁边的下水沟里了,上厕所就到那附近的记者站去上。

上野 嗯。

鹤见 在京大之后,我1954年到了东京工业大学工作,但为了抗议安保从东工大辞职了,所以白天不用上班,就以什么身份都不是的状态到处奔走做些事。然后就想着,这样的话结婚不是也可以嘛,就结婚了。在此之前就觉得结婚危险,一直拖着。但觉得可以了其实是种错觉。

上野 原来如此。

鹤见 安保斗争对抑郁症来讲还是容易得多的。结婚很难。辞去了东工大副教授的职务对精神健康其实是有好处的。但结婚是要重新改变自己长时间保持的状态,就有所损害。

上野 动摇自我的根基了。那就是说结婚是诱因?

鹤见 那就是原因。神户有家烤牛肉店叫“King's Arms”。结婚以后我带她去那儿吃饭。那家店经常有很多水手光顾,然后就看见那旁边站着的一个五十岁上下、上了年纪的妓女。当时不知怎么的,我就开始得得发抖,觉得快要站不住了似的。感觉就好像有人抽走了脚下的地毯一样。

上野 那是怎么回事?

鹤见 就是觉得,“我本来应该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自己就只配跟上了年纪的妓女结婚”。

小熊 这是跟少年时代咖啡店的那位女性、还有爪哇时期的女性的身

影重叠在一起了……

鹤见 所以就觉得，“这样的我，现在还登记注册，跟女孩子结婚。这是可耻的”。这就是抑郁症犯了才会这样的。脚下的根基崩塌了。后来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封闭起来不见人。基本上抑郁症都是因为我接受了对自己好的东西而发生的。

上野 这已经完全是自我惩罚了。

鹤见 我觉得这是我妈妈给种下的病。

上野 您少年时代到咖啡店跟女性发生关系，也是故意要去做最能背叛母亲的事吧。

鹤见 是的。

上野 于是开始了自我惩罚的抑郁症。不过鹤见先生，我理解您这边的感受，但您夫人贞子女士是没有责任的吧。

鹤见 她理解我的想法，知道自己离开的话，过段时间我的抑郁症就会好的。我当时已经是一种闭塞的状态了，就在日暮里租了一间六榻的屋子呆着。她就在离那一百来米的地方也租了一个屋子，有时过来看看我自杀了没有。就是这样的关系。

上野 这就是新婚夫妇的生活吗？……

鹤见 是的。女性逼近的时候“想逃”的感觉，我想是从我妈妈逼近时苦恼的体验而来的。一度都在想，要不然逃到非洲去吧，都到了这样的地步了（笑）。后来，六十年代前期策划《日本的一百年》时，才开始从抑郁症当中恢复过来了。

上野 贞子女士还真能接受您这种状态。她会是怎样的感受呢，虽说您当时也没法去想这些吧……

鹤见 坦率地讲，我能活到八十岁，都是她帮我应付的吧。特别感谢她。她对我有很长时间的了解。是我在京大的时候，从1953年开始就认识了。所以，她真的是这么长时间以来都陪伴在身边。她虽然一度把我拉进了抑郁症，但也陪我渡过了这段时间，让我再一次变成了正常的人。《天钿女命传》也是托她的福变成了正常人，才能写得出的。

上野 忍耐下来了真不容易啊，贞子女士。

鹤见 确实是这样。谢谢她(笑)。

上野 就说这么一句“谢谢她”就完啦(笑)?

鹤见 是很感谢她的(笑)。然后把狸猫当作护身符(笑)。狸猫不遵守约定,还经常出丑丢人。

上野 也不像基督教的神那么严格。

鹤见 狸猫是我的神(笑)。其实我在抑郁症期间想改名字。但未经过法院审理是不能改名的^①。想要改成笔名,但因为得了抑郁症以后写东西也变少了,也没办法改。没有合适的机会改。

小熊 是想摆脱“俊辅”这个总理大臣的名字么。

鹤见 还有姓。那是父亲将自己的欲望刻在我身上的印记。不过,它跟抑郁症和我的工作确实是有关系的。

上野 的确是这样的吧。

鹤见 像“变节”共同研究,也并不是从哪里得到了钱才做的,就只有跟平凡社签的约。做这个共同研究的动机,也是由我妈妈带给我的抑郁症、还有目睹我父亲变节的经历而起的。是我父母给我的种子。我是这样相信的(笑)。

^① 日本更改姓名需要向家庭法院申请并到庭陈述正当理由,法院批准后方可更改。——译者

战争责任与“变节”研究

追放解除与“变节”研究

小熊 接下来请您谈谈“变节”共同研究吧。这个共同研究始于1954年,到1962年形成了上中下三卷本的大作。我想先请问一下有关您父亲祐辅先生的事,这是促使您开始这个研究的动因吧。

您之前说,祐辅先生为了能解除追放花了很多钱。那他后来是不是很高兴、觉得能再次重返政坛了?

鹤见 是的。他想问题是很简单的。

小熊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1951年您发表了《追放解除的心理》这篇不长的文章,对在没有明确战争责任的情况下就解除追放进行了批判。

鹤见 我当然并不欢迎解除追放。但是,我没有直接写文章批判我父亲。取而代之的是不只针对我父亲,而是将其作为日本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整体的问题,开始了“变节”共同研究。

小熊 您在《期待与回忆》的访谈中说,“《变节》三卷,实际上是我对父亲的感想”。1956年,被解除追放的鸠山一郎担任首相时,鹤见祐辅先生还是出任了厚生大臣。

鹤见 当了大臣也算是一种满足了吧,不过说实在的,我父亲当了大臣就只做过一件事:他说大臣的房间太小了,给换了个大的。

上野 这真是……(笑)。

鹤见 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做。同样是厚生大臣,菅直人一上任,在两周之内就查明了血液制剂导致患者感染艾滋病的政治原因。不过菅跟我父亲作为政治家的业绩和器量都不同。

总之虽然我父亲会说“想当总理大臣”,但你要问他当了以后想干什么,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日本的政治家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不是吗。说想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当了以后要做什么呢,谁也说不出来。我看了就想起我父亲(笑)。就只不过是想想当第一嘛。

小熊 在1951年的《追放解除的心理》中,您写道,通过解除追放,“‘战后’这个祭典结束了”。同时您还写道,在南方目睹了屠杀俘虏的情景,死去的人们没有得到追放解除的恩惠。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除了您父亲的事,也想到了在爪哇的俘虏屠杀吗?

鹤见 我父亲在战争期间为翼赞会摇旗呐喊。他已经过了征兵的年纪了,而且身居高位,可以随便说话,说过的也可以反悔。这样的人被解除了追放,而身在军队最下层、被命令去做残酷的事的人们却被当作战犯追究责任,这是很奇怪的。

小熊 原来如此。就是说,您虽然对胜利者的战犯审判是批判的,但认为应该彻底追究战争责任。

鹤见 我虽然没有跟战犯审判合作,但我认为我父亲应该受到追放。我现在还是这么想的。

在这一点上和子跟我是有分歧的。因为她是“爸爸的女儿”。她会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父亲,拼命努力。我是反过来的。但和子也有封建的地方,并不去追究我是反过来的。

小熊 刚才您说,像祐辅先生那样的当政者被解除追放卷土重来了,只有军队底层服从命令做了残暴之事的人们被作为战犯追究责任,这是很奇怪的。这样的话,在《追放解除的心理》中被当作“死者们”的并不是被杀害的俘虏,而是奉命杀害他们的文职或少年士兵?

鹤见 对他们是同情的。当然也想到了被杀害的俘虏和成为牺牲品的当地人。但文章里想着的是那些人。

因为觉得我父亲实在是太不可理喻了。以一高第一名毕业什么的而自居,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我戴着面具去追究这些,就是《变节》三卷。

那是1943年2月在爪哇的时候,脑中突然就浮出了想写的目录。就是按照这个目录去写的。所以,虽然我从战争期间起就想要把变节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做个总体回顾,但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

《变节》三卷卖得很好。总共卖出了10万部。我跟平凡社签约的时候,只说在一年之内写完一册书,出2000本就可以。想着能卖掉1500本吧。但共同研究的内容增加,结果一共出了三卷,合计卖出了10万部。我以好的方式违约了。不过本来说一年做完,结果花了八年(笑)。这样说来,有一次在周刊杂志上看到演员三国连太郎的照片,发现他的书架上也放着《变节》三卷。

上野 三国先生从军队逃走跑回家,结果被他妈妈报告抓起来了,是有着这样的战争体验的人。所以女性跟战争合作、变节的问题,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小熊 合作撰写《变节》三卷的作者当中,谁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呢?

鹤见 首先是藤田省三。他把自己作为研究者最好的时期都交给《变节》三卷了。这是我特别想提到的。

在其它作品中,让我感到体现着伦理精神的是高畠通敏的大河内一男论。高畠当时可是东大法学部的助教啊。战争不过才过去了20年,要去写自己的前辈知识分子们的过去,对身在大学里的人来讲是很难的。大河内先生后来是当了东大校长的,要写批判他的论文就当不了东大教授了吧。但高畠还是写了,而且还为此把助教的论文延后了,我觉得真是很有原则的男子汉。

小熊 原来如此。所以丸山先生拜托您说“这是位秀才可不要毁他”?

鹤见 是啊。丸山也是很有这种情谊的人。但高阜还是给拉过来了(笑)。后来还让他当了“无声之声会”的事务局长,东大教授就完全没戏了(笑)。不过最后他当了立教大学的教授。他也是能当到东大法学部助教的第一名,但跟我父亲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对高阜我也是能感到黑社会道义的。

“变节”共同研究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拿钱。就只有平凡社在书出版之后给的版税。尽管如此,刚开始就自发地组成了30人左右的研究会,其中很多都是当时才20多岁的年青人,是战败时刚上初中的新一代。战前他们还是孩子,所以对那时的情况并不了解,资料也不通,但他们对从战时到战后的转变有强烈的感受,这成了他们特有的像变节体验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研究战前变节行为的起点。

编完了上卷以后,在这些年青人力有不逮的时候,老一代的人们受到刺激也加入进来了。他们既有战前的经历又有战时的记忆,就使共同研究充实起来了。大家就这样一起工作,直到下卷完成。最初加入的年青人们经过了八年的共同研究,也变成熟悉资料的研究者了。

战争责任问题

鹤见 说起来,在“变节”共同研究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五十年代前期,有一个在爪哇参与过杀害俘虏的文职来《思想的科学》找过我。

小熊 都说什么了当时?

鹤见 他并没有说“别去告发我”什么的。完全没有碰这个话题,就是讲了些家长里短。

但感觉他是害怕的。我想他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水雷战队的司令因为那件事被追究责任,获刑处死了。他可能也会作为乙级、丙级战犯追究的。他后来怎么样了呢?都过了60年了。

小熊 那您在看战犯审判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很复杂的吧。

鹤见 是的。我不愿支持战争审判。也不愿意去给占领军帮忙。不过那时京大叫我去工作了,也就没必要去那儿了。

小熊 但是,虽说是对胜者的审判有抵触,但您不认为日本自己应当去追究战争责任吗?

上野 这也是我想问的。

鹤见 发动了那样的战争,是应该追究战犯的责任的。那些发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的人最后都没有受到裁决。直到现在,国会里还有很多人认为那场战争没错。

小熊 但是比如说,您自己也可以讲出来,说日军在爪哇做过这样的事,但您也没有这样做吧。

鹤见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这样做一定会被占领军利用的。即使想要这样做,在占领期间也是不能做的。

上野 让日本人去对战争责任者进行裁决,您当时觉得有这样的方法或者是可能性吗?

鹤见 我不觉得。我认为应该对他们进行裁决,但觉得那是没可能的。

小熊 为什么觉得没可能呢?

鹤见 自己考虑过要如何去实行,但觉得就算把问题提出来了,也只不过是发出了声音,然后就不会再有下文了吧。

比如说,“60年安保”时的“无声之声会”,以及后来的越平联、援助逃兵运动,我都试图去发出声音,也引起了广泛反响吧。因为这些运动都是有其基础的。但是,“自己进行战争审判”作为评论可以抽象地成立,可能也有些场合能让你写出来,但我不认为作为运动也可以成立。

上野 那您没考虑过在占领结束之后说吗?

鹤见 《战争给的字典》做的就是这个。那本来是战争期间从爪哇回来以后陆续写的笔记,稿纸200来页吧,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战犯审判告一段落,也不用担心会被占领军利用了,就登在《文艺》上了。不过,为了不让人去给人名事件对号入座,那篇文章加入了部分虚构的成分。

但现在想来，“无声之声会”也好越平联也好，开始都没有想到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可能应该更积极地去做一下试试看。但当时并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力量。

小熊 但您在1954年开始了“变节”共同研究，然后1956年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那时正是祐辅先生出任厚生大臣的时期，还真是做了不少事啊。

鹤见 是的。父亲当大臣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回家。我想会有人觉得奇怪吧，为什么要这样呢。连羽仁五郎先生都跟我说，“你偶尔也回家一趟”。按羽仁先生的话说，“你父亲会骗自己说你随时都会回来的。这很可怜”。我父亲想隐瞒我离开家不跟他来往的事实。在羽仁先生看来，这是过于残酷了。

小熊 您在“60年安保”斗争期间写的《从根本出发的民主主义》中说，您看过涉及追放处理的文件，所以很清楚战败后失去权力的支配者们是多么“鬼鬼祟祟的存在”。是因为您父亲的关系所以能看到文件吗？

鹤见 现在已经过了时效期，所以说出来也没关系了。当时在日本官僚中有些人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对解除追放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所以在《变节》上卷出了以后，那边就有人跟我联系，说我这申请解除追放的文件都堆成了山，也没有人会看了，你们要不要用。

小熊 解除追放的申请书？就是右翼或者保守政治家写的“我从过去起就是如此这般民主的人”之类的？

鹤见 是的。什么信念什么的完全都没有。这位官僚人士跟我在新桥的天妇罗店见了面。他把他的上司课长也带来了。一问之下，这位课长也说，这是全课共同的意见，没关系的，你们去用吧。于是我就收集到了着实庞大的资料。

小熊 那些资料后来怎么样了？

鹤见 后来就还回去了。因为时局在逐渐发生变化，担心他们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但是资料都读过了。原来赤尾敏啊、笹川良一啊他们都写了申请书的。基本上都是说,我以前就是民主主义者,希望能解除追放,就是这些话。能把自己的正当性清清楚楚写出来的人非常少。虽说方向不同,但跟昭和4年到昭和8年前后左翼知识分子的变节供词是同一个调子。真是不配当右翼。

小熊 日本的右翼、保守派,在战败后自杀的几乎没有,战后基本上都转为亲美的了。

鹤见 但右翼当中也有人物。比如苇津珍彦,他在战争期间从自己的神道思想出发,反对政府的政策。他出席过《思想的科学》办的明治维新研究会,讲过话。他说明治时期建立天皇制,从神道思想的角度来看,这是“掩饰”、“偷换”。

小熊 所谓的“有原则的右翼”。

鹤见 苇津在去世前给我打电报,来京都见我。他跟我说:“我在战败时决心要当天皇的辩护人。但是,当辩护人并不是说不知道被告的不好。只是在公开的场合不会去说而已。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然后他还说:“我在自己写的东西里没有引用过你的文章。因为觉得要是被我这个右翼引用了,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但这样的人,不论在左还是在右,都很少。

小熊 《变节》三卷中用了很多这些申请解除追放的材料吗?

鹤见 这些在必须要注明出处的论文正文里是很难用的。所以就放在《变节》下卷最后的附录里,在全书提到的人物简历概览当中用到了。也就是“特稿”。特稿是无法注明出处的。否则是会给提供者带来麻烦的吧。

跟父亲的和解

小熊 最后那个简历概览里面还有鹤见祐辅先生的事吧。

鹤见 《变节》没有直接涉及我父亲的事。就是作为简历概览中的一个条目,有五行左右的介绍。那是我写的。是根据从永井道雄

那儿得来的资料写永井柳太郎的时候,想着也写写我父亲吧,就写了。

上野 没有直接把您父亲当作对象,还是因为下不去手吗?

鹤见 不想打父亲的耳光。

上野 顺便想请问您一下,您一直不回家的那段时间,您母亲怎么样了?

鹤见 只要是我写的书她就一定都看。我并不觉得她能理解,但是她都看。

小熊 想必是这样啊。

鹤见 不过我妈妈很早就中风了。是在我去爪哇的时候。所以等我从爪哇回来以后,她已经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骂我、嚷我、打我了。她也不觉得是她自己造成了我的精神问题,没有“是这样啊”的自觉。直到她去世也没有。

上野 这个啊,做母亲的是没有的吧。

鹤见 这才可怕呢不是吗。

上野 母亲只会觉得,我这么爱你,你却……

小熊 您母亲好像是在1955年去世的,那当时您也没回家吗?

鹤见 因为她是癌症,家里人都轮流在信浓町的庆应医院守着。所以我见了妈妈最后一面。但只在妈妈葬礼的时候在家呆了两天左右,然后就又早早地走了,继续不回家。

后来回家是又过了一段时间,1959年我父亲因为脑中风病倒之后了。他病倒后神智还很清醒,但身体无法自由活动了。然后之前一直照顾父亲的和子去美国拿博士学位,我代替她去照顾父亲,才回了家。不过这里必须得说,照顾父亲的主要不是我,而是我妻子。都是承蒙她。

上野 您父亲病倒,您就回家了。但您写过,这与其说是为了父亲,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和子的负疚感。

鹤见 是这样的。父亲病倒以后全都是和子在照顾他。而且,我父亲对政治过分投入,借了很多的债,全都是靠和子想办法筹钱才给处理了的。当时正是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她就把以前的家买

下来出租,然后搬到更便宜的地方住,挣一些差价。

照顾父亲基本上都是和子一个人。也有一段时间是我跟妻子轮流做的。和子从小时候起就站在妈妈跟我之间,其它事情上也帮了我很多很多。最后还要照顾父亲。所以,我基本上连和子的坏话都不会去说。不过呢,她那也是“第一病”,哈哈(笑)。

上野 我见到和子女士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这种感觉真的很强烈。头都不敢抬。

鹤见 她是很有能力的。也很有指挥的才能。

上野 那出于对和子女士的负债感替她照顾父亲,会觉得跟父亲在一起很痛苦什么的吗?

鹤见 回到好久没回的家里,见到父亲的面时,我就觉得“败了啊,这是”。

上野 您的意思是?

鹤见 我恨父亲、鄙视父亲的时候,父亲既不爱我、也不鄙视我,我一看到他的脸就知道了。他已经完全是无所顾忌、全心全意地在爱我了。所以我也没办法了。就觉得这下是我败了啊。

上野 原来如此。

鹤见 而且因为他头脑很清醒,我想什么、一举一动,他都明白。我反越战静坐、游行回来的时候,他就显出“好啊,好啊”的表情来。还有,越平联给藏起来的最早的四个美军逃兵,有两个就住在父亲那儿。父亲还跟他们握手,表情就好像打从生下来起就从来没参加过什么自民党(笑)。

小熊 但是要说不好听的,那也跟战争期间一样,是一贯的天真没气节吧。您对祐辅先生的这种变化就不感到生气吗?

鹤见 不,那是“第一病”大变身了啊。不过从最开始回到家看到父亲的表情时起,这些事就从我的意识里消失了。因为觉得是以我的失败而告终了(笑)。虽说如此,也还是不会去写什么父亲了不起之类的话的。这事我做不出来(笑)。

上野 但是跟您父亲达成了某种和解吧。

鹤见 是这样的吗？（笑）反正后来我就想，自己不要去学父亲留下的东西。要是这种坚持没有了，又会得抑郁症的（笑）。但我觉得，我父亲在病倒后的最后五年里，“第一病”已经好了。

小熊 是因为当过一次厚生大臣所以满足了吗？

鹤见 不，不是那样的。“第一病”是这样的：当个大臣没什么可满足的，必须要当总理大臣才行（笑）。他是真的好了。

上野 您父亲去世是在什么时候呢？

鹤见 1973年。葬礼的时候来帮忙的是高畠通敏、吉川勇一等等越平联的朋友们。

杂谈2 第二日夜

所谓“全历史”(total history)

上野 这个是加芥末、酱油吃的哟。话说吃的还真是不错啊(笑)。

小熊 嗯,很美味。

上野 鹤见先生说身体有点不太舒服,不过看您昨天晚饭吃得很香的样子,我就放心了。就想您胃口这么好啊。

鹤见 因为从鹤见家里放出来自由了嘛(笑)。从那以后就能吃得很香。

小熊 但上野女士都不怎么吃啊。脑力工作的人有很多都是特别瘦但很能吃的吧?

上野 我是因为照顾父母把身体弄坏了,所以少吃一点。过去是很能吃的。

鹤见 要回富山去吗?

上野 金泽。住在东京,然后回那边去照顾父母,持续了一年半。

鹤见 那很辛苦啊。

上野 都已经成了破破烂烂的旧抹布的状态了(笑)。

鹤见 注意身体。

上野 对了,这次听您讲的时候我在想,所谓历史,只写“公”的历史、不加入“私”的历史是没法写的吧。

鹤见 是的。把这些全写进来,就成了所谓的“全历史”。一般历史学

所写的只是骨架。

上野 社会史当中所讲的“全历史”也都只是“公”的历史呢。

小熊 但要写“全历史”是很难的吧。

鹤见 不过,小熊君这次的《“民主”与“爱国”》就接近“全历史”,能在思想史方面践行近于“全历史”的方法,是很少见的。

上野 小熊君的这本书给了我“大河小说”^①的印象。

鹤见 我很有共鸣的是,从昨天起说到的“朦胧的确定”,在这本书里有很好的体现。“民主”“爱国”“民族主义”这些词语的涵义千变万化,但书里没有强行去追求统一的定义,而是尊重各个时代的不同,分别去捕捉其间的差别。很细致,很有趣。“后记”里面写到了父亲的战争体验,类似一种缘由说明,朦胧地传达了自己的意思,这也很不错。

小熊 谢谢您。

上野 鹤见先生,那本厚书您是多长时间看完的呢?

鹤见 开始用了一天大概翻完了。后来仔细读,用了三天。

上野 一天啊?那很快(笑)。是从头开始挨着读下去的吗?

鹤见 第二次读的时候是这样。第一次主要是看作者在各个部分的主题下有什么样的结论。然后是看注释。基本上,学者当久了,总是要从注释开始读起的。看作者都读了什么样的书。看了注释,就能知道作者的功力怎样、写得如何了。先从目录和注释开始读起,学者的速读就是这样的了。

上野 是啊。

鹤见 跟作家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要是漱石什么的,就把书“啪”随便一翻,就看偶然映入眼帘的部分,看是不是能吸引人看下去。《草枕》里面也写到了吧。

小熊 是这样的吧。

鹤见 这本《“民主”与“爱国”》会在近现代日本留下自己的位置的。现在日本能写“全历史”的,要说又年轻又有实力的,就是小熊

① 从社会时代的广阔视野描写人生或家族历史的大长篇小说。——译者

君了。

小熊 哪儿啊。

上野 我很理解鹤见先生这么说的的心情。年轻就是有时间啊。

鹤见 历史是要花时间的啊。

上野 要时间,要体力,还要自制。小熊君也很有自制力吧。

小熊 家里没有电视什么的? 要说自制,在我而言只不过是欲求强烈而已,跟看电视什么的比起来,读资料要更……

上野 快乐多(笑)?

小熊 是啊(笑)。

上野 但是工作的要求在渐渐提高啊。你的书也越写越厚了。

小熊 并不是以厚为目的去写的(笑)。而且也不怎么会给自己设置要求。差不多每次都在想“写完这本就引退”。

上野 小熊君引退是什么样子的啊?

小熊 反正就是什么都不做,光睡觉什么的(笑)。

鹤见 我最近也觉得睡觉最快乐。据日野原重明说,人每天睡5个小时就够了。但我还要再睡上个三五小时,是作为爱好来睡的(笑)。日本也都经济不景气了,所以也不去追求白费力气的快乐,就追求这样的快乐挺好的。

上野 我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笑)。

鹤见 要是能写写明治维新,从幕末的助跑一直写到今日的回潮,应该会是一本很棒的书。这样的书对我们很有必要,但是却没有。明治维新史的话,远山茂树、井上清、羽仁五郎都写过,但都不是这样的书。小熊君希望你来写。

上野 鹤见先生,您这会儿都要当编辑啊(笑)。

小熊 我记住了。明治时期早晚是想写一写的,不过也想着要先做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什么的,想法很多。

鹤见 要写大的“全历史”,助跑是很艰苦的。把能成为助跑的东西,先从头写下去就好。丸山就是这样写的。

有一次我跟丸山为同一个讲座丛书写稿,截稿日期都是同一天。我们就一起关在骏台庄里头写。我问他:“丸山君,你写

到哪儿了？”他就“啊——”“嗯——”的，也没正面回答我。我就到他屋里一看，好多个角落里都有一块一块的草稿，这边是关于这个内容的，那边是关于那个内容的，这样分别写了片断放在那儿。等到最后再把这些片断组合在一起就完成了。我就想：“啊，他是这么写东西的吗？”所以就算你问他写了几页了，也是没法回答的。

小熊 我也是从能写出来的地方开始写，最后再去重构。所以没法写连载，被问到“现在研究什么”也答不出来。因为最后会成什么样是不知道的。

鹤见 直到现在，大学教授们还在把明治维新跟英国克伦威尔革命、法国大革命相比，说明明治维新不彻底什么的。先有个框架，然后比照着它去进行评价，所以是没法很好地捕捉到历史的。那不是可以以此为目标去做的东西。要能写出这样的“全历史”就了不起了。

上野 最近法国革命史研究也变了呢。民众的生活文化、大众文化等等，把私人领域也全都包括进来写了。

鹤见 关于德国历史上的1848年革命，良知力是想要这样去写的。他收集了很多当时的传单。说是良知在去世之前跟藤田省三说，我是个私生子，所以无论如何也是写不了当时的上流阶级意识的，但上流阶级的活动写不了，德国革命的历史也就没法写。这是他很苦恼的地方。最后他患癌症去世了，藤田去看过他几次。《蓝色多瑙河的癫狂》（平凡社）这本书，就是良心想写的“全历史”的残篇。

上野 我觉得小熊君与其说是历史家，倒不如说是思想史家。约翰·道尔（John W. Dower）的《拥抱战败》（岩波书店）等书，虽说是以占领史为题材，但从大众文化到政治都写到了。跟“way of life”相比，小熊君还是喜欢“thinking”的吧。你就不会去写女性问题什么的吧。

八卦聚集地

鹤见 哈哈(笑)。那我来讲个我绝对没写过的女性问题吧。

上野 心跳加速(笑)。

鹤见 桑原武夫先生是个很喜欢八卦的人,他那里聚集了很多八卦的。这个是我听说的。说高见顺在战争期间被征召做报道员,让他去缅甸。出发前一天,他把桑原先生喊出来,说到大阪的天王寺前见面。然后桑原先生去了一看,高见后面跟着个女人。他是想把她给甩开的。因为是在日本的最后一夜,他想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度过。但在女性这边看来,因为他有可能再也不能活着回来了,就生离死别的。

于是高见就把桑原先生叫到天王寺去。那儿有很多暗娼馆。见了面高见就说:“呀桑原君,这姑娘拜托给你了。”然后他就噤噤噤地跑进暗娼馆里去了。那女性的话是不可能去追的不是嘛。但是又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暗娼街上,所以就把桑原先生给叫来了。然后就剩下桑原先生跟那个姑娘,以前又不认识,真的很尴尬。

我觉得这是个可以留在文学史上的轶事。去了缅甸,可能就会死在那里。在日本度过的最后一夜,不想跟自己也不喜欢的女孩就出于情分顺势在一起。跟完全不认识的暗娼一起过要好得多。这个故事呢,虽然日本文学史上是没有的,但却是文学的真实。

但桑原先生没有记下这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高见夫人之前还健在。高见夫人去年去世了,桑原先生前不久也去世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于认识高见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把它留下来。

上野 这是您听桑原先生亲口讲的吗?

鹤见 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上野 那后来桑原先生怎么办呢?一般这种时候作为男人不能撒

手不管不是吗。

鹤见 他说他非常尴尬。这么那么的,最后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就跟她再见了。

上野 拿桑原先生来当挡箭牌,还真是有办法啊。高见先生在这方面真是达人。

鹤见 桑原先生那儿有很多这样的八卦,不过会对当事人有坏影响的他都没有写出来。桑原先生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

上野 像“黑洞”一样的人啊。鹤见先生您自己在《思想的科学》还有其它团体里没当过这种“黑洞”式的角色吗?有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来找您倾诉吧?

鹤见 会给那些疯子当。

上野 这是说?

鹤见 就是该团体里的疯子。有某种精神病倾向的人。比如拿越平联来说,这样的人就不会去找小田实倾诉。因为小田是健康得不行的那种人。他们也不会去找吉川勇一。可是就会来找我。不管是多大的组织、有多少人,也都是这样。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这样的人也会来找我。我不想在大学里呆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在京大也好同志社也好都是这样,很困扰。

小熊 都来跟您倾诉吗?

鹤见 他们呢,不知怎么就认定我也是个疯子。可能是因为觉得跟我能说话吧。

上野 一旦名声在外,基本上就成了必然的了。

鹤见 我还没什么名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上野 不管您自己是怎么想自己的,我觉得您一直是很有魅力的啊。

小熊 也有不少人来找上野女士吧?

上野 有。我是那种“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人,所以他们就来了(笑)。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拒绝。

小熊 我这也有人来找。

鹤见 所以高见顺很追随桑原武夫的(笑)。那样的事我是做不到的。

上野 原来如此啊。是有人把事情推给别人的。

鹤见 有一次,我在京大人文研后边的学生宿舍里睡午觉,结果就有个人坐到我的床边,满脸堆笑,然后“唰——”地从围腰里拿出了一封很长的信,还有名片,上头写着“文学博士 会田雄次”。信上的收信人写的是我,写着“我是陷入困境的人。请帮帮我”。会田雄次这个人,不负责任啊(笑)。他是个正常的人啊。他知道我是个神经兮兮的人,就找上我了。我就问他怎么了,但真的很困扰。是有这种事的啊。我就觉得活着真苦。

上野 刚才听您说人的生活方式,就觉得您是接近于这样的:只要认可了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方式,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什么倾向都没有关系。但所谓实用主义,是不问心情伦理而去问结果责任的吧?这不矛盾吗?

鹤见 不矛盾。

上野 是吗(笑)?

鹤见 桑原武夫是个实用主义者。但我不是。呵呵呵呵(笑)。

上野 这种话还是第一次听说吧(笑)?

小熊 昨天也说到了,您在《我的母亲》里写着,只要是纯粹的,到最后什么都能原谅,这样的思考方式是不完善的,但“对我而言是精神的故乡”。

鹤见 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比如她绝对不会说有岛武郎的坏话,就说他殉情了很好,是这样的想法。

上野 就是至纯的心情贯彻到底就好?

鹤见 那并不是打算要如此的吧?我妈妈不喜欢打算、算计这样不干净的感觉。

小熊 但是,只要是纯粹的不问方向,这在政治观点上难道不是有些危险或者幼稚的吗?

鹤见 至纯的人,有很多都是轻率的人啊(笑)。

上野 鹤见先生,您总是说自己是个坏人吧。所谓坏人,应该是表里一致、会做坏事的人。知道自己做的是坏事的才是坏人。定神一看才发现做了坏事的,这不是真正的坏人(笑)。

鹤见 所以我是个坏人(笑)。我喜欢不是这种的罪犯。谋杀之类,只

有很坏的人才做得出来,但冲动之下杀人的人往往情感上是很干净的(虽说也有人很恶劣)。我在美国拘留所遇到的杀人犯就是这样的人。

反过来说,能做成某些好事的人,就必须得有坏的一面。要这么说,桑原先生做的事基本上全都成功了,那是相当坏的人啊(笑)。

上野 是说诡计多端?

鹤见 并不只是这样的。桑原先生登山也很厉害,他有那种直觉。登山的时候,“到这儿该回去了”“这里应该可以爬”这样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吧。

登山没人能跟今西锦司相比,但桑原先生也很有那种洞察事态的直觉。一起工作的时候,桑原先生的直觉基本上都很可靠。我没听说过有失败的。不像我,我是那种不管胜也好败也好,就一头扎进去干的。

历史的文风

鹤见 换个话题,在日本写历史的人当中,谁的文风好呢?这个问题我本来是想问问丸山的。但很遗憾,我还没问,丸山就去世了。那就改问问小熊君吧(笑)。

小熊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要说文风,首先得说是丸山先生吧。这么回答很抱歉啊(笑)。

鹤见 哈哈(笑)。要是限于日本,我觉得首先得说是司马迁。然后还有一位就是吉本(Edward Gibbon)。我就只想到他们两个。

上野 就是说,日本有没有历史家的文风堪比司马迁和吉本。

小熊 历史学者吗?

鹤见 我觉得“历史家”和“历史学者”是有区别的。历史学者不注意文风也可以,因为那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但历史家的工作不一样,虽然也会触及社会科学的深处,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文学。

上野 要是以此为标准,那《太平记》的作者也是很不错的历史家了?

鹤见 是啊。我觉得作为叙事作品,《平家物语》和《太平记》是可以算的。

小熊 但近现代史学怎么样呢?关于历史跟文学的关系,战后的历史学者们是有很多思考的。色川大吉先生他们都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的自觉,在文风等方面也很下功夫。

上野 讨论了历史记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小熊 不然的话,是不会写出像《明治精神史》(讲谈社学术文库)这样的著作的。但在那以后,像这样在文风上下功夫的作品在历史学界似乎就很难得到好评了。

鹤见 这是个问题。在学界、大学的制度下,如果开始想着要当第一了,就没法大胆创新,只会去做一些细枝末节的工作。小熊君你写那本书的时候是在大学里吗?

小熊 您说《“民主”与“爱国”》吗?是在大学里教书的。

鹤见 那你还真是勇敢啊。我还以为那是没有大学教职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呢(笑)。那本书有很多大胆的创新。

小熊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不怎么去参加学会的活动,对学界的动向也不是很感兴趣。

鹤见 这样比较好。北里柴三郎也是这样的。日本的学者在年轻的时候、在去欧洲留学的时候都能做出不错的工作,可是回到日本以后创造力就没有了。他们要在学界和大学担负一定的责任,要参加论坛之类的活动,结果就只能做一些细枝末节的工作。好多宴会什么的也不能不参加吧。他们并不是脑子忽然变坏了啊。

小熊 啊,我在出版社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

鹤见 那回答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吧?我觉得司马迁的《史记》是最好的历史著作。但要说到日本就只能想起一些优秀的史学研究。内藤湖南的《日本文化史研究》等等,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那是史学研究吧。

小熊 有文风的日本历史家啊。谁可以算呢?我也不怎么会去把谁

设为榜样目标的……对了,要是柳田国男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历史,他的叙述风格是很有意思的。

鹤见 《明治大正史世相篇》吗?

上野 要只举出一本来就是这本。不过《在有棉花之前》也不错。

小熊 田口卯吉、山路爱山他们也写历史书,但感觉他们沿袭的是汉文的美文文风。福泽谕吉也努力想创出独特的文风,写出了别有韵味的批评文章。不过要说有独特文风的历史叙述,那我能想到的就是柳田吧。

鹤见 这个回答很有意思啊。可算一说。

小熊 那您怎么评价您自己的工作呢,比如收入《日本的一百年》丛书的关于明治维新、战后历史的各卷?

鹤见 嗯,就算是还行吧。丸山对《日本的一百年》的评价比《昭和史》要好,这是我很开心的事。

小熊 不过我觉得那种列举轶事的写法也是别具一格的。

上野 您觉得自己的代表作是那一本呢?就是您会觉得,这是我倾尽全力的作品、这会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要理解鹤见就希望你去读它,这样的。

鹤见 我呀,要说作品的话就是《变节》三卷吧。

上野 是吗?但那不是您独著的作品啊。

鹤见 我不太会去区分是跟别人一起做的还是自己做的。相比之下,跟人一起做更愉快。

上野 原来如此啊。

鹤见 那是跟仁义之士一起共事的快乐经历。跟桑原先生一起编《百科全书》也很快乐。那时梅棹忠夫还年轻,他很努力,一个人写一整章。

小熊 说到《变节》三卷,您是否觉得那也是您作为编辑最好的作品?

鹤见 是的。

小熊 我也当过编辑,也有作品自己觉得是“作为编辑的好作品”。就觉得,在要写东西的时候,是作为编辑的我来策划,然后推着作为作者的我去写的。

上野 一人分饰两角啊。

小熊 那我想请问鹤见先生,在您那里,作为编辑的自己跟作为作者的自己是怎样的关系呢?

鹤见 我觉得,要说编辑还是作者的话,我是作为编辑而生的。不过编辑是有年龄限制的,所以是很难的。

作者的话,清楚地发现问题的本质、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成文章,就算年纪大了也是可以做的。但要跟上时代、保持感觉,能理解年轻人写的东西好在哪里,这是很难的。近现代日本的这一百三十多年里,优秀的编辑比优秀的作家还要少。司马迁就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眼光好的人是很少的。

上野 明白。

鹤见 比如泷田樗荫就是很优秀的编辑。不过像这样的编辑在这一百三十年里有几个呢。

小熊 鹤见先生您可能不太熟的,曾经组织了“和平问题谈话会”的《世界》杂志主编吉野源三郎,您觉得怎么样?

鹤见 吉野源三郎很了不起。他的《你们如何生活》,用那么平易的文字写出了深刻的哲学。而且他之前被当作“思想犯”被捕,那是在他出狱以后写的。是要把未来托付给孩子们这样去写的。所以尽管平易却很有紧迫感,是近现代日本堪称巅峰的作品之一。

不过作为编辑怎么样呢。我在五十年代后期见过吉野先生,他说“你是我认识的最年轻的作者”。我就说“那吉本隆明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不过当时吉本也不是那么有名了。吉野先生作为《世界》的主编也好,作为“和平问题谈话会”的组织者也好,都是很了不起的,不过我觉得作为《你们如何生活》的作者要更好。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林达夫也是,作家林达夫要好于编辑林达夫。泷田樗荫自己也写文章,但还是他编的《中央公论》更好。他能独具慧眼地发

掘出室生犀星这样原本默默无闻的作者,是个了不起的人。要判断一个人能否有所发展是非常难的啊。

上野 是很难。

鹤见 桑原先生虽然直觉很好,但他说自己认为某某人将来能成为小说家的预言全都落空了。大冈升平是桑原先生的师弟,但好像桑原先生跟他说过“你就别再写小说了”。

上野 哦——?

鹤见 他还觉得三岛由纪夫也不行,田宫虎彦也不行。所以他说,自己在预测小说家的前途这方面很不行,不过要是品评学者的话还是有自信的(笑)。今西锦司是他的同学,他觉得这是个天才的学者,这说中了。一般人对同学可能会有嫉妒、竞争的心理,但桑原先生是很谦虚的。

上野 要说战后的名编辑,就是鹤见先生和曾任《生活手册》主编的花森安治先生吧。您二位不管怎么说都是会历史留名的,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的。

鹤见 没有没有,过奖了(笑)。我就是很单纯地喜欢编辑的工作。要说为什么,我在三四岁的时候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那是非常痛苦的记忆。所以就必须要赎罪。编辑是要为他人奉献的工作吧。所以对我来说是很愉快的工作。所以《变节》共同研究等等也是很愉快的。

小熊 我也喜欢编辑的工作,承蒙您的关照,这次的策划得以实现,我非常高兴。

鹤见 说实在的,这次的《“民主”与“爱国”》写得很好。是不可动摇的。我可不是在奉承你哟。

小熊 啊,能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这次访谈就是这么策划的(笑)。我是为这次访谈做了准备的。我觉得这将来是会留下来的。

作为“纪念文集”的诗集

上野 这次策划可能是会在历史上留下来的。我觉得我写的东西就

是消耗品。

小熊 一边觉得是只适于某个场合、用过就消失了的消耗品，一边还能继续写下去吗？

上野 是的。



参加五一游行(1959年)

鹤见 这很有趣啊。我跟桑原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对话。在京大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跟桑原先生说，“我没想过要在历史上留名什么的”。桑原先生就说“啊？”，很吃惊。他说，“那你为什么做学问呢？”

上野 啊，桑原先生是这样的吗？

鹤见 我是在当下的朝代里生活。从战争中生还的人是有这种虚无主义的感觉的。跟桑原先生那种生于明治末期的乐天气质是不一样的啊。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不过很遗憾，我父亲做的事可能比我的要更能留传下来。四卷本的《后藤新平传》已经留传了七十年，以后还能再留一百年的。

小熊 确实，我也把《后藤新平传》作为历史资料参考过。

鹤见 那比我做的事更能留下来。他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人。作为作

家,我父亲比我好。真是遗憾(笑)。

小熊 不过我几乎没有意识到那是“鹤见祐辅编”,就是作为《后藤新平传》来读的。

鹤见 是吗(笑)?

小熊 但鹤见先生所做的事,像《变节》三卷和《思想的科学》,也是绝对会留下来的。

上野 是的啊。跟我的消耗品文章是不一样的。

鹤见 不过我心里对上野君的俳句集《黄金乡(El Dorado)》(深夜丛书)是评价很高的啊。

上野 啊,突然被逆袭,不知该作何反应了。那实在不过是很个人化的记录而已……

鹤见 不,那很不错。

上野 那已经是想要忘掉过去了,就别再说它了(笑)。

鹤见 我战争期间在爪哇读了很多俳句。跟铃木六林男啊、三桥敏雄啊这些俳句诗人也打过交道。上野君的那本俳句集是写得很好的。

上野 三桥先生的俳句格调很高。我是受了西东三鬼的影响的。

鹤见 三桥是有这样一句吧:“报纸飞 展开随风寂寥地”。我觉得这句很棒。第三版的新闻被人遗忘,可是它唰地展开随风飞去了。在战争期间读到“雪山中 雪落无声亦黄昏”^①,会觉得很感激。当你身在爪哇、做着什么玉碎计算的时候,这是沁人心脾的。

上野 我不作短歌而去作俳句,是因为我是想咏也咏不出来的可怜的灵魂(笑)。和子女士是咏和歌的,那您不咏和歌吗?

鹤见 不,我会自律。

上野 是吗?不过这种自律心已经是……(笑)

鹤见 没有,就只是读读。

小熊 插个很没情趣的问题,桑原武夫先生曾经说过战败初期的俳句

^① 前田普罗(1884—1954)作。——译者

是“第二艺术”。他说,在战时的金属捐献运动期间写出鲜明的俳句口号的诗人们,在战后也仍然是俳坛的老大。所谓俳句是这样一种前近代的文艺类型。那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上野千鹤子

鹤见 桑原先生是以批判俳坛的方式来批判日本社会的权威主义的。他并没有说芭蕉^①这些真是没劲。

上野 俳句是不能为战争出力的。短歌要更容易操作一些。因为俳句是有着犬儒主义的意味的。犬儒主义的态度是没法参加战争的。

小熊 是这样吗?事实上是有支持战争的俳句的啊。

上野 不管什么领域都是有主流的。

小熊 觉得那种东西不是俳句?(笑)

上野 俳句是连陶醉也做不到的诗歌形式,所以是无法煽动战争的。

小熊 啊,我是很没情趣的,并不是很懂了。

上野 刚才不是说到了史家的文风嘛,从文体与记述的角度讲,如果是简约到极限的表现方式,把什么作为指示对象就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文体自身就会作为一种表现方式而自我成立了。俳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就只能认为“语言是独立的”。

小熊 听了就觉得,上野女士果然是喜欢读小林秀雄和吉本隆明的啊(笑)。但桑原先生的“俳句第二艺术”论正是在说,因为俳句是跟思想或内容无关的表现形式,所以在思想上就可能很轻易地变节啊。

上野 鹤见先生战后的作品都用了很平易的文体,这是基于要把想表

① 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译者

现的内容尽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初衷吧。不过,当文体自我成立之后,“所指之事”反而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鹤见先生这次出版的诗集《垂老之春》(SURE)也是这样,与其说是诗集不如说是警句集、箴言集。内容有很高的象征性。

鹤见 那本诗集是黑川创君费心选编的,还给出版了。我什么都没管。

上野 那是黑川君对您深厚的爱的产物。

鹤见 只有题目加进了我的希望。我是想把它作为我死后的纪念文集的。等我死了,在葬礼上不发点心,就发给大家这本书(笑)。

上野 是黑川君的爱啊,爱(笑)。

鹤见 你老是用爱这个词啊(笑)。

上野 这个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男女之间就叫“欲”了(笑)。

鹤见 是吗?(笑)

上野 我把这本书带来了,《垂老之春》。请您签个名吧(笑)。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么无理的请求就说不出口了呀……

鹤见 哎?签名?

上野 说要做这次访谈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然后就带过来了(笑)。

小熊 啊,我就没往这儿想。

上野 请您把今天的日期也写上吧。

鹤见 这样可以了吗?

小熊 “鹤见俊辅也就是狸猫先生”啊?那是说“俊辅”才是假名字啦?(笑)

上野 啊,真是太高兴啦!好高兴啊。我一直在找合适的时机,想着“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呢(笑)。

第三日



“60 年安保”

出乎意料的高涨

小熊 今天想请您谈谈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就从“60 年安保”开始吧。

“60 年安保”的抗议活动从 1959 年起就开始了,但达到高潮是在 1960 年 5 月 19 日岸信介首相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条约之后。在那之后,就成了“安保粉碎”和“打倒岸信介”结合在一起的了。

鹤见 岸信介是“团十郎”(笑)。是专演坏人的明星。就因为是他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如果当时的首相是石桥湛山或池田勇人,就不会那样的。

因为他原本是要被定为甲级战犯的,他是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在开战诏书上签过名,作为东大出身的高级官僚在“满洲国”担任过要职,是在解除追放之后代替因病引退的石桥当了首相。他想趁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之际送个礼,就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条约。日本近代史上几乎没有比这再坏的角色了。

上野 就是说不是演得不对吧。安保运动的高涨是“反安保”还是“捍卫民主主义”,您怎么看?

鹤见 我觉得两者都不是。那时战争的记忆还很鲜活。战争才刚刚结束十五年。关于死去的亲人、战友的记忆还留在每个人的心中。对象又是岸信介,所以就高涨起来了。是战争记忆的力量。

不管怎么说,从“满洲事变”以来,政府就几乎没有问过国民“这样的政策可以吗”。尤其是女性,连参政权都没有,完全被隔绝在外。而且,就连结束战争的方式也没有问过国民的意见。从1931年以后将近30年都是如此,这些累积的记忆也历历在目。

到了战后,名义上女性也获得了参政权,因为投票年龄降到20岁,很多学生也可以参政了。这样一来,人们就感觉“政治也应当听取我的意见”。在这种意识与战争记忆的交汇处,又出现了岸信介。

上野 但是,“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就是“捍卫民主主义”啊。然后“为什么发动战争”也是跟“反安保”联系在一起的吧。“60年安保”侧重的是哪一方呢?

鹤见 那我觉得是“民主”吧。大家都不太了解安保这个东西。不过,我觉得也没法明确地区分吧。

小熊 我研究的印象是,当时各种各样的因素在转折期重叠在了一起。战争记忆还很鲜明,民主主义的观念也广为人知,而且大家会觉得,好不容易经济开始复苏、生活安定下来,这下难道又要毁于战争了吗?

鹤见 关于这种意识的普及,大家都是低估了的。岸信介自不必说,美国也好、我们也好,都是低估了的。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是觉得这次的运动也不会很高涨的吧。《思想的科学》发表声明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当中最“右”的符号逻辑学者石本新来起草的。他是加藤静枝的儿子,他起草的声明不是要反对安保条约,而是希望进行慎重的审议。但是,不是强行表决了嘛。这样一来,最右的也好什么也好,就全都自动卷入对岸信介的抗议中去了。

但我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低估了事态的发展。在强行表决之后还去看相扑“千秋乐”^①去了。

① 相扑该赛季最终日的比赛,赛后有颁奖仪式。——译者

上野 您上国技馆去了？

鹤见 到咖啡馆去看电视了，因为那里的电视比较大。然后我回到家，家里是有个小电视的，上面正在播新闻，说竹内好为抗议岸信介辞去了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

我非常震惊。5月19日强行表决那天，竹内参加了文化人团体的请愿活动，面见岸信介提出了抗议。但是，岸在当天夜里强行表决了。竹内就立即提出了辞呈，表示没法继续在岸治下做公务员。

怎么说呢，有几个人，我是很敬爱的，或者说是情谊很深的。竹内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竹内有家庭还提出辞职，我就自己一个人。所以很自然地就想，竹内辞职了啊，那我当然也要辞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想，就很理所当然地向我当时工作的东工大提出了辞呈。对我来讲，虽说《思想的科学》也发表了声明，但我是由竹内的辞职而加入运动的。

小熊 是在5月25日左右吧。

鹤见 我辞职的事被报道以后，竹内马上给我发了个电报。他在电报上说：“共同前行，即使分别也要前行。”

小熊 是竹内先生的风格。

鹤见 他就是能这么平平常常地去讲这些青春激情的话，想不到吧。他是有着孩子般纯真灵魂的人（笑）。对他来讲，不光是自己辞职了，还有人跟着他辞职，可能会很高兴的吧。

辞职之后，一下子不用工作，自由了。所以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就一直呆在国会周围。

“无声之声”与电视的功效

鹤见 然后在6月4日，小林登美就举着“谁都可以参加的无声之声会”的牌子，到处去发传单，渐渐地人们就加入到队伍里来了。

“无声之声会”成立的契机，是之前在少年监狱参加的《思想的科学》小组活动（一个叫“主观之会”的小团体）。那时登

美君也一起去了,她说没有参加过游行,就说办个让这样的人也可以参加的组织吧,这样才发起了“无声之声会”。在那之前,就只有共产党、总评^①等组织的游行示威。

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反响,在几天之内,除了我们之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无声之声”。后来在越平联的时候,也是有各种“越平联”纷纷涌现出来,这是“无声之声”的时候就有先例了的。各个“无声之声”联合起来,在国会周围聚集了差不多一万人。这很令人吃惊啊。居然能做到这样。

小熊 电视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吧。

鹤见 那是第一场活用了电视的大众运动。回到家吃饭看电视,看到人们纷纷聚集起来的场面,就会想,我也得去,走吧!就跟电视上演竹内辞职时我的反应差不多。

小熊 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之前的战争记忆与民主主义、媒体普及等新的因素交织起来,在转折期出现的运动。当时电视还是新鲜事物,是更加会被接受的吧?

鹤见 电视的力量比现在要大得多。电视起到了触发器的作用。现在就算播出各种各样的场面,人们也就只是看看就算了,是这样的感觉了吧。当时可不是这样,回家吃饭的人们看了电视,匆匆把饭吃完,就又到国会周围去了。

这里边也不是只有学生或工会成员,已经升到管理层、不会被工会作为动员对象的人们也会来国会周围到处奔走。在信用合作社做经理的本多立太郎就是这样。他们或者参加总评、国民会议的游行,或者看到“谁都可以参加的无声之声会”的旗子就排到队伍里去。

上野 在此之前,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吗?

鹤见 没有。我是大正 11 年出生的,竹内是明治末期,丸山是大正 4 年。但从过去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么大规模的自发运动是从未见过、无法想象的。这样的运动能够发生,我、竹内和丸山就已

^①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1950—1989)的简称。战后日本主要工会组织之一。——译者

经满足了一半了。

上野 这里还是有代际差异的吧。

鹤见 那是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青年学生们不一样的。他们会认为安保条约自动成立了,没能阻止它就是运动失败了。但我们并没有指望安保条约能被阻止,就觉得有了这么大规模的超乎想象的运动不是吗。

关于运动高涨的原因,我们的看法也不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学生们觉得是因为人们支持他们的纲领,所以运动才会高涨,再进一步就可以革命了,是这样空想的想法吧。所以一旦没能阻止安保条约,他们就意气消沉了。

但在我看来,共产主义者同盟本身就不是很大的组织。号称全国有成员几千人,但真正热心的活动家也就一百来人。不过这个组织,是被日本共产党除名的一百来个学生以追究政治的不义为契机,渐渐地扩大了影响,也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些他们并不明白。不过单纯倒是很好的(笑)。

小熊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学生们很拙劣,但这种单纯唤起了共鸣。

鹤见 是啊。我问过桑原武夫先生,他也有很多朋友是银行行长什么的。跟这些人的夫人们一聊就发现,她们差不多都在支持学生运动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尽管要是按他们的纲领革命了,自己丈夫的公司就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她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丈夫是在如何不负责任地敷衍度日,巴结政治家啊,包养情人啊。但那些学生们是很纯真的。然后她们自己的孩子们也在参加运动。这是她们的希望所在。

上野 确实有这样一种关系。跟孩子而不是丈夫同一化。

小熊 学生兵、飞行员见习生这些少年士兵的形象,自己战死的兄弟、儿子的面容,都跟这些学生重叠在了一起,出于这样的心情去支持学生的人好像也是有的。

鹤见 我想是有的。无论如何,那是战争记忆还很鲜活的时代,为着没有可能实现的计划、不问结果单纯地投入的学生们,是会让

人们这样想的吧。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们是纯真的。后来“中核派”^①的北小路敏也好,当了经济学者的西部迈也好,我后来跟他们多少有些个人的交往,都是些不错的家伙(笑)。当然,像西部迈后来写的(《60年安保》,文艺春秋社),选举东大教养学部自治会委员长的时候,他是靠换票才当选的,他们也干过这样的事。但后来能把这些都写出来,就是不错的家伙。

桦美智子死去的日子

小熊 说起来,作为反对安保条约改订的国民会议统一行动,6月4日举行了交通罢工,当时您和其他人劝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学生们。国铁工会的工人们要中止早间罢工,而学生们主张将罢工进行到底,就到铁轨上静坐。据说您跟竹内先生说服他们撤退了。

鹤见 那天早晨我接到了藤田省三的电话。他为“变节”共同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跟我关系非常近。

藤田就说,吉本隆明说要带着全学联的学生们去拦今天的特快列车。这样会有人受伤的,必须要制止。要我去劝他不要去了。吉本也参加过“变节”研究,我跟他也很熟。

可是我不知道吉本在哪里。然后就到处打电话,终于找到了他。

小熊 他在哪儿呢?

鹤见 是哪儿来着?不是在家。是到他参加的六月行动委员会所在的出版社去了。

然后我跟他通电话,他说“有这样的传闻吗”,并没有否认。然后他就说,“我是布朗基主义者,所以不去现场看看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笑)。

^① 1959年结成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的简称。日本新左翼党派之一。——译者

我想,那坏了,就再给藤田打了个电话。藤田是那种当此情形会很有冲动的人。就说,必须要去制止,到现场去吧。我就跟着他去了。

其间藤田给很多人都打了电话,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桥川文三、安藤英治、高畠通敏他们都一起去了。松泽弘阳也在吧。大家都是因为“变节”研究的关系,像藤田分担的论文还没写出来呢。

我们一行人就去了品川车站。明治大学跟早稻田大学的全学联组织已经聚在那儿了,都在月台中央,分别围坐成圆圈。然后我就过去,说“听说大家要冲入铁轨,但现在这里不要有人牺牲比较好”。但我在明治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都没上过课,所以学生们是第一次见到我,怎么说也不答应。于是就陷入了胶着状态。

此前我们这样说服成功了,好像是在荏原车站吧。那里是东京工大“反战学生同盟”的队伍,也是都围坐在那里。他们来自我任教过的大学,所以认识我,尤其是因为有我辞职的事,所以就听了我的话。就是说,因为是辞职抗议过的人,大家是买账的。

但在品川车站,他们就怎么也不肯听。吉本也已经站在这些学生们中间了。他想显示,“我跟这些教授们不一样,是大学之外的独立的存在”。

小熊 像是吉本先生的作风。

鹤见 这时候,竹内好跟广播局的人们一起赶到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做说服工作,因为竹内跟我都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所以还是有些说服力的。广播局做了现场直播,一直延续到天亮。结果,学生领袖们集合起来讨论,最后说“撤吧”,围坐着的学生们就都站起来撤走了。那时就丝毫不乱了。最后是他们自己商量的。我们的劝说工作到底有多大作用也不知道。

上野 花了多长时间啊?

鹤见 很长时间了,从夜里一直到天亮。天亮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

在特快列车进站之前撤走了。吉本在学生们站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阻拦,就跟着他们一起离开了。这就是6月4日那天的经过。

小熊 6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指挥全学联主流派的游行队伍冲进国会,桦美智子在冲突中死去了,那时您怎么样了呢?

鹤见 那时我正跟“无声之声会”一起游行示威来到国会,就看到国会大门前面有很多学生在雨中倒下去了。是被警察机动队镇压了。然后这些学生就说“不要走”。因为根据日本共产党和国民会议的方针,国民会议的游行是要走到新桥然后解散的,那学生们就孤立了。

当时带领“无声之声会”的是大野力。他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但因为要走到新桥去解散,游行队伍还是离开了。“无声之声会”当中有女性和老人,是不能去跟警察机动队冲突的。但途中能听到极其愤怒的喊声。有人叫着我的名字,喊着“要扔下我们走掉吗”。是六月行动委员会的人。吉本他们都加入那边了。

我说“我会回来的”,就去了新桥,然后再回到国会这边。走到国会大门前面就看见吉本在那,跟我就离着五六米远。他之前跟学生们一起冲进国会,做了演讲。

到了夜里,有人传来消息,说警方马上要使用催泪弹了。我就跟周围的学生说,请转告给大家,多加小心。因为那里除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还有很多自由参加示威的学生。

当时我已经是觉得在这里被杀死也没关系了。没有死在那场战争里,战争期间什么也没做,所以就在这儿死了也好。在自己不相信的战争中死了是不甘心的,但安保反对运动是跟自己的意志一致的,所以死了也无所谓。

这时候催泪弹就打过来了,警察机动队一拥而上。吉本跟我不一样,他身体比较好,虽然在比我还靠近大门的地方,但跑得非常快,结果误入旁边的警视厅被逮捕了。我没有勉强行动,就慢慢走,机动队也没有来袭击我。

说起来像讲评书一样,当时我还救过两位女士。我把受到机动队袭击的她们给背走了,很不可思议。这是我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尤其是其中一位女士的鞋子什么的全都坏掉了,我就把她带到旁边的 TBS,说“借双凉鞋”,这样她就能回家了。

慢慢走的话,还能做到这样的事。但吉本因为身体好就跑,结果被捕了。

小熊 好像有些象征意义啊。

鹤见 唔,是偶然的了。

失败是下一次的准备

小熊 6月18日深夜,新安保条约自动成立的时候您怎么样了呢?①

鹤见 那时我也在国会前面。但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本来期望就不高,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失败感。

上野 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们觉得有非常强烈的挫败感吧。

鹤见 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书记岛成郎他们是全力以赴、筋疲力尽了。所以挫败感也很强。但我从战争期间起就对日本人抱有强烈的绝望,所以就觉得,在日本也能有这样的运动啊,振奋感要更强烈一些。

上野 为什么运动能超出预想的程度,作为思想家您是怎么看的?

鹤见 沉默的人们并不只是在沉默,是有着沉默当中的记忆的,我是这样想的。

“满洲事变”以来一直在征兵、征兵,那么多人死去了。这样的记忆积聚起来,到1960年爆发了。藏在胶片上的影像终于感光了。

上野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跟小熊君的《“民主”与“爱国”》分析的一样。

鹤见 我想是很接近的。

① 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后,参议院在30日内未作出决议,新安保条约“自动成立”。——译者

小熊 说到记忆,跟战败初期相比,过了十五年之后,记忆反而更容易形成清楚的“像”,是有这样的一面的吗?

鹤见 是的。战败后两三年,营养不良站不起来,什么都做不了的。所以当时日本共产党的集会等等都是以动员为主,并不像后来“60年安保”时是个人逐渐自发地参与进来的感觉。



无声之声会的游行(1960年。左边是渡边清夫人)

小熊 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生活也多少安定下来了,作为记忆反而更有唤起的力量,是这样的吗?

鹤见 可以这么说吧。

上野 虽说是因为有这样的余裕才能发生运动,但生活保守主义的一面也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吧。

鹤见 虽然已经出现了,但“大家都到国会周围去”“跟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压倒了这一面。数万民众包围了国会,我也一定得去,是这样的感觉,是以跟被组织动员起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参加的。

上野 有人认为“60年安保”斗争以失败而告终,这种能量就消失了。

鹤见 但我妻子的想法跟这完全不同。她当过“无声之声会”的组织者,是在安保之后跟我结的婚。

她说,尽管这么样冲啊冲啊地动员,但在新安保条约自动

成立的那个瞬间，一片寂静。包围国会的群众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四下奔散，完全都没有。她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力量。是自我控制的力量。

我当时已经四处奔走了一个月，很是疲惫，但觉得她的看法很新鲜。确实，那里是有力量的。所以五年之后才能跟越平联联系在一起吧。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那里有再一次重新来过的力量。我妻子觉得，在6月18日沉默凝固的自我控制当中，有这种力量。我觉得有道理啊。

那个6月，竹内发表了《四个提案》的演讲吧。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他说的第四项：“与其糟糕地胜利，不如漂亮地失败”。败得漂亮的失败是为下一次的浪潮做准备的。事情就是这样。

对藤田省三的讯问与对女性史的评价

对藤田省三的讯问

鹤见 “60年安保”之后，藤田省三受到了日本共产党的讯问，我想谈一下这件事。这个情况有点微妙，但是我希望它能把它讲出来。

无论如何，藤田是把他作为研究者最好的一段时间都倾注到“变节”共同研究当中了。而且他当时虽然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但对这个涉及战前共产党员变节的共同研究，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关于这个问题，我本来想等着藤田自己写，所以完全没写过。不过，听看护藤田的人说，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了，他可能没法写了吧（这次座谈之后，藤田氏于2003年5月去世）。所以我想还是讲出来，让它们留下来的好。

小熊 嗯。

鹤见 藤田是有什么事就会打电话过来的人。有一次我接到他的电话，他正心绪不宁，说“叫我去接受讯问”。

小熊 原因是什么呢？

鹤见 “60年安保”之后，藤田作为发起人参与了“当前唯此”共同声明的活动。这个声明是九州的谷川雁起草的。其内容主旨是反对某个组织声称自己先验地（apriori）具有思想的正统性、将

其它组织或个人冠以修正主义之名的做法。这也是有鉴于安保斗争等过程中日本共产党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学生等等的对立。这个声明是用谷川独特的文风写成的,当时被《文艺春秋》批评说是极差的文章。

按照谷川雁的想法,是要由这个声明的发起人共同来署名,其中包括日本共产党现在的党员、被开除的党员,还有跟日共无关的安保斗争参加者。那我跟吉本隆明就是与日共无关的,谷川雁与关根弘是被日共除名的(当时谷川认定是这样),然后藤田和武井昭夫还是党员,我们就以这样的形式参加了。后来谷川雁从九州过来,大家都聚到我当时租的房子里,起草了这个声明。

小熊 原来如此。

鹤见 这样一来,身为日共党员的藤田就接到了日本共产党的电话,说要对他进行讯问。把身为党员的他拉来参加我们的声明,我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所以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

藤田很明显心绪不宁。他是抱着决心加入共产党的,这样一来变成有可能被开除了,对他来讲是很大一件事。于是我们就在千駄谷车站碰面,一起去了代代木的日共总部。我这辈子就只去过这么一次。

到了以后,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进行讯问。我就想,一起来真是对了。要是让藤田独自对着两个人的话,就更得心神不定了。

小熊 您也能参加讯问吗?

鹤见 我进日共总部也没有人阻拦。到了进行讯问的房间,藤田坐在前边,我坐在后面的椅子上,也没有人跟我说“到那边去”之类的。

讯问的口气也都很温和有礼。对方说的是“这样公开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会被人利用、置于敌对阵营的”,“是有这样的历史倾向的。我们想把这个情况告诉给您”,等等。是这样的感觉,很平和的。

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开除、分裂接连不断。构造改革派在那以后被除名了。后来担任了越平联事务局长的吉川勇一,也因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内部纷争被除名了。而且,对藤田的讯问刚过了半年左右,当时讯问他的人联系了我,说“要办杂志所以请您过来”。然后我一去,他们两个人都在,对我说“之前失礼了”。他们也是对日共的改革提了意见,却被开除了,就想办一个新的机关刊物。

上野 啊,已经真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了啊。

鹤见 他们两个人,一位是内野壮儿,一位是内藤知周。

小熊 藤田先生在讯问的时候是怎么回答的呢?

鹤见 藤田没有反驳。总之我在讯问的时候就在那里,从头听到尾。我想前后不到三十分钟。

小熊 藤田先生和武井先生是后来被除名的吧。(据曾在前述声明中署名的针生一郎氏追悼藤田省三的文章《独住思想家的光芒》(《美铃》510号)称,针生氏无视接受讯问的要求,并与新日本文学会的同人们发出了同样旨趣的意见书,于是在1962年1月,武井昭夫、关根弘、花田清辉、安部公房、大西巨人、针生一郎等18人被日共除名。)

鹤见 是的。藤田接受了讯问就暂时保住了身份吧。但最后也是被党开除了。山田宗睦并不是发起人,但因为在那个声明上署了名,后来也被开除了。柳田谦十郎署名之后后悔了,写了个明信片表示收回立场。

小熊 之前做“变节”研究的时候,藤田先生没有被日本共产党说什么吗?

鹤见 没有。至少讯问什么的是没有的。《赤旗》对《变节》第一卷有很长的书评,我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日共对变节有其它的说法,认为我们的共同研究是跟它有出入的。但日共并没有因此而处罚身为党员的执笔者。那个声明之所以受到非难,可能是因为觉得那会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有利吧。

关于这次对藤田的讯问,作为事实,我觉得留下这些证言

是有价值的。不过,我觉得藤田应该写。受到震动的当事人跟见证人所说的会不一样吧。所以要是藤田有精神读我的这些证言,说不定会觉得“这点不是这样”。但这些事如果我不讲的话,就没人知道了。

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与女性史

小熊 话题再回到五十年代,当时《思想的科学》是重视小组活动的吧。石母田正先生他们五十年代是在小组当中搞运动的,那对于他们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还有谷川雁先生的“活动小组村”等等,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和子跟石母田一起参加过活动,在职场活动小组发行文集,像《母亲的历史》、《握铅笔的主妇》等等。不过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和子本来在战败初期是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的。

上野 和子女士做党员到什么时候呢?

鹤见 后来到了1950年日本共产党分裂的时候就退出了。战败初期,因为日本共产党是抵抗战争的,所以获得了压倒性的信赖,知识分子当中入党的人很多。连中井英夫都入党了。

但我基本上是一个怀疑论者,不相信历史是沿着科学地决定出来的法则而动的。所以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对石母田正他们搞的“民科”(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也有距离感。

小熊 国民的历史学运动受制于日本共产党的内部纷争和方针转换,只是一味强要他们通过小组来扩大动员,因而受到了挫折。石母田先生好像对此很后悔。

鹤见 石母田正是个好人。是五几年的时候吧,石母田把《思想的科学》与“民科”对比,很直率地说“你们这边比较棒”。要是按日本共产党的官方路线来说,本该觉得《思想的科学》的小组是什么思想性之类都没有的。

小熊 这是石母田先生五十年代说的吗?

鹤见 是他亲口说的。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不仅是共产党的方针,

石母田的历史哲学也有不恰当的地方。石母田本人确实也有责任。但是,面对责任,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承担,不是很令人钦佩吗?

有个长期在“民科”分部的人叫物部长兴,他也有一种诚实的精神。他是把“民科”的运动引向政治的人,但他对此进行了反省,六十年代末发表在《朝日周刊》上。这是很重要的文献。然后他还加入了越平联。

上野 小熊君在《“民主”与“爱国”》中写到石母田先生的诚实,我也印象深刻。

鹤见 很久以后,是八十年代的事了,我当过一个奖项的评委。那边的评委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最年轻的是司马辽太郎,第二年轻的就是我。80岁以上的评委们并没有读最终入围的著作,而且都希望能早点回去,所以我的意见起了挺大的作用。

然后有一次,评委会按照往年的惯例选出了两部获奖作品,结果赞助单位的人给获奖者打电话时,其中一人拒绝接受。那时老先生们都已经回去了,也不能再把人都召集一遍,所以就决定当年只有一部获奖作品。不过后来我跟那位拒绝受奖的人做了次对谈。那个人就是网野善彦。

小熊 是吗?就是他的《历史的故事》(朝日新闻社)吧。年轻的网野先生在石母田先生旗下,是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中的活动家。

鹤见 是的。然后我问他很多事。我问他:“网野君的老师是谁呢?”要是一般人就会回答说“我是谁谁的弟子”,讲讲自己的师承不是吗。但他说:“非要说的话,是我自己。”

而且也确实是这样。他说,自己在国民的历史学运动时期写的论文是在受制于政治的情况下按那样的模式写出来的,“作为历史学的论文,问题是不成立的”。他还说,把这篇文章“放在自己面前,冷汗直流。这就是自己的老师”。这话让我很惊讶,觉得这人了不起。

想起来,所谓国民的历史学运动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留下了果实。关于中世史、日本史,网野开辟了新的道路,但其源头

是在民科的运动当中的。而且,能开辟新路正是因为正视了输掉的战役。输掉的时候睁开眼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跟下一步相联的。

上野 胜负固然重要,输的时候是怎么去输的更重要啊。

鹤见 就像刚才说的,竹内他们在“60年安保”的时候也说过“与其糟糕地胜利还不如漂亮地失败”吧。

小熊君的《“民主”与“爱国”》关于国民的历史学运动的整理能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好。不是去单纯地拥护民科,而是在清楚地看到错误的基础上,写出了继承其精神的东西。跟藤田省三在《战后日本的思想》(中央公论社)中对民科的定位相比,这种方式更好。虽说藤田的书因为写于民科运动失败后不久,有其时代背景因素,但它一上来就光是批判了。

小熊 谢谢您。我前年跟网野先生有一个很长的对谈(收入网野善彦对谈集《关于“日本”》(讲谈社)),问了很多事情,在《“民主”与“爱国”》关于国民的历史学运动那章里有所体现。

上野 那一章是绝品杰作。

鹤见 关于民科的小组运动,也有完全自发的东西,有很有意思的记录。《母亲的历史》这些,内容都不坏。石母田觉得支撑自己的不是有着高学历的父亲,而是没有什么学历的母亲,因为有这样的视点才做出了这样的文集。问题在于是只把这当作增加政治支持的东西了。

但是,这些虽然失败了,却是跟下一步相联的。在民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出现了大量的活动团体。这与“60年安保”时期的“无声之声会”是相联的,也是越平联时期各地能成立各种组织的基础。越平联时期已经没有了日本共产党的强制力量,能够相当自由地开展活动,这一点也很好。

小熊 要说起来,以《母亲的历史》为代表的访谈记录女性史等等,可以说是跟其后的女性主义相联的。

和子女士这个时期参与了女性劳动者的小组活动,她的著作写到了这样的问题:由知识分子代替不擅文辞的女性劳动者

发声好不好？没有发出声音的民众要怎样去发出声音？我读了以后就觉得，最近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底层能发声吗？》（美铃书房）的刺激下被热议的内容，至少有一部分是和子女士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了的。

谷川雁与“活动小组村”的女性们

上野 我也从小熊君的书里了解到，在五十年代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中，通过访谈进行的女性史和民众史已经受到了关注。而民科以此方式尝试过的事情在六十年代后期再度兴盛起来了。从那时起，地方史、女性史逐渐开展访谈，成为了草根女性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

不过，这些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国民的历史学运动是其先驱者呢，我觉得是没有的。反而是共产党方面的历史学者犬丸义一他们批评当时的女性史是“理论的衰退”。

小熊 犬丸先生在日本共产党的分裂期是国际派，是对“感想派”主导的国民的历史学运动持批判态度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一以贯之的。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历史学界也认为国民的历史学运动那样的做法是不行的。

上野 微观地看是如此，但宏观地看，正是由于日本共产党的影响力低下，女性史才得以兴起。那时候，妇女解放运动什么的也都没有，在这种摸索着不知该如何入手的状态下，各地最初开始做的就是探寻女性根源的女性史小组了。

当时关于女性史的书就只有井上清先生在战败初期所著的《日本女性史》这些了。那太正式了，让人不想去读。然后在没东西可读的时候，从1968年起开始印行理论社版的《高群逸枝全集》了。后来就出现了访谈的手法，无论如何先去听听女性前辈的经历。

在这些做女性史的人们当中，被认为是先驱者的是谷川雁先生在九州组织的“活动小组村”的女性们，像森崎和江女士、

石牟礼道子女士、河野信子女士、中村纪伊子女士等等。她们可以说是五十年代的小组运动与六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鹤见先生您对她们的作品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我觉得很不错。中村纪伊子给《思想的科学》投稿，最开始的稿子就很好。是跟当地一位老婆婆的对话记录。那位老婆婆在70来岁的时候离了婚，独自建了个简陋的房子度过余生，不让差劲的丈夫牵绊。是在女性与女性的对话里产生的女性的哲学。

谷川雁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很傲慢，有不把人当人看的地方，但也有着诗人的力量。

上野 经常听人说他是个桀骜不驯的人。

鹤见 我第一次见到谷川雁是在日高六郎学士会馆的宿舍。他总是很嚣张。桑原先生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京大文化节的休息室，结果来问我说：“有个都不正眼看我的人，那就是谷川雁吧？”（笑）据说乔姆斯基来日本的时候在研讨会上见到他，也说他是“strange poet”。这也是听桑原先生说的。是个有意思的人。

谷川雁给人打分。他跟我说过“中村纪伊子第一，森崎和江第二，石牟礼道子第三”什么的。

上野 这是要煽起竞争意识的吧。

鹤见 要是我就不会说这样的话，各有各的优点不是嘛。谷川雁这个人跟很多女性都有关系，也是很乱来的家伙。

上野 是啊。跟森崎女士同居，但据说对石牟礼女士也有意思。

鹤见 石牟礼道子的《西南战争备忘录》等等也投稿给《思想的科学》，这也是谷川雁推荐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承蒙关照了，不过他也给我添麻烦了（笑）。还有谣传说跟谷川雁交往的女人藏在我那里，结果就有别的女人追上门来，威胁我想把他夺回来，很吵的啊（笑）。他真的非常混乱。

上野 谷川先生在五十年代曾是日共党员，石牟礼女士应该也一度当过日共党员，不过她和森崎女士都跟马克思主义没什么关系，就是写自己的文章。

鹤见 与其说是思想上如何如何,还不如说是被谷川雁那种强烈的个性所激发的吧。像森崎和江真的就是这样。

森崎是在殖民地的朝鲜出生的,从那时起就对朝鲜人少年抱有同情,在日本人当中很孤立。她父亲是老师,因为想保护朝鲜少年也很孤立。后来日本战败了,她回到九州,却被当作“外来归国者”对待,也没法再回朝鲜,所以到哪里都不是故乡。其间她弟弟加入了进步学生的队伍,后来自杀了。在这样的多重打击之下,为她打开自身潜力的契机,就是谷川雁。

但她最初写的东西受谷川的影响太大了,就止于对谷川的模仿。她投稿投了很多次,都没有刊登。不过从某个时候开始,她摆脱了谷川的影响,写东西也变得好起来了,不仅有了自己独立的文风,内容也改变了。从那以后的森崎就很棒了。

中村跟石牟礼从一开始就没有模仿谷川雁,是以自己的文风出现的。我感觉那是植根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体验本身的。

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评价

小熊 您对七十年代前后出现的女性解放运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自发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很有意思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想着美国有成形的理论什么的,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上野 鹤见先生啊,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并不是外来传入的哟。外国理论的传入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本的女性解放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思想。

鹤见 是吗?唔,我觉得田中美津很有意思。

小熊 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拓荒者啊。

鹤见 她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去墨西哥、自己弄好多擦伤什么的,由此改变着想法和人生轨迹。我觉得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啊。

上野 不光是如此啊。女性解放运动是基于对当时的学生运动、全共斗运动深深的失望而产生的。

鹤见 是吗?

上野 田中美津女士在女性解放运动和墨西哥之旅以前，一直是追随学生运动的。六十年代末全共斗解体之后有了第一次全部由女性参加的游行，那就是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先声。当时田中美津女士写下了有名的传单《从厕所中解放》。

鹤见 我觉得田中美津是自己独立思考的人。

上野 是这样的。不过，除此之外，她说作为新左翼的活动家，跟男性活动家们一起相信大义、参加运动，却遭到了如此的背叛，我对她这种说法很有共鸣。“男生精英们说要自我否定。但是，女性自身到底有什么是要自我否定的呢？为什么我——从来也没有被肯定过的我——必须要否定自我呢？”她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的。

鹤见 这些我都不知道啊。

上野 我跟她也并没有那么熟，她在东京，我在京都，年龄也有些差距，具体的我也不了解，但看到她这么写过。既有对高举大义共同参加运动的男性们的批判，也有遭到背叛深受打击的心情。

鹤见 唔——

上野 所以说，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日本的女性运动第一次独立于以大义、正义为旗号的男性运动。在那以前，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也好、民科也好，都是与男性一起开展运动的。是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说出了“以后不再跟你们同路了”。这才终于有了力量（笑）。

鹤见 啊，我没跟田中美津打过交道。

上野 但您读过她写的东西吧？森崎女士在谷川先生的影响下，也曾经在“活动小组村”跟男性们一起开展过支援煤矿工人的运动。不过，在一起参加活动的女性遭到男性活动家强奸的事件发生之后，森崎女士就离开了谷川。她跟为了不扰乱运动的团结而选择不将此事公之于众的谷川诀别了。她要与那些认为跟强奸女性相比大义更重要的男人们从此分道扬镳。我想，她是从那以后以写作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活动的。

鹤见 是吗。这些我都不知道。

上野 森崎女士自己这样写过。所以，女性作为女性来写作、女性成为思想的主体，也有不再跟男性同路的一面。

在田中美津她们的行动刺激之下，女性们聚集起来，掀起了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认为自己是遭到男性背叛的受害者，开始了运动。粉色头盔的“中避联”（“反对禁止堕胎法、要求解禁避孕药的女性解放联合”）就是其中的典型。您对这些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我实在是觉得，“女人这东西”这样的话，打死我也说不出口。但是，对于女性，我自己原来不良少年的经历是有消极作用的。就尽量不去接近女性（笑）。

上野 您是说，这些运动兴起的时候，也尽量不去碰它？

鹤见 女性创造新的历史，我对这样的纲领是完全赞成的。在我家里，倒是我妈妈而不是我父亲才是正直的。可是，我又着实深受妈妈的伤害。简直都快要到了逼死人的境地，但总算是活下来了，所以感觉就像是向敌人伸出了手一样。

而对于我父亲，多多少少总有些不愿意欺负弱者的感觉。那些“第一病”的家伙在人格上、道德上都是很弱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写父亲的事。不是因为他很了不起所以不写。他在跟我的关系上、跟我妈妈的关系上都是个弱者。

因为我父亲是个世俗的人，他知道是自己的妻子把自己带上去的。他就是个穷学生，就凭着自己的头脑一直考进了一高。然后就由新渡户稻造做媒人，娶了后藤新平的女儿不是嘛。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很尊敬后藤新平，他没有去照顾我父亲爬到高位。父亲虽然对此很不满，但不管怎么说当了这样一位小姐的夫婿，在阶级上一下子抬高了，别人对待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是觉得很感谢的。

所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父亲是个弱者。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软弱的人，虽然社会地位变高了，但我妈妈是个很愚钝的人，却又非常正直，有那种正直之人的强势。这是会压迫人的。

所以对我也压迫得不行……

上野 这样一来,您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完全没有那种女性是软弱的、女性是受害者的感觉吧。跟您父亲比起来,您母亲才是强者。

鹤见 嗯——我也在忍我妈妈。我父亲也忍了不少。就是一种“我们都很忍耐啊”的感觉(笑)。所以到最后我能跟父亲和解。像是在说,对强者的战斗结束了,来握个手吧……

上野 还有个事情想请问您,您年轻的时候曾经放荡度日,当时您会觉得那些卖身的女性是受害者吗,会感受到她们的软弱和悲伤吗?

鹤见 会感觉到。但后来反过来了。有一天我发现,说到底,她们接受我是因为我富裕阶级的出身。我十五岁左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就想,“不能再这样了”。这也是我开始想要结束放荡生活的原因。

上野 在您年轻的时候阶级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跟性别差异相比,阶级差异更见强者弱者之分。经济高度成长末期女性解放运动的登场,也是因为阶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性别差异就变得更加突出,我想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

嗯,这些先不去说它。好像有点罗嗦,不过我还是想请问您,女性解放运动中的女性是以主张自己是男性社会的受害者而开始运动的,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女性说自己是受害者,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什么愚蠢的想法啊”?

鹤见 这个啊,据我的观察,有很强的人,也有不那么强的人。我父亲是不强的人,我妈妈是很强的人。“第一病”的人们大体上都是不强的。比如清水几太郎,别看他看起来是那样的,但我觉得不能算是很强的人。我真是觉得,那么弱的父亲还真是能忍耐我妈妈啊。

吉本隆明其人

少年士兵一代的思想家

小熊 那您对吉本隆明先生作何评价呢？

鹤见 对于比吉本年长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我在战争期间感到极其失望。就觉得，战争来了就为战争摇旗呐喊，那败给美国了就要为美国摇旗呐喊了吗？

所以我对吉本他们这一代也完全没抱什么希望。因为他们6岁左右时发生了“满洲事变”，是被军国主义教育所浸染了的吧。就觉得从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什么也产生不了吧。但1955年我读到了吉本写的评论《上一代的诗人们》，觉得非常不错。

小熊 是那篇揭露某些共产党诗人隐瞒写过支持战争的诗的评论吧。

鹤见 我是在它发表了一段时间以后读到的。就觉得，这真是不错。

那篇评论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切入了左翼的战争责任问题。文章主要是讲，日共党员壶井繁治在战争期间写了咏赞捐铁的的诗，说“南部的铁瓶”变成兵器战斗吧，而在战后又写了“南部的铁瓶”在民主主义之下支持着民众的生活这样的诗。诗人就这么心平气和地用着同样一个比喻，这样做行吗？

这实际上是在讲语言的清洁问题。吉本并没有去借用一般权威的说法，而是独辟蹊径地做了这样的批判，而且还清清

楚楚地指明自己的批判对象。我就觉得很好,那以后只要是他写的东西我就尽量都找来看。然后再回过头来读他之前写的《试论马太福音书》和《与固有时的对话》等等,也是已经体现出了独立的权力批判。后来我就一直对他抱有好感。

所以,吉本批判丸山、跟花田清辉论战的事,真是服了啊。

小熊 服了?

鹤见 那丸山也好花田也好,我都是评价很高的嘛(笑)。

小熊 吉本先生对丸山先生的批判有“60年安保”斗争后有名的论文《拟制的终结》,以及1962年发表的《丸山真男论》。他认为那些脱离民众的特权知识分子在战争期间作壁上观,从结果上看跟日本共产党没什么分别。虽然丸山先生没有做任何反驳,但被全共斗的学生们如此批判,还是受到了影响的。

鹤见 对丸山的批判,有一点吉本是有道理的。因为丸山在演讲时说,所谓法西斯主义是亚知识层造就的,诸位都是东大的学生所以不是亚知识层。这正是我所反对的思想。

小熊 虽然丸山先生并不是这个意思,但这句话也容易被如此解读吧。嗯,不过我也能明白那种对丸山先生的意气清高不以为然的感觉。

鹤见 啊对了,你说过他本来不是这样说的是吧(笑)。我是依着自己的偏见把丸山给歪曲了。

反正吉本对丸山这点感到愤怒。因为吉本自己出身于造船工匠家庭,一直是在大学体制之外的诗人和评论家,所以他都已经是一种“不揍这家伙那都不行啊”的感觉了吧。所以,要是吉本对丸山的话,丸山得九分,吉本得一分,但我对吉本的那一分是支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上野 您第一次见到吉本先生是在什么时候?

鹤见 我读了《上一代的诗人们》觉得很好,就叫他来《思想的科学》的研究会了。那时《思想的科学》还没有办公室,是借用了明治大学的一个房间。房间有点小,可来的人不少,大概有十几个人吧。我们就叫吉本来讲讲。这就是第一次见面。吉本当

时说,不对花田清辉有更高的评价是不行的。这是没有变成过铅字的。

上野 哎——?花田的《复兴期的精神》也让我很着迷。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要写就想写这样的文章。

小熊 吉本先生起初对花田的《复兴期的精神》评价很高,是1956年在座谈会上观点相左以后才开始批判花田的。

鹤见 是。后来就有了吉本—花田论战。不过我对这场论战毫无兴趣。

小熊 因为就是没什么内容的骂架吧。

鹤见 所以我就写东西批评吉本。是发在白井吉见主编、筑摩书房出版的《现代教养全集》月报上了。我说,搞这种无聊的论战,吉本你干脆别写东西去当相扑好了(笑)。

上野 哎呀呀这真是的(笑)。

鹤见 不过我这么写吉本也没生我的气。我以为他也会像对丸山那样对我勃然大怒,但完全没有。吉本对我的态度是出人意料的克制有礼。

上野 为什么呢?

鹤见 对我黑社会的作派有共鸣吧(笑)?就是投入地去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共鸣。“60年安保”时的6月15日,我跟吉本就只有5米远的距离。我是想着就算死在那里也没关系。我想吉本是知道这一点的。

所以在“60年安保”之后,吉本在跟谷川雁、埴谷雄高等人合著的《民主主义的神话》(现代思潮社)中写了《拟制的终结》批评丸山,但对我什么也没有说。黑田宽一也在那本书里写了文章,但就连他也没有点名说我的坏话。

小熊 原来如此啊。

鹤见 在“60年安保”那样的浪潮中,投入其中的人和没有行动的人真的不一样。我想就是这种感觉吧。黑社会就是这样的(笑)。

而且吉本是很重信义的。他战败初期毕业于东工大化学系,我也在东工大呆过,虽然不同时,但也听说了很多他学生时

代的事。远山启也在工大,他对吉本评价非常高。

据远山说,学生时代,吉本他们说想学习,就在战败初期粮食困难的时候自己搞牛肉回来,叫远山来讲量子力学。然后就一起用牛肉做“鸡素烧”火锅吃。东西就算是答谢了。吉本在待人接物上是恪守礼节的。

后来吉本工作的东洋油墨公司因为他参加工会活动把他开除了,帮他找工作的就是远山启。他介绍吉本去了长井长义的儿子开的专利事务所。听他说吉本在那里工作非常认真,长井很高兴。

我听这些认识他的人都说吉本是个非常讲信义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那种见风使舵、摇旗呐喊的人。然后读了《上一代的诗人们》以后就想要见面了。

全共斗与吉本

上野 后来在六十年代,吉本先生成了青年人的英雄。您对这是怎么看的?小熊君的《“民主”与“爱国”》也有一章讲的是吉本先生。我觉得小熊君对吉本先生的看法真是冰冷啊,说与其说是吉本思想的内容唤起了共鸣,倒不如说是经济景气好,或者是那种把权威踢到九霄云外的生气勃勃的姿态吸引人,真是相当不留情面的评价啊。

鹤见 这是事实吧。

上野 是吗(笑)?但六十年代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影响力一直持续了十年。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十年是从哪年到哪年呢?

上野 从1965年到1975年左右吧。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吉本先生迅速转向了大众文化论,后来对他的评价就有分歧了。

鹤见 我觉得吉本的作品有意思是从1955年的《上一代的诗人们》开始的那十来年(笑)。吉本是在变的。“60年安保”以后他就宣称“与其去什么政治集会还不如睡午觉”,不来参加运动了,66

年就写什么《对语言来说什么是美》，转到那边去了，就不是很有意思了。

基本上吉本是不读学术著作的。关于语言，他也只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观。被叫做布尔乔亚语言学的东西都在说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对语言来说什么是美》里说的虽然没有错，但那只不过是加进了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新内容的评论。所以就不会让人像崇拜他的年轻学生那样惊叹哇了不起啊。

上野 是吗？

鹤见 与那时相比，我倒觉得吉本最近写的东西更好：护理啊、跟老年人相处啊这种生活智慧的文章（笑）。据他说，如果拄拐杖就会对它产生依赖，身体会变得迟钝。所以今天我也应用了吉本的理论，没有拄拐杖来（笑）。

上野 《共同幻想论》您觉得怎么样？这本书在68年出版以后给全共斗的学生们带来了冲击。

书中创造了“对幻想”这样一个概念，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跟国家同样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共同幻想论》最突出的观点是说国家是一个幻想。国家所带来的束缚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踢到九霄云外去的。后来像岸田秀的《唯幻论》是重温这种观点的，但可以想见，有多少人会对把国家断言为共同幻想感到震惊。

鹤见 原来如此。

上野 所以我在看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NTT出版）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安德森的书八十年代末也译成了日语，但这并不是外国传入的思想现在广为流行了，十多二十年前日本就有个叫做吉本的思想家讲过这样的话啦，有一批人是这样感觉的。

鹤见 《共同幻想论》比《对语言来说什么是美》有意思。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问题跟《古事记》什么的联系在一起很有意思。

小熊 我觉得，“国家、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个说法本来是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日本的历史学界直到五十年代前后也都在说天皇制啊、“日本国民”的意识啊都是明治以后才形成的。要说起来,我觉得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也是作为这种常识性理解的延续而出现的。出版印刷造就了民族主义,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从六十年代前后就在说了。

这样想来,吉本先生的《共同幻想论》不如说是一部刻意将国家、民族的起源拉回到古代的著作。可当时的学生们却认为这是“第一次将国家的束缚踢到了九霄云外”,这不是只能说明他们不明白吗?为什么上野女士会认为把民族主义看作是近代产物的安德森和将其拘泥于古代的吉本先生的《共同幻想论》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呢?在我看来是很难理解的。

上野 感谢授课。我也有我的想法,不过现在是访谈鹤见先生,所以就不做反驳了吧(笑)。

鹤见 《共同幻想论》在全共斗当中很有人气,我觉得很可以理解,但也觉得有点头疼。

比如,全共斗运动的时候我在同志社大学,他们在学校里架了个很大的布告板,写着“抛掉幻想的大学让金子般的我们把握真正的学问”什么的。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不知所谓的幻想。是觉得“真正的学问”在大学里吗?首先你们这些学生有那么用功学习吗?

当时我就想,如果请我去群众团体讲演什么的,我就会对学生们讲:“竖这样的布告板,你们会被阎罗王拔掉舌头的哟”(笑)。但学生们迟迟不叫我去讲。结果我的台词也没地方去说。可能就是因为觉得会被说“舌头会被拔掉的哟”,所以才不请我的(笑)。另外对他们来说,要是把越平联也变成敌人,己方盟友减少就会败给日本共产党的,我想也是有这种政治计算的吧。

上野 所谓“要真正的学问”的确是过于幼稚了,不过全共斗本来就不怎么去讲幻想解体之后要建设什么。跟那些要争取得到什么的“手段一目的型”运动相比,全共斗是“表现型”的新的社会

运动,就是要抒发表达不同意见的感觉。

布告板的前半句“抛掉幻想的大学”也是借用了吉本先生的措辞,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鹤见 是啊。所以当时见到他以后,我就跟他说:“你的书成了这种口号的原型,真是头疼”。不过仔细想想,吉本对此是没有责任的。

小熊 刚才您说吉本先生不是那种见风使舵豪言壮语的人,所以很信任他。但到六十年代后期,本来著作发行量只有数千部的他一跃成为发行量动辄数万的畅销作家,被人们抬得越来越高了。

恐怕吉本先生自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自己的影响力怎么不知不觉就已然变得如此巨大了。不过,我感觉在他七十年代前后的著作中已经开始渐渐地混有豪言壮语了。或者尽管吉本先生自己并不这么想,当时的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成口号来接受了,可能也有这样的因素。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我对于吉本式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感到非常头疼。

上野 不过吉本先生开始讨论大众文化是在更往后的时候了。

鹤见 不,是吉本变成了大众文化啊(笑)。“幻想”啊、“独立”啊,作为口号流行起来了。

我觉得所谓“真正的独立”就只有自杀。要是决定自杀并开始走上这条路,真正的独立也就仅仅存在于这最后的几分钟里吧。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对吉本制造的口号是相当有疑问的。

谷川雁在制造口号方面要比吉本更诗人、更变幻自在,所以是没法跟大众文化挂在一起的。大家是没法一边高喊谷川雁写的“原点、原点”一边游行的啊(笑)。我觉得谷川还是有作为诗人的变幻趣味的。

小熊 吉本先生就不怎么有?

鹤见 我觉得是。相反,他是有着能一直坐在某地纹丝不动的长处的。

诚实的人

上野 您是说，吉本先生在六十年代的人气高涨，是时代把他推上高处骑虎难下了吗？

鹤见 他是被推上了高处吧。不过我觉得他好就好在选择了抛下这些往前走。他写生活智慧的书就没法用“骑虎难下”来形容吧。所以他最近写的东西，比如不要拄拐杖，我是作为吉本的思想去活用的（笑）。

上野 这种变化有怎样的经过呢？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笼罩着消费社会的气氛，吉本先生就像是要迎合时代一样转向了大众文化论。

鹤见 八十年代他跟埴谷雄高争论穿品牌衣服好还是不好什么的，就穿着品牌服装，把照片登在杂志上。这个我还是没法接受啊。我对吉本评价比较高的是从《上一代的诗人们》开始的那十年，还有他现在的作品。

上野 对那之间的作品没有好评。

鹤见 不过，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从战争期间开始就带着一种诚实去生活的人，我对他是肯定的。这样的人在日本知识分子里面是很少的啊。

比如说我也喜欢西部迈。他会如实地去讲自己不像话的事。“60年安保”的时候在自治会选举里作弊呀，拿着菜刀跟儿子吵架幸亏被妻子拦下来了呀，他会写些这样的事吧。我就觉得他跟那些只靠条条框框装腔作势的人不一样，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不管从哪里切割都只能看到为“公”而忧的人，我是不喜欢的。就像方解石，不管怎么敲打都只会裂成正方形，我不喜欢这种不管怎么敲都是一副“公”的面孔的人。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完全就是明治以后学校教育的恩赐。我觉得像若槻礼次郎那样，能说“我是个弃儿”的人比较好。

上野 可丸山真男先生写的也是不管从哪里敲都只会出现“公”的文章啊。

鹤见 写的东西是这样。他一写东西就非常慎重,会很克制。但是就像昨天说过的,他内心里是个克制着狂逸之气的人。所以对藤田啊、桥川啊这样有疯子气质的家伙就会有意保持距离。

丸山觉得我也是个疯子。也就是因为我恰好不是他的学生,才没有落得被逐出师门的下场(笑)。当然他没直接跟我说过“你真是个疯子”什么的。但我在“60年安保”以后结婚的时候,他对我的妻子说:“这下他也就不会再说因为写不出稿要放火烧我家了吧”(笑)。对我而言,丸山是这样的存在啊(笑)。

上野 在您看来吉本先生是疯子吗?

鹤见 他是个一根筋的人,但常识很丰富。要叫我说,跟吉本比,谷川雁更疯,跟谷川比,藤田省三更疯。丸山可能就更厉害了(笑)。

小熊 刚才您说,战争期间十八九二十岁的“战中派”一代出现了像吉本先生这样的人,您感到很吃惊。您在战争期间觉得从这种皇国少年的一代人中间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人出现,但是却出现了这样一个人。

鹤见 确实是很吃惊的。跟我相比,战败时吉本是思想基础完全崩溃、无法立足了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动弹不得。然而就是这个很长时间连动都动不了的人,他再一次重新站起来了,有这种力量是吉本的强大之处。我是不具备这一点的。

小熊 我觉得,您对他的这种定位就像您在战争期间还有战犯审判时所一贯的那样,自己对少年士兵怀着一种追悔之情,而这一代人当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吧。

就是说,自己有知识却没有站出来抗议战争,而一无所知的少年士兵们在战争中献出生命死去,是对此所怀有的追悔。而吉本先生是少年士兵这一代的一份子,在直击有知识批判战争却变节的人们的矛盾,您是这样看他的不是吗?

鹤见 是的。写《战舰武藏的末日》的渡边清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觉得切中肯綮,触及了我的盲点、痛处,是这样的感觉。

小熊 原来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恐怕这是 1955 年吉本先生的《上一代的诗人们》、《高村光太郎》问世时,比他年长的一代知识分子们的典型反应。但这跟上野女士这一代人接受吉本先生的方式是全然不同的吧。

鹤见 是这样的吧。

小熊 要说两者有共通之处的话,就是吉本先生在战争期间一心赴死、深信不疑的皇国少年形象。两者都是以他的这种“纯粹”为出发点,去批判变节知识分子的“欺瞒”、“伪装”,或是日本共产党永远正确神话的“幻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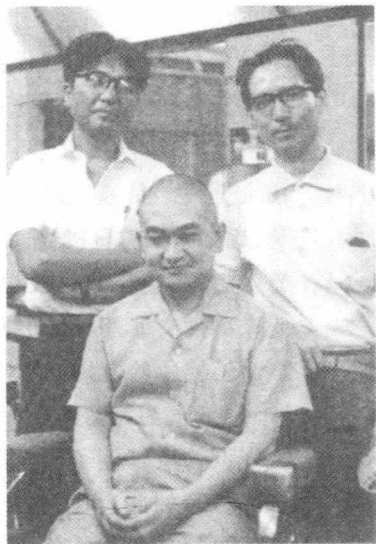
但是,我在《“民主”与“爱国”》里也写到了,仔细读一下吉本先生的著作就知道,“无惧死亡的皇国少年”形象是他的理想,而他实际上是不想死的,在父亲的劝说下升入大学免除了兵役。正是因为这在战后成了内心的重负,他才描绘了“无惧死亡的皇国少年”的自画像。鹤见先生您以前知道吉本先生兵役的事吗?

鹤见 不知道,读了你的书才知道的。

小熊 是吗?仔细读一下他的著作应该就可以知道的,为什么当时大家都没有看到呢?

鹤见 不过呢,战争期间等待服兵役是非常大的心理负担。我 1942 年 8 月从美国回来,马上就是征兵检查,后来报名当海军文职,43 年 2 月到南方去了,但那段等待的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小熊 这确实是这样的吧。



每年战败纪念日三人轮流剃光头
(1962 年 8 月 15 日。右起:山田宗睦、鹤见、安田武)

鹤见 吉本应该也是处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之下,他是摇摆矛盾的。要是他的父亲没有劝说他的话,他可能就服兵役死去了。他迷惘也是正常的,把迷惘的事零碎片段地记下来,说明吉本是诚实的。

小熊 我也觉得他是诚实的,也完全没有想批评他免除兵役的事。但是,比如他在《高村光太郎》里写“我不怕死。反战、厌战这样的思想,我连想像也没想像过”,又该怎么看呢?虽然他自己对免除兵役有罪恶感,却批评丸山真男先生是“作为陆军一等兵协助了战争的丸山”(《何谓情况》),把野间宏先生的《真空地带》也指责为“显示出战后作家急于对战争体验进行内心反思的盲点的极好例子”(《战后文学往何处去》)。

尽管如此,世间通行的却是吉本先生“无惧死亡的皇国少年”的形象,年长一代对少年士兵们所怀有的罪恶感,在结果上是被利用了。我觉得他这种姿态是极其不能接受的。

鹤见 嗯,吉本就是觉得反正这么下去自己受不了,就动手开打了。一旦动了手就会一直打下去直到最后。就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出路的家伙。所以我就写说要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去当相扑吧(笑)。不过吉本自己也感到后悔了。

上野 是吗?

鹤见 大概是98年吧,共同通讯社策划了一个新年对谈,吉本说想要见我,我就到东京去了。然后吉本就说“让您专程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态度啦。后来他说身体不好,对谈结束后连饭也没吃就回家去了。他当时就说,“我现在这么痛苦,就是因为年轻时对人不留情面恶语相向不是吗”。

上野 哈哈,这真好笑(笑)。自食其果吗。

鹤见 是真的哟。很有意思吧。但是我也不能说“是啊,活该”这样的话吧。

对“一根筋”的评价

小熊 您说吉本先生很顽固,是个“一根筋”的人。您对这样的人始终

是肯定的吧,是把他们当作那些很能干、会做人的优等生的对立面的。

鹤见 是的。反正有“第一病”的人不行。

小熊 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纯真的肯定也跟这类似吧。

鹤见 是的。后来成了中核派干部的北小路敏,在到处躲藏无处可去的时候还在我家里住过。对中核派的活动我没什么好评,就是喜欢那种黑社会式的家伙(笑)。只要是好家伙,其他派的人我也会帮的(笑)。

说起来,北小路去年还是前年还给我来过信。是他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妻子着实很支持他,还去当过女招待什么的。北小路一直看护她到去世,非常伤心,就给我写了信。我也给他写了信,就很直率地写的,说跟你当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执(中央执行委员)时所做的事相比,你失去了支持自己的妻子而感到悲伤的情绪跟我的心是更近的。

我既不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正确,也不觉得它能够实现。但我对北小路是抱有好感的。他很有能力,如果去做世俗的工作能上到很高的位置。但他放弃了这种道路,一直在搞运动。

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很多这样的人。委员长唐牛健太郎在“60年安保”同盟解散后喝酒度日早逝了。总书记岛成郎到冲绳去当了精神科医生。是什么时候来着,我去冲绳的时候他还跟我联系,请我吃冲绳面。不过他最近也去世了。他们都是不错的家伙。

小熊 西部迈先生怎么样呢?他当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理事,成了一个保守论者。

鹤见 西部也不是个坏人。不过,他在对左翼运动感到幻灭之后就迅速抬出了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开始说保守什么的,但我根本不觉得他那时认真读了切斯特顿,也不觉得他现在好好读了。倒是他的美洲游记《走进海市蜃楼》(中公文库)等等,这些随笔还比较有意思。

上野 那文章不错。

鹤见 他文笔也好,也写过关于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很到位很精炼的文章。他还是有这样的实力的人。

小熊 这个人虽然在批判大众社会,但他本人是出身于北海道的庶民家庭而不是东京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点在您这里加分了吧?

鹤见 是。庶民出身的人,我是会支持的。

小熊 您说西部先生基本上是个好人,也是个比较有能力的人,这我也是同意的。但是,那他为什么去弄什么“编撰会”了呢?

鹤见 啊,要说实话,那家伙是个轻率的人。

上野 确实(笑)。

小熊 西部先生是这样,还有先前您提到的上坂冬子女士也是出身庶民、您评价很高的人,可为什么他们都跟您志趣不同,走到保守那一边去了呢?

鹤见 嗯,关于上坂冬子现在的评价,就只是觉得我喜欢一根筋的人,不是这样的家伙就不喜欢。对她的评价标准也只是如此而已,并不是根据保守还是革新而来的。

上野 不问方向、不管一根筋地是往哪里去的感觉啊。

鹤见 现在是成了这样的了。

上野 评价人的时候不问政治方向而是看这个人的态度,这种感觉也不是不能理解,可要是成了不管往哪里去都无所谓的话……

小熊 您对小林善范有段时间也评价很高,说是来自庶民的对学历社会的批判。可他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左冲右突的。

鹤见 啊哈哈。真抱歉(笑)。那是因为觉得他的《直奔东大》画得不错。

小熊 那些“一根筋”虽然可能是轻率的人,但我觉得这满值得研究的。

我觉得,本来因着“讨厌撒谎”的纯粹而走到保守一边去也不是没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左派虽然高扬着理念,但也还是有政治的东西,所以谎言啊、跟理念的差距啊就显得很突出。与此相比,日本的保守阵营没有理想,就是直截了当的赚钱主义,

所以反正看起来像是没有说谎的样子(笑)。

有理想的话,跟现实之间有差距是当然的,要是因为觉得这是欺骗而无法忍受,就只能像本居宣长那样“抛却汉意,回归真心”了。由此变成主张去知晓在“现实”、“传统”、“生活”面前人之理性的渺小也是当然的。这样一来,在政治上就很容易趋向保守。据我所见,富于感性而纯粹或者说天真的人在年轻时采取攻击“大人世界的谎言”的过激姿态,到上了年纪以后又变得保守,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鹤见 所以呢,不要太顽固、太钻牛角尖了(笑)。轻率的人觉得应该去爱那个东西,却认为只要有谎言错误就绝对不行,这么执迷是不好的(笑)。想完全归于没有“谎言”的状态,在现实当中是办不到的。要做就只能去自杀。

小熊 这是您最大的矛盾之处吧。还有昨天说起过的问题,您是喜欢在战争中纯真地去献身的少年士兵还是那些差不多混日子的老兵呢。您本来喜欢纯粹的人,但实际上也有着从父亲那里来的政治直觉,是不会去轻率行事的吧。

鹤见 那我是个坏人的嘛(笑)。要说这是矛盾的,也确实是这样……

上野 小熊君很急于要个解释啊。我好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笑)。

小熊 对不起啊。可能我还年轻吧。

上野 刚才的问答很有意思吧(笑)。

鹤见 哈哈(笑)。

小熊 上野女士,您处在不得不要去这样说的立场,您对此是怎么想的呢。

上野 就想,啊,我老了啊(笑)。是积极的意思哟。

小熊 是吧。是很想变老的那种。

上野 对。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做过很丢人的事啊……这样的。大家休息一会吧?我买了和式点心,要不要试一下?

亚洲问题与鹤见良行

战后思想的空白

小熊 点心很好吃。这次真是承蒙上野女士的细心照料。

鹤见 就是啊。是那位上野千鹤子女士的照料啊(笑)。

上野 我这里也有被身体化了的性别规范啊(笑)。然后也不是没有作为编辑的能力,也编过《女性学年报》(日本女性学研究会)、《新女性主义评论》(*New Feminism Review*)(学阳书房)。小熊君原来也做过编辑,鹤见先生也是《思想的科学》的方家,感觉这次是三个编辑聚在一起了。小熊君,能给我点茶吗?

小熊 啊,我过去也老是倒茶(笑)。座谈会啊研究会啊什么的,都会来很多很厉害的先生不是嘛。日高六郎先生、山住正己先生、坂本义和先生、阿部谨也先生,还有很多先生我都给倒过茶。

鹤见 我过去在二十年代初的时候,也是坐在那些大人物的旁边。当时我觉得大宅壮一很了不起。是从人的内心、根本上去看他的,跟金钱名誉上的评价不一样。

小熊 我以前也是,十几个知识分子开会,我去倒茶或者送盒饭的时候,就会看谁吃完后会自己收拾饭盒、谁就等着我来收拾什么的,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上野 原来如此(笑)。看谁在你倒了茶之后会看着你说“谢谢”什么的。

小熊 对于二十三、四岁的小办事员来说,这样的事是印象深刻的吧。也会去看这个人,对无名小卒是什么样的。

鹤见 这是很重要的。是关乎人的本质的。

上野 那我们还是继续关于六十年代的话题吧,在谈到全共斗、越平联之前,1965年是缔结了日韩条约的。关于殖民地的事情从昨天起就没有说过,不然就从这里开始吧。

小熊 稍微往前追溯一下,战败初期人们跟朝鲜人的接触是很多的吧。像小田实先生他们也是到黑市去找朝鲜朋友玩,这些体验跟后来与朝鲜的关联也是相关的。您有这样的经历吗?

鹤见 坐汽车的时候有遇见过。有日本人对一名男子有轻侮之举,我站起来去帮他,发现那是个朝鲜人。

然后我本来想去护着他,但那位朝鲜男子说“我也会格斗术”(笑)。嗯,他也是谢了我的,但我当时真是没话说了。就是说要打架的话他有信心打赢,是在自我克制的。

小熊 原来如此。很不错的故事啊(笑)。

上野 之前听您讲了在船舱底遇到朝鲜慰安妇的事,那日本把亚洲当作殖民地来支配的状况,您在战争期间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我觉得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毫无意义。我就觉得,正是这样日本对朝鲜、台湾的支配才必然要倒台的,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明白呢。在爪哇听到新德里的广播节目很好,就是因为策划节目的乔治·奥威尔注意到了这一矛盾之处。

是怎么个情况呢,印度独立运动领袖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为了反抗英国而远涉重洋,在柏林播送自由印度广播。鲍斯以前留学英国,对英语文学很有研究。他甚至连日在节目里不加删节地播送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那是很有说服力的,会英语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就开始听他的节目。奥威尔很困扰,就到福斯特那里去,拜托他说不管是什么都行,请来就一部英语文学作品简单说几句吧。在这种对抗关系和矛盾当中,奥威尔广播节目的质量提高了,不过在日本是没有这些的。

小熊 与此相关,想请您讲讲您的外祖父后藤新平先生。他作为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起用了新渡户稻造等人,奠定了台湾统治的基础。您1960年写的论文《日本的折衷主义》对新渡户稻造有相当高的评价。不过,新渡户针对台湾统治提出的《糖业意见书》主张强制种植甘蔗,《后藤新平传》里写到了在采用该意见书时的插曲,您提及时也是肯定的。那是不是在五十年代,您还没有关注到台湾统治的暴力性这个问题?

鹤见 这样讲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过去也没有去台湾。其实是在逃避的。最后是十几年前才终于去了一趟。那次也去了1933年雾社事件的发生地雾社,那里的人们是高砂族^①当中最有自尊心、承载着出色文化的代表,是因为不堪忍受日本巡察的侮辱揭竿而起的。

所以过去在逃避这些是事实。东南亚直到现在也还是不能去。

小熊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您是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去明确思考朝鲜人问题以及对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的支配问题的?

1966年有这样一个事件:韩国士兵金东希表示不想去越南打仗,并逃亡到了有和平宪法的日本。当时日本政府以非法入境为由将他关押在九州的大村收容所。您在涉及该事件之后就一直在参与跟朝鲜相关的问题。但此前虽然对这些问题也有所关注,却没有把它们当成是很大的思想上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吗?不过这是日本思想的整体倾向,也并不只是您一个人的问题了。

鹤见 也可以这么说。在那以前,我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对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评价上了。所以在朝鲜、台湾问题上落后了的,这在五十年代的“变节”共同研究中也有所表现。

就是说,在研究日本知识分子的变节时,是将他们与纳粹政权之下的德国人、意大利人进行了比较。《变节》下卷的座谈

^① “高砂族”是日本殖民时期对台湾原住民族的称呼。——译者

会上也主要谈及的是欧美知识分子的变节行为。但是,跟中国、印度、朝鲜就没有进行比较。当然也没有台湾。

但在书写完以后,以前从未谋面的金达寿送来了他写的《朴达的审判》。我看了以后很惊讶。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朝鲜人,在被韩国警察抓住以后就很快“自白”,被释放了就继续开展活动,这样反复了很多次。这样的人在日本的知识分子当中是没有的。

后来我跟金达寿初次见面时,就跟他说书很有意思,结果他说:“不请鹤见先生读读这本书的话不行啊。”就是说,他是要表达对《变节》三卷的批评才写这本书的。他是想说,是可能存在其它形式的“变节”的,通过那种反反复复的“变节”,从更长远来看就不再是“变节”了,是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过程的。固定一种形式、认为只要把纯粹贯彻到底就行,并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是如此的话,受到强大的冲击就会啪一下折断的。

这一点我从金达寿那里受教匪浅。这种视角在我们的三卷书里是没有的。不加入大众或亚洲的视角,就没有那样的“变节”论啊。

小熊 我研究战后思想史的时候就在想,朝鲜台湾问题为什么直到六十年代末才作为问题而出现呢?

跟朝鲜人的日常接触在战败初期一直都有,日本共产党里也有很多朝鲜人,既然有这样的背景,为什么那些问题却没有被问题化呢?当然,当时人们生活贫困,战争期间的记忆也还很鲜明,还有很多其它的事情要讨论,可是,就算是这样,那到底又是为什么呢?而且,1950年前后竹内好先生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很早就作为问题出现了,那为什么朝鲜却没有出现呢?

上野 而且从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起,朝鲜人就失去了日本国籍。此前暂时规定的是双重国籍,但这样一来他们选择日本国籍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但这当时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也都没有被当作问题。

鹤见 当时占领军的贝雅特·西洛塔·戈登他们起草宪法的时候,是

想要写成适用于“all natural persons”的条文的,在范围上是包括朝鲜人问题的吧。但是日本方面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从战前、战时开始,中野重治等人就提出了朝鲜人问题,但却没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小熊 说到这个问题,战败后的日本不论是政治势力还是知识分子阶层都是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把朝鲜人的问题问题化的是日本共产党及其周边人士,这是历史事实。中野重治、石母田正他们从1950年左右起就对朝鲜人问题有自己的关注。要说这是因为他们在日本共产党内会接触到朝鲜人,所以当然有关注,也确实是这样;但像丸山先生或您这样跟日本共产党保持距离的人们几乎都没有关注到这些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鹤见 丸山在战争期间写的论文《“自然”与“制作”》1952年收入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后来该书的英文版序提到了朝鲜。他说这篇论文在讲日本儒学的发展史,却没有涉及朝鲜儒学对日本的影响,这是本书的缺陷。好像他后来跟韩国留学生研究过这个问题,不过并没有写成论文。

竹内以前说:“朝鲜问题比中国问题难啊。”声援要被韩国处以死刑的诗人金芝河的时候,还有后来声援金大中的时候,我到韩国大使馆门前睡帐篷抗议,他就这么说着,给放下些钱什么的。

小熊 但那是在七十年代了吧。还是说在战败后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被问题化。那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为什么呢?

鹤见 虽然很不想说,但在日本人当中从明治中期起就一直存在对朝鲜人的歧视,不论在左翼还是右翼都是存在的吧。

小熊 也包括您自己在内吗?

鹤见 是的。所以我也是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深入到那一方面的。

小熊 还是就归结于一句“歧视”了吗?

鹤见 这个啊,“他们很可怜、歧视是不好的”这样的感情以前就有。但不再只是单纯的怜悯或正义感,而是在内心深处去思考这个问题,在那以前是没有的。像日本共产党那样觉得是一起投身

运动并肩作战的同志是一回事,但并没能意识到那其实也是自己的问题。

与韩国的关系以及金芝河

小熊 那反过来说,为什么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就不再歧视了呢?

鹤见 很讽刺地说,是因为韩国变得富裕了。过去日本人的态度就是歧视朝鲜人是没钱的“棒子”,要不然就是同情他们。不过,有钱的日本人看不起没钱的朝鲜人,没钱的日本人也歧视比自己还穷的朝鲜人。

即便如此,也有像战前跟朴烈在一起、后来在狱中自杀的金子文子这样的人。她连小学都没有好好上过,却写出了那样的狱中手记,真的是一位孤独而立的知识分子。人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像她那样的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小熊 这样说来,韩国在一定程度上富裕起来是原因之一:这样一来“没钱的日本人轻慢比自己还穷的朝鲜人”的情况就不成立了。那如果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因为日本在高度成长以后变得有钱了,也就没有必要靠歧视来支撑自尊心了?

鹤见 也可以这么说吧。虽说八十年代的时候,有钱的日本人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说什么美国人很小气,表示很看不起,所以也不是只要有钱歧视就消失了吧。不过,等日本人又没钱了以后,歧视可能也变得更严重了。但“没钱的台湾人、没钱的朝鲜人”这种侮蔑的态度是消失了吧。

上野 因为韩国也变富了。这样韩国终于变成了跟日本竞争的外国了吧。在此之前是不会被作为外国而承认的。所以是可以去歧视的。

鹤见 是。就被看作是像没钱的日本人、有点低等的日本人那样的人。尤其是还被看作没钱的日本人可以随便侮蔑的对象。

小熊 我去读总督府和日本政府关于朝鲜统治时期的档案,就觉得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没有什么是在统治另外一个国家的意识。

很多时候都是把对方看作是贫穷不开化的乡下。所谓同化政策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鹤见 我想有这个可能。

小熊 那么由此说来,把韩国正式作为外国看待,还是以1965年的日韩条约为契机的吧?

上野 是这样的吧。啊,不该由我来答的(笑)。

鹤见 恐怕是这样。但我也并不是很确定。不过可以说人们开始意识到朝鲜人问题是从那以后开始的。

小熊 但是印象里您在六十年代之后也没怎么写过亚洲问题。竹内先生从1950年前后就以中国为起点提及了亚洲的问题。您对竹内先生感觉意气相投,那为什么自己没有去写亚洲的问题呢?

上野 是啊。我也有这样的印象。

鹤见 我不写自己没信心的题目。三木武夫不是说过“无信不立”吗,他说的是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不会去竞选,不过我是借用这个说法,自己内心没有想法的东西就写不了。要去写亚洲,对我来说很难。

小熊 为什么呢?

鹤见 我没有写这个问题的方向感。比如说,我会对甘地、泰戈尔有共鸣,也会很关注。但关于甘地就只写过一篇书评。

上野 对您来说,第一外国首先是美国,对它也多有论及。但印象中关于韩国就没有发表过言论。

鹤见 关于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写过几次。这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开始意识到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参与了各种活动以后了。不过关于韩国或朝鲜本身就不怎么写得了。

上野 对于法国知识分子而言,阿尔及利亚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但对于日本知识分子而言,韩国是这样的吗?

鹤见 开始变成这样了吧。但不能说是很大的。

小熊 您说爪哇可能这一辈子都不能再去了,那韩国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呢?

鹤见 就是小田实说“你去吧”(笑)。就突然给我下了个命令,叫我去见金芝河。

我就到韩国金芝河被监禁的病房里去看他,他很惊讶的样子。因为一个素昧平生的日本人一下子出现在面前了嘛。

然后我就用英语跟他说:“这是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反对处你死刑的签名。”金芝河不会说日语,英语也不怎么会。但他用碎片的英语说:“Your movement can not help me. But I will add my name to it to help your movement.”(你们的运动帮助不了我,但我要签上我的名字来帮助你们的运动。)

小熊 这很了不起。

上野 完全是从平等的关系出发说出的话。既不是依赖对方,也不是看轻对方。而且能让人感觉到面对整个世界的意志。

鹤见 这是个了不起的人啊。是超出了朝鲜人、韩国人这样的界限,作为人本身的那种了不起。如果是我的话,在快要被处以死刑的时候,有个外国人拿着收集来的签名突然造访,我会说什么呢?可能就只顾得上说“Thank you”、“Thank you”吧。

而且他不怎么会英语,就只用最简单的英语说了这样的话。毫无赘言、独立存在。我觉得他真是个诗人。

后来十多年以后,他终于获释来日本访问,还到京都我家里来了。他说要是只在外面见一下说声谢谢,总觉得过意不去。这可能是传统儒教的礼节,但他也是有那种仁义的人。

跟这样的人相处,就完全不是那种抽象地说不能歧视朝鲜人啊、朝鲜人很可怜啊的情形,是超出了这些的。会有那种想法的我们才是可怜的(笑)。不能判处这个人死刑,这样的想法是超越了朝鲜韩国这些范畴的。

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会去写跟自己有这样的关系的金芝河的事情,但不怎么会去抽象地写朝鲜或韩国的事情。这种写法我是写不了的。

鹤见良行其人

小熊 说到亚洲,我想请问您对鹤见良行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没想到他能成为这么了不起的人(笑)。

上野 哈哈(笑)。

鹤见 他是我的堂弟,打生下来就认识了啊。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才十几岁,觉得还是跟在我后面走的小孩子呢。

小熊 战败初期在《思想的科学》的时候,您跟良行先生一起去采访睡在地下通道里的人们的“哲学”。

鹤见 是啊。他的变化是受了越平联的影响。

小熊 很多人都回忆说,刚参加越平联的时候,良行先生说着流利的英语,戴着领结,留着小胡子,给人的感觉是个风度翩翩的国际派精英。

鹤见 他是东大法学部毕业的,又生在美国有美国国籍,还当过洛克菲勒跟日本的财阀一起创办的国际文化会馆的企划部长。他喜欢讲英语,用英语讲起话来很是生动活泼。

但加入了越平联的活动以后,他就开始援助逃兵了。逃兵发表声明的电影片就是在他家拍的。

上野 真的啊?

鹤见 拍的时候注意不让人看出来这是在哪,不过要是被发现是他家,他就不能再呆在国际文化会馆了。他是赌上了自己的工作的。光是从事反越战运动这一点,在亲美的国际文化会馆里就要顶着巨大的压力。他就这样冒着丢饭碗的风险从事反战运动,后来写的东西也变了。

不过在越平联期间他虽然也写国际关系和反战运动的论文,但后来关注点渐渐转到亚洲问题上了。这最开始是作为国际文化会馆的工作来做的。

本来国际文化会馆主要干的事情就是从美国、欧洲请知名人士来做演讲。但越战爆发以后,也有人慢慢开始觉得不能不

重视东南亚。良行 1964—1970 年在那里担任企划部长,就以此背景为契机,策划了派遣日本的优秀学者去东南亚的项目。他自己也去了当地做调查研究。这样就把工作跟自己的关注点结合起来了。

上野 是啊。国际文化会馆在六十年代之前确实是亲美一边倒,但从八十年代后就把目光转向亚洲了。这一潮流的源头就是良行先生吧。

鹤见 后来他辞去了国际文化会馆的工作,到亚洲各地去考察。他能做到这件事,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个好太太。

上野 是位跟亚洲有渊源的夫人吗?

鹤见 不是,不过他太太是绝对不会在屁股后面追着要他上进,说什么“你啊,东大法学部毕业的应该更出世一点嘛”之类的话的(笑)。他放弃精英路线,辞了国际文化会馆的工作,他太太也什么都没有说。

良行到了晚年身体变差了,后来亚洲去都是他太太陪着一起的。他在晚年所做的工作是很不错的。

小熊 良行先生关于亚洲的作品都是在 50 岁左右到去世这段时间里爆发式地写出来的。

鹤见 是的。然后现在出版的良行著作集,他太太也在帮着编辑。特别是田野调查笔记这些。很了不起的人。不过说实在的,良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没能发现这一点。

上野 不管长到多少岁,人都蕴藏着改变的可能性啊。

鹤见 他在《红树林的沼泽地》里实际展现了,是有不成立国家的群体存在的。通过书写世界的历史,揭示了不能忽视的事实。

不过,那虽然不是国家,却也可以说是“国”。日本现在也在说地方分权什么的,就是“国”的复活吧。这样的“国”超越国家联结起来。用羽仁五郎的话说,就是自治都市的联合。

我想良行的这种视野是受了竹内好的影响。他自己创办了旨在增进对亚洲了解的学校(人称“良行学校”),就请了竹内来。竹内在讲“国民文学”等等时所说到的“国”也是这样的。

全共斗·三岛由纪夫·联合赤军

全共斗时代

上野 说到六十年代后期,您这边的越平联里有很多年轻人也是全共斗的成员吧。全共斗也反对越南战争,但跟越平联不同,采取的是激进暴力斗争的方式。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全共斗也是在那个时期像从地下涌出的泉水一样广泛扩大的运动。当时有年长的人们认为那种东西在理论上是脆弱的,不值一提。嗯,他们在理论上也确实是脆弱的,但我是不会去这样批评他们的。不过他们的方式跟越平联不一样,而且是以大学为对象的,就是跟他们保持着一种友军的关系。

上野 彼此有合作吗?一起组织游行、集会的情况也很多吧。

鹤见 集会这种虽然也可以一起办,但这种场合要是起了内讧,或者有那些只为本派做宣传的家伙就难办了。

要说比这更具体的合作,全共斗运动中有很多人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不是有“青医联”(青年医师联合会)嘛。医学部的学生或者年轻医生来给在游行示威中受伤的人治疗。有一次在京都,越战逃兵们打架,有人受伤了,玻璃扎进手上很深,必须要做手术。又不能叫本地的医生过来,我太太就跟青医联的人联系,没用国民健康保险,给伤者做了手术。

上野 夫人们果然都很了不起啊(笑)。不过这些贡献都不会被记录

下来吧。

鹤见 是什么记录都没有。不过那时校园斗争开始有了青医联，非常有帮助。

上野 其实我在京都大学跟山崎博昭君是同一级的。

鹤见 就是那位山崎君？他 67 年 10 月在羽田死去的时候我也在场，在对岸看到了他的死。

小熊 抗议佐藤荣作首相访问南越的第一次羽田斗争，山崎君的

死给了当时的学生们很大的冲击，也被认为是 68 年反越战运动和全共斗运动的导火线。

鹤见 他是在到羽田途中的桥上死去的，那边有两条堤坝，他死的时候我就在他对面的堤坝上。

小熊 对山崎君的死有两种说法，有人说他是被警察机动队打死的，还有人说是在混乱当中被学生抢下驾驶的警车轧死的。

鹤见 当时学生跟警察机动队混在一起，完全是一片混乱，我只看见有车交错而过，然后山崎君就倒下去了。

上野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游行就是在京都参加山崎博昭君的追悼游行。一个月之后，11 月 12 日的第二次羽田斗争，我就去羽田了（笑）。

鹤见 哦——

上野 不怎么想说起这些事啊（笑）。

鹤见 山崎君死去以后，京大的学生来找我，说要举行追悼集会，要我参加。他说跟京大的教授们说过，但谁也没有响应。——不过最后京大也有井上清等几位教授出席了。我没有办法，就在京都和东京山崎君的追悼集会上都做了演讲。

上野 全共斗在那以后趋于过激，您还一直认为他们跟越平联是友军的关系吗？



1962 年时的鹤见俊辅

鹤见 我一直觉得是友军。不过对方有很多时候不是这么看的。有人批评说,越平联之流就是小资产阶级文化人,卖着免罪符、干着不负责任不彻底的事。

上野 作为大学教师,您对全共斗是怎么想的呢?全共斗从一开始就主张大学改革,但实际上成了没有目标的运动,只是打着自我否定、解散大学之类的口号,成了表现型的运动。那您在大学里作为教师是怎么看的呢?非常希望您能讲一讲。

鹤见 那时我还在同志社大学工作。当时丸山受到东大全共斗的冲击,说他是骗人的战后民主主义的象征、旧式权威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的。结果丸山身体不行了,71年就退休了。所以那些是很令人困扰的。

对我而言,丸山跟竹内一样,都是能让我感觉到仁义之情的人。就像竹内辞去大学教职我就会响应,对丸山我也是一样的感受。但这并不是说因为丸山被全共斗敌对起来了,我就要跟全共斗敌对,这是不行的。

小熊 为什么不行呢?

鹤见 因为我是站在学生而不是教授的一边,这是我的立场(笑)。大学教授东大教授全都是敌人,是这样的立场。所以我也能理解全共斗所说的,但对丸山受到非难感到很困扰。

上野 您没有觉得这些家伙们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鹤见 所以我说“你们这样会被阎罗王拔掉舌头的哟”(笑)。他们要是来找我就会这么说。不过在同志社我也给学生们自己办的讲座演讲,全共斗封锁校园的时候他们也都让我进去。来做讲座的元老级人物是和田洋一,他战前是《世界文化》的同人之一。山田庆儿他们也在。

小熊 据说您是反对引入警察机动队驱散全共斗的。

鹤见 是的。因为都是一直在教的学生嘛。要是教授自己打他一巴掌、骂“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也就罢了,但叫来机动队让他们打就违反江湖道义了(笑)。

所以可能学生也就没有讨厌我吧。全共斗占领校园,把教

授们的研究室弄了个底朝天,但机动队把学生们驱逐出去以后,我回研究室一看,我的屋子一点没给弄乱。

上野 原来如此。

鹤见 然后我就想,这下可坏了,别的教授的屋子都给弄乱了,就我的没弄乱,跟教授们的关系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了。于是就很快递了辞职信,70年3月就离开学校了。

上野 这是正确的判断。

鹤见 不过我自己也有点不对劲。去开教授会的时候,直到前一天还在反对引入机动队的教授们一下子都变了说法。我就觉得在满座的教授那里都看到了我父亲的脸(笑)。所以就觉得那只能辞职了。

上野 您是怎么跟您夫人贞子女士说辞职的事的?

鹤见 我根本没跟她商量过。但我跟她说“辞职了”的时候,她跟我说:“我之前就在想,要是你不辞职的话会怎么样啊。”就是她觉得要是那么下去我又会抑郁的。她是很了解我的(笑)。

到此为止,我跟大学就缘尽了。后来72年墨西哥请我去做过一年客座教授,在加拿大也讲过学,但再没有在大学里担任过全职教师。

上野 那就是对全共斗不太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

鹤见 不,是没有办法的了。他们会撒谎,是会被阎罗王拔掉舌头的一群人,还不负责任地发表过激言论,越平联几乎都要受到牵连。这是很让人困扰的。不过虽然困扰,“这么个东西就跟它断绝关系”这样的话,我是不会说的。

上野 好像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不过我还是想请问您,全共斗没有具体的目标,成了空中楼阁的运动,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作为政治运动是不好的。但是跟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其中也还是有不错的家伙的。东京医科牙科大学也有医学部斗争,最初的推动者就是后来在《思想的科学》上连续进行自我解剖的上野博正。他以全共斗“解散大学”的主张为重,虽然那么优秀,但一辈子也没去拿博士学位。这种有清清楚楚的责任意

识,或者说是有黑社会道义的人是很好的。

三岛由纪夫与对死者的评价

小熊 您是觉得,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好,全共斗也好,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可能表现拙劣,也未必有自己的目标,但有些不错的家伙还是很不错的。

那如果跟前面说到的有关战争的话题扯在一起,对于那些抱着纯真的必死的决心去冲锋的少年士兵,会无条件地跟他们站在一起,您是有这样一种倾向的吧。因为与这些赴死的少年的纯粹相比,并不纯粹却在活着的自己感到愧疚。关于刚才说到的山崎博昭君的死,您在那以后也写了一些文章。

鹤见 我觉得像山崎博昭还有桦美智子这样的人都很了不起。他们比法西斯的少年士兵更具有善的动机。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部落解放运动、最后因为哮喘病发作死去的柴田道子也很了不起。他们是在这样地活着,是让人愧疚的啊。他们死去了,我却还活着。

小熊 还是一种愧疚的心情吗?

鹤见 是一种愧疚的心情。

小熊 那您当时对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是怎么看的呢?

上野 我也特别想听听您的看法。

鹤见 当时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消息马上就来家里通知我。我就想,“啊,这下媒体会打电话来采访的”,于是马上带着孩子出门了。我家附近有个北野神社,那天正好是“缘日”,有各种活动。我就跟孩子一起吃点心什么的,过得很愉快。这样在附近到处逛逛,就不会被记者逮住问“您怎么看”了不是嘛。就这么过了一天,等日报的截稿日期过了,也就不会有人来采访了。

上野 您什么都不想说。

鹤见 嗯。当时有些左翼青年会冒出些“让三岛给抢了先”这样的话吧。那时候学生们就是一股单纯的想法,是一种觉得向前冲直

到死就很伟大的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说什么。所以关于三岛的自杀我没有发表任何感想。就逃了。

小熊 不过您是怎么想的呢?现在能说说吗?

鹤见 当时我的反应不是像能登在报纸上的谈话那样的啊。我对三岛是抱有好感的。他以自杀证明了自己并不只是个想要出风头的人。这就是我的感想。最后就是觉得那是个不错的家伙了。

说起来,三岛在后期主动跟我接近了起来。但我都没有回应。也没去过三岛家。不过我觉得他的《春子》、《喜悦之琴》还有《近代能乐集》都非常好。

但我为什么对三岛有好感,日本的报纸杂志是不会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关系好,一定不会有好事情。是会被利用的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没那么密切挺好的。

上野 您对三岛是这种感情,我头一次听说。

鹤见 关于三岛我没有写过成形的东西。

小熊 作为差不多属于同一代人的“战中派”,对他有没有共鸣呢?

鹤见 那就完全没有。三岛也有像《忧国》这样的作品,我就不喜欢。而且三岛很不足取的地方是美化贵族。我从小就生活在被叫做贵族的人们中间,不管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还是从统计上来看,日本的贵族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很不堪的。只偶尔有些零零星星的例外。但三岛却不这么认为。他这一点我觉得不怎么样。

小熊 吉本隆明先生说,在得知三岛的死讯时,他有种很强烈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的感觉,想起了参加特攻队而去世的跟自己同辈的青年。但与此同时,他又觉得三岛的政治声明和辞世诗“不怎么样”。是既有共鸣又有反感两面的,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鹤见 切腹自杀可不是只为了出风头的人能够做到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大概有五次自杀未遂,但没有真正100%确定地自杀过。

当时丸大楼就算是高楼了,要是爬到楼顶上“梆”地跳下去就肯定会死,但我是做不到的。割腕弄得到处都是血但止住了,也试过吃安眠药或者吞烟草,但心里觉得很恐怖,就做不下去了。说到底这都只是觉得活着太痛苦而不是真的想死,都只是无所适从的挣扎。

但三岛超出了这个范围,从想死到死去,他表现实行了。这在只是自杀未遂的我看来,就会觉得“比我强,有始有终地做到了。了不起的家伙。不错的家伙啊”(笑)。

上野 让可能会说出这些话的自己远离报道的漩涡了。

鹤见 我是很狡猾的啊。是一个坏人。

小熊 顺带也请问您一下,后来99年江藤淳的自杀,您是怎么看的?

鹤见 江藤淳在“60年安保”的时候写过批判进步派的文章。我觉得是把我没法写出来的感受直率地写出来了,所以对他是有好感的。不过后来他写的什么国家这国家那、什么父权复归之类的,我就觉得不怎么样。

但99年他追随夫人而自杀,我还是觉得,是个不错的家伙。因为是追随夫人真的自杀死去了,那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啊。

小熊 从昨天开始,作为参照,我常常会把丸山先生和您进行比较。包括全共斗在内,您是对那些纯真赴死的少年少女抱有强烈的同情的。但在丸山先生那里就不怎么看得到这样的部分。或者说,他不愿诱发自己内心的狂逸之气,强调政治不是心情伦理而是结果责任。所以就会认为三岛自杀、全共斗这些作为政治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吧。我感觉,恐怕您跟丸山先生在对全共斗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吧。

鹤见 是的。可以这么说。

小熊 丸山先生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吗?

鹤见 丸山嘴上说政治是结果责任、自己是实用主义者,但他本人完全不是这样的人(笑)。

小熊 啊,这倒是吧。

上野 您刚才说的真是名言(笑)。

鹤见 你别看丸山,他喜欢军歌什么的呢(笑)。

小熊 啊,真是这样吗?

鹤见 嗯。会哼着讲日俄战争旅顺之战的军歌什么的。

小熊 再跟其他人对比的话,大江健三郎先生好像也对1960年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少年山口二矢抱有同情。大江先生说,理性上会认为他的方向是错误的,但他在17岁的年纪就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然后果决地自我了断了,这种果决自己是比不上的。大江先生在战时也曾经是个皇国少年,我觉得他是为了将会被这些事情牵动的自己相对化,才写了《迟到的青年》《17岁》等等。那您对山口二矢有同情吗?

鹤见 会很强烈地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人。对唐牛健太郎、北小路敏、岛成郎他们也是一样的。

上野 是对他们的纯真评价很高吗?

鹤见 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把社会评价上升到很高,但我不想这样做。我觉得这些人自己就了不起。

上野 不问方向吗?这样的问题追问了好多次真是抱歉,但就算是山口二矢也无所谓吗?

鹤见 就是觉得,这么年轻宝贵的生命就用在这里了吗。

上野 那目标上是有价值轻重的吧。

鹤见 有。所以我小学时的朋友一宫三郎说要报名参加海军的时候,我对他说“别那么着急比较好”。

联合赤军与“警探小子民主主义”

上野 在全共斗退潮、三派全学联分裂以后,就陷入了内斗和恐怖的时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到了这个阶段就必须要有逃走的器量了。曾任社学同系全学联委员长的藤本敏夫碰巧是我课上的学生。据他说,到了内斗时期,本来是对立派别要派来杀他的学生给他打信号,说你还

是快逃吧。对方也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争斗。

然后他就逃到九州去了,最后被警察逮捕进了监狱,但他人狱期间内斗愈发惨烈了,也算是躲过一劫。我觉得他能下决心逃走并付诸实践,是相当有器量的。

上野 那如果是不会逃走、继续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人呢,您怎么看?像制造劫机、炸弹恐怖事件的人呢?

鹤见 我是个怀疑主义者,所以没有那种人就必须要这样生活的普遍性的思想。所以就没办法有什么评判的标准。

上野 还有“弱者的恐怖主义”的问题。就像巴勒斯坦,除了恐怖主义就没有其它抵抗的方法了。

鹤见 有一点要说的是,要分辨恐怖主义是否会牵连到完全无辜的人,就是说,要仔细区分恐怖行动的对象。这是从民粹主义开始就有的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故事吗,俄国有一些民粹主义者搞恐怖行动暗杀俄罗斯大公,但看到大公旁边有小孩子,就中止了行动。我认为民粹主义者的这种决断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把自己恐怖行动的对象看作数字,而是要仔细区分,然后不去杀无辜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由此而成立的。

上野 您对暴力行动和武装斗争都是这样的看法吧。那能不能再请您讲讲对联合赤军事件的看法呢?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个事件是个心灵创伤。

鹤见 关于劫持人质枪战的事件,就是刚才说的那样。而且他们以“总结”为名把自己人都杀死的私刑事件是很不像话的。为了不被卷入这样的事件,平时就要注意看人啊。

比如说,要是跟竹内一起,那辞了教职都可以。但要是我父亲,他当了大臣就一起支持他吧这样的,我是不干的啊(笑)。我是这种黑社会。

上野 就是说,您从这个事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没有眼光,分辨不出能作为同志相互信赖的伙伴?

鹤见 没有眼光。但就算到了那个程度,也还是可以挽回的。可以尽量去逃走。接到命令要把自己的同伴处死,可以逃走啊。

上野 但是联合赤军的人们为了大义理念选择不逃走。

鹤见 不应该根据所谓的大义这种抽象之物来做决断。人是没有进行这种判断的能力的。跟谁可以一起行动,应该要认真去看这个。

我决定跟竹内一起辞去教职的时候也没有时间思考大义什么的。就觉得,如果是跟竹内一起,就算最后吃亏倒霉也没关系。就只是这样。联合赤军会这样去想自己的同伴吗,我表示怀疑。如果他们是这样想的,就不会把同伴杀死了吧。

小熊 这次座谈中我一直在想,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能抛弃为大义而赴死的纯真的少年少女们”的伦理。不只是您,这是有着战争记忆的年长一代共通的想法,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内在支撑。所以对特攻队的追悼和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共斗的共鸣是并存的。

那我想请问您,如果一些纯真的少年伤害了其他纯真的少年呢?比如说内斗,还有69年立命馆大学全共斗砸毁了纪念战歿学生兵的“海之神像”。他们说那种东西不过是骗人的战后和平主义的象征。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我没有像“海之神会”的安田武那样去批评全共斗。当时一说起这件事,就有人公式化地认为批判砸毁雕像的全共斗就是亲日共的立场。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

小熊 出现这种公式化的认识是很不幸的。

鹤见 “海之神像”所在的立命馆大学校长末川博先生也没有明确表态,我想他也是很为难的。不过我是在想,不把它砸毁也可以吧……

小熊 还有,如果说“不要抛弃为大义而赴死的纯真的少年少女”的伦理是战后思想的核心之一,那在联合赤军事件之后也就终止了。在那以后,为了某种理念去死是没有意义的、跟“为公”相比“利己”才是更重要的,这样的想法越来越普遍了。联合赤军事件发生后不久,吉本隆明先生的演讲《战后思想的颓废与危机》正是这种旨趣的吧。

上野 与此同时，“跟男性的‘大义’分道扬镳”的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登场了。是主张“私”比“公”更重要、作为“女性、孩子”的思想的妇女解放运动。

小熊 然后在七十年代，您对漫画《警探小子》评价很高，提出了“警探小子民主主义”的说法。那个只对钱和性有兴趣的少年警官象征着私利私欲所支撑的民主主义，为大义而死什么的想都不要想，所以打仗也不会去，是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我想加藤典洋的“从肯定私利私欲出发”是继承了您的这个部分。

鹤见 《警探小子》不管怎么说很有意思的。

上野 您对“警探小子民主主义”评价高，就是觉得就只能指望日本人只对钱和性感兴趣，因此也就不会去打仗，总之就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吗？

鹤见 我对于日本人期望很低。在这样的日本出现了像《警探小子》这样的作品，而且还很受欢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而且我不喜欢知识分子去叱责民众的姿态。

小熊 但是鹤见先生，要让“警探小子”作为“日本人的自画像”被广泛接受是很困难的啊。没有多少人会去主动承认自己就是个只对钱和性感兴趣、盲从权威又仗势欺人的人吧。

因为接受不了这个，现在像小林善范的《战争论》那种赞美特攻队、说为“公”而死很壮美的漫画要比《警探小子》这样的漫画更有人气吧。我觉得小林的《战争论》是作为对“警探小子民主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虽然他自己并不是有意识的。

上野 吉本先生从七十年代起也半是讽刺地倾向于肯定大众消费社会了吧。这是肯定了某种生活保守主义，在结果上追随了高度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繁荣。在我看来，这种对欲望自然主义的有意肯定可以说是随着一切公之大义的消灭而登场的一种思想。我觉得您在同一时期对“警探小子民主主义”的好评也是某种对现状的事后肯定。先不说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您提倡“警探小子民主主义”是出于怎样的意图呢？

鹤见 我觉得《警探小子》很有意思，但没有说大家都应该成为“警探

小子”。我虽然批评知识分子,但对庶民说教不是我要做的。在三十年代是没有出现像“警探小子”这样的日本人自画像的余地的。虽说是来得晚了,但这种自画像的出现说明日本人比三十年代更有自觉意识了。就是这个吧。这样我就很高兴了。

上野 您说不喜欢知识分子叱责庶民的姿态,我很能理解。但我觉得您好像反过来有过分抬高庶民的倾向。

鹤见 是吗?

上野 庶民也并不是那样伟大的吧。我认为自己就是庶民,所以才这样说的。

鹤见 这跟丸山对我的评价很像吧。

上野 如果不是丸山先生,而是像我这样的“女性、孩子”这样说,您会怎么回答呢?

鹤见 我本来就是怀疑主义者,是没有普遍的伦理也不会去教导别人的。我跟川本隆史等伦理学者的不同就在这里。我只能说我想要这样去生活、是这样生活过了,就只是这样而已。除此之外的就不说了。更何况,对以大义为名去杀人的事情,我是想要逃的。

上野 这样的话,您评判联合赤军行为的标准就是“不要杀人”吗?战争期间也是一样,如果面临不得不去杀人的境地就自杀,您是想说这是最后的底线吗?

鹤见 这也是我对我自己的选择。我不能要求别人也把它作为绝对的伦理标准。不过,这就是我反对越南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越南变成社会主义就会幸福这样的。是觉得不想要被国家拉出来去杀人,要反对这样。这就是我反越战的理由。

越平联与逃兵援助

遇到小田实

小熊 那么接下来就请您谈谈主张“不要杀人”的越平联吧。联合赤军和“警探小子民主主义”已经请教过您,关于《思想的科学》、《天钿女命传》前面两天也都谈到了,现在可以说说七十年代以后了吧?

上野 可以了。

小熊 关于越平联的成立,各位相关人士已经写了很多了,那您对这个运动的起源是怎么看的呢?

鹤见 唔——要说的话,是在小田实的《什么都去看一看》里面体现出来的那种开阔,不要把越南战争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情,是这样的吧。

上野 您的意思是说?

鹤见 小田是“没有殖民地的日本人”。他不是那种对欧美卑躬屈膝、对亚洲颐指气使的人。这在他的《什么都去看一看》里面都表现出来了。

那本书是小田在富布莱特项目哈佛留学和归国时世界旅行的记录,但跟以前的留学日记都不一样。日本人的留学日记很多写的都是在欧美的大学用功吃苦成绩提高啦、要不然就是受到歧视民族主义觉醒啦这样的吧。

但小田不论在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介意就用碎片英语。他不会去想着“不是哈佛腔牛津腔就不行”，反倒是以“碎片英语才是世界通用语”的姿态满世界去走，住不了旅馆就睡路边，就这样走遍亚洲、生着疟疾回到了日本。

小熊 用小田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们这一代是“第三代日本人”。明治时期的“第一代”是追随赶超欧美，战前的“第二代”是民族主义觉醒夜郎自大，而“第三代”才第一次开始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其它国家。

鹤见 是啊。他后来 1960 年回了日本，但因为疟疾卧病在床，没有参加“60 年安保”。

1965 年美国轰炸北越的时候，高畠通敏跟我商量，想要把“无声之声会”那样的小型组织联合起来，发起独立于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的反越战运动。我就说，“让安保时期不是领袖的年轻人来主导吧”。于是就选了小田。

上野 您以前认识他吗？

鹤见 就只有做对谈的时候见过一次，没有打过交道。

然后我就给小田家打电话，是他当时的太太接的，说他不在，在西宫的姐姐家。我就打到那边去，小田就说“我干”。三天后，我、他还有高畠在东京新桥的咖啡店见了面。小田已经写好了第一次集会的号召文稿带过来了。

小熊 您没想过选一个更熟悉点的年轻人吗？

鹤见 羽仁进他们我是认识的。除了他之外，其他安保时期在“青年日本之会”的人我也认识不少。不过是想安保时期没当过领袖的人比较好，而且想尽量找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要迈出新的一步那样的。

上野 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吗？觉得如果是畅销书《什么都去看一看》的作者小田的话，在年轻人当中会很有人气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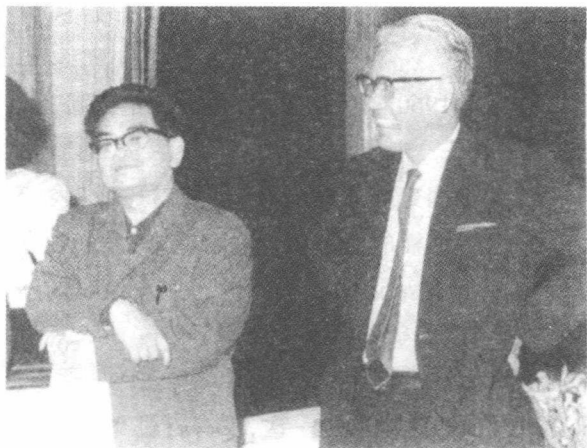
鹤见 是偶然碰上了的（笑）。人生是会有出人意料的事的。

上野 但像安保时期没当过领袖啊、有新鲜感啊、是新一代日本人啊什么的，不也是战略性的考虑吗？

鹤见 我实际的感觉是这样的：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瓶子，好奇地打开盖子一看，瓶子里冒出一股烟雾，里面出现了一个巨人（笑）。是这种感觉的。

上野 原来如此。那么偶然之下，觉得是个好相处的对象吗？

鹤见 他在所有方面都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本来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就是觉得有你出面就已经很好了这样的。



与桑原武夫（1969年，在小田实《现代史》的出版纪念会上）

上野 您这辈子有好多这样的机缘啊。

鹤见 嗯。不过这个巨人把我支使得团团转啊（笑）。他会让我“到那儿演讲、来这儿游行、去那个国家”，还得把每年收入的六成以上都投进去（笑）。

小熊 这么强人所难，那您有没有过想跟他说“别让我去了”、“放慢点速度”的时候？

鹤见 很累的啊（笑）。

上野 您这真是肺腑之言（笑）。但是也没想过要放弃？

鹤见 那是我让他这么干的嘛（笑）。一开始是我强人所难地把他拉来了啊。而且后来高畠去了耶鲁大学留学，折磨小田的人就剩下我了。这样一来，我是没道理要躲的吧。要是躲了的话，在黑道上就要遗臭万年了不是嘛（笑）。

上野 他是能呼应您这种黑社会道义的人吧（笑）。

鹤见 是的。而且他真的是个很有应变能力的人。有的人很能随机应变,有的人就不行。

比如1968年1月,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停靠佐世保。当时佐世保还没有越平联。小田立刻就带着事务局长吉川勇一一起去佐世保了。

当时小田本来打算租一架直升机飞到航母上空撒传单,很是惊世骇俗。他是畅销书作家,还出过全集,钱还是够花的。所以就揣着租直升机的钱直奔佐世保了。

吉川就去找长崎县大村机场的飞机公司,可对方说不会为了这样的事出动飞机。跟博多、大阪的飞机公司去谈也还是不行。要是一般的进步文化人,到这儿也就放弃了吧。但小田不,他租了个小船,买了个扩音器,一边绕着航母划来划去,一边用英语喊“停止这场无聊的战争,逃走吧”。这种事没有应变能力可办不到(笑)。

然后小田还在佐世保加入日本社会党、共产党和新左翼的游行队伍,举着块写着“哪也没加入的人,一起走吧”的牌子,跟吉川两个人去走。然后就有人来跟着他们一起走,在此基础上就成立了佐世保的越平联。

“进击”心情下的逃兵援助

小熊 然后也真有逃兵出现了吧。

鹤见 是的。不过本来没想到真的会有。在此之前我们印了号召当逃兵的传单,让越平联到横须贺去散发,但没怎么想过真能有效果。

但到了67年秋天就真的出现了。停靠横须贺的航母“无畏号”有四名逃兵跑到越平联那里去了。东京的越平联就发电报到京都告诉我。因为当时装电话还没那么容易呢。电报上说:“有逃兵,来电话,越平联。”

对我们这些“战中派”来说,当逃兵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因

为日本的军法规定发现逃兵可以当场击毙。我以前也想逃跑，但做不到。所以就很震惊地打了电话过去。是在京都植物园附近一个叫“橡树”的咖啡店里打的。

上野 那家店几年前还在呢。

鹤见 那里有很多学生来。我就在那给东京的越平联事务所打电话，当时事务所还在御茶水。我跟鹤见良行通话，但如果老说“逃兵”“逃兵”的不好，良行就说“说荞麦面店吧”。然后我就打电话说着“荞麦面店如何如何……”，那些学生们都看我（笑）。

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要说是荞麦面店呢，后来就明白了。是赤穗义士^①啊（笑）。他们进击复仇的前夜是在荞麦面店集合的吧。

上野 噢——（笑）。

鹤见 你别看良行，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他比我小三岁，实际上也是受皇国教育长大的一代。

结果那时逃兵们就被藏在良行家里。他是国际文化会馆的企划部长，要是被发现了是要被开除的。他是赌上了自己的工作。所以是义士进击的感觉。我打完电话以后就马上坐新干线到东京良行家里去了。

然后大家就一起商量怎么办。大家觉得，无论如何要先把有逃兵出现的事实、他们的声明、还有我们的声明记录下来。不然的话，如果被抓住就无从证明他们的存在了，他们的动机也可能会被人随意抹黑。反过来说，他们也有可能是什么组织为了陷害我们而派来的人。如果是这样，留下证据就可以反驳。

上野 这个活用媒体的战略是谁想出来的？

鹤见 当时在场的大家一起决定的，不过出主意的是小田和久保圭之介。决断相当快。

上野 这方面的直觉真是特别的好。

^① 元禄十五年（1703年），四十七名前赤穗藩武士为主君浅野长矩报仇，杀死幕臣吉良义央，事成集体切腹。——译者

鹤见 小田是很有应变能力的。这是他的长处。

小熊 越平联在此之前也有对媒体的活用。1966年的通宵讨论会在电视上现场直播了,在《纽约时报》上也登过越平联的反战广告。

鹤见 当时越平联有电影导演久保圭之介在,他给准备了摄影器材。那天老天保佑,正好赶上吉田茂举行国葬的日子,所以警察跟机动队都去防范学生运动了,我们车上又是摄像机又是摄影师的,也没人来过问。

开拍的时候,起初吉川说越平联方面由小田做代表,拍一个他的个人演说,但小田说这不行。他应该是觉得如果拍这样的电影就会被抓起来的。他虽然有应变能力,但并不是那种无所畏惧孤胆英雄的类型。

后来小田就说四个人一起拍。除了小田和我,还连夜叫来了开高健和日高六郎。

小熊 开高先生当时是越平联的核心人物之一,可为什么还有日高先生呢?

鹤见 日高跟越平联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因为是东大教授所以就叫他来了(笑)。东大教授的头衔是有利用价值的啊。要是声明发出后被逮捕了,还是有个东大教授在的好(笑)。

上野 好吧。东大教授这个招牌是有这种利用价值的(笑)。

鹤见 日高太善良了,是个你把他卖了他还会帮你数钱的家伙(笑)。所以他就没事儿人似的来了(笑)。

小熊 不过他真是个很好的人。我是倒过茶的所以很清楚(笑)。而且半夜被叫出来,做好了被逮捕的心理准备,很了不起的不是吗。

鹤见 是的。是个很不错的家伙。就是太善良了(笑)。

其实,根据日美行政协定,美军士兵是不受日本的出入境管理约束的,就算帮助他们离开日本也不会触犯日本的法律。只有在美国方面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日本警察可以代行逮捕美军士兵。但我们都不知道这些,都以为协助偷渡离境和私藏犯

人是犯法的,大家真的都很紧张。所以尽管都是些外行出镜,却表现出了逼真的张力(笑)。电影拍完已经是天亮了。

小熊 是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并不犯法的?

鹤见 是过了大概一周以后,一位叫角南俊辅的律师告诉我们的。良行还是东大法学部法律系毕业的呢,这方面一点忙都没帮上(笑)。

逃兵进澡堂

小熊 就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下把逃兵藏了起来。

鹤见 是的。问题是把他们藏在哪儿。那时小田正要跟太太离婚,所以在国内没有住的地方。于是就把两个人藏在我东京的家里。然后后来当过京都精华大学校长的深作光贞在茅崎有所别墅,另外两个人就给藏到那里去了。

深作的太太堇也是个很有心胸的人。这种运动没有个贤内助是做不来的啊。

上野 这确实是。把逃兵藏在自己家,整个生活都要受影响的。

鹤见 是的。然后我就把两个逃兵带到我父亲住的东京家里。我父亲就跟逃兵握了手了(笑)。

但麻烦的是这两个逃兵吵起来了。其中一个就开始说不要当逃兵了要回部队去。

小熊 那怎么办呢?

鹤见 我没有介入。就算说他是“叛徒”也没有用。那天晚上就随他们去了。第二天早晨我问他们:“好不容易逃出来了,在日本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啊?”他们就说:“想去叫做澡堂的地方看看。”因为美国是没有这个的。

上野 这次澡堂之旅您也作陪了吗? 可能会被抓起来的。

鹤见 是啊。那他们连日语也不会说,也搞不清楚哪儿是哪儿。

去是决定要去了,但因为还是以为可能会被逮捕,要是自家附近的澡堂就比较危险,所以就去了个远的澡堂。我们到的

时候人家刚刚开门,浴池里阳光金灿灿地照进来。

泡了澡以后气氛就变得非常愉快。等出来回到我父亲家,那个说要回部队去的士兵就说“逃兵还是要继续当”。是日本的传统帮了我们(笑)。

小熊 好故事啊。我喜欢泡澡(笑)。

鹤见 后来因为也不能让他们一直呆在我父亲家,就转移到京都我自己家去了。他们不会说日语,要是跟我走散了就完了。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就跟他们说“不要走在一起。跟着我的时候稍微保持点距离”,我们就去东京站了。

但在东京站碰到了尾崎秀树。又不能跟他说是什么情况,真是很难办(笑)。不过总算是应付过去了。在新干线上我们坐得远远的,到了京都就让他们住在我家附近的旅馆。只有吃饭是在我家吃。

但这样还是要花钱的。所以我就想了个“逃兵下保津”。

上野 那是什么?

鹤见 当时 TBS^① 里有很多越平联的同情者,在援助逃兵的职场募捐当中,他们是规模最大的。他们报道越南战争和三里塚反对修建成田机场的运动时,都被批评为“偏向”,受到了非难。

然后 TBS 带着摄像机,让逃兵沿京都的保津川顺流而下,拍了个片子,做了个“逃兵下保津”的节目,挣了些钱(笑)。

上野 绝密行动和媒体战略兼顾得不错啊。

鹤见 最后吉川勇一去找苏联使馆,让逃兵们坐苏联的船去瑞典了。肯接受逃兵入境的中立国只有瑞典,要逃去那里就只能经由苏联。

所以就从横滨出发,坐船到纳霍德卡(Nakhodka),再坐火车、飞机到莫斯科,再到瑞典去。苏联船出了横滨港以后,我们利用在公海上的这段时间开了记者招待会,还公开了拍下来的纪录片。

① 日本 TBS 电视台(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 Television, Inc.),成立于 1955 年 4 月 1 日,日本五大民营无线电视台之一。——译者

上野 当时还是在冷战期间吧。对拜托苏联没有抵触情绪吗？

鹤见 苏联方面当时也有利用这个事件的一面。逃兵们到了莫斯科以后，苏联方面要他们做这做那，他们也有人觉得很反感。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以送他们去瑞典为先决条件的。

小熊 是谁提出去问问苏联试试的？

鹤见 是吉川。他以前是日共党员，是反原子弹氢弹运动事务局的成员。因为对苏联、中国核试验的评价出现分歧，加上中苏对立的影响，反原子弹氢弹运动后来分裂了。吉川因为对反原子弹氢弹运动受制于党的利害关系提出了抗议，被日本共产党开除了。后来他加入了越平联，他认识苏联使馆的人。

不过他并不是跟苏联使馆有联系，就只是在那有认识人而已。后来《产经新闻》无中生有，说美国情报称越平联从苏联克格勃那里得到了10万日元什么的，但吉川给证明了，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来我跟小田给越平联投入的钱都有这个的几十倍了。

上野 不会有人议论说这么依靠苏联不太好吗？

鹤见 后来援助逃兵时也用了其它方法。比如乘飞机送到法国什么的。这是游历欧洲的高桥武智告诉我们的，说是二战期间用过的方法。

这种情况下法国那边就必须要有去接吧。我就想了一下，做了些写着“horizontal society”的徽章，跟逃兵们说会有戴着这种徽章的人来接你们。日高六郎在法国置了别墅，逃兵们到了那边就由他来接。

上野 是说日高先生在法国置别墅就是为了这个？

鹤见 他真的是太善良啦（笑）。不过他夫人也很了不起。她觉得跟让先生保住东大教授的位子相比，援助逃兵这么浪漫的事更好（笑）。

上野 您刚才就一直在这么说（笑），果然是另一半很重要啊。

小熊 这种秘密活动跟可以自由参加的越平联区别开来，以JATEC（援助反战美军逃兵日本技术委员会）的形式运营起来了。后

来在美军的要求下,日本警察就开始抓逃兵了吧。

鹤见 是啊。68年夏天还把大概是三个逃兵带到鹿儿岛还往南的諏访濑去藏起来了。

上野 諏访濑,就是当时有嬉皮士聚居地的那个地方吧。

鹤见 对。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跟我认识,他跟那边有联系。越平联方面是那须正尚和阿奈井文彦跟着去了。

上野 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啊。

鹤见 现在看来就像是有趣的冒险。

但有一段时期逃兵太多了,快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要把他们藏起来或是送出去都很难。所以后来就成立了PCS(Pacific Counseling Service)来提供咨询帮助,呼吁士兵们不是以逃兵的形式,而是留在军队内部进行反战活动,或者申请基于良心拒服兵役,合法地不失信誉地离开部队。

我们从美国请来牧师,让他们跟逃兵们谈话。有时根据情况也请佛教的僧人来。然后出具一份像证明书那样的东西,证明这名士兵并不是不服从命令而逃走的,而是出于宗教上的信念想要脱离战争。这样他们回到部队以后,虽然会受到军法会议的审判,但如果好好辩护说有宗教上的理由,就有可能被认可为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

有段时期要藏起来的逃兵太多,实在是非常的难办,就一边通过这些活动来帮衬着,总算是让他们在各处躲下去了。

小熊 最多的时候一次有多少个逃兵要藏呢?

鹤见 并不是很大的组织了。也是让他们在相关人士和认识的人那里到处躲,好像最多的时候一次有10个人左右吧。

上野 这很辛苦啊。让逃兵藏在自己家也很辛苦,去找能让他们藏的地方也很辛苦……

小熊 而且要是以后随时都可以接收,逃兵会越来越的吧。

鹤见 所以啊,这是依靠女性的力量才能成功的运动。把逃兵藏起来、天天面对着他们的都是各家的主妇们。还有的逃兵会因为压力或紧张喝酒耍酒疯,她们是很辛苦的啊。

还有逃走的指示啊、送他们去国外时的确认工作啊,很多都是由女性承担的。逃兵对她们也比较信任,会比较容易放松戒备心。最初坐苏联船离开的时候也是如此。当然也有男性做这些工作。不过这基本上是由女性和青年担起的运动。

越平联的组织运营

小熊 越平联打出的是自由参加的原则,谁都可以参加。而且没有本部、支部这样的关系,只要是采取越平联的方式,各地自己去成立组织就可以。东京事务所也不叫“本部”,而是叫“神乐坂越平联”。各地成立的越平联也不用在东京的越平联那里登记,只有一个人也可以叫“越平联”。这种组织形态可以算是网络式组织的先驱吧,那是谁想出来的呢?

鹤见 不是由某个特定的谁给当成原则提出来的。我本来就很不喜欢总店分店这种关系。而且像日本共产党那样有严密的中央本部、党员登记的组织的弊端,以被开除的吉川勇一为首,大家都很清楚。

上野 越平联后来也提出了运动的原则吧。我记得越平联的三原则是:(1)愿者来,不愿者不来;(2)愿者不强迫不愿者;(3)不愿者不拖愿者的后腿。简单明了但非常好的原则。这好像是以1958年三井、三池煤矿斗争时谷川雁先生他们的“大正行动队”的原则为范本的吧……

小熊 这些原则1970年前后小田先生曾经写过,表述形式有所不同(“什么方式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不要对别人做的说三道四”,“提议行动则必须自己带头做到”),不过并不是从越平联的初期开始就明确提倡的。我想并不是受到了谁的影响、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明确的原则这样的。

鹤见 本来一开始也没想到越平联能如此壮大。高畠、我和小田开始就是想先组织游行。后来小田各种临场发挥,逐渐扩大了规模,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什么原则的啊。

而且这些原则也不是越平联首创的。原来的“无声之声会”也是小林登美举着“谁都可以加入的无声之声会”的牌子去走,后来就有很多类似的组织出现了。在69年那会儿,每周都有哪条街上又成立了越平联,说没法统一管理也是可以的(笑)。

小熊 当时越平联的会计报告会在《越平联新闻》上公开,从那些报告来看,作为中心机构的神乐坂越平联本身也是一个很小的组织,跟日本共产党等等都没有可比性。这个小组织的策划,通过参加游行的人们,通过各地自己的组织,变成了很大的运动。

鹤见 不管怎么说是扩展开来了(笑)。全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人都加入了。

小熊 在此过程中,撒播火种的是小田先生、总理事务的是吉川先生?

鹤见 吉川是非常能干有办事能力的人。他当了事务局长以后,会计帐目记录得清清楚楚,像管理通讯录、提交游行申请、安排集会地点这些都做得井井有条。所以,有人中伤我们从苏联拿了10万日元的时候也是,吉川马上就能拿出帐目来,这就很有力地反驳了他们。

小田加吉川是很好的组合。小田到处演讲很有人气,也很能挣钱,但记账就完全不行了(笑)。因为有小田和吉川两个人在,越平联才能运转。

吉川最开始来越平联是在65年借赤坂王子饭店举行通宵讨论会的时候,大家说起没有越南地图很难办,武藤一羊就说“有个人地图画得很好”,就让吉川给我们画了一个。

小熊 那次有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等自民党政治家,还有桑原武夫、久野收、日高六郎、开高健、小田实、坂本义和,堪称超豪华阵容的通宵讨论,电视现场直播。虽然在话题涉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时发生了播送中断的事件,但那可以算是最早的“通宵电视直播”了。

鹤见 是的。从那以后吉川就开始负责越平联的事务工作,人称“事务局长”。越平联并没有正式的总部啊职务啊之类的,不过大

家都这么叫他。还有人管小田叫“天皇”呢(笑)。

小熊 听说武藤一羊先生最初介绍吉川先生的时候是说:有这么个家伙,很能干,但被日共开除了,靠夫人养活很闲,你们不要吗?

鹤见 是的。吉川也有个好太太啊(笑)。没有好太太是搞不了运动的。

上野 那小田先生呢(笑)?

鹤见 他跟之前的太太处得不好,他又很有人气,很受女性喜欢。所以就很多地方都出麻烦。吉川和我到处去消除影响都烦死了。

上野 小田先生当时跟全共斗的口号口径一致,讲“家族帝国主义”。后来好像叛变了啊(笑)。被媒体抓到了吗?

鹤见 那真是败给他了啊。说起来,也请桑原武夫先生和松本清张帮过忙。让松本清张给周刊杂志的编辑部打电话。要是他的连载停了编辑部就很难办了吧。这样才没登出小田的丑闻。

小熊 还得做这样的事啊?

鹤见 清张了不起啊。啊不过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笑)。

上野 您跟松本清张先生也很有交情吗?

鹤见 没有,基本上跟不认识差不多(笑)。不过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就连小田本来也是跟社会运动无关的畅销书作家,跟我们也完全没打过交道,结果一个电话就出山了。“逃兵下保津”这种节目也是TBS给做的(笑)。是很有意思的时代啊。

小熊 有高度经济成长那种“长啊长啊快快长”的气氛,还有战败后无政府状态的继续。

鹤见 小田后来娶了个韩国太太,就相处得很好了。

小熊 那吉川先生原来是日本共产党的资深活动家,如果想把既有的组织论带到越平联里来也是做得到的吧,他都没有这种倾向吗?

鹤见 他不做这种事。他在日本共产党的时候就深知那种组织论的弊端,也深受其苦。他就是因为对“反原子弹氢弹运动”受制于政党的利益方针而分裂的情况提出了抗议,才被日本共产党开除的。

所以他是反感大众运动被党组织牵着走的。当时说要在日本共产党之外组织前卫政党,他自己也是饭田桃发起的“共劳党”的党员。但他决不把共劳党的活动带到越平联来。

小熊 吉川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市民运动的作业题》(思想的科学社)里也写到过,他是觉得“守护越平联不受共劳党影响是我这个共劳党员的工作”。

鹤见 是啊。这是他努力的结果,是吉川给做到的事。

小熊 我写《“民主”与“爱国”》之后也去访问过吉川先生,据说当时有越平联的年轻人想加入共劳党,吉川先生就说:“你啊,入党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再好好想想再决定吧。”

上野 这在当时的左翼人士中是很少见的。

小熊 至少吉川先生自己是这么讲的。吉川先生还说,因为是自由参加的原则,也有新左翼的人来加入越平联。他们在越平联事务所里动员青年加入自己的组织,吉川先生就说:“喂,这里可不是做这些事情的地方。”然后当时新左翼内部就有人传,说越平联表面上打着小田先生、鹤见先生等文化人的名义,背后实际是吉川先生这些共劳党的活动家在操纵。

鹤见 完全没这回事。就是乱讲。本来既无本部又无职务,要怎么操纵呢(笑)?

疲惫与道义

上野 不采取总店分店的方式,也不进行统一管理。但参加的人一多,也会有些年轻人以越平联的名义进行相当过激的暴力行动吧。对此越平联是怎么应对的呢?还是越平联内部就没有过内斗?

鹤见 这个问题是不能不涉及的吧。1969年,围绕小田的小说《冷人》发生过暴力事件。

小熊 那部作品写的是朝鲜人问题和部落歧视问题,也涉及到了受歧视者歧视其它群体的问题。

鹤见 然后就有年轻人出来说,这样的小说不行,作为越平联成员要自我反思,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他们该看作是越平联的呢,还是越平联之外的呢?

小熊 在越平联内部,主张更加激进行动的年轻人把不管怎么说都是领导者角色的小田先生、您还有吉川先生称为“老越平联”加以批评,这种倾向以前就有。这种不满情绪借小田先生的小说而爆发了,似乎是有这样的一面。

上野 原来如此。就算是不设职务的组织,也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鹤见 然后就在越平联接连讨论了好多天,还发生了暴力行为。出了个伊丹越平联,我家被占了两次。我是奉行“绝不找警察主义”的,他们一直在我家占到天亮我也没说什么,后来他们就走了。

还有人强行闯入东京的神乐坂越平联。吉川给我打电话,说有人闯进来,他们被打了。我想这也是一种内斗吧。

小熊 吉川先生是说没有内斗的。挑起这个问题的是“关西部落研究会”,很可能是新左翼派系的一个组织。吉川先生说越平联里有过讨论,但是没有内斗。

鹤见 吉川很爱越平联。所以他就说越平联没有发生过日本共产党或者新左翼那样的内斗,那些都是外边的人干的不是内斗。

小熊 越平联是只要自己说“我是越平联”就算数了的,所以要是口称“老子们也是越平联”闯进来就没办法了啊(笑)。

上野 那小田先生是怎么处理的呢?

鹤见 小田的做法很高明。他们逼他做自我批评然后停止出版,小田就提议说,不停止出版,而是把批评也一起收进来出版。不是让它绝版消失,而是让读者去评判。

小熊 据吉川先生说,小田先生是这样提议的,但开始纠缠此事的关西部落研究会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销声匿迹了。于是小田先生就把部落解放同盟的批评家所写的论文一起收进来,把书出版了。

鹤见 吉川跟我的记忆多少有些出入,不过暴力事件也就只有这些。

除此之外就是有像是警方间谍的人加入进来了。神乐坂越平联的事务所每周二晚上会开组织者会议,决定一些重要事项,也是谁都可以自由参加。那时就有那种让人觉得“那家伙该不是个间谍吧”的人会来。

上野 那怎么办呢?

鹤见 吉川就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才好。我就出了个主意,吉川采纳了,是这样的:

首先,把他列为间谍嫌疑人、大家一起批判他示众,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做的。吉川在日本共产党的时候知道有这种盘查演化成私刑的事件,我也见过他们查问藤田省三,所以都觉得不要这么干。

我们的方法比较花钱花时间:先在事务所里边闲聊,然后就一家店接一家店地去吃东西。这当儿那个被怀疑是间谍的家伙就熬不住了,也没钱了,就先走了(笑)。

然后到了凌晨四五点,就只剩下最早的几个成员了。这才开始商量事情,被间谍听去就麻烦了的事情都留到最后。这叫吃倒战术(笑)。虽然会很累,但这是种民主的方法。就是这么干的。

小熊 了不起。要是新左翼或者联合赤军也有这种智慧……

上野 但是听上去很累啊(笑)。没体力就不行了。

鹤见 那时还很年轻所以做得到。老成员们当时也都是三十几岁四十出头。

小熊 要避免暴力坚持民主的方法,就不能惜力气啊(笑)。

鹤见 说起间谍,援助逃兵的时候,我们还把间谍送到美国去过。是68年秋天,有个人假装是逃兵,到越平联这来了。

上野 有这事啊。

鹤见 那次我是有责任的。也有其他可疑的人来说自己是逃兵,所以越平联的成员就要去见见他们,确认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逃兵。那个间谍到了京都的越平联,说自己叫约翰逊,是深作和我去见的他。

现在想起来,从一开始就不对劲。他把自己为什么反越战说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之前的逃兵没有这样有备而来头头是道地讲反战思想的。

上野 不是“朦胧的确定”(笑)。

鹤见 但是我给他通过了。这是我的失误。把他送到东京以后,东京那边就有人说他不会是间谍吧。因为玩具枪发出“叭叭叭”的声音时,他一下子就跳起来了。是处在戒备状态的。我就说,要是那样的话就让他走不行吗,不过也是很难这样去做的。

小熊 关于这件事,据当时逃兵援助运动的中心人物栗原幸夫先生回忆,他跟您说过那家伙可能是间谍,但您显出不悦的表情说,“彼此之间这么疑心生暗鬼的话,运动也就完蛋了”。

鹤见 是的。结果就把他和一个叫梅尔斯的真逃兵一起带到北海道,想让他们从那里坐船。但这个约翰逊中途消失了,美军的吉普车和日本警察追来,把真逃兵梅尔斯带走交给美军了。负责转移他的山口文宪当时19岁,也被找了个理由带到警察局去了。

在越平联的逃兵援助运动中被捕的就只有他一个。援助行为并不犯法,所以他很快就被放出来了,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没法上大学了。我的失误影响了他的一生。

小熊 但栗原先生说“鹤见先生是对的”。他说如果当时对间谍的怀疑蔓延开来,盘查、私刑也就随之而来,运动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吧。

鹤见 栗原是怎么说的。但那是我的失误。

那个被抓住的真逃兵梅尔斯很久以后回到日本来了。他作为反战人士一直受到迫害,获释以后就到日本来做了关于越平联的演讲。但他的一生也被影响了。

所以我对这次失误是有责任的。间谍是条理清晰的,其他的逃兵都只是说些含混不清的东西。总是信赖条理清晰的人是不行的,也是有这个教训的。

上野 不光是内斗和间谍,也有的年轻人主张以越平联的名义进行暴力斗争吧,这种情况怎么办?

鹤见 这方面也有很头疼的事。68年8月,我们在京都国际会议场开国际会议。那里的馆长高山义三是在战争期间也为无辜的被告奋力辩护的人,有一种“我跟一般的自民党员可不一样”的劲头。我们让桑原武夫、松田道雄和奈良本辰也做代表去申请借会场,他就批准了。

但在会后游行时,有人往机动队和示威者中间投掷盛硝酸的瓶子。越平联的学生也被烧伤了。我觉得是擅自混入游行队伍里的新左翼的人干的,但也搞不清楚。但报纸上就说越平联扔硝酸瓶。这真是非常让人头疼。

上野 但也没有去管制、清除这种行为吗?

鹤见 从65年4月成立到74年1月解散,总共是八年零九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是应付过来了。虽说也是有过失败的。

上野 比如说?

鹤见 69年的时候,东京以越平联为中心举行了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当时就有那种喜欢爬到卡车上、用扩音器发号施令进行煽动的学生也混进来了。

上野 啊,是会有的吧。

鹤见 还有一次是在东京,我没在现场,是70年6月越平联、全共斗、反战青年委员会等共同组织示威游行的时候,有人被学生们当作是可疑的家伙抓起来,让戴着头盔的学生们给包围了。

小熊 当时游行队伍里边有穿着便衣的警察混进来是常有的事。

鹤见 他们就问他,你干嘛的,你家住哪,电话多少。但按他给的电话打过去没人接。他解释说妻子去参加“妇女民主俱乐部”的游行,女儿是学生也去参加全共斗的游行了,但学生们说你别骗人了,还打伤了他。打他的人是某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级人物。学生运动开始过激化,警察也更加暴力,群情激奋十分紧张。后来把他救下的是东大全共斗的人和某大学的越平联活动家。

可这个人并不是便衣警察,而是一个朝日新闻的记者,跟我也很熟。虽说打人的并不是越平联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是在

跟越平联有关的游行中遭到了如此对待。所以小田、吉川和福富节男还去医院道了歉。

上野 这种情况下您会去道歉吧。越平联不是那种可以把人开除的组织,但您会去说“我们的年轻人冒犯您了”吧?

鹤见 会去。黑社会道义嘛(笑)。

上野 这种时候也可以推掉吧,说越平联没有统一管制,是没法管人的组织,所以打着越平联旗号的人做了什么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鹤见 不会推掉。不管怎么说我们要负责。

小熊 就是说,不统一管制,但承担责任?

上野 能做到如此地步啊。这是最高的伦理不是吗?

鹤见 从道理上讲有点怪啊(笑)。嗯,不过是坚持了八年。我也累得喘不过气,但我是在京都,辞去大学教职以后72年还去墨西哥当了一年客座教授。小田跟吉川,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比我更辛苦吧。所以当美军根据巴黎和平条约撤出越南,74年1月越平联宣告解散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轻松了。

上野 是这样的吧。

小熊 这种不去统一管制只去承担责任的态度坚持了八年,真的很不容易。这种热情是从何而来的呢?还是像您写过很多次的那样,战争期间没能有所行动的悔恨,在战后就以行动来补偿吧,是这样的心情吗?

鹤见 是的啊。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了。

但也不光是如此,还有就是,不然就对不起太太们吧。搞越平联活动的人都给自己的太太添了很大的麻烦啊(笑)。无论如何要努力直到越战结束,不然的话就对不起容忍着我们的太太们不是吗(笑)。

上野 哈哈哈哈哈(笑)。这也是道义吗?

鹤见 半途而废的话就对不起太太们。实在太对不起了。就是这么想的(笑)。

小熊 是磨练生活的感觉吗?可是,您不累吗?

鹤见 累。不过也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上野 累,但是愉快?

鹤见 两者是一体的了。就是这样的吧?人生就是如此。没办法啊,被生在这个世上了嘛(笑)。

上野 那八年辛苦疲惫,觉得有所成就吗?

鹤见 在日本能进行这样的运动,我很吃惊。就觉得,我评价那么低的日本人居然能做到这样的事吗。觉得做了真好。不过真的很累啊(笑)。

杂谈3 第三日傍晚

在这儿“散伙饭”

鹤见 这家三岛亭是很有渊源的。据说刚进三高的大宅壮一班会的时候来过。桑原先生也经常带学生和助手们一起来，也带我来过。

小熊 这家鸡素烧火锅的老店，看起来相当有年头了。

鹤见 所以就想着这次的访谈也在这儿告一段落吧。

小熊 访谈主要由我来整理了，您对整理方式有什么要求吗？

鹤见 没有，相信你，都拜托你了。就像若槻礼次郎跟二十几岁的我说，“都拜托你了”。

小熊 我知道了。会用心去做的。

上野 您周围真的有很多贤达之士啊。

鹤见 上野君觉得自己学问上的老师是谁呢？

上野 是社会学者吉田民人先生。

鹤见 啊，是吗？

上野 我是吉田先生的不肖弟子。做的工作跟先生的完全不一样。学生不会看老师做的是什麼，只会看老师是用怎样的态度在做。

小熊 原来如此，可能是这样的。

上野 上课的时候民人先生讲过什麼基本上都不记得了，但我清楚

楚地记得他说过“做学问就像孤注一掷”。这种态度我们是耳濡目染的。

鹤见 哦(笑)? 这说的很有意思。不过他做学问的时候对分类是非常严格的吧。

上野 都说他是整理狂(笑)。结果也没有培养把自己“缩小再生产”的学生。所以可以称为他的传人的人一个都没有。



小熊英二

鹤见 别人都觉得我一辈子都自作主张趾高气扬,可我六十五年来都是作为都留重人的学生而生的。虽然做的事情跟都留先生完全不一样(笑)。

上野 您觉得有没有谁也会对您说这样的话?

鹤见 我想一个也不会有。我也没有徒弟。

上野 您自己是这么想。但说不定加藤典洋、黑川创他们会这么说呢。

鹤见 但在我来讲,要是我死了,葬礼的时候就让我儿子站在门前,说“各位能来非常感谢”就可以了。然后发那本诗集(笑)。

上野 您影响了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鹤见 嗯,不是有意去启蒙的,是偶然的了。而且是“以其昏昏”(笑)。普莱斯(Harry Price)说,人是会模模糊糊地传达出某种信息的。从洛克到休谟,英国的经验主义流派也认为,心灵不是一个关着的箱子,“个人”这一单位的轮廓是模糊的。由此就有了超能力、心灵感应的问题。

小熊 您很早就开始关心宗教思想、心灵感应这些问题了吧。

鹤见 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信息是明确的东西吗?是有“朦胧的确定”这种东西的。小熊君的书里也在讲“心情”什么的吧。

小熊 是(笑)。

鹤见 我在美国的时候只听过一次怀特海的课。是在哈佛的圣堂里。他当时年事已高,行动有些不便,最后他以一句话结束了授课。那是他在哈佛的最后一次讲演。

他最后说了什么呢?后来我找来讲义的复印件确认了一下,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Exactness is a fake”。

上野 噢——(笑)。

鹤见 这是很了不起的。当时哈佛哲学系是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奎因等人在主讲,逻辑实证主义很盛,是追求逻辑上的明确性、“exactness”的。怀特海是对此提出了异议。

上野 最后的努力啊。

鹤见 所谓精确性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出来的东西。人所真正具有的东西是朦胧的。这一事实本身是清楚的,确定的。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观。

上野 当怀特海说出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全场哗然吗?

鹤见 没有,我想大家都没理解。也听得不怎么清楚了。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是当时哲学的源头。他是对当时最前沿的东西提出了异议。

更有意思的是,那次他的课的题目是“Immortality”(不朽)。

上野 哦?

鹤见 他首先定义了不朽。会在此间消失的东西就是“mortal”,就是会死的东西。而有一种东西是可以穿透现在的。这就是“immortality”。是可以穿透“mortal”的东西的。

这是相信价值、把这个世界作为价值来看待的。因为是价值,就不会在此间消失。也无法使它终结。因此就穿透了现在。这就是“immortal”(不朽)。这虽然是朦胧的,但却是确定的。

这种感觉跟金子文子是一样的。读她的狱中手记,她知道就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死去,自己的存在也不会就此消失。她只

上过小学,但在狱中能看到自己的存在,人是能够到达如此之高的境地的啊。

超越个人的

小熊 人死去之后,有什么会超越了个人的形体而留下来吧。与此相关想请问您的是,您长期住在京都,可是完全不讲关西话啊。

鹤见 是的。虽然住了很长时间,但基本上不说。而且我从小就没在祭日活动里抬过神轿。我的孩子我倒是让他去抬了(笑)。

小熊 您昨天说,如果“爱国”的“国”是“故土”的话就可以理解,您虽然不喜欢“nationalism”,但如果是“patriotism”就可以理解。但“patriotism”一般是指对本地乡土的爱吧。那打个比方说,国家要修造水坝,自己的村子将沉入水底,支持国家就是“nationalism”,从村子的立场出发反对修造水坝就是“patriotism”了。但没抬过神轿的您所说的“故土”,并不是这种从本村、当地的立场出发的东西吧。

鹤见 对。所以我对“没有领土的民族主义”这样的说法是有共鸣的。如果是这种感觉,我确实是有的。所以在电视上看到竹内辞职的消息时,就想“啊,那我也辞吧”。那次也跟都留先生被传讯的时候一样,第二天照镜子,发现自己白了些头发。我就明白自己在内心深处跟竹内是有怎样的联系了。所以,我是这样一种“patriotism”的。这是超越了个人的。

小熊 这么说来,与其说是“乡土爱”,不如说更近于“黑社会道义”。

鹤见 是啊。我对桑原先生也有这种亲近感。所以我是不会讲京大的坏话的。东大教授的坏话也是在丸山去世之后才开始讲的(笑)。有个认识的东大教授说,“鹤见君说东大的坏话,是因为你是哈佛毕业的吧”(笑)。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小熊 不是对于像“有领土的国家”这样传统的共同体的爱。但也不是真正的黑社会那种老大小弟的关系,是一个人另一个人的信任。

鹤见 是的。不是老大小弟那样的。从小时候起就不是。

小熊 那就是一种同志式的感情吧。与其说是“patriotism”，不如说是更接近“fraternity”的吧？是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fraternité”。

上野 我一下子就想不到这样的词。我会更倾向于叫“缘”、“知己”。

小熊 “fraternité”是基于共通的普遍原理去构筑同志式的友爱，所以有点不一样吧？不过名称类别什么的都无所谓吧。

鹤见 我对于作为群体的“国家”或“一代”都是不抱期待的。我自己始终抱有“patriotism”之情的是更小的对象。也并不只限于日本，在全世界都是有的。

比如留学时我住过的美国家庭。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批判的，但对他们就有一种“patriotism”的感情。这样的地方散布在世界各地。这跟所谓的领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样去承担着政治理想的人与人的感情，在我内心当中是有的。所以无政府主义的我跟这种“patriotism”是不矛盾的。我不是那种要把国家全部破坏、幻想无政府就能达到美好纯粹状态的无政府主义者。

小熊 那么，您组织“变节”研究小组，做《思想的科学》和越平联，也是要去建立这样的地方吗。

鹤见 为了《思想的科学》，让我背多大的黑锅都在所不辞。这么干着干着，就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跟我一样愿意来背黑锅的人了。像加太浩二啊，上野博正啊。这就是黑社会（笑）。

上野 是跟始终如一地生活的人们的一体感。

鹤见 是啊。这就是“黑社会道义”。

上野 但同时大家是各自走着自己不同的道路。并不是像抬神轿那样，设想好了看得见的共同体的吧。

鹤见 是的。我的无政府主义就是这样的东西。

小熊 于是呢，这样我们三个人也聚在一起了。

鹤见 是啊，这是很重要的。

后 记

小熊英二君的《“民主”与“爱国”》(新曜社,2002年)是以大河小说的方式描写战后思想史的大作,它采用了迄今为止书写战后思想史的人们都没有用过的方法:试着以未被讲述的战争体验作为光源,反照出每一位战后思想家的思想。由此,他的工作就像手影游戏一样,成功地从战后多有叙说的思想语言中揭示出了至今未被言说的战争体验。战后的我们,第一次如此震撼地感受到了这一至今仍在摇摆着尾巴的巨大影子的存在。

对于他所讲到的各位思想家,小熊君目光中投出的感情有深有浅。对吉本隆明可以说是冷淡的,而对他最终没有收入书中的清水几太郎,他的评价之严苛辛辣让我为之胆寒。而他对于鹤见俊辅先生则最饱含敬爱之情,让我感觉得到了慰藉。

对于鹤见先生,我从十几岁起就从未改变、敬爱至今。所谓从未改变敬爱至今,并不意味着没有批评。而是说在各式各样的历史转弯处,他所站立的位置始终是我关心的对象,可以说是我的基准点。鹤见先生被称作是自由主义者——这里的“自由主义”跟小泉纯一郎的“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或是“自由主义史观”的“自由主义”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他什么主义者都不是。不论发生了什么,鹤见先生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自由的理性,让人感到唯有他才能够如此。而思想家的生命力也在于能不断地经受历史的考验。时间对思想家的揭示考验是残酷无情的。但历经时代变迁,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

候,我就会想“如果是鹤见先生的话会怎么做呢”,以此来作为我思考的依据,我始终很敬佩他那种不依赖于任何东西的灵活强韧的态度。想起来,我觉得与其说鹤见先生的魅力是在于他一贯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在于他自己称为“黑社会道义”的那种一贯的态度。

不过,在读到小熊君的著作之前,关于战争体验在鹤见先生那里投下的影子,我并没有什么认识。这可能是因为我只将鹤见先生当成了同时代的思想家来阅读,也可能是因为这位如此高产的作家关于战争期间写得相当有限。小熊君让我看到了“怀着没有写下的体验而写下的东西”的重量。

后来这位小熊君对我说,想去见见鹤见先生,见见他,请他讲讲没有全写下来的战争期间的体验。在《“民主”与“爱国”》写完之后,写过了很多位思想家的他,觉得特别有兴趣、想要直接去问问本人看法的就是鹤见先生。他就来邀请我,说“能不能出书还不知道……”我感觉这样的机会可能再也不会了,于是带着一种祈祷的心情接受了他的提议。

鹤见先生对我们这个将成果得失都置之度外的提议表示欣然接受。在没有跟任何出版社签约、没有任何编辑参与、没有从任何方面拿钱、也没有给任何谢礼的情况下,在2003年春天的京都,先生跟我们谈了三天的时间。这是无比充实丰富的三天。

“对于我来日无多的人生,三天是相当长的时间了。问什么都可以。我都告诉你们。”……再没有比这更深的信任了吧?而我们也暗暗地加快了速度。鹤见先生已是高龄,随时都可能有什么发生。这几年他心脏有问题,身体不太好,我是知道的。从开始联系到实际访谈要几个月。把录音打字整理出来又要几个月。就算运气好能找到地方出版,打出清样请作者校正又得要几个月。这期间万一有什么的话……大家嘴上都不说,但都在这样想。鹤见先生还对我们说,“要是有什么的话……”校对什么的“就都拜托你们两位了”。

鹤见先生自己是少有的多产作家、座谈名家,也接受过很多的访问。我们就专门追问他没有说过的事,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可能都不好问的事。所以这部访谈不是对长年偶像的追捧,也不是你好我好的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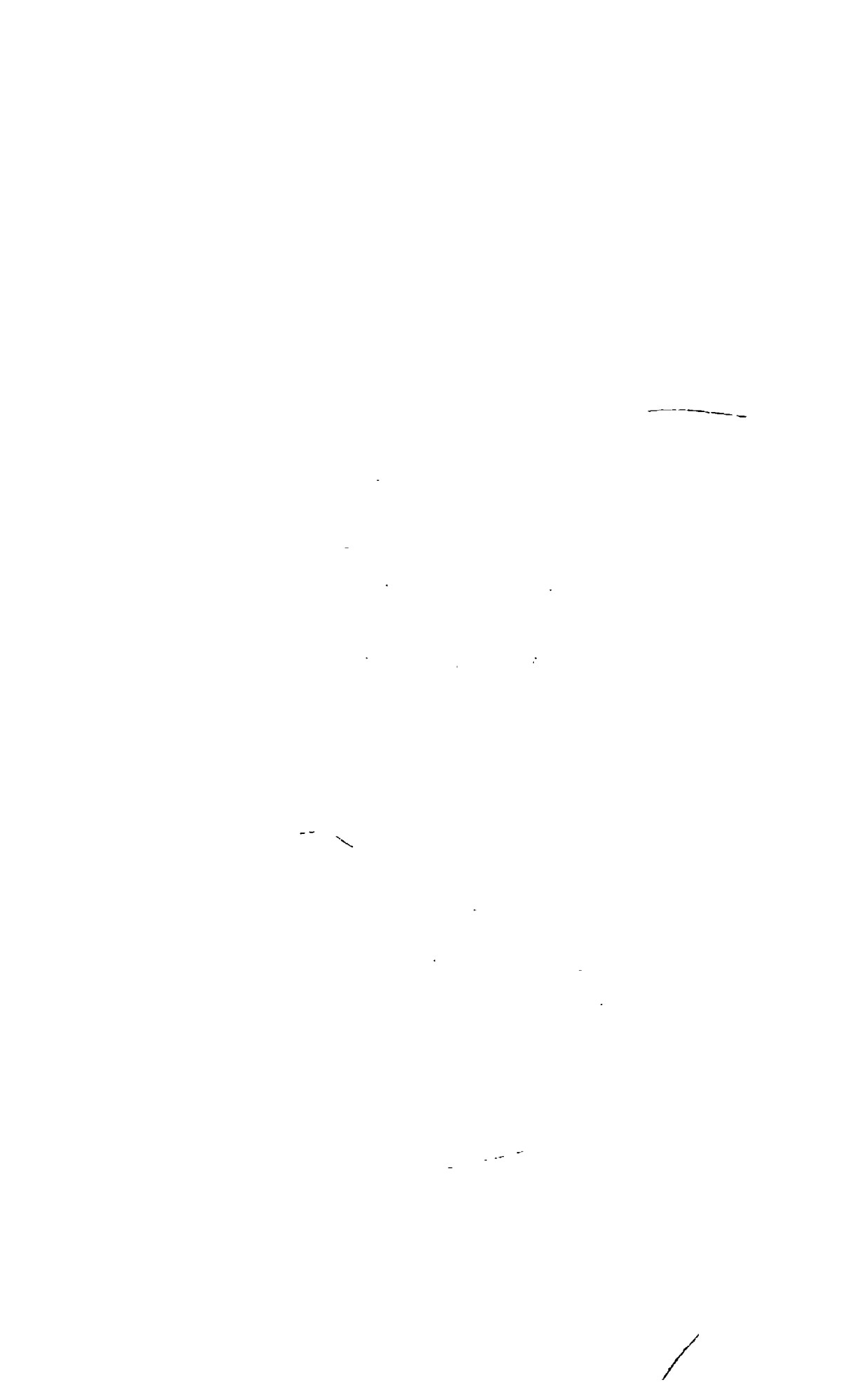
美。在我看来,小熊君是个不考虑后果的提问者,事后不知所措;而在小熊君看来,我可能也是个不留情面的提问者,打破砂锅问到底。虽然纸上的铅字表现不出,但对话中常常出现充满苦涩凝滞的沉默。鹤见先生仰面向天,挤出话来讲。

在这种没有妥协的对话间隙,在春天的京都品尝美味时的谈话就成了可以让人稍微松一口气的幕间休息。这样的气氛,各位读者大概也能体会得到吧。变换版式以表现出幕间气氛是本身也是位出色编辑的小熊君的主意。出版事项则由出版过小熊君的书的新曜社承担下来了。在长期联系未果的情况下,在编辑涡冈谦一君的努力下最终得以出版,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本书是与许多人的编辑能力分不开的。

面对鹤见先生深深的信任,感觉就像是接力棒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和小熊君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日本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之多都是战后出生的。战争体验已经不再能让经历过战争的人讲下去,而只能由完全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人们重构接受下去。但是,即使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战争也丝毫没有变成过去的东西。从那惨痛的经验当中,我们学到的还远远不够,就是这样的吧。

历史只会在要去学习它的人面前显出身影。在历史这条没有路标的路上,先于我们而立而行的鹤见先生的理性能让我们学到很多。可能我们是有些性急、缺乏考虑地让鹤见先生讲了许多他没怎么说过的话。这是鹤见先生给我们的宽容和信任,而接受这些的我们感到了责任。衷心希望这种责任也能与身为读者的您分享。心怀此愿,将本书交在读者的手中。

2004 年冬
上野千鹤子



我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 (译后记)

我喜欢丸山真男,对鹤见俊辅没什么感觉。日本念书的时候有幸听过这位老先生的讲座,日本人都好爱他的样子,讲完了把他团团围住,我等了半天好不容易逮到个机会请问他宪法问题研究会的事,也是自己之前功课做得不好,老先生一句“不太清楚”,我也再不知该怎么往下问了。

后来于铁军老师问我要不要翻译这本书。我相当犹豫,只答应去找师兄看看再说。翻译很重要,却是最最吃力不讨好,论文写得这么慢,再爱也只能克制,再说又不是丸山真男。

师兄那里翻到了书,还是相当犹豫。挑出他写丸山的地方看了又看,不怎么喜欢,也不怎么讨厌。腰封上大概是要吸引读者,写着什么“美国坐过牢”“战时慰安所”“60年安保反越战”“跟丸山真男吉本隆明都熟”……这是一本对谈,访他的是上野千鹤子和小熊英二。上野可能很多人不熟,她研究的是大家不热衷的性别问题;小熊更有名些,因为他有一本大厚书叫《“民主”与“爱国”》,虽说里边写丸山的部分我不全同意,但此人东大农学部毕业,岩波书店工作过,以前乐队吉他手,后来研究思想史,是个好玩的人。

继续犹豫的当儿,又有几次长谈,只模糊记得为什么答应帮翻前言,但最后到底是怎么答应要翻这本书的,我真的不记得了。再后来师兄和大姐一起坐在对面冲我笑,我只能拼命絮叨请他们再多给一点

时间。

话说我就硬着头皮翻下去(因为时间总不够用),看鹤见跟上野和小熊讲生病和恋爱、追求和失败。羽仁五郎对他说,要是读了我的书那么感动,为什么没有跑来打开监狱的大门呢?你八月十五日那天在做什么啊?桑原武夫对他说,你是生病了,别说这事,还领京大的工资,休养休养吧。《思想的科学》开始谁都不怎么明白对方研究的东西,刊名还是碰巧路过的上田辰之助给起的。问投奔“越平联”的越战逃兵想去日本哪里玩,美国大兵说想去叫做澡堂的地方看看。……这本书让我哭,让我笑,也陪着我哭,陪着我笑。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在生活。

鹤见俊辅的观点我未必全都同意,但我想应该把它们真实地呈现出来。他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在日本也有着确实的影响。他和他的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战争,反思过战争,对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他们是研究者也是实践者。这本书有很多生动的细节,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语境,可以让我们都想想看,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到底有多少是模糊的?那些在西方和中国都有的概念,在日本又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中国和日本是不能搬家的邻居,我们都需要耐心,好好地彼此了解下去。

我想这本书里,不但有鹤见上野小熊,有羽仁桑原丸山,也有师兄和师姐,有两位于老师,有大野先生,有许老师唐老师,有北大人大外交学院社科院的好多好多老师,还有我不管在哪里都努力不放弃的兄弟姐妹们,在他们面前,我没有资格说累。

我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过我想这本书应该翻。谢谢于老师让我翻译,谢谢师兄当责任编辑。此外还要特别感谢笹仓秀夫老师的鼓励,谢谢夏维勇师兄审阅了“越平联”部分,谢谢漆麟、唐英英、谭牧、劳展新、彭云的字句,谢谢素未谋面的森川裕贯博士的指点。当然,翻译的错误不足都由我个人承担责任,敬请读者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邱 静

2014年12月

阅读日本书系编辑委员会名单

委员长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

委员 常绍民 三联书店(北京)副总编辑

张凤珠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谢刚 新星出版社社长

章少红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

金鑫荣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韩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事务局组成人员

杨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胡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艳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祝得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力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日本书系选书委员会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高原明生(委员长)	东京大学教授	中国政治、日本关系
荻部直(委员)	东京大学教授	政治思想史
小西砂千夫(委员)	关西学院大学教授	财政学
上田信(委员)	立教大学教授	环境史
田南立也(委员)	日本财团常务理事	国际交流、情报信息
王中忱(委员)	清华大学教授	日本文化、思潮
白智立(委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学副教授
周以量(委员)	首都师范大学	比较文化论副教授
于铁军(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外交副教授
田 雁(委员)	南京大学	日本文化中日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